



---

# 中共党史人物传

---

## 第三十三卷

---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

# 第三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9 字数 255,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 1-5,000

统一书号：11094·204 定价：(精)3.4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 目 录

- 罗荣桓.....李 圭 ( 1 )
- 邓 华.....罗印文 ( 120 )
- 安体诚.....张守宪 董建中 ( 177 )
- 杨峻德.....冯 奇 ( 201 )
- 林道文.....林锦文 ( 215 )
- 段玉林.....裴年松 ( 231 )
- 彭之玉.....荆 国 ( 249 )
- 杨幼麟.....谢秉忠 ( 263 )
- 彭干臣.....张锡岭 彭醒华 ( 275 )
- 孙仲德.....蒋晓钟 ( 291 )
- 冀朝鼎.....曹云鼎 李 吉 ( 312 )
- 郭晓棠.....张仁荣 ( 329 )
- 张克侠.....杨明训 谢公义 张光天 ( 339 )



罗 荣 桓



邓 华



安 体 诚



杨 峻 德



林 道 文



段 玉 林



彭 之 玉



杨 幼 麟





彭 干 臣



孙 仲 德



冀朝鼎



郭晓棠



张克侠

# 罗 荣 桓

李 圭

## 青少年时期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现衡东县杨林区鱼形乡）。他的祖父罗汇吾，以教书为业。父亲罗国理，二十岁时当过童蒙教师，后来借钱在南湾开了一个“永隆”杂货铺，兼卖中药，家境渐渐好转，添置了一些田产，并担任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一九〇八年以后，因受人诬陷，打了几年官司，家境开始衰落。罗荣桓的母亲姓贺，为人宽厚，勤劳善良，亲友称誉她“外柔内刚”，是“寒林一枝之秀”，她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对罗荣桓影响很深。

罗荣桓原名镇慎，字雅怀，号宗人。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八岁入私塾。他学习刻苦，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还翻出家里的藏书，废寝忘食地阅读。十二岁，罗荣桓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他对学校开设的国文、算术、博物、历史、地理等课很有兴

趣，学得很认真，对历史上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非常景仰，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sup>①</sup>的作文，称赞大禹公而忘私的高贵品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被老师选为范文。一九一六年夏，罗荣桓高小毕业后，又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

一九一九年秋天，罗荣桓离开闭塞的南湾到长沙，考进协均中学（原名谊群补习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新旧思潮斗争激烈：一方面，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日益高涨；另一方面，“读经”复古的逆流也在泛滥，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学说纷纷出现。罗荣桓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他影响最深。他从毛泽东充满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吸取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这年底，他参加了长沙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暑假，罗荣桓由长沙回家，遇到寒水乡地主萧罗仙不顾天旱歉收，率众到南湾刈禾逼佃，他父亲罗国理为了保护族人利益，出面制止，双方争吵，引起械斗，受地主诬告再一次吃了官司。这件事使罗荣桓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重要。于是，他以长沙学生联合会为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当时衡山县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在南湾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sup>②</sup>。罗荣桓被选为会长。联合会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开展平民教育，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校舍，因陋就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罗荣桓教算术。夜

---

<sup>①</sup>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92页。

<sup>②</sup>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怀念罗荣桓同志》，第93—94页。

校还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深受农民欢迎。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长沙湘江边向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慨投身到这一反日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六月一日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举行的抬尸游行和六月四日召开的追悼大会。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准备镇压。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不得不回乡暂避。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他不坐从长沙开往衡山的日本轮船，走了几天旱路回家。

一九二三年暑假，罗荣桓来到北京。他和几个同学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里，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樾，曾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鼓吹“联省自治”，为赵恒惕歌功颂德。罗荣桓和同学一起揭露易家樾的骗局，并高喊口号把他轰出了会场。

在北京的一年里，罗荣桓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去青岛入学。

在青岛大学，罗荣桓进行过“实业救国”的尝试。为了抵制日货，他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三民实业社，吸收投资，每股五元，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自己动手生产出纱布、药棉、墨水、肥皂等日用品。罗荣桓看着这些刚出厂的产品，十分高

兴，立即给南湾老家寄了一大包肥皂，写信说：这是同学们自己做的，不要再叫它“洋碱”了，应该叫它肥皂。但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几个青年学生仅凭一腔爱国热情办起来的小小手工作坊，怎能经得起风浪，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连股本也没有收回来。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青岛日本纱厂的三万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五月二十九日，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日本人的旨意，调集军队镇压，打死八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青岛惨案，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青岛大学在学生会组织下，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罢课。罗荣桓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慰问死难者家属，募集救济金支援青沪两地工人。学校成立了义演话剧团，他到处劝售戏票。他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去上海进行宣传活 动，揭露青岛惨案真相，呼吁青沪各界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卓越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

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时，思想活跃，考虑的问题很多，例如，怎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怎样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怎样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总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谈论人生观时他表示：“我也想当工程师，当建筑师，但是现在看来，首先要和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sup>①</sup>。在谈到对政党问题的看法时，有的同学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争权

---

<sup>①</sup> 黄瑶：《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以后引文凡出自此书的，不再一一注出。

夺利，假公济私，因此还是不参加政党为好。罗荣桓则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和同学张沈川一起乘船经上海、厦门去广州。八月，罗荣桓到广州后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报上不断传来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罗荣桓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

同年秋，罗荣桓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先到县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及县农民协会联系，听取指示，接着召集积极分子在鱼形山上开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此后，他又挨家访问宣传，动员农民参加农协。十一月（旧历十月），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成立，罗荣桓是农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宣传革命形势和农会成立的意义与任务。会后，全体会员高举“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和旗帜游行。罗荣桓还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他起草章程，挨户动员，并出席了两个组织的成立大会，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还领导群众斗争了杀害儿童团员的反动地主罗凤梧，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南湾的农民运动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的仇视和反抗。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南国民党右派、地主“保产党”头子刘岳峙组织



“左社”，诬蔑农民协会是“地痞流氓”组织。各地土豪劣绅闻风而起。南湾地主罗凤梧、肖罗仙等一面造谣中伤，骂罗荣桓是“罗痞子”，一面搜罗流氓地痞另立假农会与农会对抗，并密谋暗杀罗荣桓。罗荣桓对这些诬蔑、恫吓毫不畏惧，写文章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罗荣桓在武汉读书的同学来信，谈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要他到武汉去。四月十四日，在农友的护送下，罗荣桓摆脱了地主豪绅的监视，离开衡山经长沙到达武汉。

罗荣桓到武汉后，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集会游行、街头演讲、化装宣传等活动。这时，罗荣桓在青岛大学的好友彭明晶也在武汉，由彭明晶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他指挥农民自卫军智取了通城，缴了反动民团的枪枝，随即组成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由王武扬担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九月初，罗荣桓等率领崇阳、通城农民武装一百余人到达江西省修水县，同没有赶上八一起义而转来修水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农民武装编为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罗

荣桓任党代表。

罗荣桓不熟悉军队工作，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战士谭希林等请教。谭希林向他介绍了士兵爱戴的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罗荣桓听后很受感动，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惩罚，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所以大家都尊重他，服从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同其他党代表一道，在我军历史上，开创了连队党代表的实践道路。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四个团，武昌警卫团为第一团。秋收起义受挫后，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往一营，由朱建胜接任连长。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建胜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定改变原来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两省边界的农村进军。在文家市，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到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在起义受挫折后，毛泽东把革命力量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比做一口大水缸。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罗荣桓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增加了坚持革命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前委决定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和特务连。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连长曾士峨。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决定，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罗荣桓后来回顾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三湾，当天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下的茅坪，不几天，又在毛泽东率领下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途中，罗荣桓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在士兵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该连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有了我军最早的这批士兵党员，才使“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决定能够实现。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湾改编，到一九二九年底古田会议，在两年零三个月中，罗荣桓曾历任特务连、九连、八连和三营的党代表。他是我军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党代表之一。

他在九连工作时，始终坚持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时，他和连长并肩冲在队伍的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被子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而战士们有了病，他却一天几趟问寒问暖，还要伙房给做好病号饭。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

罗荣桓调到八连后，十分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了加强党支部的建设，他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

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家庭成分十分困难。罗荣桓反复向当时在八连当班长的党员张令彬等交代：“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政治表现搞清楚。”他特别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时连队吃的主要是红米饭，吃饭时没有碗筷，饭熟了，由炊事员捏成饭团，一人一个。因为经济困难，饭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分完了饭团才回来，有就吃，有时分完了就饿一顿。罗荣桓还要求全连党员分工，对非党员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给予具体帮助。连队的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很及时。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罗荣桓任三营党代表，伍中豪任营长。八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附和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致使该团和二十八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等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接回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逃散）。当三营夜间通过桂东地区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时，只少一个担架兵。等部队回到井冈山，发现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成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三营在巩固部队方面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一个重要原因

是，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部队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坚持肃清封建残余，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当时，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军官中的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是家常便饭。罗荣桓不同意这种作法。他从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从不打骂士兵。即便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他任三营党代表时，曾对一个打了战士的班长谈话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这个班长承认并改正了打骂士兵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对于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党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建党、建军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当时任支队（营）党代表的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会议最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九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这次会议毛泽东、陈毅都未参加。这个会开得不好，“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sup>①</sup>。在这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许多代表都同意，有人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大会还为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十月底，红四军攻打广东梅县

---

<sup>①</sup>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7年9月—1930年4月）。

时，罗荣桓率九支队打进北门，腰部右肋下负重伤，谭政等把他抬下火线。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撤到寻鄜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下旬红军收复汀州后，罗荣桓住进傅连璋的医院治疗。

十二月初，罗荣桓伤愈出院归队，随即率领三纵队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这期间，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他多次召集党代表座谈，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座谈，并积极反映了部队情况，介绍了政治工作经验。十二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镇召开，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罗荣桓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罗荣桓等“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这时党代表都已改为政治委员），二纵队司令为曾士峨。罗荣桓来到二纵队，首先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要求部队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他还建立了经常性的党的教育制度，按时上党课，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思想建设。到三、四月间，二纵队在罗荣桓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贯彻古田决议，又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sup>①</sup>。

---

<sup>①</sup>“七部曲”是：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使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一九三〇年六月，罗荣桓调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军长为林彪。罗荣桓到四军后，十分重视部队的青年工作。当时部队刚开始设专职青年工作干部。他找军部青年委员肖华谈话，要求“首先把各师、各团的青年团组织建立起来，要调一部分年轻的党员作团的骨干，将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经过他们，将连队的团支部和团小组建立起来，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还对肖华说：“要把部队搞得活跃一些，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要符合这个特点，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政治机关的努力下，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同年八月，罗荣桓被正式任命为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十一、十二月间，一方面军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肃清“AB团”的活动。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估计敌情的错误，出现了扩大化，使许多无辜同志被捕被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对待这一事件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坚持政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挽救释放了许多被捕的同志。红十二师根据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当时部队中就流传着“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尽管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批评为“肃反不力”，“右倾”，但他却减轻了肃清“AB团”对部队造成的损失，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粉碎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创造了胜利条件。

## 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后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四军召开了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他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个有利条件。这八条中，前两条讲的是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罗荣桓讲完话又领着部队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昂扬斗志，扫除了不久前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恐不安情绪。大会之后，部队即准备进入战斗。按照统一部署，罗荣桓与林彪指挥四军向龙岗西北斜插过去，切断敌师部和后备旅的联系，与红三军联结起来，使敌人陷入重围。三十日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乘胜追击，又歼敌五十师一半，第一次反“围剿”至此胜利结束。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对我中央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我军主力由边沿区移至广昌、瑞金地区做反“围剿”的准备。这期间，罗荣桓以全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



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又召集了有驻地人民代表和广大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粉碎敌人“围剿”。四月下旬，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东固、龙岗一带隐蔽待机。这时，由于几万大军集结在大山中，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罗荣桓一面抓训练，一面抓生活，带领干部战士想方设法解决吃饭问题。同时，他始终抓紧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四军部队经常上政治课，召开党、团员会议，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反“围剿”战斗中党、团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红军一、三军团由江西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红四军参加的各次重要战斗，罗荣桓都亲临前线指挥。

一九三一年八、九月，红军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中，红四军曾抓了一些俘虏，缴获敌人大批枪枝。部队转移时，敌军紧追上来，把一些俘虏、枪枝又重新夺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在四军军委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深刻的检讨。随后，他被免去了四军军委书记职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组成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四月，由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红军东路军，向福建进军并攻占了漳州。罗荣桓很重视城市工作。在红军入漳州之前，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并要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

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他还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穿长袍、戴礼帽的人都当成土豪。”进入漳州城后，罗荣桓首先抓纪律，红军良好的军纪，给漳州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赢得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接着，罗荣桓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分别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成立了漳州市工农民主政府。不久，撤离漳州。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对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建议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后，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罗荣桓等也随之受到排挤。一九三三年春，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不久，有一段时间罗荣桓身体不好，经常发疟疾，不能下部队。有的人就批评他“官僚主义”。五、六月间，罗荣桓被调离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在受到排挤、身处逆境之时，罗荣桓仍然坚持原则，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利益。他离开一军团到宁都时，遇到两个也受排挤的老战友。他们向他倾吐了心中的不快。罗荣桓对他们说：“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四月，罗荣桓在五次反“围剿”中，在广昌前线遇到因对李德的指挥不满而被撤职的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罗荣桓对满腹委屈的唐天际说：“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

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对人民武装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一九三三年六月，为了贯彻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他兼任了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带领扩红工作人员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做动员宣传工作。他强调在工作中要讲清武装保卫苏维埃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反对强迫命令，要注意协同地方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群众运动。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给予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等几个先进单位以“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并决定把罗荣桓等人名字登在苏区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广泛宣传他们的经验，以教育全党同志。一月十日，《红色中华》发表了表扬罗荣桓、罗迈、毛泽覃等的“红版”。一月下旬，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的优异成绩，在大会上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县崇贤镇组成，罗荣桓调任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十月，被迫长征。十二月，红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下一千多人，后经军委指示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被任命为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以后，罗荣桓曾短时间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在长征途中，罗荣桓跟随干部团行动，不论环境多么艰

苦，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罗荣桓又调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筹粮和群众工作。九月下旬，红一、三军团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到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罗荣桓在这里嘱咐部队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十月，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主力战胜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一九三六年二月，罗荣桓根据党中央决定，带领一军团渡河东征。三月初，一军团在山西中阳县以南的关上村战斗中，消灭了进攻红军的阎锡山主力独二旅。罗荣桓随即在汾河流域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大红军，取得了显著成绩。五月，罗荣桓随东征部队返回陕西。六月，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罗荣桓调红大学习，并任一科（主要收师以上干部）政治委员。在红大，他一面参加学习，一面抓思想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迁往延安，罗荣桓调延安，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后方政治部主管着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独立师的政治工作。他同时还到红军大学第二期讲授中国革命史和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受学员欢迎。

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与林月琴在延安结婚。

同年七月十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任命罗荣桓为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

桓（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聂荣臻为——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此后，罗荣桓即随——五师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艰苦曲折的八年抗日战争中。

## 向山东敌后挺进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五师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六连，抵达晋冀交界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十月，——五师骑兵营收复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抗日后的，从敌伪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潘振武率领宣传队，赶赴曲阳县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任潘振武担任曲阳县县长。接着，在罗荣桓领导下，我军又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阜平成立，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即率——五师政治部南下，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晋南的赵城一带，同——五师司令部会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吕梁山地区，巩固战略枢纽的指示，二月中旬，——五师移至汾阳、孝义地区。三月二日，林彪被阎锡山部队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三月中旬，罗荣桓和陈光指挥三四三旅在晋西大宁的午城、井沟伏击日军，连续战斗五个昼夜，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粉碎了敌人西渡黄

河、威逼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九月中旬，又在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两侧，三次伏击扫荡吕梁山根据地的日军，三战三捷，毙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十六名，缴获汽车三十余辆。显示了我军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巨大威力。

九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他着重谈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两个问题。

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去山东敌后建立根据地。十二月二十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部队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从介休越过积雪的绵山，到达晋东南的电留、长子一带，在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迎来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听取了朱德作的形势任务报告。经过短期休整，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名义，在罗荣桓率领下，向山东进发。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罗荣桓率东进支队从濮城、鄆城一带渡过干涸的黄河故道，进入鲁西鄆城地区。东进支队一到山东，罗荣桓就和陈光商定，首先要打一个胜仗，以扩大我军影响。三月三日夜晚，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全团把驻鄆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全部歼灭，俘团长以下五百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这是一一五师入鲁后的第一个胜仗，我军声威由此大振。樊坝战斗后，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与陈光决定，由杨勇、何德全、张国华等率六八六团三营等部队留在鄆城地区，称东进支队第一团（后改为独立旅），在这一带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三月六日，罗荣桓率师部及六八六团一、二营继续东进，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同中共泰西地委和八路军山东

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罗荣桓到达泰西后，先召开一一五师高干会议，传达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十二日，他又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的形势，说明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创造泰山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依山（泰山）伴湖（东平湖），向外发展。他指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罗荣桓特别强调：主力部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要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兄弟部队<sup>①</sup>。

罗荣桓来山东时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受党中央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三月下旬，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深夜越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到达驻在沂水县王庄的中共山东分局，会见了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等人。罗荣桓向分局主要领导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正在这时，传来了顽固派秦启荣指使部队在淄川以东太河镇残杀我过路干部战士多人，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罗荣桓听到此事，极为愤怒。他亲自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会议，明确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政治上必须彻底揭露，在军事上应当狠狠打

---

<sup>①</sup> 《罗荣桓年谱》（初稿），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期207页。

击，绝不能心慈手软。四月二十日，我军向太河镇顽军发起反击，歼敌一部，收复了太河镇。

四月下旬，罗荣桓回到泰西。五月五日，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武装问题，二是政权问题。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游击部队应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之下，加强政治工作，依靠党来保证统一指挥，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克服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他在讲到政权建设时指出，“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建议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的代表组织泰西联合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泰西的统一行政机关<sup>①</sup>。

深入泰西的我军，好似插入敌人心腹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浦路中段的敌人。一一五师师部从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八日，一直驻在肥城以南的中古城。这里距泰安不过五、六十里，六八六团已经活动到距津浦铁路只有十几里的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同志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罗荣桓在五月五日的报告中，及时告诫说：“敌人虽然受了打击，然而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会到来。”<sup>②</sup>果然如他所料，一一五师在泰西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亲自指挥调集五千余人，并配有战车、汽车、坦克百余辆，大小炮百余门，兵分九路，于五月九日开始向我泰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十一日，将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于肥城以南陆房地区。罗荣桓当时去东汶支队，不在师部，陈光指挥我军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当晚突出重围，十二日拂晓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在这里会合了罗荣桓。由

---

<sup>①②</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送审稿），第66—67页。



于我军在陆房战斗中处于非常被动和危险的境地，伤亡了一些同志，丢掉了许多东西，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并有埋怨情绪。罗荣桓回到师部后，听到这些议论，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强调战后的主要问题是正确地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士气，而不应埋怨指责。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说明我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有的同志埋怨我们的一些骡马驮子在战斗中丢掉了，这等于是敌人替我们搞了一次轻装，使我们丢掉了包袱，这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更加有利于机动地打击敌人。现在丢掉一点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sup>①</sup>。罗荣桓的讲话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内部团结。

陆房战斗之后，罗荣桓安排师直属队大部分人员过了津浦路东，他自己与陈光继续留在路西，指挥其余部队坚持鲁西平原的游击战争。七月下旬，罗荣桓到达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回来，与罗荣桓会合。八月一日，部队正准备在前集召开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时，突然接到情报：有一股敌人正从汶上直奔梁山而来。据侦察报告，这股敌人属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约三百余人，配有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野炮，准备到梁山一带进行“扫荡”。当时，一一五师师部所掌握的兵力不足一个营，但附近到处是青纱帐，便于我军隐蔽运动，在梁山南边二十余里还有杨勇独立旅的部队可以调来参战；而这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69—70页。

股敌人没有后续部队，人数不多，孤军深入，指挥官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十分骄横。罗荣桓与陈光分析了上述敌我形势，认为我军兵力虽不多，但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决定由陈光指挥这一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八月二日上午，将敌人全部歼灭，俘日军十三人，缴炮三门，骄横一时的长田敏江也被我军击毙。梁山战斗的胜利，震动了鲁西，传遍了山东，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也坚定了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不久，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参战部队。蒋介石也发来一封嘉奖电报，还送来三万块钱表示慰劳。这样一来，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存在。

梁山战斗后，罗荣桓率师直部分人员在东平湖中的小岛上隐蔽，指挥我军反“扫荡”战斗。

九月，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特务营等单位，开始分别越过津浦路，东进至鲁南。教导大队已于五月先到鲁南费县。罗荣桓也于十月份到达鲁南。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抱犊崮附近的上大炉召开的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欧洲大战的起因和前途，欧洲大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日本和英、美、法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中国抗战的困难和危机，着重强调：“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的危险，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sup>①</sup>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91页。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罗荣桓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正当罗荣桓为开创鲁南根据地的新局面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从湖西传来大批干部在“肃托”中被害的消息。他忧心如焚，立即与率领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和一支警卫部队，星夜赶赴湖西。

### 微山湖畔 力挽狂澜

湖西地区处在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战开始后，湖西人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成立了抗日武装，初步开创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开了湖西的局面。后来，苏鲁豫支队同当地抗日武装合编，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正当湖西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八月，突然发生了“肃托”事件，短短一个多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数百人，被杀害者二三百人。湖西地区的党组织——苏鲁豫区党委，除了一名书记，其余负责人全部被杀、被关<sup>①</sup>。

湖西“肃托”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罗荣桓从靠近湖西的冀鲁豫支队杨得志的来电中，得知湖西在“肃托”中杀了很多人；同时还接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92页。

到苏鲁豫支队关于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逮捕的报告，他感到问题严重，立刻发电报，命令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立即停止捕杀，并将杨得志的来电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郭洪涛发电报同罗荣桓商量一起去处理此事。罗荣桓在出发之前，再次发电报通知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sup>①</sup>。罗荣桓带领保卫部干部及警卫部队十一月从鲁南抱犊崮山区出发，与郭洪涛、张经武会合后，昼夜不停地赶往湖西。罗荣桓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部署沿途警戒，采取一切措施，加快行进速度。他们穿过津浦路，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这时，四大队也已由鱼台县转移到单县朱集一带。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不进王凤鸣的驻地，而驻在附近一个村子里，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而后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同时，把带来的保卫部干部组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的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经过调查了解，湖西“肃托”首先是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起来的。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干校青训班毕业的时候，有些学员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在干校处理此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将魏定远调到地委来，由王须仁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93页。

亲自审讯，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供出了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搞的所谓“肃托”，得到了王凤鸣和湖西区党委书记的支持，王须仁便有恃无恐，用种种残酷肉刑进行逼供、诱供、指供。湖边地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打成“托派”。

“肃托”的恶浪，从地方又卷入部队。四大队的营、连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许多人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送进监狱。至此，王凤鸣一手独揽了湖西的党政军大权，王须仁成为他的高参和打手，区党委书记也变成他们的帮凶。

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听到湖西“肃托”的消息，兴高彩烈，都等待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内乱”和“崩溃”。而湖西群众则人心惶惶，失去了对我党我军的信任；部队干部、战士人人自危，怕被捕杀，有的被迫回家，有的逃到友邻部队。几年来党在湖西地区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几乎全被摧毁。

罗荣桓派人把王凤鸣叫来后，不屑看他事先编造好的那些材料，也没听完他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词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使得王凤鸣一下慌了手脚，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

罗荣桓气愤地说：“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还有那个‘苗子’（指的是二营副营长，因为是苗族，人们都这样亲切的称呼他），他是个奴隶娃子，十四岁就跑出来当了红军，来到湖西才几个月，也被你打成了‘托派’！”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凤鸣，浑身无力的瘫在椅子上。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这时也悔恨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教育他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张如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是托派，能这样干吗？”<sup>①</sup>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去看望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等同志。衣衫褴褛、面色憔悴的梁兴初，看到罗荣桓走进来，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他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看着他身上的伤痕，愤慨地说：“这简直是胡闹！”罗荣桓向梁兴初问了些情况，告诉他是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来的，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接着，罗荣桓和郭洪涛又去看望了受刑最重的湖西地区专员李贞乾，派人将他转送卫生队，并亲自叮嘱卫生队负责人，要细心看护，精心治疗。他们又去看望了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102页。

前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并立即将他释放安排了工作<sup>①</sup>。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的“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来的，这个基本事实已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再一个个的调查，决定快刀斩乱麻，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然后分别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善后处理。

几百个“囚犯”一下得到了自由，好象春风融化了冰冻，黑夜突现了光明，人们掩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sup>②</sup>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接着是一片激动的哭声。罗荣桓的眼睛也被泪水蒙住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一次惨痛的教训。”他痛心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帮助党把问题搞清楚<sup>③</sup>。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同志，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要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审阅修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

①②③李维民、潘天喜：《罗荣桓在山东》第103—104页。

许多受迫害的同志被释放以后，揭露了王须仁大量骇人听闻的罪行。罗荣桓解除了王须仁的职务，交由保卫部门进行审查，然后将其处决。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制止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屠杀，为挽救湖西的党组织，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重大功勋。

十二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十二月二十六日，罗荣桓在师直干部会议上，报告湖西事件的经过，指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

对于那个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负有严重罪责的王凤鸣，当时未能给他应得的处分。罗荣桓考虑到他经过长征，还能打仗，是被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后，调离湖西分配了其它工作。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决定给王凤鸣判处徒刑。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回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自己对王凤鸣过于姑息。而王凤鸣偷听到中央对他的决定后，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王凤鸣逃走的第二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上讲话时，又就这个问题公开作了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的崇高品德，给了到会同志极为深刻的教育。

### 建立独立自主的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罗荣桓在大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动员报告，他指出，鲁南山区便于开



展游击战争及建立后方，创造八路军的山区根据地；能配合广大平原游击战争，成为苏鲁游击战争的依托。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对具体的对象，取具体的方针和办法，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场。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打开鲁南局面，创建独立自主的根据地，罗荣桓狠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团结万春圃，争取孔昭同，正确对待于学忠的东北军，是开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

万春圃是鲁南山区很有名望和影响的开明士绅，人称“万三爷”，家就住在抱犊崮东北的大炉。他是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的负责人，掌握着四县边联的军政大权。他性情豪爽，讲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我党有了接触。苍山暴动时，他曾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万的三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在他掌握的四县边联办事处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住在万春圃家里，经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我军的历史。罗荣桓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万春圃深受感动。他常对人说，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在和罗荣桓的不断接触中，万春圃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我党我军的感情更加亲近了。他一再向罗荣桓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有几百条枪、几万发子弹、并有机枪和迫击炮装备的武装，全部交给我军指挥。后来，这支武装正式编为八路军

临邳费峰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争取孔昭同，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又一个成功的例证。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十八岁中秀才，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使。北伐战争以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做官，他不肯出来。

“七七”事变后，当日军侵入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同别人一道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冬，进驻沂蒙山区的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六师。罗荣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孔昭同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部队号称三千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泗县、费县之间，对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中段构成很大威胁，这个地区也是我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孔昭同本人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飞机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在自己的白绸子背心上写了“为国尽忠、为子报仇”八个字，天天穿在身上。石友三反共后，曾想把孔昭同的部队调到河北去，他拒绝北调，坚持在鲁南抗战。他还聘请在山东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根据这些情况，为了争取孔昭同，罗荣桓曾同他派出和我军联系的代表彭畏三作过多次深谈，一再阐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后来，应孔昭同的要求，罗荣桓又把黄玉昆派到孔师作政治部主任。黄玉昆到职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联系。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孔昭同与我军关系日益密切，终于在一九四〇年春，断然与国民党割断关系，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一一五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一一五师

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为此，一一五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罗荣桓在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

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之前，被蒋介石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率领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进驻鲁中、鲁南一带。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团结友军政策，确定了正确的策略。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西安事变前后，他同我党建立过友好关系。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学忠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学忠既要服从蒋介石，又要效忠于张学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这就是在东北军中流传的，反映于学忠政治态度的一句名言。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虽然也是东北军出身，但他积极投靠蒋介石，深得蒋的信任。罗荣桓根据于学忠、沈鸿烈不同的政治表现，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次会议上，罗荣桓就指出：“八路军的影响，可以促进东北军的进步。我军与于学忠的东北军互相配合，可以使沈鸿烈省政府的局面更形缩小。”根据这一方针，罗荣桓在鲁南积极领导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东北军驻鲁南的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与我一一五师驻地靠近，有时两个师部相距仅六十里。为了团结一一二师，罗荣桓曾几次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拜访一一二师中将师长霍守义，向他表示，我们希望与他们团结抗日，请他们顾全大局，珍重友谊，避免摩擦，以免渔人得利。当时霍守义对我军态度较好，王秉璋每次去时还带给他一些革命书报等材料。有一次，王秉璋带去一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了非常赞赏，并给全师发训令，要大家都学唱这支歌。罗荣桓还通过在一一二师做秘密工作

的共产党员谷牧（当时叫刘曼生）、李欣等人了解情况，对霍守义进行团结工作。

开展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罗荣桓在一次干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搞统战不能拍人家的马屁，而失掉自己的立场。对于东北军的一般军官和国民党掌握的政工人员，应当加以区别。对于反动顽固势力的挑衅，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李长胜，趁我农民自卫团开会时，打着检阅抗日队伍的幌子，强令我自卫团架起枪枝，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我干部、战士六人，打伤数人。此事发生后，罗荣桓及时指示：“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向霍守义请愿，揭露和声讨杀人凶手李长胜。”在近万名农救会员、自卫团员和死难者家属向霍守义请愿后，罗荣桓又指出：“通过请愿已经达到了揭露顽固派的目的，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鼓起来了，我们在政治上主动了，现在要及时转入武装斗争，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讨伐投降派。”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地委组织了二十四个农民自卫团，兵分五路把李长胜盘踞的费县南部的崮口围得水泄不通。最后，李长胜狼狈逃窜，崮口被我收复。

打下崮口以后，罗荣桓和陈光于二月七日给中央军委发一电报，汇报了对顽固派进行反击的情况。电报中说：“顽固分子企图造成东北军与我破裂、对立，我们必须改变对东北军的态度，给他们中下级干部及战士以好的影响，并密切与他们上层的联络工作，但不放弃我之独立立场，要于我有利之下打击反共反八路活动，收集地方顽固派的一切破坏行为，向东北军主官提出控告，向东北军全军揭露。”中央及军委接到上述电报后，在二月十一日复电，肯定罗荣桓等“所取方针是正确

的”，并指出：对反共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的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

由于罗荣桓坚决执行了对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因而在抗日战争前期，于学忠在山东基本上保持着中立态度。

解放郟（城）、码（头），三打白彦，巧妙粉碎敌伪军扫荡，是建立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几次重大胜利。郟码平原是联系山东和苏北、华中的枢纽。拿下郟、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阎丽天任郟城县长。他公开反共，制造摩擦，取缔我党在郟码地区的抗日活动，并妄图消灭我临郟独立团。经过争取与我联合抗日无效，一一五师遂派出东进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举攻占了码头镇。此后，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郟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是西北与东南的交通枢纽。盘踞在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是当地一霸。罗荣桓到鲁南后，曾派人去争取孙鹤龄一道抗日。但孙顽固不化，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根据地的民主建设，致使白彦成为我军向北面的天宝山发展、与沂蒙山区打通联系的严重障碍。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一九四〇年春节刚过，罗荣桓与陈光就率领师部离开大炉，冒雪向白彦进发。二月十四日，六八六团迅速攻占了白彦，成立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打开孙鹤龄的粮仓，救济白彦的贫苦农民。过了几天，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相继组织起来。部队也抓紧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准备迎击敌人

的反扑。果然，不甘失败的日、伪军，接连在三月七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九日对白彦发起三次进攻，均在罗荣桓、陈光亲临前线指挥下，将敌击溃。在三次争夺战中，我军歼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粉碎了日伪占据白彦的企图。白彦战斗的胜利，给鲁南根据地军民很大鼓舞，使鲁南的敌、顽、友三方都受到很大震动。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近八千人的兵力，从邹县、滕县、枣庄、临沂、费县等据点，分十几路出动，向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消灭我军。各路敌人在我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后，从二十一日起，对我大炉中心区形成了大的合围。这时，罗荣桓正在主持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他沉着冷静地说，尽管敌人兵力众多，计划周密，但他内部还有许多空隙和缺陷。我军应把主力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以高度的胜利信心坚持斗争。在罗荣桓与陈光指挥下，六八六团等主力部队迅速转到外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罗荣桓则带领师直属队坚持在内线迂回穿插，与敌人周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天拂晓，罗荣桓和师政治部在核桃峪附近发现了敌人。他命令警卫排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自己仅带两个警卫班监视敌人，直到敌人距离数百米时，他才带警卫班从容地骑马急驰而去。罗荣桓面对强敌如此镇定沉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志们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我军经过大小战斗三十余次，历时二十多天，歼敌千余人，到五月上旬，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月，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在鲁南天宝

山区的桃峪村，主持召开了为时三周的高干会议。这是一一五师入鲁以来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各支队及旅级干部、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总结的报告。他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对敌顽斗争的方针。所谓“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伸入腹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发展我党我军的力量；“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特别是进入山东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孤立顽固派；“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来一一五师入鲁以后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顽斗争的指针。

在桃峪会议上，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指示，罗荣桓结合一一五师的实际情况，在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会后，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对于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桃峪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将一一五师部队统一编成六个教导旅，师的领导机关也得到加强与健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荣桓既是政委，又兼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多，任务繁重。一九四〇年六月，军委总政治部任命鲁西军区政委肖华为师政治部主任。十月，军委又批准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任师参谋长。有了主任和参谋长，罗荣桓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领导全师工作。

罗荣桓一贯重视政治工作，他认为：我军的战斗力不但取决

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有政治工作的保证。我们所以能以低劣的武器装备同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奋战数年,并获得惊人的战果,这正说明了我军政治质量优于敌人,我军政治工作在保证战斗的胜利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罗荣桓经常教育政治工作干部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他说,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工作去取得。他还经常强调,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保证作用,不要和军事工作争权,工作方式方法也要与军事工作有所区别。

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罗荣桓经常强调政工干部要懂得军事,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部门工作。为了使军政干部密切合作,完成战斗及各种任务,他很注意军政干部的适当搭配。他把干部教育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十分重视,抓得很紧。在一九四一年山东敌后战斗频繁、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他曾亲自给山东分局党校及师直机关干部系统地讲授《联共(布)党史》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基本理论著作,以便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指战员进行宣传教育,指导部队工作。他要求一一五师政治部办的《战士报》努力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积极发挥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他经常亲自审阅修改《战士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有时亲自动手撰写。罗荣桓也很重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他对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



队——战士剧社的成长十分关心，常给年轻的队员们讲，这个剧社是在古田会议之后，为了加强红军的宣传工作成立的。他要求战士剧社要有战斗作风，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罗荣桓还非常重视连队工作的建设。他一贯认为，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为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一五师召开了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他在报告中对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较全面而又简明的指示。指出，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必须通过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启发战士的自觉，连队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抽象的东西。罗荣桓对青年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他认为，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进行战斗和完成各项任务的突击力量。从红军时期，他就特别关怀青少年的成长，象肖华、梁必业等同志，就是在他的长期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著名的领导干部。

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进入山东敌后，到一九四二年夏的三年多时间里，罗荣桓熟练地运用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逐步地打开了以鲁南山区为中心的新局面，成功地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带领日伪军五万余人，向沂蒙山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

鲁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十一月四日，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转移至沂水以南之留田村，遭到敌人四面合围，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在留田的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三大机关共有两三千人，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能不能突出敌人的合围，保证山东党政领导机关胜利转移，关系着整个山东抗日斗争的成败。五日下午，罗荣桓在留田附近一个小村庄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向。有的主张向东突围，返回滨海根据地；有的主张分散突围，以保存实力……。罗荣桓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果断地说：“我们应该向南突围！”这个意见使大家感到意外，因为敌人的大本营就设在留田南面的临沂城里，畑俊六就在临沂坐镇指挥。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罗荣桓接着对当前的敌情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判断：东面，沂河、沭河和台（儿庄）潍（县）公路都被敌人严密的封锁着，而且敌人预料到我军可能由沂蒙向滨海区转移，已经秘密地在两河之间集结了重兵，封锁了每个渡口；如果我们东去滨海区，正好钻入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正是敌人疯狂扑来的方向，沂鲁山区又为国民党军盘踞，我军北上可能受到敌顽夹击；西面，是临沂通向蒙阴的公路，过去虽大部分为我控制，现在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能越过此路进入蒙山，那里也必定是敌人合击的目标；而南面，虽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区合围，临沂一带成了敌之后方，必定空虚。而且，敌人也不会估计到我军敢于向他们的大本营所在地的临沂方向突围。据此，罗荣桓提出，我军直下正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再转向西北，进入

蒙山南麓——沂蒙区和鲁南区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罗荣桓立即向特务营营长交代了任务，又给几个干部作了分工：营长和教导员带领一、二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四连居中，卫护机关。副营长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和收容掉队人员。他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最后他又宣布了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在突出合围圈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声响。

入夜以后，敌人在留田周围的各个山头上燃起一堆堆大火，枪炮声、马嘶声、日军的嚎叫声，阵阵传来，狂妄的敌人以为他们的“铁壁合围”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向我军发起总攻。就在这时，我军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的战士们，正在罗荣桓的带领下，乘着朦胧月色，静悄悄地向南疾进，迅速通过了张庄、高里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到了下半夜，就顺利地突出了重围。过了高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他遂即命令部队折而向西，于黎明前抵埠山庄宿营。这个村庄距临沂城只有五十多里，紧靠敌人控制的临（沂）蒙（阴）公路。天亮后，敌人的后续部队正从这条路上络绎不绝地向北开去，但却没有发现我军的踪迹。我军在这里隐蔽了一天，入夜继续向西转移，经过诸满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这里地处临费和临蒙两条公路的中间，是敌两路“扫荡”部队的结合部，虽然四面敌情严重，师部在这一带却很安全地住了五、六天。

这次跟随一一五师突围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名叫希伯。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来过中国，热情支持中国的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到延安和皖南、苏北的新四军采访，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陈毅等。一九四一年九月，他从

苏北跨过陇海路，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接见了这位国际友人，一一五师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曾准备让希伯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区去。希伯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战斗的事迹。”十一月五日夜，希伯随一一五师从留田突围。他亲眼看到我几千兵马，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心情非常激动。突围后，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兴奋地跑去找罗荣桓，赞扬他英明卓越的判断和果敢巧妙的指挥，马上挥笔写了一篇战地通讯，题为《无声的战斗》，译出后发表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不幸的是，二十多天之后，敌人在费县以北的大青山另一次合围“扫荡”中，希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壮烈牺牲。

从一九三九年春一一五师入鲁以来，在近四年的紧张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罗荣桓根据多次反“扫荡”的战斗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所谓“翻边战术”，就是将我军主力配置在边沿地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掌握有利时机，开展边沿区的斗争，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上旬，敌人企图切断我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蚕食我滨海区之赣榆、东海县一带的马陵山地区（称为海陵区）。

罗荣桓亲自部署了海陵反蚕食战役的计划，他命令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逐个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和赣榆之间的伪据点。他要求部队动作要迅速，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十一月三日，教二旅等部出敌不意地逼进陇海铁路，攻克铁路北面的据点罗庄，伪军全部被俘。四、五两日又连克横沟、亭子埠、管圈沟。

六、七、八三天，我军乘胜前进，一面包围伪军据点，一面对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伪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恐慌万状，有的投降，有的反正，有的闻风逃窜。从三日到八日六天之内，我军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海陵六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两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战役结束后，罗荣桓亲自听取了参战部队的汇报，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汉奸罗保成。

当我军进行海陵战役时，日伪军又在沭河两岸加紧进行蚕食。为了制止敌人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清河的反“扫荡”斗争，根据罗荣桓的部署，教二旅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又发起了郯城战役。郯城南靠陇海路，是日伪军在鲁南的兵站基地，但防守兵力不多，城内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也只有数百人。战前，我军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动员了几千民兵配合主力一部围攻醋太庄等据点，把蚕食的敌人缠在沭河沿岸，并动员万余群众，对临沂至郯城的公路进行了四天大破坏。战斗从一月十九日夜发起，在敌人密集火力下，我军搭桥过壕，架梯登城，于二十日夜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打下城周围的马头镇等十八处敌伪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全部撤退。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海陵、郯城战役的前后及其间，罗荣桓还抓紧时机，组织了讨伐顽军孙焕彩的三打甲子山战役。

在整个战役中，罗荣桓参加研究作战方案，到参战部队进行动员，亲临前线指挥，及时分析敌情，改进攻坚战术，终于取得了歼灭孙焕彩部两千余人，收复甲子山的胜利，扭转了滨海根据地中部的局面。但是，罗荣桓由于过度劳累，不幸得了

严重的肾病，连续一个多月，尿血不止。在当时敌后的战争环境中，医疗条件极为困难，罗荣桓的肾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然而，他以顽强的意志，超人的毅力，仍然带病坚持着繁重的工作。

## 历史重任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山东也和其它抗日根据地一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敌人反复的“扫荡”、“蚕食”，当时山东只有滨海、鲁中、胶东三个地区还有比较集中的根据地；鲁南山区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窄地带。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是敌强我弱和敌顽夹击。但是在主观上，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敌强我弱和严重的三角斗争形势，有的领导同志认识不足，影响了工作的深入；几年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在军事指挥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罗荣桓曾向山东分局、“集总”和中央作过报告，并建议中央派人来帮助解决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春，刘少奇在从苏北新四军军部回延安途中，受党中央委托，到山东视察工作，于四月上旬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范村。他先同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谈话，交换意见，随后召开了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批评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

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sup>①</sup>罗荣桓完全赞同刘少奇的意见。

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报告的基本精神，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在山东全党进行学习讨论，并贯彻执行。朱范会议之后，罗荣桓和朱瑞、黎玉、陈光等分局负责同志，在刘少奇领导下，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二是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三是妥善地处理了“抗敌自卫军”的问题<sup>②</sup>。这对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陈光调回延安）。山东我军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了解决。八月，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继任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的党、政、军领导重任，集于罗荣桓一身。在这以后的两年间，山东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发动战役攻势，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227页。

<sup>②</sup>1939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部分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1940年7月，“国民抗敌协会”又建立了“抗敌自卫军”，由我党供给他们武装和经费，还派去许多干部。此后，有的地方出现了“抗敌自卫军”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争人争枪的错误。罗荣桓对“抗敌自卫军”早有不同看法，但未能解决。刘少奇到山东后，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亲自同“抗协”的负责人多次谈话，最后明确“抗协”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不应建立武装。“抗敌自卫军”遂于1942年由一一五师统一整编。参见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231—233页。

一九四三年春，蒋介石命令主力部队李仙洲部由皖北入鲁反共，而将东北军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山东我军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连续受到敌人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地区缩小，力量减少，元气尚未恢复。如果李仙洲部入鲁，将成为山东各地方顽固派的有力支柱，也将使我军处于对敌、顽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形势，罗荣桓一方面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坚持山东的三角斗争；另一方面，则要求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对各部国民党军队，按其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分别采取团结抗日、争取中立与坚决打击的不同对策。六月二十一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提出：于学忠部西开，我军可给予便利，并相机解决于部原驻地沂山附近某些地区的土著顽固派，求得恢复沂山部分阵地。如李部北上反共则拟于蒙山地区与之求战，力求歼灭其一部。七月四日，罗荣桓等再电报告上述方针。七月十五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方针，并指示：“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罗荣桓根据中央这一指示，亲自起草电报给各军区，指出，对同我有友好历史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不久，于学忠部西越津浦路离开山东，于部驻地为我军接收。李仙洲部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受阻不得入鲁而撤回皖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山东。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大大改善了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挫败了蒋介石派遣中央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罗荣桓当时曾把这一斗争的胜利，看成是“山东军民的一项杰作”。



减租减息，是我党抗战以来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在山东根据地并未认真进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后，把减租减息当作最主要的任务认真抓紧进行。为此，分局多次下达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有关指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要求各地立即开展一个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此后，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又亲自到驻地农村检查指导实施情况。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减租减息斗争进展缓慢和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不法地主的抗拒和破坏，基层政权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干部中有的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九四四年四月，山东分局发布了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着重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右倾思想。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一九四四年春，山东军区政治部提出了“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的号召。同年秋，又发出《关于部队协助地方群众斗争的指示》，规定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部队要站在基本群众方面支持群众斗争。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踊跃参军、参战，热情支持我军，使山东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山东的斗争局面取得了有利于我的明显转变。

减租减息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一九四三年，又在党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大生产运动。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领导同志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组织换工，提倡合作，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各种农副业生产，使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罗荣桓还向部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战斗号召，要求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光荣传

统，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利；并大力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开盐田，搞运输，办作坊，纺棉线，打草鞋，自制日用品……尽量做到自筹自给，以减轻人民负担。罗荣桓抱病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开盐田。在罗荣桓等军区首长的领导和带动下，山东我军很快掀起了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仅一九四三年，山东全军共开垦荒地六千七百余亩，开盐田二千余亩，生产节约总值四千七百八十五万元（抗币）。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以后，山东的整风运动在一九四二年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尚未形成热潮；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对整风的认识和重视不够。一九四三年山东党政军的领导统一之后，罗荣桓以很大精力抓了这一运动。当时，山东党组织已有很大发展，党员已由抗战前的二千余人增加到十一万人。对这些新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以便坚持艰苦的对敌斗争，已成为全党的迫切任务。山东分局根据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于同年四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今后建设的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

罗荣桓在领导整风运动时，要求大家认真精读规定的文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联系当前形势和抗日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学习成绩的好坏，要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来表现。”罗荣桓也经常参加干部学习，有时病重，还要勤务员搬把躺椅，去和同志们一起讨论。他还亲自同干部谈话，帮助某些同志解决不安心工作等思

想问题。

山东的整风学习和反省坦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曾经以山东的整风成绩，作为和当时几个地区发生的“左”的倾向相对照的典型材料。这个指示中说：“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今后各地的坦白运动应采取这种方式。”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罗荣桓在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地论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是继承了中国百年来革命历史的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它是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不可分离的。毛泽东的思想，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已经成为我国革命胜利的旗帜，并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示范。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罗荣桓在报告中还指出：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要与整风相结合，把它作为指导斗争的武器。

正当全党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整风审干时，康生却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作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大搞“逼供信”，干扰运动的进行。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歪风，在山东受到了罗荣桓的抵制。当他那个讲话的小册子从延安寄到山东时，罗荣桓看过之后，通知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

因此，山东的整风运动，没有受到这个口号的影响。在整风审干试点阶段中，山东地区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发展健康，广大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党性。

山东我军经过一九四三年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又经过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及整风运动，整个根据地形势有明显好转。到一九四四年初，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大体已恢复到一九四〇年的状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日军对山东被迫采取了“重点主义”的配备兵力方针。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罗荣桓领导山东军区加强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发动了一九四四年春、夏、秋、冬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一系列战役攻势。当时总的战略意图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

春季攻势，首先从滨海军区揭开战幕。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夜，滨海军区派部队包围了石沟崖伪军据点，二十四日歼灭了伪军，活捉了罪大恶极的惯匪头子朱信斋，拔除了据点，使滨北人民实现了“杀朱过年”的愿望。

吴化文是山东伪军的主力，虽经我两次打击，仍有万余兵力，盘踞在博山以南鲁村、悦庄一带，控制了鲁山南麓，成为威胁我根据地之心腹大患。罗荣桓多次召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决定鲁中军区于一九四四年春季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鲁中军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经过认真准备，制定了作战方案。三月下旬，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鲁中军区各路大军，于二十五日开始发起攻击，至四月二十日胜利结束。是役一举歼灭吴化文部七千余人，攻克重要据点四十处，重要山寨十二处，解放村镇千余、人口三十多万，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的联

系，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

从五月开始，我军展开了夏季攻势。鲁南军区于五月二日歼灭了伪军荣子恒部的一个师，全部解放了费县南部崮口山区，改变了鲁南区被敌人分割的形势。滨海军区于七月下旬发起讨伐伪军李永平战役，歼敌七百余人，收复国土一千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滨北形势。鲁中军区于八月中旬攻克了沂水城，收复了沂水县全境，巩固了鲁山山区。渤海军区也于八月份攻取了联系清河与冀鲁边的枢纽利津城，扩大了渤海根据地。

八月十九日，日伪军万余人分十三路“扫荡”我滨海区，企图合击我山东军区指挥机关。我军区指挥机关和滨海区主力部队适时转入外线，抓住敌之弱点，积极打击敌人。为配合滨海军区反“扫荡”，在山东军区统一部署下，山东各战略区也相继在八月中、下旬抓紧有利时机，发起了秋季攻势。八月十九日，胶东军区发起大规模秋季战役，至二十四日，连克平度大泽山周围之敌据点，恢复了我胶东区战略支点大泽山区。九月八日至二十三日，我军向烟（台）青（岛）公路出击，拔除与迫使敌伪放弃据点数十处，控制了烟青公路近一百公里，歼敌伪五千余人，使我胶东四个分区完全连成一片。渤海军区主力部队于八月二十四日发动了以收复沾（化）利（津）滨（县）边区为主的全区性秋季攻势，控制了徒骇河，解放了乐陵和沾化除县城外的全境，歼敌伪五千余名，打通和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把分散坚持的小块游击区变成大块根据地。

十月十二日，山东军区发出《今冬明春军事斗争方针的指示》，十一月二日又作了补充指示，要求趁山东一部分敌人南调之际，尽量消灭伸入我根据地内之敌伪据点，但一般不打较

大城市。罗荣桓在和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组织一九四四年的冬季攻势时，决定首先收复莒县。莒县是山东的第一个大县，当时有九十余万人口。该县西与鲁中沂蒙区连接，东可控制沿海平原，北可拱卫沂鲁山区，地位十分重要。十一月十四日，我滨海、鲁中部队发起莒城战役，争取了伪军莫正民部三千余人反正。二十九日，莒县全部解放。至此，滨海、鲁中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三十一日，鲁中我军肃清了临沂、费县两城外围据点。鲁南我军向临（沂）滋（阳）公路展开攻势，控制了泗水、费县段，使鲁中、鲁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广大地区为主要方向，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扩大联系。为了贯彻这一意图，在罗荣桓指挥下，山东我军发起了春季攻势。二月，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收复了泗水城。与此同时，胶东军区歼灭顽军赵保原部一万二千余人。清除了胶东军民准备反攻的重大障碍。三月，鲁中军区收复蒙阴县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

从一九四四春年到一九四五年春，经过一系列的攻势作战，山东我军共歼敌十二万人，先后收复了十八座县城，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胶济路以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胶济路以北的两个战略区扩大了联系，还开辟扩大了与华中、冀鲁豫根据地的联系，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山东我军已由一九四四年初的九万人，发展到二十三万人，并且改善了装备，从而增强了我军反攻的力量。这其中，倾注着罗荣桓的大量心血。

## 准备反攻和夺取最后胜利

一九四四年以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五个战略区内，敌人的分割封锁已被基本打破，过去遭受严重压缩与分割的鲁南区、冀鲁边及泰山区都逐步得到恢复并有新的发展。这时，罗荣桓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打通与扩大五个战略区的联系，相机拔除深入我根据地内部比较孤立的据点，以继续扩大解放区，为反攻和争取战后优势作准备。为此，必须加强边沿区的斗争，发挥武工队的作用，争取大股伪军起义，加强城市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和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

为了加强边沿区的斗争，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连续多次发出文件，详细地规定了我边沿区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研究分析了敌人“重点主义”的特点，指出今后的对敌斗争不只是斗力，而且是斗智；不只是军事，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力量及指导能力的总较量。

罗荣桓非常重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他的领导下，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一九四五年一月，罗荣桓等军区领导人通令嘉奖模范武工队及队员，号召创造更多的、更全面的模范武工队。二月十五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发出《关于武工队组织领导的决定》，要求建设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等各方面任务的武工队。“决定”对武工队的建设提出三点要

求：一、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一个队员都能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工作；二、准确地执行党的各种政策，运用策略，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各阶层，进行合法与非法的对敌斗争；三、军事活动上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成为一种袖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同年三月六日，中央将这个决定批转各地照办。经过这些工作，山东各地的武工队重新作了整顿与加强，更加发挥了对敌斗争的威力。

一九四四年，敌人改为“重点主义”的兵力配置方针后，为了弥补其守备力量不足，竭力扩充伪军，山东伪军猛增至二十万人。随着日军在战斗中的逐步失利，伪军已普遍感到日军不可靠。因此，争取大股伪军起义，便成为粉碎敌之“重点主义”的有力一环。在罗荣桓领导下，山东分局和军区于一九四四年初，抽调了三千多名干部，充实与加强各区党委及地、县委的敌工部门和武工队等，这一措施对于山东伪军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渤海我军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攻势中，争取了伪“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团团长王道率部一千六百余人反正；滨海我军在冬季攻势的莒县战役中，争取了伪莒县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三千五百余人反正；一九四五年春季攻势中，滨海我军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率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在同年夏季攻势中，鲁中我军又相继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团长韩寿臣率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大股伪军的起义，不仅给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及国民党“曲线救国”的政策以沉重打击，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

罗荣桓很注意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他曾对原东北军一一一师起义的领导人万毅等谈到，如何改造旧军队时指出：主要的问题，首先不是象在我军内部那样忙于纠正这种或那种偏向，而是着重于打通干部的思想。必须向他们明确宣布我党我军对这些部队根本不是歧视、编并、监视、削弱，而是热烈地欢迎他们。罗荣桓以其自身经历，传授三湾改编的军史。他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的旧军队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他反复强调，彻底改造旧军队的根本问题，是要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这样，才能把整个部队完全置于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还联系该师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改造部队的具体要求。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山东军区召开的各独立旅（起义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罗荣桓又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各旅不论成立时间先后，均有进步，开始了新生，一改过去与群众对立的关系，而开始与群众相联系。他再次强调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大家明确军政工作的关系；各旅之间要互相团结、学习，互相鼓励进步。

山东的城市工作，过去有些基础，但是由于对秘密工作注意不够，致使济南等几个主要城市的工作，几乎全被敌人破坏。罗荣桓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领导山东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进行了检查，要求重新加以整顿，建立了济南、青岛等几个重点城市工作委员会，逐步使工作有了新的开展。一九四四年中央发出“六五”指示，同年九月，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研究发动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

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收复大城市的问题。会后，各地都把城市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为以后的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四年七月，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今后作战方针和军事建设问题。罗荣桓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关于作战方针，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仍要坚持以分散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但在目前条件下，由于我之回旋地区扩大，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增多了，所以我们的运动战，应是发挥我之特长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关于部队整训问题，罗荣桓说：敌人在其临近死亡之前，必然会发动挣扎性的攻势；我们要反攻，就将遇到敌人越发顽强的抵抗。准备反攻必须以我作主，而不是依靠盟国，更不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强调，为了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最终把日寇驱逐出国土，我们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利用一切战斗空隙，普遍的整训部队，以巩固和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对于如何整训部队，他还提出了具体要求。通过这次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军队建设的各项政策，制定了山东部队作战和建设的明确方针，研究了当时山东根据地发展的主要方向，对我军建设和当时的连续战役攻势有很大指导作用，对以后的大反攻也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加强山东我军的政治建设，山东军区政治部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召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抱病参加了会议，并向到会同志作了斗争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军委、总政的指示，切实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

罗荣桓非常重视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发展。他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军事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说：把我们的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统一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辅助，以发展壮大我之军事力量，这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这次会议之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及省人民武装委员会又陆续发布了许多有关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和文件，对人民武装的性质、任务、编制、领导、经费开支、民兵武器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山东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迅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县、区武装已由一九四三年的四万人发展至近八万人，一九四五年九月，民兵已发展到五十万人。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指出一九四四年是山东解放区取得更大发展和胜利的一年，要求在一九四五年继续扩大解放区，组织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开展大练兵，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全面贯彻党中央对根据地的各项号召。二、三月份，山东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春季攻势。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没有出席，大会选举罗荣桓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主持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重点是发展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和临沂、费县方向。正当我军准备发起夏季攻势之际，敌人突然增兵山东，五月一日以三万人的兵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军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罗荣桓分析敌人这次“扫荡”的性质是防御性的，国内外的形势已发生了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急剧变化。因此，在对原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稍加调整后，即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各军区遂相继对敌

发起了攻势。经过我军的夏季攻势，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二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大战略区分别在胶济路南北联成一片，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罗荣桓由于过度劳累，病情也日益严重。五月二十七日，他曾电告毛泽东，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复电：“荣桓同志：来电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sup>①</sup>因此，罗荣桓仍然一直抱病坚持工作。

七月七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八周年，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七年的苦斗创造出来的。当前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去完成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历史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各根据地武装部队向敌占区积极进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罗荣桓在会上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他特别提醒大家：“敌人虽然投降了，还不等于缴械。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伪军来对付八路军，同我们争夺山东。因此，不要认为日本投降，我们就可以顺利受

---

<sup>①</sup>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23章第14页。

降，就没有事了。”八月十三日，罗荣桓和黎玉、肖华联合发布动员令，命令山东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一击，迫其迅速投降。此后，山东全省部队在八月中旬立即进行整编，共编为八个师，十二个警卫旅，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七万人。从八月中旬开始，分为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南五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准备攻取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和烟台等城市。

我五路大军的健儿们英勇作战，攻城夺寨，在半个月内取得辉煌战果，至八月下旬，山东的日伪军，被我军压缩在铁路沿线和少数孤城中。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由于敌伪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遵照军委指示，山东军区在罗荣桓等领导下，立即调整部署，向临沂等中小城市进军。

攻占临沂的战役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罗荣桓对这一战役也最为关怀。当时，驻守临沂的日军，于八月十六日逃往枣庄，临沂城内由猖狂反共反人民的王洪九等三股伪军两千余人固守顽抗。我军组织了五个主力团，于八月十七日开始，连续发起进攻，均未奏效。罗荣桓看到临沂久攻不下，非常着急，他本想亲自到临沂前线指挥，但因病情加重，连续尿血，未能如愿。他撻在临沂前线负责指挥的同志找回来，详细听取了汇报。他进一步说明了攻占临沂的重要意义，批评了指挥上的轻敌麻痹思想，确定了下一步作战方案：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

攻势；一面改变主攻方向，在城西北角实行土工作业，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部队按照罗荣桓指示的作战方案，认真进行准备。九月十日清晨，爆破成功，突击部队占领了突破口，经过连续爆破，继续攻击，并进行了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到十一日上午，我军占领了全城，歼灭两千多伪军，历时二十五天的临沂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我五路大军收复县城四十六座，攻克烟台、威海等六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三十五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六万余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罗荣桓收到中央来电：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当时肖华正在博山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发急电让他赶回山东军区接受新任务。肖华来到后，罗荣桓先让他看了中央来电，而后对他说：“我们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中央决心很大，要我们先机进入东北。那里背靠苏联，是工业基地，可以作为大后方；有了东北，中国革命胜利会更快到来。你带部队到东北去，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局领导下，争夺这个对全国革命斗争有战略意义的地方。首先把农村和中小城市控制起来，搞掉汉奸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根据地。”罗荣桓还对肖华说：“你们到那里，困难一定不少，思想上要准备长期斗争，甚至要准备打游击，要有独立坚持的决心”。

肖华刚刚出发，罗荣桓又接连收到中央几次来电。九月十九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并决定调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

局，陈毅到山东工作。十月，中央又来电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遵照中央的电示，罗荣桓在九、十月间组织了山东部队六万余人，地方干部四千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去东北，并给山东留下了四十多个团，包括四师、八师等主力部队。

十月五日，陈毅到达临沂。二十四日，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乘汽车离开临沂城，沿台潍公路向东北行进。行至黄县龙口，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从前方赶来送行。罗荣桓把自己骑了多年的战马送给了许世友；许世友解下刚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

罗荣桓在龙口登上了小汽船，告别了山东大地和人民，于第三天拂晓，在辽宁金县以东的貔子窝登陆，然后到辽阳，十一月抵达沈阳，十二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从此，他又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东北战场上历尽艰难、赢得胜利的一位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 艰难创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罗荣桓到达沈阳，在三经路博物馆找到了东北局，把机关人员安顿好以后，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首先了解了苏军、我军、敌军的基本情况；驻沈阳的苏军对我军态度基本上是友好的，但因受“中苏条约”<sup>①</sup>的约束，

---

<sup>①</sup>“中苏条约”全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有：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以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等。（摘自《辞海》缩印本第1419页。）

不让我在沈阳驻扎部队，并且准备在撤走时把沈阳交给国民政府；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已有十三万余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装备又差，必须迅速整编，使其置于东北局统一指挥之下；在敌人方面，国民党的全美械化的石觉部十三军和半美械化的赵公武部五十二军共约七万人，已海运到秦皇岛登陆，杜聿明也亲赴前线，指挥这两个军向我控制的山海关进攻。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罗荣桓着重考虑和大力抓紧的，就是战争和整编部队两个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东北局来电，要求我军“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并指示“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歼灭敌人。”<sup>①</sup>东北局当即决定林彪去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就在这一天，蒋军集中第十三军全部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共五个师，在大量炮兵和飞机配合下，向山海关我军阵地发起全面攻击。扼守山海关的我山东第七师和冀热辽部队奉命顽强抗击，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又有炮空优势，我军远道新来，立足未稳，械弹缺乏，加之兵力严重不足，遂于十一月十六日主动放弃山海关。

十二月十三日，罗荣桓向林彪及西满分局发出《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的电报，提出：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我军应争取控制沿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使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之中，这样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可能。并应争取在一个月內开展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组织。这些意见，

---

<sup>①</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送审稿）第2章第47页。



同半个月后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于是，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东北，蒋军继占领锦州之后，又侵占了黑山、义县、北票、朝阳、阜新等地，并向沈阳逼进。就在蒋军向我大举进攻之时，二月中旬，我军集中七个团的优势兵力，将侵入秀水河子的蒋军二六六团全部、二六五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突然包围，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这是东北我军打的第一个典型的歼灭战。与此同时，在对敌南路的盘山以东的沙岭战斗中，我军却没有打好，虽然包围了新六军的一个团，连续三天一夜，反复攻击，终未奏效，后来援敌赶到，我被迫撤出战斗。这两个战例，罗荣桓曾多次用来教育干部。他总结经验教训说：沙岭战斗，我们五个团又两个旅打敌人一个团，数量上虽然优于敌人，但战斗力不如敌人。参战部队思想上、战术上都不够成熟，组织装备也不行，内部不能团结，指挥上也不统一。加上对敌我两方面缺乏正确估计，敌人已经站住了脚，筑起工事固守起来，我们的火力没有组织好。结果，我们伤亡很大，也没有把敌人消灭。秀水河子战斗和沙岭战斗相比，条件不同。秀水河子战斗我们都是主力，老部队。罗荣桓着重指出：一定要按条件办事，要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不能只有一手，还要有第二手、第三手，打仗没有后手是不行的，要以老部队作骨干，要长期打算，重视部队的建设和整顿。

一月间，罗荣桓病情恶化，经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确诊是肾癌，医生认为必须动手术。东北局决定他去大连治疗。到大

连后，因苏军医院设备简单，不能做大手术，建议他在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诊治，罗荣桓遂于二月十六日到达平壤，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平壤期间，金日成很关心他的病情，曾和夫人亲到医院看望他，并赠送一台收音机，供他收听新闻。经平壤苏军总医院检查，他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但因医疗设备不足，也无法进行手术，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于是，罗荣桓于三月上旬又回到大连疗养。他虽在养病，却时刻挂念着东北的全局。三月十五日，他致电林彪转报中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开展工作，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加强我军主力，保持元气，同时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罗荣桓在大连密切注视着东北战局的变化。三月十三日，蒋军进占沈阳，接着又占领了辽阳、抚顺、铁岭。四月初，蒋军大举进攻四平，我军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罗荣桓在四月二十三日致电东北局和党中央，对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军正在扩大战场，对我采取分进合击，便于我各个击破，并已开始遭到严重打击。或许今后敌人会引起警惕，不敢冒进。但我军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力量予以各个击破的办法仍将适用。就在罗荣桓发出这封电报的前后，我军在保卫四平的同时，先后解放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座城市，歼敌二万六千余人。实践证明，罗荣桓的这些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五月十八日，我军在抗击并消灭了大量敌人之后，主动放弃四平。

五月中旬，罗荣桓返回东北局。五月十九日，他参加了“前总”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召开的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和今

后的作战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是主张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赞成后一种意见。经过讨论，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先退到哈尔滨。会后不久，罗荣桓即随同东北局转移到哈尔滨。我军于五月二十三日由长春撤至松花江一线。敌军于五月三十日进到松花江南岸后停止前进。

六月六日，国共双方达成在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对新的进攻未准备好，实际停战了四个月，到十月十日才开始向我南满大举进攻。因此，从六月初起，东北暂时呈现一种缓和局面。东北局抓紧这一暂时休战的难得机会，接受了罗荣桓不久前三次电报的建议，在六月中旬积极部署了三项重要工作：第一项是迅速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这对于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心，提高我军作战能力，都是极为迫切、重要的。第二项是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六月十二日，林彪、彭真、罗荣桓发出《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力争和平，但应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战争打算。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分地的斗争。今后主力兵团的作战方针，是避免打大的阵地战和大的运动战，而应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对城市的方针，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以保持城市，但在客观条件显然不可能保持时，则应适时断然预先放弃，免得造成既损伤了力量，又仍然失掉了城市。以致对有利的作战机会不能及时使用。第三项是剿灭土匪。罗荣桓同林彪、彭真研究了东北各地，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匪活动的情况，于六月十二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要

求所有剿匪地区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为此，东北局抽调了千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随剿匪部队一同出发进行工作。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党中央于六月十六日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以林彪为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为参谋长，谭政为政治部主任。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爆发了全面内战。

为了及时总结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任务，以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东北局于七月初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并作了发言，强调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和应该依托的力量要有明确的认识。

会议通过了由陈云起草、后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因为是七月七日讨论通过的，简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会议是东北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两年后东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罗荣桓在东北局扩大会议期间，除参预会议的组织领导和“决议”草案的讨论修改外，还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强调东北部队来自五湖四海，一定要搞好团结，反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他和大家谈国内外形势和东北的工作，要求干部树立胜利信心并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

七月下旬，罗荣桓在参加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因病情严重，东北局决定并经中央批准，送他去苏联治疗。罗荣桓和夫

人林月琴带着两个孩子，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等了十几天才办好过境手续。于八月初换乘苏联火车，经过六七个昼夜的漫长旅途，终于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干部到车站迎接，安排罗荣桓一家住进豪华的莫斯科大旅馆。过了几天，又迁入专门接待各国共产党干部的纽克斯旅馆。从延安来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住在这个旅馆。两个老战友一别九年，想不到却在异国重逢，真是“他乡遇故知”，都感到格外高兴。休息了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又经过四天全面细致的检查，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当时罗荣桓头上冒着汗珠，忍着剧痛一声不哼，苏联医生翘起拇指连声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手术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就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罗荣桓的伤口才完全愈合，身体渐渐复原，于是又回到莫斯科纽克斯旅馆休养。

多年来，罗荣桓一直是带病指挥战斗、坚持工作，现在一旦清闲下来，感到很不习惯。他每天除了读书、散步、请翻译讲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外，还去看望住在莫斯科的陈昌浩等老同志，经常找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卫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谈话，给他们讲国内革命斗争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回国后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罗荣桓就把自己的食品节省下来给孩子们吃。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在当时还不很了解我国情况的

苏联红军干部、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中，产生了种种误解和猜测。在莫斯科学习的我党一些干部子女，对此也很不理解。罗荣桓虽然离开祖国到莫斯科治病已七个多月，但他对国内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听到这些议论，就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他说：“放弃延安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中国大得很，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罗荣桓的话使人们受到很大鼓舞。

### 战争胜利的重要组织者

一九四七年六月，罗荣桓谢绝了苏联医生要他继续疗养的建议，从莫斯科回到了哈尔滨。他的出院通知书上，除了写着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外，又增加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因而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并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个小时。但是，罗荣桓不顾医嘱，一回到哈尔滨，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这时起到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前，正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罗荣桓除参加东北局的集体领导，参预重大战役的指挥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政治委员，他还着力领导东北我军进行许多重大工作。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前，在辽东军区三纵队，就已出现并推广了诉苦运动。这种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首先是在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九连开始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苦大仇深的战士（包括被俘后参加我军的“解放战士”），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开展“磨刀杀敌”、“复仇立功”活动。这种把土改

教育、阶级教育同战斗动员相结合的方法，空前激发了部队杀敌立功情绪。

罗荣桓十分重视辽东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认为“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他立即指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八月二十六日，《东北日报》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并按他的授意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经过普遍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成为激发部队阶级仇恨，提高政治觉悟，鼓舞战斗士气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

同年九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辽东三纵队的经验，充分肯定了诉苦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不久后在全军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使诉苦运动发展成为全军部队进行阶级教育的主要形式。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党的土地政策，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政治部又要求各部队及时组织学习。对于部队中曾经出现的、有些干部战士阶级意识模糊，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如包庇地主家庭，隐瞒地主财物，干涉群众斗争等，都进行了严肃的处理。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和土地法大纲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发生了某些“左”的偏差，主要表现是，模糊了地主同富农、中农的界

限，模糊了大地主、恶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界限，发生了乱打乱斗乱没收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罗荣桓不赞成这种做法。他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讲了中央苏区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会上有人竟训斥他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李富春支持他的意见，终于顶住了让农民进城“挖浮财”的歪风。在罗荣桓等同志的坚决抵制下，当时流行的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说了算”来代替党的领导的错误做法，也及时得到制止。在东北部队内部，没有搞划分阶级、“搬石头”<sup>①</sup>等“左”的做法，没有提“执行贫雇农路线”的口号。后来，中央发出了纠正土改中“左倾”偏差的文件，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四七年七月，根据罗荣桓的建议，东北局提出在继续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以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裕的后备兵力，并分工由罗荣桓直接领导组建二线兵团和筹备作战物资等工作。从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罗荣桓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研究成立二线兵团的有关问题，规定各地区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前成立三十八个独立团，第二批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分别组建一百二十六个独立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对这些新建的独立团，要首先进行政治教育，明确为谁打仗，然后再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队生活作风。罗荣桓还提出：“要切实保证

---

<sup>①</sup>“搬石头”，即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停职检查。



兵员质量。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和严格监督下，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各地动员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先后组成了一百六十四个独立团，共三十七万余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扩军计划。二线兵团的建设，对于扩大我军力量，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罗荣桓在倾注全力组建二线兵团的同时，还抽出时间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罗荣桓首先找到了伍修权，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伍修权表示希望到前方部队去锻炼。罗荣桓说：“到前方锻炼是件好事，不过以后还有机会。现在部队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很大，后方军工生产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准备成立一个军工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军工会议，确定东北必须成为全国军工基地，以支援全国战争为己任的指导思想，正式决定成立军工部，经中央批准，任命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此后，军工部在何长工、伍修权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很快统一了东北军工生产的领导，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系统。到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已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〇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这些军工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我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罗荣桓仍任副政治委员。

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于二月二日至三月七日，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的报告中，首先根据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精神，指出当前的形势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他还着重讲了建军的问题，提出东北不仅要为争取东北的胜利而建军，而且要为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华北作战而建设大规模的军队。

这次政工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部队的实际情况，确定在东北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将新式整军的内容具体化为：干部“五整一查”（整思想、作风、关系、纪律、编制，查成分），对战士则主要是开展诉苦运动，进行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从三月中旬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在部队全面展开，到四月底结束。经过发扬民主和深入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团结，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

东北我军经过几次大的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也暴露了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罗荣桓认为对于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打开城市乱抓一把的流寇主义倾向，必须严加整顿，否则，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部队发出《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电，要求做到：一切从政策观点出发，严格遵守城市纪律，保护新解放城市的工商

业不受破坏；要执行统一规定的命令，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加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有问题要首先检讨自己，反对骄傲自满。五月二十五日，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施、名胜古迹和建筑物。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六月四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指出这个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采用。”东北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条守则的教育，并印成布告张贴。八条守则不仅对维护我军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军所到之处，收到安定民心，扩大我党我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罗荣桓领导下，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报告，强调贯彻集中统一是目前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应积极地进行斗争。要严肃党的生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

东北战场经过连续几个攻势，仗越打越大，伤病员也随之增多。驻在各地后方医院的大量伤病员，有的居功骄傲，目无

法纪，说什么：“身上打了一个眼儿，比毛主席小不点儿！”有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旧军队的兵痞习气还没有完全去掉，加上医院管理教育工作抓得不紧，因而发生了不少违犯纪律、惹是生非的现象，甚至有的打骂医护人员、聚众闹事。罗荣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他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等负责同志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有的认为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主张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听完各种意见，最后说：“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并遵照罗荣桓的意见，将会议定名为“荣誉军人代表大会”，确定参加会议的代表，积极分子不超过三分之一，要多找些爱“闹事”的来开会，以便他们受到教育思想转变后，回去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带着一肚子气和一大堆要求而来，不答应就准备大闹一场。但是他们一到哈尔滨车站，看到站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标语，人群喊着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来欢迎；到了招待所，接待人

员热情地给他们端茶送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吃饭全是细粮，四菜一汤……这一切使他们很受感动，心里有气的人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期间请了只有一条腿的后勤司令员钟赤兵、保卫井冈山战斗中左腿负伤致残的何长工和抗战时期的几位伤残同志“现身说法”，讲他们如何负伤致残，在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如何艰苦奋斗配合治疗，遵守纪律，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伤好后重返前线继续革命的事迹。这些报告，亲切生动，十分感人，代表们听了深受教育，思想起着激烈变化。在小组讨论中，开始他们对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后来，大家就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多数参加过闹事的伤兵，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的失声痛哭，悔恨自己忘了本，决心回去后，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罗荣桓向荣誉军人代表讲了话，他说：“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这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军同志们本身努一把力，去联系群众，……严格地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最后，罗荣桓要求荣军同志们不要居功骄傲，要积极参加后方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

这次会议取得很好的效果。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到各地医院后，每个人都在伤兵中展开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使伤病员闹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罗荣桓在以主要精力从事部队建设工作外，还特别注意对干部子女的教育。

一九四七年六月，林月琴随罗荣桓由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后，就要求参加工作。林月琴是鄂豫皖苏区的老同志，参加过长征，当过妇女工兵营的营长，做过机要工作、机关协理员等，军区政治部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任副部长。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听后说：“要求参加工作是对的，但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过了几天，他对林月琴说：“这几天我反复考虑了你的工作问题。我看你就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了，有件工作你倒应该去做。现在各机关、各兵团留守处都有很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个工作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事。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林月琴也感到办子弟学校很重要，应该去做，但又顾虑自己没搞过教育工作，不知怎样去办。罗荣桓说：“不会干可以学嘛！办学校，一是要有个校长，二是要有一些好教员。你可以找一些有文化有经验的女同志商量，请她们跟你一块办。”于是，林月琴就找了肖向荣的爱人余慎、吕正操的爱人刘莎等几个热心的同志，共同商量筹办子弟学校。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积极支持下，解决了房子、教员、设备、经费等问题，很快办起了子弟学校，开设了小学部和幼儿园，收了前、后方干部的孩子，使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有人管，身心得到健康成长。这样，在前方的父母免除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对敌斗争；后方的干部减轻了家务负担，可以更好地工作。

### “战锦方为大问题”

一九四八年六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在东北战场上

我军已占压倒优势，国民党军被迫采取了重点防御，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根据这一形势，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是关系着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能否彻底胜利的重大决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东北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犹豫不决，而罗荣桓却又一次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对党中央、毛泽东战略意图的深刻领会。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等曾讨论了打长春的问题，并将计划报中央请示。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二日复电：同意先打长春。五月下旬，林彪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未能攻克，遂提出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东北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并决定在吉林前线召开会议进行部署。林彪借故不去主持会议，而要带病工作的罗荣桓前去。吉林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召开，罗荣桓听取了长春前线部队领导同志的汇报，了解到长春守敌的情况，最后作了总结，决定：在军事上，一面要对长春敌人实行紧缩包围，一面要开展大练兵，进行攻城与打援的训练；在政治上，要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动摇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在经济上，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流入城内。此外，经罗荣桓提议，决定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对在敌人“杀民养兵”的残忍政策下被驱逐的群众，给以收容和安置，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这次会后，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打退了敌人三次试探性的突围和运粮活动，歼灭敌军四千余人，争取了敌军官兵一万八千余人向我投诚。

七月，东北局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行动问题，拟于八月中旬以主力南下作战，并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粮食接济等困难。这一设想向中央军委报告后，毛泽东于七月二十

三日复电同意。

为了适应主力南下后领导上的需要，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分开，罗荣桓任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八月二十九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发出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指出：我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争取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热烈响应“动员指示”的号召，根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进行了深入地、有针对性地思想工作。与此同时，东北局领导各地方党组织，动员东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全力支援战争。仅参战民工就动员了一百六十万，担架一万三千余副，大车三万六千余辆，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支前高潮。

九月七日，毛泽东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明确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根据军委指示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从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罗荣桓和林彪领导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辽沈战役。各路大军按照进军命令，在百万民工配合和广大解放区人民支持下，于北起长春、南至唐山千余里的绵长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六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纵主力，夜行晓伏，长途奔袭，分别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敌军各据点；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九月



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到十月一日，我军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和锦州郊区敌人的据点，按计划将锦州紧紧围住，准备进行总攻。

罗荣桓和林彪、刘亚楼等随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的前线指挥所的列车，九月下旬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迂回曲折地向南开进。在行进途中，罗荣桓在十月一日会签了《准备夺取锦州，歼灭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指出：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正在我军准备夺取锦州的紧要时刻，却发生了毛泽东后来在《悼罗荣桓》一诗中所写的“战锦方为大问题”的事。这个“大问题”就是：十月二日清晨，前线指挥所的列车开到彰武时，林彪看到电台收到的一份情况报告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加了四个师。林彪早就顾虑攻打锦州时有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两面夹击的危险，看到这个报告，打锦州的决心更加动摇，没同任何人商量，就在当日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出四个“A”字的万万火急电报：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四军、九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

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sup>①</sup>。

这封电报的意见很明显：葫芦岛敌人得到增援，因而打锦州，不如打长春。说是两个方案“正在考虑”中，其实是在“考虑”改变方案：打长春。林彪的这次动摇，当即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严厉批评，而且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十月三日清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急忙来到罗荣桓住处，把林彪发电报的事和电报内容报告了罗荣桓。罗荣桓刚起床，听完刘亚楼的话，顾不上洗脸吃饭，马上拉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罗荣桓心情沉重，又很气愤。作为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他和司令员同为部队首长，对部队工作共同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牵动全局、事关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怎么能够不经研究就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出电报呢？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不能容忍这种轻率行动。林彪见他们来了，便讲了昨晚向军委发电报的事，仍然认为回去打长春可靠一些。罗荣桓压住满腔怒火，尽量冷静地向林彪说明回去打长春的做法不妥。他指出，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敌人据点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而敌情变化并不大，只不过增加四个师。在这种情况下，轻易改变中央早已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适当的。罗荣桓还向林彪严肃地指出：“这是抗拒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违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要影响解放全国的战局的。”<sup>②</sup>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经过耐心的劝说和严肃

---

<sup>①②</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190—195页。

的批评，林彪才要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刘亚楼问怎么办？林彪不吭声。罗荣桓说：“检讨一下，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林彪点头同意，却不肯动笔。经过商议，由罗荣桓拟稿又经林彪修改后，即于上午九时发出，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在报告了拟采取的部署和对敌情的判断后，电报最后说：“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sup>①</sup>。

军委领导同志收到这封电报，已是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在这之前，军委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批评林彪二日二十二时电报中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十七时的来电说：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

---

<sup>①</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 第196—197页。

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等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sup>①</sup>。

十九时的第二封来电说：

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sup>②</sup>。

毛泽东针对林彪十月二日晚的电报而发来的这两封电报，证明了罗荣桓的意见是符合军委意图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罗荣桓对林彪的批评、劝说，并及时向军委重新表明攻锦决心，

---

<sup>①②</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197—198页。

是完全正确的。

军委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电报后，十月四日上午六时，毛泽东及时复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毛泽东这份电报，肯定了我军攻锦的决心，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再一次说明了不应回头打长春的理由。并且指出：“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sup>①</sup>这就促进了领导思想的迅速统一，坚定了广大指战员争取胜利的信心，为“战锦”这个“大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

领导思想统一了，前线指挥所的列车继续南下，于五日到达锦州西北三十里的牯牛屯，立即向军委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六日收到毛泽东复电说：“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要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可，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志，迫近城垣指挥。”<sup>②</sup>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即直接指挥所），设在锦州北面“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罗荣桓听说参谋长刘亚楼要去看地形，也不顾自己有病，谢绝了劝说，同大家一道乘车、骑马，翻山越岭来到帽儿山上。罗荣桓站在山上纵目远望，高兴地说：“这儿很好，锦州全城及周围主要高地都一目了然。”他又用望远镜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看了环城工事，而后同林彪、刘亚楼一面听作战科长汇报，一面询问情况。回到牯牛屯，野司召开

---

<sup>①②</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199—204页。

了军事会议，根据原来我军部署、敌情变化和察看地形的情况，又做了通盘研究，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

罗荣桓和谭政在攻锦州之前，召集各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野司的作战部署，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做好战时政治工作，搞好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做到不争功，不争胜利品；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和纪律。罗荣桓指着院子里果实累累的苹果树说：“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要教育部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挂在树上的，收在家里的，掉在地下的，都不要吃，也不要用钱买，这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sup>①</sup>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在群众中造成极好的影响，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在攻锦之前，我军主力于九月下旬就到达锦州附近，并迅速包围了锦州。当外围战斗开始时，野司就命令八纵担负封锁机场的任务。但是，蒋军在九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还空运了一些部队到锦州。这是因为锦州有西郊和北郊两个机场，八纵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发电请示封锁哪一个机场，以致延误了时间。于是，野司又改命九纵和炮纵控制和封锁机场，击毁敌机五架，这才迫使蒋军停止了空运。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来电，一面表扬：“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一面批评耽误两天封锁机场的部队，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这期间，八纵还发生了在战斗中一度丢失

---

<sup>①</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215页。

了阵地但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为妥善处理这两件事，罗荣桓决定亲自去八纵一趟，临行前，他对刘亚楼说：“下面干部出了差错，不能简单地批评处罚，应该先从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找出缺点。敌空运的飞机已经开始在西郊机场降落，他们还来电请示封锁哪个机场，这固然不对。但我们司令部下达命令时如果详尽一点，明确指出是封锁西郊机场，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一差错了吗？上次冬季攻势中开原敌人的一三〇师向西出扰时，我们把特级电报发成A级，结果耽误了二师的行动，这能光责怪二师吗？你们司令部起草战斗文书，也要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

当夜，罗荣桓乘吉普车赶到八纵驻地，听取了纵队领导的汇报后，他一方面表扬了八纵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中打得不错，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军令加严”的指示，鼓励八纵的同志争取在攻锦州战斗中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打好这场关键性的攻坚战。

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经过三十多个小时激战，到十五日十八时，全歼锦州守敌十二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九万余人。

我军攻克锦州后，东北敌人全线动摇。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十月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十万余人被迫投降。我军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蒋介石面对土崩瓦解的局面，又慌忙飞到沈阳，督促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妄图重占锦州；并令五十二军抢占营口，准备接应东北残部撤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野司对围歼敌西进兵团作了具体部

署。十月二十日，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各部队“必须以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动员令”发出后，罗荣桓又分别给各纵队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不顾疲劳、不怕困难，不要怕少数人落伍掉队，不分昼夜前进，迅速赶到指定地区，截断敌人的退路。二十五日，我军主力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经过激烈战斗，至二十八日拂晓，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廖耀湘被俘。十一月二日，我军乘胜解放沈阳，同日解放营口。至此，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罗荣桓进入沈阳后，召集司令部、政治部几个同志，由他口授，起草了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在报告中，写进了林彪曾对打锦州一度发生动摇的问题，但是摆了客观原因，语气也很婉转。“……后由蒋介石在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底稿刚拟好，林彪走进屋来。罗荣桓说：“在综合报告里，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的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后来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林彪板起面孔看完之后，将稿子往桌上一扔，一声不吭，转身而去。经过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这份报告还是以林、罗、刘的名义于十一月八日签发上报中央了。这是一个历史见证，证明罗荣桓在“战锦”



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是坚持原则的，是正确的。

##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即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罗荣桓等野战军首长，指示各部队移至指定地点进行休整。各部队在休整期间，分别召开了祝捷会、战评会、庆功会、党委会和党支部大会、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表扬英模，动员继续作战。同时，还进行了配备干部、调整武器装备、补充新兵、争取俘虏等工作，并抓紧进行了战术教育，改善了部队的管理教育。

十一月十七日，军委根据华北蒋军的动态，向林、罗、刘提出了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入关的行动方案。十八日，军委正式下达了《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指示，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争取国民党军不战投降。命令还要林彪、罗荣桓等“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sup>①</sup>。

这时，东北野战军正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讲话，总结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动员部队立即入关作战。二十三日，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向关内开进，二十七日解放山海关、秦皇岛。三十日，罗荣桓等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出发，向冀东地区前进，十二

---

<sup>①</sup>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6章第231页。

月七日到达蓟县。

辽沈战役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着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于傅作义同蒋介石及美帝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后才能入关作战，因而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将他所辖的全部兵力五十余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余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从全国形势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月下旬秘密入关，在华北野战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由西而东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为不让敌人跑掉，要求我军在两星期内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罗荣桓同林彪、刘亚楼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各纵队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敌人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五个孤立的据点之中，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退路。至十二月二十日，上述任务全部完成。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荣桓和谭政主持起草了《平津作战的动员指示》，指出全歼华北敌人对于争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要求各部队鼓舞士气，做英勇善战的模范，做团结人民、

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指示特别强调：“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以劳苦功高、居功骄傲、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礼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

十二月十七日，中央电召罗荣桓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驻地，商讨一九四九年整个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罗荣桓到西柏坡后，非常高兴地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陈毅、薄一波等同志。会议结束后，罗荣桓立刻返回平津前线。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约法八章。新年以后，各部队根据政治动员指示和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对指战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号召“打响进关第一炮”，创造“打仗好、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连队。并深入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学习“约法八章”，提出“秋毫无犯、原封不动”、“军政双胜”等口号。有的部队还请天津郊区被蒋军烧杀过村庄的居民，控诉敌人的罪行，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阶级仇恨，求战情绪极其高涨。

在我军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的榜样，命令所属部队放下武器。陈长捷曾两次派人出城谈判，但只是拖延时间，并无诚意。为统一指挥东北、华北我军联合进行平津战役，党中央于一月十日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之后，我军于上午十时向天津发起总攻。我各路攻城部队在淮海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士气高昂，经过二十九个

小时的激战，到十五日下午三时，守敌十三万人全部就歼，解放了天津。十七日，塘沽敌人由海上逃走。至此，北平已成孤城，陷入我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

早在辽沈战役之后，傅作义就派人同我地下党组织联系，向我党中央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天津解放前，傅又正式派出代表到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直接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人多次谈判。但直到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时，傅作义仍然犹豫不决。

一月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傅作义提出两条办法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人民群众，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部队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函发出后，双方代表又经过具体谈判，傅作义最后接受了第二种办法，将其所属部队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二十六日，我军公布了整编命令。三十一日，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我军开进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三日，我军在北平人民倾城夹道欢呼声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站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持续了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华北大部地区。

罗荣桓自从西柏坡开会回来后，就一直忙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直到一月二十九日，在通县潞河中学（现为通县一中）召开的四野干部会上，他才有机会传达西柏坡中央会议精神。罗荣桓在传达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松劲，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分析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部

队以战备姿态休整两个月，解决南下思想问题，重点是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还要求抓紧教育改造大批解放战士，加强与改善管理教育和党的支部工作，同时进行军事上的训练和准备。罗荣桓还向到会的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结束时讲的进入城市要防止各种政治微生物的侵袭等问题。在报告中，他讲了去中央开会的见闻和感受，讲了中央机关谦虚谨慎、对各地区的干部亲切关怀的好作风，要求野战军总部机关要向中央机关学习，克服老大的作风。

二月下旬，林彪去西柏坡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罗荣桓留在北平，主持全面工作。他虽因劳累过度，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抓部队整训外，还抓了几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一是南下先遣部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二是根据总前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同北平、天津市委商定，在平津招收了一万名知识青年，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三是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傅作义所属各受编部队师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改编方案。罗荣桓到会讲话，着重讲了改编的方针和意义。他说，这次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而是一种政治的改编，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是根本改换立场问题。因此，首先就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要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他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中发扬民主，而要看自己有没有决心进步。罗荣桓还在会上宣布：为了实现改编，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部队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正式改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来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罗荣桓等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并参加检阅。

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三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三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他结合四野部队的历史和现状，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这次会议是四野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动员全军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作好大军南下的思想组织准备，都起了重大作用。

高干会议结束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不久，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九十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罗荣桓正要随大军南下，可是他从北平来天津时就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右肾，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病症。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紧张的工作，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他的病情，专门派黄树则到天津，负责为他治疗。毛泽东还写了亲笔信，托黄树则带交罗荣桓，嘱他在天津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

南下，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两句话来劝慰他<sup>①</sup>。于是，罗荣桓留在天津休息、治病，直到同年七月，才离开天津去北平，参加建国的筹备工作。

罗荣桓在天津的三个多月里，同他过去在大连、平壤、莫斯科时一样，身在病榻，心里却一直想着部队，想着前方，也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一次，何长工到天津看他。他对何长工说：“部队南下，仗还是有得打的。要警惕那个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穿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比较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武胜关到五岭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两广部队作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还要准备一些伤亡。”<sup>②</sup>这时，许多部队的留守处都住在天津。罗荣桓对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说：“后方这一摊子交给你，一定要搞好。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后方要照顾好，吃饭、住房、医疗，都要具体管好。这样，干部在前方才能安心打仗。”<sup>③</sup>

有位部队领导同志到天津看望罗荣桓时，曾经谈到：天津战役后，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有十几万辆，许多牲口到南方后，有的拉稀，有的死亡。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面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经过查询证实后，就让在天津的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对东北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历史上要大书特书。”

---

<sup>①②③</sup>林月琴：《与罗帅在天津度过的日子》，载1984年7月29日《天津日报》。

罗荣桓很关心天津市的建设，多次嘱咐看望他的四野部队的领导同志：要认真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切实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搞好社会秩序。驻天津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使刚解放不久的天津，从复杂混乱局面中，很快地稳定下来。

六月七日，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央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罗荣桓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九月三十日，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罗荣桓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盛典。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成为百万大军统帅之一的罗荣桓，又投身到新的历史时期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继续贡献他的力量。

### 总政治部的好主任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央决定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坚持“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建议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四方面军、延安总部）、肖华（原在一方面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为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甘泗淇（原在二方面军、一二〇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在组建总政治部新的领导机构时，罗荣桓明确指示：总政的部长、处长、干事，都要从各个方面军、各野战军、各军



兵种选调，这样可以广泛的团结干部，熟悉各部队的情况，便于总结交流经验。九月，总干部管理部建立时，他同样依据上述原则，任命三野的赖传珠和一野的徐立清为副部长，不久又调来二野的宋任穷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个野战军调来的领导人，就可以尽快地熟悉并合理调配、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军已发展到五百四十万人。这样庞大的部队，与和平建设时期显然很不适应。同时，部队主要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也不相适应。因此，中央要求军队精简一百四十万人，使总数不超过四百万人，同时，还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根据中央指示，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参谋部（聂荣臻任代理总参谋长），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部队精简整编和组建各军种、兵种、院校的繁重任务。到一九五一年底，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铁道兵以及公安部队、军事学院等各军种、兵种及院校的领导机构，都相继建立。总干部管理部及时从全军选调了数万名军事、政治、后勤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迅速妥善的建立和充实了这些领导机构。全军复员一百四十万人的精简整编任务也顺利完成。

罗荣桓带病坚持着这些繁重工作。由于过度操劳，他的高血压、心绞痛时常发作。毛泽东对他的健康状况极为关怀，曾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中央愈是信任，罗荣桓愈是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因此，他仍然肩负着总政和总干的领导重任，了解基本情况，掌握大政方针，解决重大问题。

为了把我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建国初期，罗荣桓着重抓了部队的文化教育，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

罗荣桓认为，加强现代化建设是我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而提高文化正是改善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突破口。一九五〇年，新总政组建不久，罗荣桓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于八月一日由军委颁发全军。指示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指示还规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文化教育方针。这一指示发出后，得到全军热烈响应。经过充分准备，普遍深入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两年后，罗荣桓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全军文化教育的情况：全军开办速成中学五十多所，速成小学二百多所，已有二百万人投入文化学习，文盲迅速消灭，好学上进蔚为风气。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组织了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一九五〇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着重讲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

重要保证。一九五一年一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政治教育指示》，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不按职务而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班，并确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总政治部和各大军区还为部队培训了几千名理论教员。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总政召开的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此后，部队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逐步走向正规，并形成了学习高潮。

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全军实施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罗荣桓指示总政治部于同年五月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实施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同志认识这一正规训练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开始，是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重大步骤。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到训练中去。要注意训练的实际效果，反对走过场、赶进度、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罗荣桓还号召广大政工干部要深入到训练现场，学习军事，钻研技术，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罗荣桓自己身体力行，抱病到部队视察，了解到许多军事训练中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在正规化训练中，有些同志忽视了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只强调官教兵，不实行兵教官，以致发展了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向，使训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对此，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路线和领导方法。在正规化训练中同样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不能只提“官教兵”，而不提“兵教兵”和“兵教官”。他还在一次讲话中说：“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

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

五十年代初期，总政治部在决定起草政治工作条例时，罗荣桓找编写条例的同志多次谈话，要求他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领会我军建军原则的精神实质，认真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注意研究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写出一个符合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条例来。对苏军的经验也要好好研究，吸收它好的方面，对不适应我军情况的东西，决不能照抄照搬。在条例起草过程中，罗荣桓还抱病听取编写组的汇报，一再强调，军队历来受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集体领导，实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扬三大民主，实现军政、军民、官兵的团结一致，这是我军建军的基本原则。不管苏联军队是怎么做的，某些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们还是要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决不能丢掉或削弱。

一九五三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他坦率地对彭德怀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不就否定了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吗？不就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支部建在连上吗？我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是怕取消政治工作我没事干了。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问题。”半年之后，即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由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我军

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对于我军是否要坚持政治工作的体制和传统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中央决定，由罗荣桓和陈毅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这两位井冈山上的党代表，古田会议的参加者，最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最熟悉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在他们领导下，政工条例的修改很快完成，并正式颁布。

政工条例颁布后，部队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忽视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一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罗荣桓在病中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尖锐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文章说，

“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对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sup>①</sup>为了继承发扬“古田会议”的精神，为了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为了使政治工作条例顺利实施，罗荣桓在五十年代繁忙紧张的岁月里，以抱病之躯，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罗荣桓和傅钟、肖华给毛泽东报告，建议开办政治学院，很快得到了批准。首先建立了由罗荣桓、肖华等七人组成的筹委会，罗任主任，并提出了建院速度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培养人”的指导原则。

---

<sup>①</sup>罗荣桓，《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载1955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速成系第一期在边建校边办学中正式开课，罗荣桓和肖华、莫文骅及总政治部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开课式。罗荣桓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介绍了在延安办“红大”的情景，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重任，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的共同财富。他要求政治学院要象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主持制定了《办院基本方案》，几经讨论、修改，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上报军委得到批准，使政治学院有了明确的办院方针。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在政治学院授旗开学典礼大会上，罗荣桓讲话说，我们的教学方针是：每门课程都要系统地进行教学，但又是重点的。教学应注意联系实际，特别是当前党的路线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军事。此后，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要在教学中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他强调学习毛

泽东著作应当系统地、完整地学，着重领会精神实质和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他总结了政治学院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五结合”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相结合；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相结合；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方法，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为了在政治学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罗荣桓提出了“人人当院长”的口号。他认为，要办好政治学院，必须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广大教员、干部职工和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认为这是检验一个院校是否办好的重要标志。为此，他一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培养和提高教员，一方面在学员中间提倡自学为主，强调思想改造。用罗荣桓的形象说法，就是“思想回炉”，要求每个学员对思想进行十次再冶炼。罗荣桓还谆谆教导政治部和院务部的同志都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为教学服务，他指出：“学院的政治机关就是保证教学，离开教学还有什么政治工作！”他经常对做院务工作的同志讲，院务部门就是服务部门，一定要把教员、学员的生活搞好，一心一意为搞好教学多做工作。

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七年。其间，学院先后开办了速成系、完成系、高级干部短期轮训班、政治理论教员培训班、在职干部读书班、理论研究班等各种班次，为部队培养轮训了一大批团以上政工干部和理论教育骨干，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这三次影响到全党、全军、全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对于罗荣桓这位曾经统率百万大军的元帅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在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罗荣桓个人自然不可能彻底认识和纠正这些失误。但是，他本着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结合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经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察觉了这些失误，并在一定范围内，在可能条件下，力所能及的做了一些纠正的努力。

对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罗荣桓不赞成整人，不赞成轻易给人戴政治帽子。他曾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右派是有思想体系的，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右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政策。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sup>①</sup>在他的影响下，政治学院少划了许多右派。当时在军队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高级干部，就是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陈沂。罗荣桓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陈沂虽然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所领导的全军文化工作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罗荣桓还同中央的领导同志谈到了陈沂的问题<sup>②</sup>。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陈沂被下放到齐齐哈尔“监督劳动”前，同爱人马楠去向罗荣桓告别，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然后说道：“陈沂，摔倒了再爬起来嘛！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接着，又对他们谈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并鼓励他们说：“只要努力，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你

---

<sup>①②</sup>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6章第2、3页。



们会因祸得福的。”<sup>①</sup>后来，陈沂始终把罗荣桓对他的鞭策和鼓励铭记在心，成为支持他度过逆境的精神力量。

一九五八年，在中央召开的几个会议上，逐步提出了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形成了“三面红旗”。罗荣桓因病这些会议大部未能参加，但对这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十分关注。那时，北京南面不远的徐水县，被称为是“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在天津的胜芳，有一块据说亩产十二万斤水稻的高产卫星田。罗荣桓和贺龙、聂荣臻结伴去参观了这两个全国著名的典型；后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徐水之行的观感说：“公社化的浪潮来了，全面跃进的形势看起来也比较热闹。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下面也热的非常厉害。那徐水，简直是‘共产主义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在那里的墙上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画，猪圈里放了几头大猪，别的也没有什么”<sup>②</sup>。至于天津胜芳的那块所谓“高产卫星田”，本来就是把几十亩水稻移栽来的假“卫星”。罗荣桓当时就看穿了这个假象，严肃地对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说：“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还不能算是成功。”旁边一位同志开玩笑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荣桓回答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为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行。”<sup>③</sup>那几年，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要讲真话，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头脑发热。他的这些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讲话，象是在炎热气候里的一股清风，吹醒了人们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

---

①《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②③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6章第6、7页。

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罗荣桓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还告诉他，中央酝酿让林彪来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表示，林彪和彭德怀都是一方面军的，林身体又不好，是否考虑其他更合适的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九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从这时起到一九六三年底，罗荣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疾病日趋严重，身体更加衰弱，然而，他仍然以坚强的党性，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又同林彪的日益暴露和发展着的错误，进行着艰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 同林彪的分歧和斗争

林彪就任国防部长后，罗荣桓同他的第一个分歧，就是关于“大办民兵师”问题。一九五九年九月，新的军委组成后，罗荣桓分管民兵建设。十二月，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一九六〇年一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林彪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立即建立六百个基干民兵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罗荣桓，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二月下旬在广州召开座谈会，研究六百个民兵师的组建问题。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但也可能会流于形式。”“究竟怎样搞法，怎么分布，都要做很好的研究。首先要服从生产，搞不好，就会增加农村的负担，所以大家要仔细地考虑一下。”他最后说：“现在民兵已提到战略地位，因此，大家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把战争气氛搞得太浓了，不要搞成战争马上就到……。现在，要求我

们的是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确确实实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要求我们广泛进行宣传。”<sup>①</sup>在一九六〇年，罗荣桓自然不可能预料到十年后林彪竟然会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他认为制造浓厚的战争气氛，在民兵建设上要求过高过急，显然不切实际。此后几年，罗荣桓对民兵工作几次视察，作过多次重要讲话，对主管民兵工作的动员部领导同志，也作过许多具体指示。在罗荣桓的主持和领导下，对“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有了较全面、正确的理解，在民兵工作中，注意了纠正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抓重点，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结合中心工作和服从生产，民兵训练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严禁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使民兵工作逐渐落实。为一九六二年粉碎国民党武装特务对大陆的窜犯，维持社会治安，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罗荣桓和林彪的第二个分歧，是关于谭政问题。一九六〇年一月，林彪在上海会议上，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给抗大的题词概括为“三八作风”。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八”这个简称容易同“三八妇女节”相混淆，需要再加斟酌。林彪听到谭政的不同意见，十分不满地说：“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就在这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点名指责谭政，除了“反对三八作风”外，又加了两条“罪状”：一条是把总政提出的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斥之为“糊涂观念”、“教条主义”；另一条是把总政组织全军进行文化教

---

<sup>①</sup>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6章第11—12页。

育，给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林彪一点名，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后来，谭政等人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〇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副主任。毛泽东在征求了罗瑞卿和肖华的意见后，由中央决定，在一九六〇年一月重新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但是，林彪并不满意，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对罗荣桓的任命。

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罗荣桓因病没有参加。对于批判谭政，林彪事先也没有同罗打招呼。罗荣桓不同意说谭政反党反毛主席。他曾说：“他（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sup>①</sup>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尽管同林彪有不同的看法，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他找谭政谈话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sup>②</sup>并热情地建议他：“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半年之后，罗荣桓又建议军委召集总部有关领导人和部门，专门听取了谭政关于军工生产问题调查情况的汇报，讨论制定了改进的具体措施。罗荣桓对于处在逆境中的谭政如同对其他干部一样，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以保护、鼓励和支持。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罗荣桓同林彪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坚持党的学风的原则问题。为了维护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罗荣桓在他逝世的前几年，同林彪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九六〇年十月，林彪提出了对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到一

---

<sup>①②</sup>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7章第3页。

九六一年初，扩展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后来，又添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句，凑成了所谓“三十字方针”。这个“方针”在十余年内，危害全军、流毒全国。罗荣桓对林彪这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和必将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忧虑。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对刚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梁必业谈话时说：

“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妥当。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sup>①</sup>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不顾重病在身，和贺龙一起到南京、福州、长沙等部队和院校视察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听取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和连队的干部、战士进行广泛交谈，对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荣桓反复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多次对部队的同志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象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见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未免太简单了！”<sup>②</sup>在视察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时，罗荣桓又明确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对战士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把尺子去要求，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sup>③</sup>

一九六一年四月，罗荣桓在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儿子罗东进回信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看法。信中写道：“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

---

①②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载1983年12月9日《解放军报》。

③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7章第16页。

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sup>①</sup>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罗荣桓坚持原则，直言不讳地说：“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啊？”罗荣桓让坐在他后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中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林彪听后，脸色阴沉地问罗荣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作声，末了才阴阳怪气地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sup>②</sup>。林彪没等罗荣桓讲完，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悻悻而去。

会后不久，《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向罗荣桓请示：林彪要求《解放军报》每天都要刊登配合当天报纸内容的毛主席语录，以便部队“活学活用”。为此，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翻遍毛选，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刊登了几

---

①《怀念罗荣桓同志》，第194页。

②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天，就难以为继了。不知应该怎么办？罗荣桓明确答复说：“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的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说到。”<sup>①</sup>

对于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罗荣桓就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反映，他用电话向总书记邓小平讲了这一问题情况和自己的意见，邓小平感到罗荣桓反映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这件事，邓小平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过：“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sup>②</sup>一九七七年五月，邓小平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sup>③</sup>

林彪在提出“带着问题学”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把“四个第一”，鼓吹成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此后的几年内，林彪的这个思想不断膨胀，又接连提出了“精神原子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这一套唯心主义和空头政治的东西，对

①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②③《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6页。

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对于林彪的“四个第一”，罗荣桓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一提法当时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并被写进了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不能正面反对这个提法，他却用重新解释的方法，力求给这个错误提法以正确的含义，尽量避免这一套错误东西对军队建设造成大的危害。到一九六一年夏天，林彪的“带着问题学”、“四个第一”等错误提法，已经在部队中产生不良效果。罗荣桓从一些文件中看到，当时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只强调“红”，而贬低“专”；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的倾向。“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一般化的作风明显滋长。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而解释和领会的关键则是要运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和十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以及其它场合，罗荣桓都做了重新解释的工作。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了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sup>①</sup>他分析红与专的关系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

---

<sup>①</sup>甘渭汉：《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载1982年11月26日《解放军报》。



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sup>①</sup>

罗荣桓对于“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四个第一”、“红专”关系等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引起了刚愎自用、居心叵测的林彪的极端不满和忌恨。由于分歧日益加深，林彪有一次恼怒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sup>②</sup>更有甚者，林彪竟然歪曲事实，信口雌黄，诬蔑罗荣桓“反党”。罗瑞卿在林彪摔死后写的一份揭发材料中说：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份的一天，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到林彪家里向他汇报工作。汇报中间，罗瑞卿也去了。肖劲光谈到罗荣桓二月份在福建前线视察时，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肖劲光的话，发怒说：“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其实，罗荣桓讲的“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提出的“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泽东的号召。这个提法并没有错，林彪所以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借题发挥。接着，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sup>③</sup>

林彪在这里说的“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指的是半年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罗荣桓听了总参动员部的汇报，并看到许多材料中反映部队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很有意见，但又不

---

①②《怀念罗荣桓同志》第28—29页。

③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8章第15页。

敢反映。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看到问题不敢向党反映，是党性问题。他经过慎重考虑，指示总政治部发一个建议，要求各地驻军“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sup>①</sup>这一建议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林彪看到后，急忙于十一月十日向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表示不同意总政这个“建议”，危言耸听地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sup>②</sup>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并于十一月十五日批示肖华：“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毛泽东作了批示，总政已通知全军执行，这个问题本来已经解决。林彪所以在半年之后又把这件事翻出来，并且无限上纲，给罗荣桓扣上“反党”帽子，无非是为了对罗荣桓进行打击报复。后来，林彪同其他干部谈话时，还恶毒地诬蔑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sup>③</sup>。

同林彪进行的这场尖锐斗争，直到一九六三年底罗荣桓逝世时，也没有结束。由于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一直怀恨在心。“文化大

---

<sup>①②③</sup>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第8章第13、14、17页。

革命”开始的时候，尽管罗荣桓已逝世三年，但林彪仍不放过。他不仅叫叶群在总政治部的一次会上大讲“罗荣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而且还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诬为“阎王殿”，必欲“彻底砸烂”而后快。连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受到株连，叶群指使吴法宪等人在总参办公楼贴她的大字报，胡说她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还授意一些人在大会上对林月琴指名攻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官。林彪一伙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却越发使人钦佩敬仰。

### “人类庄严一典型”

罗荣桓虽身居高位，却不争名、不争利、不伸手、不特殊，在党内是普通党员，在军内是普通战士，在人民中间是普通群众。人们从普通中看到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叶剑英在《悼罗荣桓同志》诗中说他：“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sup>①</sup>。这个评价，罗荣桓是当之无愧的。

罗荣桓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井冈山时期，他同战士一起下山背米，上山打柴，同吃红米饭、南瓜汤。长征到达延安后，在红军大学，他和同志们一起动手修窑洞，建校舍。一九四二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久旱不雨，部队缺粮，他就带头吃野菜、树叶、地瓜

---

<sup>①</sup>叶剑英：《悼念罗荣桓同志》，载196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藤。建国后，他强调要反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常说：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他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湖南衡山，县里准备设宴欢迎他。罗荣桓婉言谢绝，却提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对这种糙米饭，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然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北京解放后，罗荣桓住在南池子十八号。这里的房间较少，为了照顾他在家办公方便，管理部门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他认为这属于浪费问题，主动向中央写了检讨。有一次，医生考虑到罗荣桓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为使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罗荣桓批评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罗荣桓表示同意。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钱到上海订做了一张。

罗荣桓处理亲属关系很讲原则，区别对待，对身边的工作同志关怀照顾，亲如家人。一九四九年秋，湖南解放不久，罗荣桓就打电话给当时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请他对自己家乡来北京寻访的亲友进行劝阻。一九五〇年一月，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还是找到北京来了。罗晏清在家乡当过族长，雇过佃户，思想落后，罗荣桓对他比较冷淡。有一天，罗荣桓看见他摆着架子支使警卫人员干活，就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們摆那个土豪劣绅的臭架子？”没住几天，就让他回去在土改中

接受群众的教育。不久，从衡山来了一位当过长工的老人，一九二六年底罗荣桓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会员。家乡解放了，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非常热情地接待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参观游览。老人走时，给他买票，亲自送到大门口，又派车送到火车站。事后，罗荣桓对孩子们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绝不象你二伯伯他们，国民党在时他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了边，解放了，都要来享清福。他虽然是我的亲哥哥，但不是一个阶级。”

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有一次和另两个工人到罗荣桓的住地帮助整理花木，罗荣桓回来看到了，立刻问秘书：“饭准备好没有，同志们都饿了吧，快请到屋里吃饭。”老张感动地说：“我们不饿！”那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老张他们去整理花木时都自己带着饭。可是罗荣桓一定要他们去吃。林月琴说：“我们吃什么就给你们吃什么，又不是什么特殊招待。”罗荣桓也说：“再困难也不在你们吃这一顿饭嘛！”老张回想起这件事时说：“罗元帅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这么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司机老穆从解放战争时期就给罗荣桓开车，直到他逝世，十多年间相处如同一家人。老穆说，罗元帅对同志关心尊重，服务人员工作中出点问题，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穆以为要开很长时间，就跑去参观了。不料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老穆才回来。老穆心里很紧张不安，可是罗荣桓只是问问他到哪里去了，还和蔼地问他参观得怎么样。

罗荣桓对待子女亲切慈祥，要求严格。他常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罗荣桓留在衡山老家的大女儿罗玉英，全国解放时已二十多岁，在家结了婚。她听说爸爸还在，而且“当了大官”，想到北京来。罗荣桓回信教育她说：“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们来此，也只能帮助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玉英等来京以后，罗荣桓鼓励她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以后参加了工作，又要她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经过几年的锻炼，光荣地入了党，并成长为国家干部。罗荣桓说过：“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东进和南下这两个孩子上小学时离家比较远，有次星期六家里派车把他们接了回来。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去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两人步行了很久，才回到家里。罗荣桓看到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的两个孩子，问清原因后，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持下去。”一

九五五年五月，十五岁的南下不幸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保健局长黄树则去看望罗荣桓，但是想不出怎样提南下的事才好，过了好半天，还是罗荣桓打开了僵局，他说：“树则同志，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黄树则无言地点了点头，一时也想不起该讲些什么样的安慰话。罗荣桓沉默了一阵后缓慢地说：“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地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亲人战友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南下是战争年代出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停了一下，他又满怀深情地说：“月琴这些天也够辛苦操劳的了，你们要劝劝她，要她好好休息休息。”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罗荣桓嘱咐儿子说：“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里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随后又写了几行字交东进随身带着：“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

长期以来，罗荣桓一面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一面与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有的同志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他回答说：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率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罗荣桓认为，与疾病作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

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一小时。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病人。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处处为医护人员着想。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用感激的口吻说：“你们是党派来工作的，真比我自己的儿女还要亲。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他还对护士们说：“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是在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真是不行啊！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也确实是的了不起的专家。你们既是战士又是专家。”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入院之前，他还嘱咐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入院后，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最后的斗争。由于肾功能的衰竭引起了尿毒症，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向腹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隔半小时再抽出来的腹膜透析的办法。这种治疗，肚子胀得象鼓一样，他都一声不吭。他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吃饭呕吐、浑身奇痒的痛苦。每当他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时，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同志们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后却安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有一天朱德来看望，对他说：“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作斗争啊！”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作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



作。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罗荣桓还问身边的同志：“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象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弥留之际，他拉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这位和他同甘共苦近三十年的红军女战士，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①

北国严冬，寒凝大地，凛冽的北风不时掠过古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七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提议到会的同志起立默哀。而后毛泽东十分难过地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②后来，毛泽东又写了《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③？

---

①②③ 《怀念罗荣桓同志》第87、1页。

十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各界一万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罗荣桓公祭大会。刘少奇主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致悼词。悼词说：罗荣桓同志在他光荣的一生中，“数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战斗，坚持工作，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罗荣桓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树立了不朽的功勋。”“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sup>①</sup>

####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年谱》，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期。
2. 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怀念罗荣桓同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10月1版。
3. 黄瑶：《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 1983年12月2版。
4.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送审稿）。
5. 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送审稿）。
6. 黄瑶：《建国以后的罗荣桓》（送审稿）。
7. 甘渭汉：《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罗荣桓诞辰八十周年》，1982年11月26日《解放军报》。
8. 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1983年12月9日《解放军报》。
9. 访问聂荣臻、谭政、粟裕、黄克诚、何长工、傅钟、肖华、杨勇、张宗逊、杨成武、梁必业、舒同等166人的记录。

---

<sup>①</sup> 《邓小平同志的悼词》，载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 邓 华

罗 印 文

## (一)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湖南省郴县永宁區陂副邓家（现为郴县鲁塘乡陂副村）人，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邓华的曾祖父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穷秀才。邓华的祖父邓文奎，十四岁开始教书，四十岁考中拔贡，曾出任云南省马龙州知州。邓文奎出身贫寒，又具有山里人诚朴刚正气质，虽在官场，却不善于逢迎应酬，而是师法清官廉正，想为自己留个好名声。上任不到两年，时值州境久旱成灾，百姓苦不堪言，邓文奎稟陈上司，请求减征该州粮赋，以苏民困，遭到上司驳回。邓文奎再次呈文固请，因而触怒上司，将他革职罢官。邓文奎回到故乡重新开馆执教，直至晚年。

邓华的父亲邓养源，自幼随父读书，二十多岁应县试，中廪生，在家乡私塾执教。中年时代，邓养源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将私塾改成新式小学。为了出去开眼界见世面，他装扮成“游学先生”，卖文鬻字，先后游历了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等地。在这些地方，他目睹帝国主义、军阀官

僚的暴行和民众受欺凌的惨景，愤慨不已。回家后，思想为之一变。此后，他除继续教书外，还刻苦钻研医术，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郎中先生。他给人看病不取报酬，遇上贫苦农民，还为他贴钱抓药。他有个同族叫邓家乐（即邓允庭，后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参加过同盟会。他俩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势，抨击弊政。邓养源这些思想性格，对他的子女是有影响的。

邓华七岁时在本村私塾发蒙。他虽调皮爱玩，但天资聪慧，深得老师的赏识。有一次，老师对他的父亲说：“多华很有天赋，看样子他没有读几句书，到时候背诵起来倒是一字不差。”家里藏书不少，邓华不时溜到书房，贪婪地读着，有的书看不大懂，不免生吞活剥。但《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书，却深深吸引了他。遇上同孩子们“打野外”——扮演打仗的游戏活动，刚正勇猛的黑旋风李逵，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精忠报国的岳飞等英雄人物，是他最爱扮演的；相互厮杀，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也不哭叫一声，继续抡刀舞棒，追赶冲杀。

邓华读了几年私塾，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陵高级小学读了一年。一九二二年秋，他想跑出去，跑出这个偏僻闭塞的山村，便向父亲提出到县城求学的要求。开明的父亲同意了她的要求。是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

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对谁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

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一九二五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政治，长沙市工人、学生不断地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sup>①</sup>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在安源被害，遗体运抵长沙，灵柩停放在教育会坪。邓华参加了十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黄静源是郴县人。这位可敬的同乡在临难前面不改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工友们联合起来”等口号，从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革命先驱的事迹中，邓华体会到：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一九二五年冬，邓华由父母作主，与本县华塘乡社里的邱耨娥结婚。

一九二六年，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北伐军入湘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邓华的故乡郴县和与郴县紧邻的

---

<sup>①</sup>访问邓华的同学、亲属邱芬的记录。

桂阳县，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后加入共产党，二姐夫何仰之还是永宁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帮助，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用邓华自己的话说，“开始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苏维埃，实行社会主义。”<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联，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三月，经由易蕴、查夷平的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②</sup>。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组织决定邓华到省党校学习。这所名义上为国民党的党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秘书长为谢觉哉，教务主任是李达。五月二十一日，军阀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经党组织同意，邓华与两个郴县籍党员一道，离开省党校，返回郴县。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转战至湘南，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接着挥师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至湘粤边境十余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数十万，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四、七三

---

<sup>①②</sup>邓华，《自传》。

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并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邓华闻讯，连夜赶到离家只有三十里路的桂阳县城，可是革命军已先期退出；他又追到郴县保和圩，终于赶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先在该师第二团工作，三月，被调至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sup>①</sup>。

（二）

不久，湘粤两省敌约六个师进攻湘南起义部队。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于四月在宁冈砦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五月四日，在砦市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原第七师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邓华任宣传队中队长，不久，被调到该团三营六连任党代表。

三十三团没有参加两军会师大会，而是奉命去打遂川。这是邓华第一次参加战斗。作为连党代表，他除了能进行一般的政治动员外，军事知识并不知晓，而是凭着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现在战场上。幸好连长方正明是贺龙旧部，他指点眼前山川地物，教着邓华如何隐蔽自身，如何向敌人进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邓华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枝不足，四军军委决定：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要求三十三团前往桂东山区活动。在返回湘南途中，有人乘机煽动干部战士回家，部队秩序很乱。此时，邓华的表弟、在三十三团任连长的首培之，邀邓华一起回家乡去，说是到家乡打游

<sup>①</sup>邓华：《自传》与履历表。

击，群众条件好，情况熟悉。邓华回答说：“不能回家乡去，农民同志有家乡观念，回去就会散掉。”<sup>①</sup>邓华虽然也思念家乡的亲人，但他想到自己的入党誓言，便毅然决定：不随大队人马回家乡，而是重返井冈山。

邓华和三十三团中不愿回湘南的同志上了井冈山后，受到毛泽东的欢迎<sup>②</sup>。四军军委将他们中的军事干部编入二十八团，政治干部编入三十三团，邓华被分配在三十一团一营，任营委干事。

不久，邓华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他随担任前卫的一营由古城出发，在七溪岭凉亭前面与敌遭遇。由于地形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就在路旁的两个山包上与敌对峙。待迂回敌后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打响，敌军动摇之际，邓华和三十一团一营全体指战员在营长陈毅安指挥下，迅即勇猛冲杀，将敌打垮，与主力一道乘胜追击，占领了永新城。

八月底，邓华随三十一团一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是役红军凭藉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作战，打退敌人两个团的多次进攻，毙伤敌近百人，红军仅伤亡三人。

九月，邓华被调到三十一团党委，任组织干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邓华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于二月十日参加了太柏地战斗。此役歼敌近两个团，扭转下山以来连战失利的被动局面。三月十三、十四两日，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歼敌郭凤鸣旅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攻占长汀后部队进行整编，三十一团编为红四军

<sup>①</sup>按：首培之回到郴县后即被敌人残酷杀害。

<sup>②</sup>参见李克如：《井冈山斗争的回忆》，载人民出版社《革命回忆录》第6辑。



第三纵队，邓华先后任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军士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随部队继续在闽西活动，参加了三占龙岩、攻占上杭等战斗。

十二月下旬，邓华以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身份，参加了在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邓华对大会通过的《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等决议非常重视，把它当作红军建设中的纲领性文件，在所属部队深入传达，坚决贯彻。

一九三〇年六月，成立红十二军，邓华先后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治委员、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八月，邓华率部参加围攻长沙战斗，撤围长沙后，随红一方面军回师赣西南，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城。在吉安，红十二军扩编，成立红三十六师，邓华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根据上级指示，邓华和师长一道向部队和驻地群众作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十二月二十四日，率部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的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十二月二十九日，总部发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逃至龙冈，并继续向东进犯，遂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攻击张辉瓒部命令，三十六师等十二军所部为左翼。战斗打响，三十六师会同友邻部队一举突入敌阵，邓华与师长一道，指挥所部与张辉瓒卫队营激战，几番勇猛冲杀，全歼了这个由能上刺刀的驳壳枪装备的卫队营，有力地促进了全歼张辉瓒部的胜利。紧接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三十六师受命作为正面攻击力量，追歼谭道源部的第五十师。邓华等指挥所部勇猛进攻，与友邻部队协同，又歼灭谭

道源师两个团<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六师参加粉碎敌第二次“围剿”后，七月间，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和盘旋打圈子战术，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八月七日和十一日，三十六师跳到敌人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歼敌万余。此时，各路敌军共约二十万人，向红军集结地君埠追来。在敌包围圈越来越紧缩的情况下，方面军总部于八月十三日命令红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把敌人牵走；而主力则向兴国方向突围，再次跳到敌人背后去隐蔽休整，以逸待劳，伺机破敌。

在这次向东北方向佯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斗中，三十六师在军首长罗炳辉等率领下，有声有色地执行总部交给的战略使命。邓华和师长各骑一匹从张辉瓒那里缴来的高头大马，或率先，或殿后，指挥部队虚张声势，故意扬旗鸣号，拉大行军队伍距离；没有红旗的同志，挂起各色包袱皮当旗帜，高高举起。夜间行军，有意点起无数火把。行军路过岔口，或是宿营住房，则把红一方面军所有番号有意号出来。果然，蒋军认定红军主力“北窜”，急调各路人马跟踪追来。就这样，三十六师等部牵着敌人鼻子，在赣南地区崇山峻岭中盘旋打圈子，待到八月底，敌人发觉上当，已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惫不堪了。以逸待劳的红军主力抓住敌全线退却的有利战机，勇猛追击，又歼灭二万余人，胜利打破敌之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三十六师奉命在闽西做群众工

---

<sup>①</sup>邓华，《自传》，访问张宗逊记录。

作。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邓华先后率部参加粤北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资战役。打破敌第四次“围剿”后，六月，红一方面军在腾田整编，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团直辖师。原十二军三十六师编入一军团一师，邓华任一师三团政治委员。不久，他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四年一月，邓华改任二团政委；八月至十月，在工农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初，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时，邓华率领红一师二团，执行向敌人进攻、阻击、追击等任务，掩护主力西进。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红一师二团参加了四渡赤水等战斗，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又飞兵入滇，胜利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勇夺泸定桥，甩掉敌人的前堵后追。接着又爬雪山，过草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邓华先后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主任、一师政治委员和三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后，奉命率部南下至西安北部，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转入整训，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准备。

### (三)

抗日战争大部分时间，邓华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平型关前线，邓华作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同年十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邓华改任该团政治委员），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会同团长杨得志指挥所部，迎战猖狂一时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是役歼敌一千多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邓华先后担任独立团、独立师和第一军分区政委，带领部队抗击日寇，打击和争取伪军，参加开创晋察冀根据地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组建了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第一步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以取得前进基地。三月，邓华支队向平西进军，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连克矾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门头沟等据点，一度收复昌平、涿县、涞水、良乡等县城，并将北平至门头沟铁路及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昌平段大加破坏，解放了平西十余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宛平、房（山）涞（水）涿（县）、延（庆）昌（平）、怀（柔）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自卫队。

五月，宋时轮支队奉命来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兼党委书记。四纵辖第十一支队和第十二支队，共五千余人，积极准备挺进冀东。

六月八日，宋时轮、邓华率部分两路向冀东开进。邓华率第十一支队沿途作战，连破永宁、四海等敌据点。四海一仗，歼敌三十多人，接着在沙峪与增援四海之敌遭遇。该敌二百余人，为板垣师团所部，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在其伤亡达

三十多人时，仍然顽抗。邓华当即指挥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大队，坚决消灭该敌，从上午十一时战至午后四时，敌除七人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六月十七日，十一支队所属三十三大队猛扑灵雾山区的兴隆县城，与日军、伪军三百余人及反动民团等彻夜激战，占领县城大部。二十一日，部队在邓华率领下，转到蓟县的靠山集和遵化将军关一线。

在四纵胜利进军的配合和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七月上旬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人民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建为抗日联军，一度发展到十万人。

四纵进入冀热边区后，由于日伪军拦截阻击，在长城一线转战。那时天天下雨，大路被敌人控制，部队在泥泞小路上开进，十分艰难。每遇敌情，邓华总是亲自到前边指挥战斗；行军道上，他常随前卫营活动；到达宿营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

邓华等四纵首长遵照中央指示，于八月率部攻克迁安县城，同时开进遵化、丰润县境，在铁厂与抗日联军部队胜利会师。至此，四纵和抗联部队已经攻克六座县城，控制了冀东广大村镇，一度截断了北宁铁路，中断敌运输半月之久，使日军陷入严重困境。八月中旬，冀察热宁军区成立，宋时轮、邓华分别担任军区正副司令。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并指示其“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sup>①</sup>

---

<sup>①</sup>转引自李运昌：《回顾我党领导的冀东暴动》，载1981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sup>①</sup>面前，四纵党委会决定主力西撤平西，并决定将起义部队五万人带到平西整训，以便第二年整理成一个大部队再打回冀东，并将这一安排打电报向上级报告请示。在等待上级复电时，四纵主力已经开始西移，只留下邓华带领的一个大队在冀东。邓华认为，如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就须把已开走的主力部队调回来，至少要调回一个大队，并就此再次打电报请示上级。十月八日上级来电说：“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由邓华主持的、有抗日联军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九间房会议上，大家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一致同意留下包森、苏梅等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起义部队约五万人向平西转移<sup>②</sup>。

大规模西撤的决定是错误的。部队在西撤途中由于敌人围追堵截，加之起义部队组建不久，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不细，以致遭受较大损失。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对四纵挺进冀东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电报说：“邓、宋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电报同时指出：“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这是应当引为教训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5页。

② 参见马辉之：《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

的<sup>①</sup>。

一向严以律己，不居功，不诿过的邓华，对于西撤问题一直严肃认真对待，数十年来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外，还由于：一，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二，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三，地下河北省委在起义发动后才赶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sup>②</sup>。他多次表示，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sup>③</sup>。

十月底，邓华带部队回到平西后，即着手恢复和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秋，邓华奉调到晋察冀军区，筹备建立第五军分区；一九四〇年三月，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到任后，带领部队一面开展政治整军，开辟根据地；一面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

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邓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任命为涞灵战役左翼队司令兼政委，指挥一、二、六、二十六团和察绥支队，向浑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敌出击。战前，他指

---

①转引自马辉之：《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②邓华于一九六八年写的关于挺进冀东问题的材料底稿，存邓华亲属处。

③邓华：《自传》（一九五五年一月写）等。

挥所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打无把握之仗”，是他一贯强调执行的军事原则。根据军区给予的战役计划，他部署所部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得十分详尽，敌人驻地以及警戒配备如工事、外壕、铁丝网、堡垒等，都绘成了图。部队出动前后，严密封锁消息，保守军事秘密；同时增设有线电话，便于联络指挥。如攻占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处的战斗，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十月八日夜，邓华亲临战场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七十余名，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称赞，说“打得十分干脆漂亮。”<sup>①</sup>百团大战期间，他指挥所部共进行大小战斗九次，歼敌五百余人。

第五军分区辖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繁峙、应县、阳原等八县。这一带总称雁北，是有名的贫瘠地区，加上日军频繁“扫荡”掠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遇上荒年，山上的树叶、树皮，都被采来当主食。在部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时，邓华指示所部，严格执行军区“不得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的训令，率领部队强袭敌伪据点，去“虎口夺粮”；就是再困难，宁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期间，邓华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坚守一条原则，越是艰苦困难时，越是要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越是要关心干部战士<sup>②</sup>。

随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日军深感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它的心腹大患，因而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从一九四一年起，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

---

<sup>①</sup>《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02页。

<sup>②</sup>1984年6月原晋察冀根据地部分干部座谈记录。



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

一九四一年八月，因五分区撤销，邓华被调到四分区主持工作。他一到四分区，便立即投入秋季反“扫荡”斗争。

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七万之众，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进犯四分区之敌一万五千余人，分六路出动，首先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邓华和四分区首长一道，带领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敌之合击，保全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在敌合击的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突然开火，速战速决；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如九月十九日，在获悉日军五百余从漫山、骆驼崖出发，向六亩园前进时，分区主力一部于古树台附近设伏，另一部则不断对其侧击、尾击，毙伤其二十余人，待其进入预设伏击圈时，即以猛烈火力向其扫射，毙伤敌一百五十余名，余敌狼狈逃窜。又如分区部队仅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方，牵制敌人三千多人，麻雀战从上午十时直打到下午五时，日军晕头转向，被打死者达一百二十余人，而八路军方面开火的战士仅十三人。与此同时，还发动广大民兵实行麻雀战。这样就使日军处在根据地军民合力打击和内外线的夹击之中，终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sup>①</sup>。

一九四一年底，邓华被任命为第四分区司令员。

四分区所属十多个县，处在滹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盛产稻谷，当时有晋察冀根据地的“乌克兰”之美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

<sup>①</sup>邓华：《秋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1941年9月25日《晋察冀日报》。

和“蚕食”，妄图把华北变成它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四分区便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在分区周围大量增筑据点、堡垒，大修封锁沟、封锁墙，建立“无人区”；同时经常派出部队前来奔袭、进击。根据地进一步缩小。邓华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精神，一方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另一方面指导分区军民，积极打击前来奔袭、进击的敌人，使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八月，四分区部队共与日军战斗二百三十余次，歼其一千三百余人。

九月军区高干会议后，邓华领导四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军区提出的“到敌后之敌后”的对敌斗争方针，即组织游击队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活动，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从此，四分区“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sup>①</sup>十月十四日，到敌占区活动的部队，一举攻入灵寿县城，毙伤日伪六十余名，俘二百十七名，缴获许多枪枝弹药等物资；连日本新首相东条英机颁发的金质奖章也缴来了。灵寿之役给日伪震动很大。《晋察冀日报》于十月十六日发表社论，祝贺“攻入灵寿城的新的胜利”，向“子弟兵的英雄们致热诚的敬佩之意！”从九月至十二月，四分区军民歼敌八百一十二名，摧毁堡垒十一个，恢复和开辟村庄一百四十四个。

进入一九四三年，尽管日军仍对根据地进行所谓“跃进蚕食”、“转辗扫荡”和“毁灭扫荡”，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斗争方法，还是挫

<sup>①</sup>邓华：《一年来的战斗与反“蚕食”斗争的初步总结》，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初，针对日军对分区行唐地区的“蚕食”，邓华指挥主力部队趁其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二月一日至十日十天中，在攻克西口头、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等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七百八十二名。在封锁沟外活动的部队，甚至还袭击了平汉铁路上的长寿镇。分区军民紧密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到敌后之敌后，或推行麻雀战、地雷战，组织“飞行爆破组”、“飞行射击组”，以冷枪射杀和地雷爆炸，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使敌处于惶恐万状之中。在九至十二月，即日军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期间，四分区军民共与敌作战四百三十二次，歼敌二千四百余人。

邓华十分重视部队文化宣传工作。他自己就是搞宣传工作、搞政治工作的行家。他当过宣传中队长，连、营、团、师级政治干部。他长于写作，重要的电报、总结、报告，通常都是亲自动笔，不假他人。每到一地，只要战争环境许可，那里的文化生活就比较活跃。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球，排球、篮球、康乐球，样样都来。四分区剧社在晋察冀边区颇有影响，除上演《白毛女》、《血泪仇》等现代剧目外，还演出京剧。他和“文化人”也合得来，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可以饶有兴味地谈上几个小时。

一九四四年二月，邓华任机动旅（后改称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这个旅是由晋察冀军区抽调六个团组成的，奉中央军委之命开赴陕甘宁边区。

邓华到延安后，于同年十一月调到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队学习，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其间，四月至六月，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离开烽火连天的战场，他得到了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回顾自

已战斗历程的机会。邓华后来总结说：在延安一年多，“对于提高思想，改正自己的缺点方面是有收获的。”<sup>①</sup>

####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许，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和邓华等高级党政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共二十一人，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DC 型运输机，从延安起飞，在山西南部一个临时机场降落后，立即分赴指定的地区，去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

邓华的目的地是我国的东北地区。当时及稍后，通过海路、陆路进入东北的人民武装部队达十三万多人，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

十一月八日，邓华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五日，邓华奉命率保一旅等部队撤出沈阳，向辽西转移。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委员。十二月，辽西军区（后称辽吉军区）成立，邓华任军区司令员。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他率领军区部队，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巩固的根

---

<sup>①</sup>邓华：《自传》。

据地；同时，整训部队，鼓舞战斗意志，进行各项战斗准备。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违背于一月签订的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以优势兵力，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以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攻。邓华指挥所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解放四平战斗和四平保卫战后，转战于辽吉广大地区，进行反敌蚕食作战，拔据点，歼顽匪，积小胜为大胜，为东北战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一九四七年四月，由保一旅、保二旅、西满独立师等部组建成辽吉纵队，邓华任司令员。

经过东北民主联军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四平已成为孤悬于中长路的孤立据点。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四平，作为在东北转入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战役。

邓华奉命指挥由辽吉纵队改称的第七纵队，于六月上旬协同第一纵队进攻四平。七纵到达四平地区后，从侦察部队的情报中得知，四平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已得到补充，第五十四师也已退集四平，加上保安部队，共约三万余人。邓华根据敌情，判定以两个纵队攻取四平，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果用三个纵队，拿下四平较有把握。他即拟好电报，准备向总部提出建议。但他又想到，过去对作战提过意见，被林彪（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打四平，提出兵力不够，是否还会受到责难？可是他想到，四平是战略要地，如能夺取四平，就使北面长春之敌更加孤立，我在战略上处于主动。经过周详考虑，他从全局出发，把上级批评与否置之度外，决定提出自己的建议。当时纵队司令部有同志说：“上级恐怕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调，还不调来么？”邓华却认为，当时东北有六个纵队，增调一个纵队不

成问题。最后他把电报稿改为：最好增加一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以后实际上只增加一个师，而且这个师只能担任战役预备队，不能担负独立攻击一个方向的任务。实践证明，两个纵队加一个师，打四平这样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只能对该市西城（以铁路为界）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击，无力在东城增加一个攻击方向；夺取西城后，敌人退到东城死守，这时两个纵队已打得很疲劳，加上战斗减员和存在着铁路开阔区的不利地形等情况，再攻东城，就显得兵力不够了。为了夺取东城，这才把第六纵队的两个师调来，形成“加油战术”。后来由于攻击四平的时间过长，敌人南北援兵迫近，又把第一和第七纵队抽出打援，只留第六纵队攻城，力量就更不够了，结果不得不放弃夺取四平的计划<sup>①</sup>。

尽管上级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他还是坚决指挥所部，浴血奋战十二昼夜，取得歼敌四千八百多人的巨大战果。第七纵队曾攻下敌七十一军军部大楼，活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胞弟、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在民主联军撤围四平后，蒋军南北援兵与守军汇合，得以在四平继续挣扎了八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第七纵队再次参加四平战斗，以三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守敌一个多师，仅一天一夜，即一举解放四平。一九四七年夏季未能攻克四平，是由于“没有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这个主要作战方向上”这一结论<sup>②</sup>，已为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所普遍接受。

---

<sup>①</sup>参见高体乾：《胸怀全局》，载《军事学术》1981年增刊第1期。

<sup>②</sup>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58页。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第七纵队经过短期休整，于九月底向辽西地区挺进，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并阻敌新六军北返任务。当时蒋军在辽西地区有暂编一七七师、暂编第五十七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及暂编第五十一师和一八四师等部，分别驻守在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等地。为了到新民以西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就要越过法库、彰武。是置法库、彰武之敌于不顾，绕道去执行破路和截击任务，还是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消灭法库、彰武之敌呢？邓华想采取后一作战方案，但如果法库、彰武不能顺利拿下，又耽误阻击新六军任务，就会犯一个不执行命令的大错误。当时就有人持异议，说：“上级并没有命令我们打法库、彰武呀！”邓华经过认真侦察敌情，并仔细分析后，果断、坚定地命令：以一部兵力前出北宁路执行破路任务，以纵队主力去歼灭法库、彰武之敌。其所部第二十一师远距离奔袭，一昼夜强行军一百八十里，于十月一日拂晓前包围法库时，敌人还毫无察觉。第二十一师迅猛发起攻击，全歼蒋军暂编第一七七师。此时，蒋军对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还未摸清，第七纵队亦未发现新六军北返迹象。邓华旋又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指挥所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彰武，下新立屯，克阜新，直取新邱，攻占黑山，连战皆捷。十七天时间，接连拿下五城，歼敌三个师。七纵这次机动灵活执行命令，既打了没有命令的胜仗，又完成了破击任务，连受总部通

令嘉奖。邓华事后总结这次战役时，幽默地称之为“顺手牵羊”<sup>①</sup>。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邓华因病在哈尔滨治疗、休养。病愈后重返七纵，指挥部队在四平一带进行新式整军及军事大练兵运动。

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把蒋军封闭在东北，然后予以各个歼灭。九月十二日，邓华奉命率领第七纵队南下北宁线，执行包围锦州蒋军任务。

怎样攻打锦州？如同一九四七年夏季攻打四平时一样，有一个集中兵力问题。最初的部署是：以两个纵队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援敌，五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援敌，一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四个纵队攻取锦州。十二个纵队中，用于直接攻取锦州的仅有四个纵队，主要兵力用于打援了。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系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点，守敌八个师十万余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当时邓华只是一个战役方向（指挥城南方向两个纵队）的指挥员，但他纵观战役全局，认为攻取锦州是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也是能否把蒋军封闭在东北、并在稍后予以各个歼灭的关键，因此，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六个纵队，在援敌未赶到之前攻占锦州。夺取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较有把握，而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延长；拿不下

---

<sup>①</sup>高体乾：《顺手牵羊》，载《军事学术》1981年第1期；李化民：《忆邓华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的作战指挥》，载沈阳军区编印的《革命回忆录（1）》。



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邓华把这个意见作为正式建议，向东北野战军总部提出<sup>①</sup>。电报发出后，林彪没有答复，但不久调来了两个纵队，即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外加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坦克营，这样攻锦就有把握了。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蒋军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当时邓华等人认为，增调两个纵队攻锦，是林彪听取了下面的意见，后来才得知，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sup>②</sup>。

攻占锦州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邓华率第七纵队急行军北上，参加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之战。此役七纵歼灭廖兵团一万余人，生俘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高级将领多人。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散。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分路隐蔽地入关，准备会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举行平津战役。

十一月二十五日，邓华率七纵从辽阳一带出发，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北塘一带集结，并于月底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去夺取塘沽，三个纵队都归七纵首长统一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守敌，封锁平津蒋军从海上逃跑的去路。但七纵在现地勘察和试探性进攻后，认为攻击塘沽于我不利，因为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可以发挥舰艇炮火火力，部队不能沿海岸包围敌人，而塘沽的南面和西北面，不是河沟很多，就是草地盐田，广阔平坦，不易通过，强攻不仅会造成我重大伤亡，而且不能全歼敌

---

<sup>①②</sup>高体乾：《胸怀全局》。

人，只会逼使敌人从海上逃跑；如果转而拿下天津，同样能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邓华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研究，并再次察看地形后，认定攻击塘沽得不偿失，准备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提出转而夺取天津的建议。邓华知道，攻克塘沽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重要战略部署，如同中央军委电报指示的：“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sup>①</sup>。作为三个纵队的战役指挥员，现在提出不打，是不是会招来不执行命令之嫌呢？邓华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敢于站在战略指挥员的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在一九四七年夏季打四平和辽沈战役中攻取锦州时，提出在战区战略部署上集中兵力问题；现在则提出战役方向指向何处的<sup>②</sup>问题。邓华对人民解放事业高度负责，敢于从实际出发，终于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拍发了电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二天，平津“前总”派出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前来实地勘察，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于是，由邓华和刘亚楼共同向中央军委和“前总”报告，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接受了这个意见，立即改变部署。毛泽东给平津“前总”发电说：“放弃攻击两沽（按：指塘沽、大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sup>③</sup>。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邓华指挥两个纵队由东向西突破敌防御工事，与兄弟部队一道，经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天津。接着便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结束

---

<sup>①②</sup>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617、640页。

了解放华北的战争<sup>①</sup>。

一九四九年四月，邓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八三个军。

五月至六月，十五兵团所部在平津地区整训三个多月后，在邓华率领下南下，行程二千四百余里，到达长江北岸。七月，邓华率十五兵团并配属两广纵队渡过长江，配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沿湘赣边境攻击前进。接着，与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共同进行了湘赣战役。十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又与第四兵团、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共同进行了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十五兵团先头部队攻入广州市区，解放了广州市。广东战役歼敌六万二千余人。十一月九日，邓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一九五〇年春节期间，邓华趁路过郴县之便，请假回到故乡郴县陂副邓家探望。一九二八年春节后不久，他扛着梭镖，告别亲人奔上井冈山以来，二十二年过去了。回到故乡，父母亲早已去世，大革命时期，他们同情支持过革命，又让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参加革命，就因为这些，父亲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大年初二，邓华来到父母亲墓前，默哀凭吊。接着，他又去看望了堂兄邓天生墓地。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是在湘南起义时被豪绅指使的暴徒用锄头砸死的；坟墓只是一堆土痕，连墓碑也没有，邓华向陪同的村干部建议，给邓天生修坟建碑。邓华还到了华圻铺社里邱家，深深怀念着十二年前去世的前妻邱青娥女士。可以告慰于九泉下的英灵的是，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亲人邻里见面，述说往事离情，真是

---

<sup>①</sup>高体乾：《邓华同志在辽沈、平津战役中》，载1981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千言万语；展望新中国的光辉前景，又都倍受鼓舞。在故乡逗留六日后，于二月二十二日（农历正月初六日）重返前线。

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由邓华统一指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等部，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守敌为海南岛防卫司令薛岳（号伯陵），所属五个军连同地方武装约十万余人，附有大小舰艇五十多艘，飞机三十多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凭藉海峡天险，妄图负隅顽抗。面对茫茫大海，解放军参战部队一无渡海作战经验，而且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空军海军支援。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邓华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春夏之交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但是，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得力措施，克服敌机敌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与坚持海南斗争的琼崖纵队紧密配合，才有可能使部队顺利登陆，胜利完成作战任务<sup>①</sup>。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研究，兵团于二月初确定渡海作战方针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

木帆船能不能同敌舰作战，能不能把大军渡过海峡，这是当时许多人疑虑的问题。在海上练兵时，四十三军一个副排长带领八个战士，乘小帆船与敌舰遭遇，他们在五六十米距离上一齐向敌舰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四十军一一九师在濠洲岛登陆时，当我炮船（用十轮卡车上发动机改装的机帆船，装

---

<sup>①</sup>邓华：《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载《琼岛星火》创刊号。

有战防炮等火炮)勇敢地上前与敌舰炮战,击伤其“海硕”舰,敌亦仓惶逃窜。邓华在给各参战部队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

“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向敌舰展开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争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sup>①</sup>当时,邓华有一句为人普遍传颂的名言:“遇上敌舰,要横下一条心:打!木船即使被打坏,抱着木头我们也要游到海南岛登陆”<sup>②</sup>。及至前后两批四次营、团规模偷渡成功,并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便大大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用木船战胜敌舰、胜利跨越天险的勇气和信心。

趁着台风季节到来之前,趁着“谷雨”前后还有东风风向可资利用的时机,四月十六日,正是潮汐平流,下午为东风,是南渡海峡较好的气象。当日十九时三十分,兵团一声令下,两个军渡海第一梯队共八个团,分乘帆船三百十八只,机帆船三十二只,于雷州半岛南端起航,途中突破敌海空封锁,于十七日二时至六时,先后强行登上海南岛,与前来接应的前两批偷渡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渡海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部队大举登陆后,敌防卫司令薛岳犹作垂死挣扎,调兵遣将,组织五万余兵力,在空军支援下,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在美亭地区加以围歼。此时,邓华迅速组织了美亭决战:严令两面作战处于不利情况下的四十三军忍受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同时,命令向澄迈挺进的四十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沿澄琼公路

---

①1950年3月9日电报,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②黄进先:《跨海南征》,载《琼岛星火》创刊号。

向在美亭的四十三军出援。四十军主力于二十一日十七时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四十三军形成对敌合围态势。二十二日两军协同，在美亭东北侧的白莲地区击破敌六十二军和三十二军二五二师等部的抵抗，歼其一部，同时全歼美亭突围之敌。至此，敌全线崩溃。解放军乘胜追击，于五月一日宣告全岛解放。整个战役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击毁敌机两架，击伤敌舰五艘，击沉敌舰一艘。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邓华率十五兵团指挥所由海南岛回到广州。

邓华和海南岛战役其他指挥员一道，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在规定的期限内，指挥所部，排除万难，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胜利。这不仅开创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海作战的先例，创造了用木船战胜兵舰的奇迹，而且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它的战略意义也显示了出来。在这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之前，在美帝国主义于六月二十七日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台湾之前，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这就使得要使海南岛成为“第二个台湾”的阴谋不得不破灭。

## (五)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在宣布出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公然武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造成对我国的直接侵略。

七月八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华担任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这支战略预备队是在海南岛战役结束后由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组成的。

七月二十八日，邓华率领部队北上东北执行边防任务，将司令部设在丹东（当时称安东）。

丹东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邓华在这里密切注视朝鲜战场局势发展，研究对阵双方战略态势，并且联系我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认真探求一旦我军出动与美军作战我应采取的战术。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三日，他在边防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选择敌人的弱点，从敌人的翼侧或侧后插至敌人的心脏，首先将敌后方联络切断，尔后分割和包围敌人，一一歼灭之。一般的敌人防御正面布置是较严密的，尤其美国军队火力组织较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美军最怕的是联络切断，被人包围。他还指出，我军必须“充分发扬近战”，“发扬夜战”。这些战术意见，在志愿军入朝后，在运动战期间的作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

当时，朝鲜人民军正将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打到洛东江边，解放了朝鲜国土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在洛东江前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邓华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等人反复研究后，提出对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估计，由邓华执笔，联名向上级报告。这份在八月三十一日发出的报告，从两方面论证了敌将在朝鲜侧后登陆。报告分析朝鲜地形时说：“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为内线作战，在战役上虽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以收外线作战之利。”接着，报告从战略高度分析战场态势，指出“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并以局部反击来巩固滩头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估计敌人将

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小部兵力于现地与人民军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及时作了部署，先是增调两个军，编入十三兵团（亦称东北边防军）序列；接着又抽调三个兵团，在通往鸭绿江地区的铁路沿线集结，准备应付紧急局面。

已在鸭绿江地区的十三兵团四个军，配属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三个汽车团，以及战防炮团、战车团、工兵团、骑兵团等，则在邓华司令员等边防军首长的领导下，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抓紧练兵，特别是练习山地穿插迂回战术和近战、夜战战术，为应付紧急局面而紧张地进行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诸项准备工作。

果然，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等七万余人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随即占领汉城，切断了人民军洛东江前线的供应，人民军大部被割断在汉城以南。这就完全证实了邓华等人对朝鲜战局发展的估计<sup>①</sup>。

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十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并不断以空军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先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

---

<sup>①</sup>参见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载《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3期。



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邓华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东北边防军全体指战员宣誓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十九日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六个军，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进行第一次战役，经十二昼夜激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收复了清川江以北和清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遭到第一次战役打击后，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仍然指挥所部分兵冒进，叫嚣一定要在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第一次战役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上，在总结第一次战役作战经验后，研究下一步战役计划时，邓华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特别是敌军统帅麦克阿瑟狂妄嚣张的心理特点，提出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彭德怀和党委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sup>①</sup>。十一月十三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大榆洞作战会议上，邓华根据志愿军党委讨论的意见，部署了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为：“节节抗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在运动中消耗和歼灭敌人。”为实现这一战役企图，西线集中主力六个军，另一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sup>②</sup>。

<sup>①</sup>姚旭：《彭德怀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学〉杂志》1981年第6期。

<sup>②</sup>刘海清：《忆抗美援朝二次战役》，载《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

美方真的中计了。他们认为，“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sup>①</sup>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sup>②</sup>于是，他指挥美李军和其他仆从军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起所谓“圣诞节回国攻势”，西线美方“第八集团军在前三十六小时中，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十二英里。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sup>③</sup>原来，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的指挥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接着于二十七日发起强大攻势。西线和东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经一个月激战，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收复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美军兵败如山倒，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仓惶撤退时翻车毙命。它被迫转为防御。美国纽约报纸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走进了陷阱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陆军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败。”<sup>④</sup>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三八线，一月四日解放汉城，并一直打到三七线，歼敌一万九千余人。

<sup>①②</sup>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4页。

<sup>③</sup>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sup>④</sup>美国合众社纽约1950年12月5日转播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电。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邓华深入总结志愿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写出《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并于一月八日将此论文在志愿军高干会议上作了报告。这篇对作战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著名论文，高度概括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长处和短处，精辟阐述了志愿军在运动战中的作战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华在这篇论文中总结了志愿军在一、二、三次进攻战役中担负局部防御作战部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志愿军运动防御作战，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sup>①</sup>。

接着，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中，敌人集中全力反扑，朝中方面采取“西顶东放”方针：西面在汉江两岸顶住向汉城的进攻，东面把敌人有计划地放到横城地区，造成该地区的敌人突出，两翼暴露。邓华于二月初率前线指挥所前往东线指挥作战。二月十一日，美军第二师第九团和南朝鲜第八师等部，得意忘形地窜到横城西北六十余里的上下榆沟一线，邓华当即抓住有利战机，于当夜指挥部队采取两钳渗入、严密包围的战术，一举截断其后路，敌人全线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万二千九百余名敌军被分割聚歼在横城南北、广田里东西，方圆数十里的山地里。我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但紧接着，当志愿军反突击向纵深发展发生困难，砥平里战斗受阻时，遵照彭德怀的部署，适时转为运动防御。此时，邓华在《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中提出的在防御作战时兵力配置前轻后重，火力配置前重后轻的战术原则，对于胜利进行运动防御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行这种战术原

---

<sup>①</sup>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

则，在敌具有强大火力的情况下，有效地避敌之长，减少我之损失，而我实行近战夜战，又能攻其所短。在一定时间内消灭敌人一定的有生力量后，在不利情况下，利用夜晚适时主动后撤至新阵地。第四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敌人每天前进不到一点五公里，伤亡达七万八千余人，超过了前三次战役伤亡的总和。

第五次战役规模很大，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人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的进攻作战和打敌反扑，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至六月十日结束，历时五十天，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这次战役结束后第二天，六月十二日，曾任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的魏特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sup>①</sup>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美方被迫在开城与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邓华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原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举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邓华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旬在《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性》一文中说，敌我装备悬殊（敌为高度现代化军队，有制空权、制海权，火力强，机动性大），我方供应运输困难，地势于我不利，以及缺乏敌后配合，在这种情况下，“要以达成大歼灭战，一次战役歼灭敌人多少个建制师，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随后，他于八月二十六日在开城向彭德

---

<sup>①</sup>转引自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77页。

怀和中央军委报告说：“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离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邓华在报告中作了上述分析，表示不赞成打第六次战役后，建议说：“相反的，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①

邓华，作为彭德怀司令员的助手，在这世界的东方，在这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他懂得落在肩上的担子的分量。尽管他这时主要是作为志愿军代表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他还是把这关系战略全局的建议提了出来。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接受了邓华的建议，停止了预定在九月份发起的以运动战为特征的第六次战役。

还需要说到的，一九五一年夏秋期间，朝鲜北方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公路、铁路及其桥梁冲垮不少，给部队后勤供应造成重大困难。从各方面的情况来说，不打第六次战役是完全正确的。有的军事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②

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就是朝鲜战争中运动战阶段的结束，而进入两年长期对峙的阵地战阶段。

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季，果然如同邓华所预计的，敌离开其

---

①②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

载《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

坚固设防的纵深阵地，大举进攻。朝中人民军队依托野战工事英勇抗击，大量予以杀伤，粉碎了夏秋季两个攻势。在整个夏秋季防御作战中，朝中部队共歼敌二十五万余人，超过了运动战时期五个战役歼敌数的总和，而朝中方面的损失大大低于前五个战役的总和。

在朝中人民军队进行夏季防御作战时，邓华正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在讨论停战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说它有海空军优势，要求朝中方面后退一万二千平方公里，说这是对“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这一荒谬意见遭到驳斥后，美方便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在这种情况下，邓华一方面向彭德怀建议，为促成停战谈判的实现。必须进一步歼灭敌人；另一方面，为解决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寻求办法。他在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之后，于八月十八日在开城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意见。邓华建议说：“现地停战，我方亦不吃亏，因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面积虽小，但人口财富较多。战略上，敌阵地离元山近，登陆易；但我阵地离汉城更近，亦易抚敌侧背。”<sup>①</sup>敌人夏秋季攻势遭受严重失败后，当朝中方面于十一月七日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方案时，美方不得不予以接受。这个建议的提出，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了贡献。

邓华在八月十八日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还同时建议：“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应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的

---

<sup>①</sup>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下）。

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毛泽东赞同邓华的建议，于八月二十一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sup>①</sup>

于是，志愿军于九月六日对美军阵地举行局部攻击。其一是攻打敌人夸耀为“铁三角地区”的主要高峰——平康东南的西方山和斗流峰。志愿军攻克了这两个高峰及其附近高地，连同打援共歼敌四百四十名。其二是攻击铁原西南的三三八点一高地美军一个连，歼敌一百二十余人。从此便开始了我方在阵地战时期的战术性反击。

九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在粉碎敌人夏季攻势战役中，我方部队先是构筑一些单人防炮洞，继而有的部队又将单人防炮洞互相挖通而成为坑道。当敌炮火急袭时，部队荫蔽于坑道内，敌炮火延伸时部队便进入野战工事来打击敌人。经实战证明，这种防炮洞和坑道，使部队平均每天减少伤亡百分之四十一·六。彭德怀、邓华等志愿军领导人发现这种经验后，立即指示“志司”进一步总结并在全军推广；一九五二年四月，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从战术上进一步研究改善，统一规格标准和内部的“七防”（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要求。这以后不久，我方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即基本形成，真正成为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一九五二年四月底，彭德怀因病回国就医，五月中旬出院后被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随后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理

---

<sup>①</sup>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下）。

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九月十日，邓华和副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甘泗淇等指挥志愿军进行了全线反击作战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这次全线反击分为两个阶段：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五日为一阶段，在志愿军首长统一计划下，一线各军根据准备情况，不等齐地陆续发起进攻；第二阶段从十月六日至三十一日，在邓华等统一指挥下，一线各军同时发起进攻。在两个阶段作战中，对敌六十个连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防御地域的进攻作战七十七次，打敌排以上反扑的作战四百八十余次，共歼敌二万七千余人。

毛泽东对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十月二十四日给邓华等人发出的电报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sup>①</sup>

十月十四日，美军为了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对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加强连的阵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我方称之为上甘岭战役）。

美方先后投入三个师共六万余人，集中大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多辆，飞机每日几十至几百架次，集中对志愿军三点七平方公里阵地共倾泻炮弹二百九十万发，最多的一天三十万发；飞机投弹五千枚，最多的一天五百枚，把阵地山头削低了二米，岩石被炸成一米厚的粉末。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志愿军也先后投入四万多人的兵力，并尽量发挥炮兵作用，平均日消耗炮弹一百一十九吨。在邓华等志愿军首长指挥下，志愿军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0页。



防守部队坚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作战方针，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与敌进行空前激烈的战斗。根据邓华代司令员的指示：“有坑道的阵地仍然是可以而且必须与敌反复争夺的。同时应尽一切可能及时的增援，以致我坑道中能保持适当的有生力量，利用野战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于阵前”；并“适时以火力反击，或兵力反击，求得里应外合夹击敌人，杀伤歼灭敌人于阵地上。”志愿军防守部队转入坑道后，顽强坚守，并在火力反击和二梯队兵力反击支援下，里应外合，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歼灭敌人达二万五千余人。这次战役持续了四十三天，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sup>①</sup>。

对于上甘岭战役，双方最高指挥官都下了最大的决心，投入了极大的兵力，这不只是争夺仅仅三点七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小的高地问题，而是对双方在这场战争中攻防能力的考验，是双方作战信心、力量与指挥艺术的较量。结果是美方失败了！它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无法攻破我方的阵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哀叹道：“用这种方法，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sup>②</sup>

十一月，邓华撰写了《关于积极防御的若干战术问题》一文。这篇长达三万三千多字的著名论文，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五次战役以后，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以来，依托坑道体系，在防御组织、防御作战和对坚固阵地攻击诸方面的经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

<sup>①</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336页；访问姚旭记录。

<sup>②</sup> 转引自邓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

委员。美方在上甘岭的失败，使得它在正面战场突破我防线的希望破灭了，除了使用核武器和在我方侧后大规模登陆外，是别无他法了。慑于世界人民的压力，要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动用核武器持怀疑态度”，因为朝中人民军队“处于掘壕深藏的状态。”<sup>①</sup>美方便企图在我侧后大规模登陆。从战略全局出发，为使我立于不败之地，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华在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和美军在仁川登陆等战役中登陆与反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后，联系朝鲜我方侧后东西海岸自然条件，敌我双方人力、兵力、物力等方面情况，提出了我方反登陆作战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志愿军执行这些方针和原则，在朝鲜军民协同下，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反登陆战备工作。在几个月时间内，进一步修筑了东西海岸防御工事，新建了两条铁路和八条公路，加强运输，储备弹粮，等等。至一九五三年四月，我方完成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可以抗击敌十个师左右兵力在我侧后的登陆进攻<sup>②</sup>。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朝中人民军队发起夏季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五千多人，促使停战谈判有了进展，到六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就在这时，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纵容下，以“就地释放”为名，无理扣留我方被俘

---

<sup>①</sup>美国合众国际社 1984 年 6 月 7 日消息，报道美国一批销密文件中的记录。

<sup>②</sup>薛奇：《志愿军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载《党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罗援：《从抗美援朝战争中进行反登陆战备想到的》，载《军事历史》总第 8 期。

人员二万七千余人，并狂妄叫嚣“北进”、“单独干”，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认为有必要给它一点教训，以促成停战最后实现；同时，在金城前线敌方李承晚集团防线正有一突出部，伸进我方防线。邓华说，为了不给朝鲜人民留下隐患，也需要“把战线拉直，给朝鲜人民多占点地盘”，因而打算进行金城战役，正拟向中央军委和彭德怀请示<sup>①</sup>，恰在这时，彭德怀司令员来到朝鲜。

彭德怀于六月十九日离开北京，赴朝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二十日晨抵达丹东，得悉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于十八日借口“就地释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疯狂叫嚣“单独干”时，立即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白天驱车赶到平壤，同邓华等通了电话，他们不谋而合地主张再打一仗，并于当晚就此向毛泽东请示。第二天，毛泽东答复：再打一仗，“极为必要”<sup>②</sup>。

金城战役于七月十三日夜打响了！邓华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向毛泽东、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所期待的“战役反击”，终于到来了。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呵！战役发起时，一千余门大炮，四十分钟的火力急袭，即发射了弹药一千九百余吨。我强大突击集团在一小时内，就突破李承晚集团四个师的二十一公里正面阵地，至次日黄昏，经二十一小时，突入敌人阵地纵深九点五公里，随即乘胜追击，迅猛穿插，活捉其“首都”师副师长；接着又击退敌纠集美李军六个师以一个连到两个团规模的反扑一千三百余次，至七月二十七日停战时止，金城战役歼敌五万人，向南推进一百六十九点二平方公里，打掉了突出部，拉直了战线，迫使敌人于七月二十七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

<sup>①</sup>访问赵杰、姚旭、丁甘如谈话记录。

<sup>②</sup>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第160页。

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是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准的。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划出，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再次校正时，我方向南推进了一百四十平方公里；金城战役后七月二十四日第三次校定时，我方又向南推进了一百九十二点六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划分线向南推进了三百三十二点六平方公里。战线不断向南推进，生动地反映了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

朝鲜停战实现，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哀叹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sup>①</sup>。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失败。

七月三十一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最高荣誉——“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十月二十七日，以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等志愿军领导人。

停战协定签字后，彭德怀回国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sup>②</sup>。

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从朝鲜战场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努力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不断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他屡出奇谋，协助彭德怀决断部署，同时又亲临前线指挥，是我军的一位智勇双全、能文能

---

①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1页。

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插图第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武、军政兼优的杰出将领。他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邓华从朝鲜回国，并参加于十二月四日至次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华向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经验的介绍》的发言。

## (六)

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邓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十二日，又被任命为东北军区代理司令员。

邓华到东北军区后，五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主持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东北地处我国东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朝鲜停战的实现，东北军区的历史任务，由支援抗美援朝作战转变为以战备训练为主，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新的形势下，邓华在强调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大力抓了部队的现代化建设。根据在朝鲜同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美国军队作战的经验，邓华强调全体指战员要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技术装备和诸兵种军队的合同战术。

一九五五年三月，邓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员，随后，被任命同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五月六月，他参加从苏联方面接收旅大基地的工作，任接收领导小组副组长。

一九五五年十月至十一月，邓华参加组织领导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任副总导演。这是一次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司令员携带通讯工具，并有部分实兵参加的抗登陆战役现地演

习。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后第一次大型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视察指导，并有全军许多高级干部参观见学。演习结束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总结讲话。演习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一九五六年三月，邓华在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就如何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问题，和周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一道作了联合发言。他们建议要明确重点防御和强调控制强大机动部队的思想，在关于军队建设方面，他们认为，加强防空是我们当前建军、作战的头等任务。邓华形象地说：“在朝鲜战争中，咱们是光着脑袋打仗呀！现代战争，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掌握制空权，可不行呵！”只要有会，他就要为加强空军建设而大声疾呼。

邓华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军人本色。在沈阳，开始安排他住在日本关东军司令住过的房子，可他觉得那房子太大了，浪费，便主动要了处小房子，于一九五六年搬了进去。那幢关东军司令住过的房子，遵照邓华的意见改作招待所了。邓华的一位老战友回忆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私花过公家一分钱，或者向公家要过一件规定以外的东西。几十年来，他生活上无所奢求，自奉甚俭，始终过着廉洁清淡的生活。”<sup>①</sup>

一九五五年九月，我国人大常委会对在我国长期革命战争中有功人员授勋时，邓华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同月二十七日，国防部颁布授衔命令，授予邓华上将军衔。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sup>①</sup>袁升平：《深切怀念邓华同志》，载1980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邓华被选为中央委员。

十月，邓华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

一九五八年二三月沈阳军区党的第一届二次会议上，不少人“大跃进”的劲头很足。但邓华强调要“因地制宜地、有计划地，并在物资器材许可和不打乱原有的整个工作规划和提高训练质量条件下，展开战斗训练的大跃进。”邓华说：“所谓跃进，不能只是数量上的跃进，而且也要求质量提高，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因此在训练中要特别注意质量。”“防止走过场的形式主义。”<sup>①</sup>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邓华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检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部队工作。这是一次整风会议。他列举事实，严厉批评了虚夸浮报和弄虚作假问题，说，这种问题“发展下去有亡军、亡国、亡头的危险。我们要警惕起来，大声疾呼，为反对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sup>②</sup>他还说：“客观的物质条件是有限制的，人们不能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我们作任何一项工作，既要重视主观能动性，又要看到客观的可能性。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就会把指标挂在空中，实现不了，一定要干，就是主观主义。”<sup>③</sup>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

①邓华：《在沈阳军区党的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存沈阳军区。

②③邓华：《沈阳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9日），存沈阳军区。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赶上庐山。他原想会议当是讨论工作问题，继续批“左”。可是，在八月二日全会开会时，毛泽东长篇讲话的主旨是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了！

八月三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夫、周小舟四人。邓华被分配在批彭的这个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经痛心形成了——边倒的意见。邓华也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揭批，但招来的却是“假批判，真保护”的指责。

紧接着，在林彪主持下，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追逼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同时还批斗了邓华等四人。邓华的罪名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重要成员，“反党、反毛主席”。

批斗邓华前，毛泽东托罗荣桓给邓华带信，大意说，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sup>①</sup>。可是，会议一开，哪里是提意见，而是无端问罪，强加罪名，并且不许他申辩。最后，林彪在会上宣布的是：撤销邓华在党内外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十月中旬，邓华被拉回到沈阳军区，由派去的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主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搞了一个洋洋数千言的所谓《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声称邓华“既是高饶

---

<sup>①</sup>参见邓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邓华亲属来信。



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的一个危险人物。”

这个材料，是作为邓华反党罪过定案材料的，但又不同邓华本人见面，却把它塞进邓华档案中近二十年之久。直到邓华问题彻底平反后，邓华读到这个材料时，给了它十六个字：

“无限上纲，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混淆是非。”<sup>①</sup>

在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揭批之后，邓华举家于十一月迁来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此时此刻，邓华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他本来言语不多，现在更是缄默少言了。但有时向他的夫人李玉芝迸发出一两句火山爆发式的语言：“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将会作出结论的。”

十二月，邓华得到通知，中央已决定他转业地方。这就是说，肯定要把他撵出部队了。从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参加红军时起，三十多年来，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一直战斗在部队，先是在红军，接着是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继而是人民志愿军，随后又是人民解放军，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今天，在新中国建立刚满十年的时候，却要离开部队了，他是多么地留恋呵！然而，邓华深深知道，这是无可挽回的了。

一位战功卓著、驰名中外的上将，人民解放军难得的高级指挥员，就这样在军事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 (七)

一九六〇年五月，邓华到达成都。中央已经决定他担任四

<sup>①</sup>邓华手记，存邓华夫人李玉芝处。

川省副省长。

地方工作，他不熟悉，而且分配他主管农业机械，他在部队曾经学会驾驶汽车、坦克，算是同机械打过交道，但农业机械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当然也是陌生的。

省委中有一位主管农业的书记，省人委设有农业机械厅，厅长由一位省委常委兼任。上有农业书记，下有常委厅长，而他只是一般的省委成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个“戴罪之身”。这时他已五十岁。有好心人来劝导他：你不过是挂名的副省长，还是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有的人甚至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搞不好又会飞来横祸，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而邓华回答说：“我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拿人民的钱，吃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办事。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考虑。”

他立即以他那特有的战斗作风投入到新的工作。他把家略为安顿了一下，便一头扎进了农机世界。他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机械书刊。他下乡下厂，深入调查研究。一年之中，他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农村。几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以致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说：“在省级领导干部中，邓华走的地方最多，接触面很广，了解情况深细，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同志。”<sup>①</sup>

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还提出给几年来县以下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这是在中国政治生活开始出现转机的表现。紧接着，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了扩

---

<sup>①</sup>谢功贵：《回忆邓华同志在四川工作时的二、三事》，未刊稿。

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自我批评。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sup>①</sup>

在阅读有关上述方针、政策的文件时，或是听取传达讲话时，邓华的心情激动不已。一九六二年春，他在四川省级机关干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工业小组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成功了，建设上又有了一些成绩，因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脑子发热，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等等，这怎么会不摔跤子呢？对于七千人大会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很感兴趣，他借用毛泽东讲过的话说：“不让大家讲话，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他衷心地希望党和国家摆脱“左”倾等错误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sup>②</sup>

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成都市前卫街邓华寓所，寒暄两句之后，对邓华说：“中央发了文（指《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原犯错误的人，要进行甄别，你看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该怎样回答呢？李井泉是受中央之托（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员）前来征求意见，真的要给以甄别平反？还是来摸阶级斗争动向，准备“钓鱼”呢？邓华注意到他仍然称自己是“犯错误的人”。邓华踌躇了一会儿后回说“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处理过了，没意

<sup>①</sup> 《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52-53页。

<sup>②</sup> 邓华笔记，存邓华夫人李玉芝处。

见，没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到来，还是引动着邓华思想深处的波澜。在他看来，对他的处理是一个重大的冤案；当然应当甄别平反。他和夫人李玉芝、长子邓贤诗作了深入研究后，决定向党的总书记写一个报告：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报告起草后，邓华作了认真的修改，并加以誊正，准备作为试探气球放出去。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邓华反复分析当时政治形势，认为报告还是不寄出为好，最后将报告销毁了<sup>①</sup>。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月，邓华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并批判了所谓的“翻案风”，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sup>②</sup>。

邓华注意到，这次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新的批判，而彭德怀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出席会议。邓华得以出席会议（他仍是八届中央委员），是区别对待，还是留作反面教员？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政治生活方面的转机，似乎又破灭了。

参加八届十中全会回来，邓华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特别是严重消瘦，几乎是一个星期减少体重一市斤，到一九六二年底，一个一米七的个子，体重竟下降到只有七十二市斤。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邓华到重庆治病，经医师多方检

---

<sup>①</sup>访问邓贤诗记录。

<sup>②</sup>《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0页。

查，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至一九六四年四月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治病和休养。

一九六四年五月，邓华出院回到成都。他仍然受命主管农业机械工作，主要抓“四机一车”（指打谷机、打米机、插秧机、粉碎机和架架车）和水轮泵的生产 and 推广使用。在这一工作中，邓华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并说同这些人的斗争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邓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他得悉这个通知后，联系这些年来政治形势发展的脉络，他预感到：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二十日，邓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邓华回到成都，有人对他的处境表示担忧时，他回答说：“我不当权，尽管放心。”

他照常抓工作，照常下乡下厂。

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德怀被由江青把持的红卫兵由成都揪去北京批斗。

这时，邓华要他的夫人李玉芝为他准备一个小提包，内装随身衣服和小日用品，他说：“这下该轮到我了，随时准备他们来揪吧！”

一九六七年春所谓批“二月逆流”时，得悉一个一个有功之臣，一个一个的老师，纷纷要批倒斗臭，邓华按捺不住了，

他蓦地从沙发上跳起，在室内急促地走步，他想起《史记·勾践世家》中记叙的范蠡在辅佐勾践之后离去时的话语，愤愤地说：“难道真的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吗！？”<sup>①</sup>

六月二日，终于轮到邓华来了，一伙红卫兵闯进他家，未出具任何文件，便将一位堂堂的副省长抓走了。康生、江青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开指名“邓华是坏人”后，迫害升级，转而关押到成都市昭觉寺临时看守所，完全被当作囚犯看待。

无穷无尽的审讯，数不清的游街批斗，一齐向这位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袭来。无论是拳打脚踢，还是棍棒加身，或是被推搡倒地，摔得口角流血，邓华始终实事求是，坚贞不屈。暴徒们说：“老实交代你的罪行！”回答是：“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又追逼：“你到处看地形，是准备参加‘二月兵变’。”邓华回说：“我早就没有一兵一卒了，还搞什么兵变！”

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华接到要他去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通知。他从临时看守所出来，有人请来了理发师，给他理了由于长期监禁而长得很长的头发和胡子。他乘飞机抵达北京，参加了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的全会。原来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在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因而决定“解放”几名中央委员出来。十月十日，经毛泽东指名，邓华被宣布为得到“解

---

<sup>①</sup>访问邓贤诗记录。

放”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才达到四十人，加上从候补委员递补上来的十人，共五十人，刚刚过半数<sup>①</sup>。

邓华回到成都，不少人来看他，其中也有来拉关系的，要求他公开支持某一派，并许以结合他进省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作为报酬。不久四川省举行省党代表大会，他们特意安排他在大会上讲话。谁料他根本不谈支持哪一派的问题，而是讲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讲大联合，强调抓生产，使不少人失所望。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邓华只被安排在省革委属下的生产指挥组下的农机小组任组长。

此时，补发了在监禁时被扣的工资一千九百多元，他拿来交作党费了。

省革委要求他在继续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时，还把小化肥生产抓起来。他不顾当时自己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也不顾体弱多病的身子，忘我地工作着。他说：“干什么事无私就无畏。我没得乌纱帽，也不想升官发财，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在林彪、“四人帮”还在肆虐的年代，他和四川省农业机械战线的干部、群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为四川省的农业机械建设和小化肥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六九年四月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

<sup>①</sup>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79页；  
《邓华同志生平革命活动年表》

## (八)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于这一年来四川，分别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司令员。他们在会见邓华时，分别向他透露：要你回部队工作，你准备着吧！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讯息！邓华非常兴奋，心想：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历史性的重大事变终于发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年到此结束。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邓华出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调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就是说，他重新回到部队了。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他被赶出部队到重返部队，经历了十八个年头。在这个历程中，多少人在登台表演！每一个人都在经受历史的检验。邓华，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昂着头，无愧于共产主义事业，无愧于人民群众，胜利地走过来了。

邓华这时正是六十七岁高龄。由于重返部队，他断然把吸了五十年的烟戒了。他还要好好干一场！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他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月二十五日，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军委委员。



接着，他参加了十二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他虽身患感冒，但仍坚持参加阔别了近二十年的军事会议。会议刚结束，身体不支，他不得不住入医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包括审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邓华在这次全会上发了言，他坚决拥护全会确定的方针和作出的决策。他在回顾一九五九年那场强加的斗争后说，那时“一找不到我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找不到我反对社会主义的事例，三找不到我反对‘三面红旗’的证据，只好抓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有工作关系，也有同志间的战斗友谊）和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进行批斗”。“我就这样被扣上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邓华曾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他说：“此人非常阴险毒辣，口密腹剑，一有机会便下毒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他一方面着手撰写早就酝酿了的两篇论文：《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方面准备系统地回顾总结数十年来的作战经验，第一步先行撰写有关东北战场、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回忆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他从北京去到广州，身体更差了，再次住院治疗。虽在病中，仍然抓紧时间，写作了纪念海南岛解放三十周年的长文：《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

来自海南岛的一位记者于一九八〇年三月在广州访问过邓华，他在访问记中写道：当秘书领着我们“来到老将军的卧室时，那情景真使我们十分不安。墙角竖着一樽氧气筒，老将军坐在椅上，正插着输氧管吸氧。他在抱病接见我们呢！虽然秘书已经告诉我们，老将军患有肺气肿、哮喘病，但竟想不到这样严重。”“我仔细地端详老将军，他身着粗布便服，头戴圆顶小帽，一副普通老人的打扮，面庞消瘦，脸色苍白。”记者接着写道：“如果走在人群中，谁能料到这是我军身经百战、威震中外的名将呢！”<sup>①</sup>

在广州期间，邓华会见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浦安修转达了彭总在生前对邓华的战斗友谊，她说：“彭总对因他的事件而无端连累很多人，非常难过。”邓华向浦安修表达了他对彭总的深切怀念。他说，在成都时，知道彭总来川了，两人的住地相距只有二、三里路，散步二十分钟可到。可是，那时不能见面啊！邓华说：“心想，来日方长嘛，原希望以后在北京见面的，岂料竟成永诀！”

邓华于五月四日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北京去。谁知到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恶化，有时竟至昏迷不醒。即使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在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安全着想，他惦记着未完成的手稿：《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他断断续续地说：“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流血换来的经验是有用处的……”

当他躺在病床上，得悉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为他彻底

---

<sup>①</sup>黄进先：《一次难忘的会见》，载《琼岛星火》第2辑，

平反的通知已经下达，并且进行传达时，他的两眼润湿了，吃力地讲道：“多想为党、为军队建设再作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日，邓华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

####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注明者外，尚有程子华、韩先楚、曾思玉、肖锋、邓东哲、陈正湘等人的回忆文章或讲话，〈邓华同志生平革命活动年表〉，和访问杨得志、宋时轮、张宗逊、高体乾、袁升平、李钟奇、赵杰、浦安修、姚旭、丁甘如、杨迪、易耀彩、李静、边疆、成普、杨春茂、蔺子安、刘荡、李天、石国英、宋玉林、叶昌渠、杨雨田、张纪、戴觉生、李德绵、门长平、秦玉生、谢功贵等人的记录，以及访问邓华的亲属李玉芝、邓贤诗、邱苓、邓贤毅、邓春和等人的记录。

# 安体诚

张守宪 董建中

安体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知名的教育家。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成员、中共北京区委委员、杭州党支部书记、西安特支书记、黄埔军校党团干事和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教官等职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和革命武装，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国解放前后，周恩来多次提到安体诚；深情地说：“这个同志非常好，是在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的。”<sup>①</sup>

## (一)

安体诚，字存斋，又名安诚斋、安存增、安灿真，笔名存真。一八九六年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丰润县阎家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安宝增，以务农为主，兼营豆腐业，后与别人合资经营糕点。父亲安世祥（又名凤祥）以务农为业，曾任本村学堂校董，对子女和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安体诚兄

---

<sup>①</sup>访问李一夫记录（1985年8月9日）。

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安体诚七岁时入家乡私塾读书，不久到县城上高等小学，一九〇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附属中学，后升入该校法律预科和本科，一九一七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直隶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毕业后，由学校资助赴日本留学。一九一八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安体诚在留日期间，十分关注祖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劳工运动。一九二〇年冬，他写信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了解劳工运动的情况，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神圣’二字意义之所感》寄回国内。文章赞颂劳工“可以生产，改造社会，实现理想”。他认为“劳工神圣”合于“真理正义、光明正大、庄严、科学精神、哲理关系之意味。”<sup>①</sup>该文虽是文言体裁，但生动流畅、言简意赅。当时一般只刊登白话文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破例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此文。

一九二一年夏，安体诚由日本回国后，应天津母校——法政专门学校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年九月，在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和于树德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又称工人补习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并亲自担任补习学校的主任<sup>②</sup>。这所学校设在恒源纱厂（今天津第一毛纺织厂）附近的宇纬路东兴里，招收学员（工人和学徒）四十余人，开设国文、算术、劳工运动知识等课程。安体诚给学员讲授劳工运动和国内外大事，注

<sup>①</sup> 1920年11月8日《民国日报》。

<sup>②</sup>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重阶级教育，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校内还设有天津工人图书馆，馆内购买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供学员和贫苦的知识分子学习。最后，学校又创办了“五五”（马克思诞辰日）书报代卖社，专门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一九二二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安体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入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领导成员兼天津特派员<sup>②</sup>、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并一度担任区委秘书负责国民运动工作<sup>③</sup>。工余补习学校成为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基础。这个学校为北方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安体诚本人也得到了锻炼。安在学校时期曾是一个沉默寡言、安祥而又害羞的人，被同学们称之为“大姑娘”。可是通过和工人们的接触、虚心向工人学习，性格变得十分活泼，并善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工人眼里，他既是一个两眼近视、文质彬彬、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的良师益友。工人们都愿同他亲近。

工余补习学校成立不到一年，就被天津警察当局以宣传“赤化”而查封，许多教员被捕，安体诚脱险离校暂回家乡。安体诚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思绪万千，挥笔写了“创造新生活，共成大志愿”苍劲有力的对联和“进步”二字的横批贴在家门上，以此自勉并教育家人<sup>④</sup>。

---

①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访问李一夫记录（1985年8月9日）。

②罗章龙1984年12月19日的回忆。

③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同志》，原载《中国工人》1957年第九期；王建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集第1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④安国光的回忆（1984年9月21日）。

一九二二年春末，中共北京区委调安体诚到北京担任《工人周刊》的记者、编辑兼搞发行工作<sup>①</sup>。《工人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他为办好该刊呕心沥血，经常白天外出采访，晚上编稿至深夜。在安体诚、罗章龙（《工人周刊》的主编）、宋天放（《工人周刊》的编辑）等人的努力下，该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极力鼓动组织工会和俱乐部。《工人周刊》由于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印数两万余份，成为北方各地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广大读者特别是劳苦工人争相阅读，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者的言论机关”<sup>②</sup>。北洋军阀政府对此曾甚为恐慌，认为《工人周刊》实为“鼓动工人之导线”；如任其“四处宣传”，必妨碍“地方秩序”，此事“至为重大，实难忽视”<sup>③</sup>。为此，反动当局多次通令，“严禁发行递寄”，“严行禁止”<sup>④</sup>。但是，《周刊》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不仅在工人中继续广泛流传，而且在北京东安市场、劝业场等商场的一些书店中继续出售。

一九二二年五月，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刊》成了总部的机关刊物，它对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推动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北京区委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

---

①罗章龙的回忆（1984年12月19日）。

②转引自《李大钊传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③④见直隶警务处长杨以德的呈报及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公函二四〇一号

通过李大钊与高恩洪（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亲信）等人的私交关系，介绍安体诚、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包惠僧等五人到北京政府交通部先后任密查员和育才科视学。安体诚被分配到京奉铁路工作。他利用密查员与视学<sup>①</sup>的合法身份和乘车免票的有利条件，往返于北京、丰台、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奉天（今沈阳）等车站，深入到工人和学生中去，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压迫与剥削的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党的纲领和政策，启发工人和学生的觉悟，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工会，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工人和学生开展斗争。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安体诚和邓培等共产党员先后指导了山海关和唐山两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达数千人，这一斗争取得了相当的胜利。

安体诚在任密查员和视学的一年里，一方面将京奉铁路上为工人所痛恨的交通系官员的营私舞弊罪行写成材料向北京政府交通部报告，促使军阀之间斗争的加剧。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京奉铁路职工运动的特派员指导工作，走遍了该路的大小各站和厂矿，普遍建立了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并建立了党团组织。

安体诚当时月薪银洋百余元，但仍过着朴素的生活，将节余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sup>②</sup>。由于他在京

---

<sup>①</sup>密查员是由交通总长直接派遣和领导的要员，负责收集各条铁路上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情况。视学是北京政府交通部育才科的工作人员。育才科主管铁路上的教育事业，视学又是负责铁路上举办的各种学校。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sup>②</sup>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原载《中国工人》1957年第9期。



奉铁路上的奉工作卓有成效，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sup>①</sup>。

一九二三年初，安体诚在奉天从事工运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虽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幸得一个同乡狱卒的同情与帮助，越狱逃出，回到北京<sup>②</sup>。

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前，安体诚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召集京奉铁路工会骨干分子开会，原决定于二月七日举行全路罢工，因经费一时未能等齐，后改为稍等数日待领取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罢工计划被铁路局察觉，并派军队严密监视工人行动，加之京汉铁路复工消息传来，京奉铁路遂未罢工。“二七”惨案后，为抗议对京汉铁路工人的血腥镇压，安体诚等主持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召开了“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sup>③</sup>。

一九二三年春，北京政府交通部以鼓动工潮嫌疑的罪名将安体诚等人撤职，并欲逮捕入狱，幸经李大钊的老同学，交通部育才科科长黄统的多方周旋，才免遭逮捕<sup>④</sup>。

## (二)

一九二三年夏，北京白色恐怖严重，安体诚在北京、天津无法立足，经好友于树德推荐和党组织的同意，应浙江法政专

---

①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央局在所做的报告中当讲到劳工运动时指出：“京奉路情况也很好，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

②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载《现代史料》第四集，海天出版社1935年出版。

③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88页。

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99页。

门学校聘请到杭州任该校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他在授课中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深入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有一次，一个名叫张崇文的学生写了一篇短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发表在杭州报上。该文揭露了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的状况，同时又发出“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哀叹。安体诚针对青年人处于彷徨状态这一普遍性问题，在《杭州报》上，用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他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证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不管前面有多么大的阻力，它总是要发展、要进步的，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生的意义在于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安体诚的这封公开信在当地的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来感到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张崇文和其他学生张新锦、黄文容、李和涛、方恒圃、郇咸明等，读了安体诚的公开信后，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此后，他们经常到安体诚的住处阅读革命书刊，或向他请教问题，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安体诚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自觉性。在安体诚的帮助下，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称赞安老师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sup>①</sup>。一九二四年夏，安体诚曾给张崇文去信，信中说：“你的活泼精神我很佩服，但我对于活泼的人总愿请其加以‘深沉’、‘坚忍’，以使其尽善而且尽美，对你，也愿如此！”<sup>②</sup>张崇文把这封宝贵的信件一直珍藏了五十八年，把它当做自己

---

<sup>①</sup>张崇文：《最初的脚印》，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1981年8月编印的《志在四方》第30期。

<sup>②</sup>安体诚1924年6月30日给张崇文的信，现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

一生意志和作风的座右铭。

安体诚在杭州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在党团内先后担任中共杭州组小组长<sup>①</sup>、独立支部书记<sup>②</sup>、杭州团地委委员<sup>③</sup>、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发行主任<sup>④</sup>等职。在社会上他还担任了进步组织——杭州青年协进会常务委员兼《协进月刊》主编<sup>⑤</sup>。

安体诚到浙江时，正值中共三大召开。三大后上海区委负责人徐梅坤到杭州指导工作，安体诚在西湖的游船上主持召开党员大会，请徐梅坤传达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和上海区委的指示<sup>⑥</sup>。会后，按三大的精神，安体诚为促成浙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带领全体党团员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杭州西湖的刘庄举行了全体国民党党员大会，公推宣中华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国民党一大后，宣中华回到杭州和安体诚一起积极筹建国民党的组织。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安体诚当选为执行委员<sup>⑦</sup>，并负责宣传工作。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安体诚积极为筹建各市县党部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工作。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成立时，他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

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1923年10月4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徐梅坤、于树德、华林等人回忆（回忆件存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③《杭州团地委委员长唐公宪报告第一号》（1923年10月2日），存中央档案馆。

④罗章龙的回忆（1984年12月19日）。

⑤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⑥访问徐梅坤（行之）记录（1985年8月16日）

⑦1924年4月1日《民国日报》。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由于军阀孙传芳入浙，实行严密的反动统治；临时省党部的一些负责人被迫离开杭州，杭州国民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临时省党部秘密机关的房租和膳费均无着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安体诚将自己任教的薪金作为临时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并帮助一些县党部恢复了活动。经过安体诚等人的努力，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浙江已有二十三个县市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党员人数约两千<sup>①</sup>，其中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还有许多工农分子和进步青年。

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成立后，主管宣传工作的安体诚创办了《浙江周刊》，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安体诚在该刊上发表了《党与群》<sup>②</sup>等文章，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提出国民党应该“结党为公”，要多吸收工农兵学商中的革命分子参加，要带领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浙江周刊》共出了十一期，每期发行四、五千份，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同时，在杭州还创办了《民国日报》总分馆，在一些县里建立了分馆。还选派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到有关报刊如：《新浙江报》、《杭州报》任主编，以加强对报刊的领导。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列宁逝世，安体诚和杭州团地委的负责人一起组织党团员及各界群众五百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同年二月七日，又组织铁路工人召开“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号召党团员和工人要继承列宁的革命精神和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并发动党团员深入到铁路和印刷行业中去进行宣传

---

<sup>①</sup>宣中华：《浙江省党务报告》（1926年1月），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件。

<sup>②</sup>《浙江周刊》第4期（1924年6月22日）。

和组织工作。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影响，安体诚还在杭州文化印务局附设了一个新文化书报贩卖部，除公开经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外，还秘密出售《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党团刊物<sup>①</sup>。为了加强青年团与进步青年的联系，安体诚还通过杭州青年协会，筹办了青年补习学校。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主持召开了浙江人民反对曹锟、吴佩孚大会。会后，安体诚、宣中华、俞秀松等率领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拦，奋勇向前。经过金沙港时，由于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王克敏的家祠捣毁，将“栗主”（即宗庙神主）取出，抛入湖中<sup>②</sup>。

捣毁王家栗主之举，引起了当地一些商富豪绅对革命党人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联名向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告，要其对“赤化”活动严加制止。但当时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有矛盾，卢永祥与孙中山有联盟关系，故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未多干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再次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安体诚等联合各群众团体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成立了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安被选为促成会总务委员，主持会务<sup>③</sup>。他和促成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印刷特刊、传单、标

---

①倪忧天：《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未刊稿，存浙江省档案馆（写作时间不详）。

②1924年9月10日《申报》，孙斌：《自我叙述》。

③上海1925年1月14日、2月7日、2月21日；《民国日报》孙斌：《自我叙述》。

语、组织讲演队，通电各县市迅速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并致函孙中山表示慰问。二月十四日，安体诚和孙斌，周自强、黄文霞作为浙江代表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推动下，三月一日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安体诚当选为大会秘书长<sup>①</sup>，并担任大会党团成员<sup>②</sup>。他和大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等一起，在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区委的指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指示，促使大会在主要议题上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安体诚在大会上作的教育问题的报告中，历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军阀政府摧残教育的罪行及其造成的恶果，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宗旨应培养民族独立思想；收回教育主权，杜绝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养成学生的自治精神与能力，应予学生以充分的自治；为养成致用人才应给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充分的机会，实行男女同校；推广农村教育；厉行平民教育；推广职业教育；提高大学程度；教育经费应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三十等十大主张<sup>③</sup>。这十大主张被大会一致通过。安体诚当选为国民会议全国促成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sup>④</sup>。

大会结束后，安体诚回到杭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会议，传达了大会的精神，决定扩大宣传，并通电反对军阀政府发布的所谓国民会议代表大会条例和禁止学生集会的反动命令<sup>⑤</sup>。为了保证贯彻国民议会促成会的精神，在安体诚的指导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浙江各县市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

---

① 1925年3月22日《民国日报》。

② 访问彭建华记录（1985年8月1日）。

③④ 1925年4月9日、13日、21日《民国日报》。

⑤ 1925年5月21日《国民日报》。

织。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宣中华、安体诚等当即以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向各级党部发出了援助上海工人斗争的动员令。六月上旬，宣中华、安体诚等亲自发动和组织党团员成立讲演队，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五卅”惨案的真象，声讨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野蛮暴行。还联合杭州各进步团体，在杭州公共体育场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号召各界群众援助上海的罢工工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安体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和游行的群众一起高呼反帝口号，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经过英国人办的广济医院时，愤怒的群众冲入医院，将英国国旗扯下来，帝国主义分子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阻拦。当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领事馆大门时，谢飞英等爱国学生奋不顾身冲破军警的防哨，涌入馆内并与前来阻拦游行的军警发生了冲突。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安体诚和孙斌、宋云彬等人出面进行了说理斗争，帮助学生解围，安全离去<sup>①</sup>。不久宣中华、安体诚又发动杭州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和募捐活动，全省支援上海工人斗争的募捐款近十万元<sup>②</sup>。

“五卅”运动后，安体诚和宣中华等一起积极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

<sup>①</sup>1925年6月4日《申报》，1925年6月4日、22日、24日，《新闻日报》；孙斌：《自我叙述》。

<sup>②</sup>朱适等：《星汉灿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124—125页。

七月上旬，沈定一和戴季陶串通一气，在沈的家乡萧山衙前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他们企图通过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组织上排挤安体诚、宣中华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省党部的领导地位。宣中华、安体诚等团结了与会的多数人，同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使浙江省党部坚持了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sup>①</sup>。

安体诚在杭州工作期间，还在上海大学兼任教授，主讲现代经济学。他编写的《现代经济学》作为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讲义由上海书店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sup>②</sup>。《现代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马列主义观点，材料丰富，学术水平高，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sup>③</sup>。

### （三）

一九二五年夏，安体诚被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反动校长凌士钧无理解聘<sup>④</sup>。九月上旬，党中央准备派他去广州工作，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由华林接替<sup>⑤</sup>。时值国民三军由冀入陕，当时陕西地区尚无党的组织，西安原有一个团支部，因思想不统一

---

①孙斌：《自我叙述》。

②《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12页；  
《中国青年》（1924年3月8日）第21期。

③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载《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④访问张崇文记录（1985年8月16日）。

⑤《华林自述》，转引自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  
《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一期。



分裂为两个支部。这两个支部都向团中央和党团北京区委写信，要求派人调查处理。团中央曾几次派人处理，均未能解决问题。此时，中共北京区委急需派得力干部去陕西开展兵运工作和解决西安团组织的矛盾。经党中央同意，安体诚以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的身分<sup>①</sup>赴陕作兵运工作，同时负责整顿西安团组织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九月下旬安体诚到了西安，公开身分是国民三军军长兼陕西军务督办孙岳的秘书<sup>②</sup>。当时孙岳及其部下倾向进步，拥护国共合作。安体诚在该部任职对孙岳及其部下进行统战工作，帮助孙岳整顿军纪，建立群众性的军人俱乐部，并协调和密切三军与陕军及国民二军的关系。

与此同时，安体诚和当地的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取得了联系，并向两个团支部传达了北京党团区委关于整顿团组织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指示。在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的支持下，以陕西国民党员俱乐部为基础，于九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选举魏野畴、刘含初、雷晋笙、王授金、杨明轩，赵保华、张秉仁、张含辉等人为执行委员。临时省党部成立后，派出一批共青团员去三原、渭南、绥德、延安等县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当时不少共青团员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革命性，不愿加入国民党。安体诚与团员促膝谈心，用党的指示精神和自己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说明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经过他的说服解释，许多共青团员愉快地加入了国民党<sup>③</sup>。在解决两个团支部严重对立的问题时，他和团中央派来

①《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②白琳：《北方共轭安体诚》。

③访问高克林记录（1984年4月6日）。

的吴化之一起分别与团干部及团员谈话，详细调查了解分歧的由来，同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解革命团结的重要性，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宗法观念和偏激情绪，指出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能再闹无原则的纠纷。经过一段工作，在分清是非，批评已往错误的基础上，宣布解散原来的两个支部，成立一个新的特别支部，对符合团员条件的重新介绍入团。

经过整顿，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sup>①</sup>，选举高文敏（克林）为书记<sup>②</sup>。团的特支成立不久，安体诚和吴化之又领导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体诚任特支书记<sup>③</sup>。

党团特支成立后，安体诚和战友除积极发展党团员外，还将《西安评论》<sup>④</sup>作为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他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国庆与革命》、《对双十节西安市民大会的感评》、《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这些文章热情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他指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资本帝国主义。”“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sup>⑤</sup>。其次，宣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他指出：“中国这样千痛万苦的民族，舍了进行推

---

①③《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9月26日），陕西档案馆存件；  
《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②访问高克林记录（1984年4月6日）。

④《西安评论》是1925年8月由魏野畴主办的一个革命刊物。

⑤《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载《西安评论》第22期1925年11月16日出版。

翻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外，更无生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十八世纪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之可能，须知我们国民革命之成功，必然是工人阶级作领导的前锋”<sup>①</sup>。最后，强调了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之进行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有铁的纪律的、有主义的、有切实训练的伟大的革命政党！必须有为民族利益斗争！必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否则不能成功！”“军队，须为有主义的革命军！仍须造成商工农学的大联合。才能成功今日的国民革命！”达到“反动思想及反动势力之矫正与扑灭。”<sup>②</sup>上述文章促进了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对陕西的党团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安体诚为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十月十七日，应邀到西北大学讲演《人生与社会组织》。他通俗地讲解了革命的人生观，批判了“人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虚无主义和一切为了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他宣传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卜克内西的名言：“只有牺牲自己以图公共利益的人生才有价值。”指出，只有“发挥个人的德智体的能力，向着社会进步的实际理想前进，以积极创造人类的无限的文明幸福的人生才有价值。”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指出，全世界将来都要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针对当时青年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够了解，甚至还存在着种种错误认识的思想实际，他从生产法则、道德原则、经济政策、对人态度，财产所

---

<sup>①②</sup>《国庆与革命》，载《西安评论》第18期，1925年10月9日出版。

有,生产目的等七个方面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加以比较,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后提出我国人民“除了改造中国的旧社会制度,同时改造世界的旧社会制度外,更无可走的道路。”<sup>①</sup>

西安党团特支成立后,安体诚和吴化之,魏野畴联合各群众团体先后召开了纪念双十节和十月革命胜利八周年的大会,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广大党团员和工人、学生受到深刻教育。为了加强党在国民三军中的力量,安体诚和魏野畴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去该军从事兵运工作。

一九二五年底,孙岳和国民三军的主力离开陕西移驻河北。安体诚完成了在国民三军的兵运和赴陕整团建党的工作任务后,奉中共北方区委的调令离陕回到北京,接受新的工作。

安体诚到京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以及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联合总会的领导工作<sup>②</sup>。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安体诚作为北京国民反日大会的代表,参加领导清算段祺瑞对日妥协,出卖我国主权罪行的斗争<sup>③</sup>。为了动员妇女界参加这一斗争,三月八日,他应邀在北京妇女界举行的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妇女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闯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又有日、英、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

①《西安评论》第25期,1925年11月27日出版。

②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1926年3月4日《晨报》第6版。

③1926年1月18日《晨报》第6版。

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并以“武力解决”相威胁。三月十八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大学等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向军阀政府请愿，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安体诚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大会和游行示威。下午一时许，当请愿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铁狮子胡同后，安体诚作为五名代表之一<sup>①</sup>和其他代表一起要求面见段祺瑞亲自递交国民大众的决议案。卫兵奉命将栅门紧闭，反动军警竟用排枪、刺刀野蛮屠杀请愿群众，当场死伤二、三百人。安体诚为保护学生身负重伤，被人群挤倒在地，眼镜和皮包均被军警抢去<sup>②</sup>。

“三一八”惨案的当天晚上，安体诚参加了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北京党团组织联席会议，决定慰问受伤群众，召开追悼会，悼念牺牲的烈士，进一步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屠杀人民的罪行。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军阀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体诚是他们通缉的主要对象之一<sup>③</sup>。

#### （四）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共北方区委将安体诚等一大批党员干部调离北京，分赴南方开展新的工作。由于反动军警对京、津车站检查甚严。安体诚等不易脱险离京，经李大钊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协商，安

<sup>①</sup>1926年3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版。

<sup>②</sup>1926年3月19日《晨报》，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sup>③</sup>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体诚等化装成俄国华侨乘火车经蒙古至赤塔，再由西伯利亚转海参崴，最后转赴广州。安体诚坚持每天写日记，到广州后整理并撰写了《内外蒙古横断记》的长篇报导，在广州《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sup>①</sup>。

安体诚到广州后，经中共广东区委介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名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sup>②</sup>、政治部宣传科长<sup>③</sup>、中共党团干事<sup>④</sup>、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sup>⑤</sup>等职，主编《黄埔日刊》<sup>⑥</sup>，兼任广州劳动学院教授<sup>⑦</sup>、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sup>⑧</sup>等职。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同该校的政治部负责人、党团书记熊雄、主任政治教官、党团干事恽代英等一起，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学方针，努力加强宣传教育，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政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关报《黄埔日刊》及时报道国内外大事，并大量报导了北伐战争的战绩、省港大罢工的斗争情况以及黄埔军校的重大活动，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

---

①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

③阳翰笙的回忆（1984年7月27日）。

④黄埔党团干事会是军校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核心，统辖校属党的各个组织。见刘天：《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载《社会新闻》第十卷第七期，1935年版。

⑤《黄埔日刊》（1926年2月27日）。

⑥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

⑦李沛群：《劳动学院创办的过程》，存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⑧《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载《中国农民》（1926年11月出版）。

罪行及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每有紧急的撰稿任务，他总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先后为日刊撰写的重要文章就有三十余篇。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安体诚挥笔写诗，称颂廖公是“党国之英”、“献身而忠于彻底的革命”。提出革命者要继承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为党国为革命而死，为农工群众奋斗而死！”<sup>①</sup>九月，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安体诚写了《本校同学对祝捷的责任上应有的觉悟》，提出“我们的‘祝捷’当然不是徒作感情的表示的，当然是要负起革命责任而拥护这战捷的战绩而致力增大其成绩的；是要分任其劳苦牺牲以使北伐之目的早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早日达到的！”“我们也必须把能力生命贡献给党国以造出足〔以使〕全国人‘祝捷’的结果！”<sup>②</sup>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中，蒋介石独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大权于一身，准备伺机叛变革命。面对这一新的危机形势，安体诚在九月十七日的《黄埔日刊》上发表了《怎样能使一切权力属于党》的文章，提出要“把党建筑在最大多数最有力的民众基础上”。他针对国民革命军中反动军官破坏革命的行为，指出：要“定出严密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对于不遵守纪律和不执行纪律的分子都不能姑息宽赦！”安体诚积极主张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在他写的《英国炮舰政策之破产及我们今后的努力》一文中，热情歌颂了省港大罢工的巨大威力和斗争精神，称赞省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不但“绝对不被

---

<sup>①②</sup>《黄埔月刊》（1926年8月20日、9月10日）。

威服”而且使其“受莫大损害……更足以冲破其纸老虎”的本质<sup>①</sup>。为了发展工农革命力量，并联合一切革命势力打击国内外反动派，他提出六点主张：“一、一致谨严地拥护省港罢工的组织与实力；二、统一并集中革命势力，增进党的工作和权威；三、训练农工商兵学的大联合与国民政府合作；四、拥护农工团体，严厉取缔反革命派；五、促进北伐成功，发展人民政权；六、联合被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及英国无产阶级，密结一切反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战线！”<sup>②</sup>同年夏，他还撰写了《援助省港罢工的要义》，提出革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都应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援省港罢工的工人<sup>③</sup>。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期间，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他讲课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课后组织讨论或进行讲演比赛，他亲自参加指导，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平时深入学生宿舍问寒问暖，促膝谈心。他曾教育学生说：“做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做到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在行军作战中要做到“四不”（即不拉伕、不抢劫、不捐饷、不住民房）、“十不怕”（不怕死、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穷、不怕重、不怕险）<sup>④</sup>他还教学生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sup>⑤</sup>并讲解校歌的革命精神。

安体诚所领导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下设编纂、发行、

---

①②《黄埔日刊》（1926年9月16日）。

③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9月编印的《拥护省港罢工》小册子第24页。

④⑤何锦洲：《安体诚传略》（1984年），未刊稿。



指导三个股及俱乐部、图书馆、书报流通所等。该科任务繁重，人员不足，他带领大家团结奋战，和政治部其它科室的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印发报纸、期刊、特刊、文集、政治课讲义、丛书、画报和传单、标语、口号等任务。据一九二六年八个月的统计，印行上述宣传品逾千万份以上，发行点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sup>①</sup>。

尽管安体诚在黄埔军校工作十分繁忙，还经常到广州劳动学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共产主义问题》、《统计学》等课程。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一些群众团体经常委托他草拟对时局的宣言、通电和文告，他从不推诿<sup>②</sup>。

一九二七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进行“清党”反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纷纷被驱逐、逮捕或杀害。安体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被驱逐的人员绕道上海准备赴武汉。到达上海后，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旅馆，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和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兼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勾结法国捕房逮捕，关押在龙华监狱。安体诚在狱中严守党的机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迫利诱，宁死不屈。他自知难免牺牲，曾用铅笔写了两封信，托出狱人带出。一封信给他父母，信中说自己要出洋留学、归国无日，不能孝敬二老，希父母不要惦记他，并嘱咐他爱人改嫁，不要等他。另一封信是给他的女友黄文霞的，信中表示向她诀别<sup>③</sup>。这两封信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为

---

<sup>①</sup>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载《黄埔日刊》（1927年1月1日）。

<sup>②</sup>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

革命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安体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敌人对他既仇恨又惧怕，便决定秘密将他枪杀。一九二七年五月，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安体诚在龙华英勇就义<sup>①</sup>。

####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2.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 2 集），三联出版社 1979 年版。
3.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4.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
5. 《天津革命史话》，《支部生活》增刊号（1982 年 5 月）。
6.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5、9、11、12、15 卷内有关传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 丰润县文教局编：《腰带风云》（1981 年 7 月印）。
8.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编：《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学员烈士传》（一）1976 年 5 月印。
9. 《安体诚》，载《革命烈士传通讯》总第 11、12 期（1984 年 3 月 1 日）。
10. 《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11. 李嘉陵：《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载《学习与研究》1984 年第 8 期。

---

<sup>①</sup>对于安体诚牺牲说法不一。一、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记为 1927 年 5、6 月；二、丰润县文教局 1981 年 7 月编写的《安体诚烈士》记为 1927 年 6 月；三、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记为 1927 年 5 月 1 日；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写的《安体诚同志传略》记为 1927 年夏；五、上海革命烈士陵园王菊如写的《安体诚烈士传略》记为 1927 年 5 月 16 日，由于缺少原始资料，本文暂取 1927 年 5 月。

12. 访问罗章龙、徐行之、刘仁静、郑超麟、阳翰笙、高克林、吴化之、方仲如、李一夫、张明远、彭建华、胡允恭、张崇文、吴文祺、关中哲、杜松寿、王友直、党伯弧、王超北、冯润璋、郑自毅、曹志麟、刘友珊、李波涛、刘依仁、周益三、安国光等人的记录和他们给作者的复信。
13. 赵子劼、王菊如、徐柏年、沈自强、陈以沛、何翰洲、姜廷玉等人提供了史料；郑超麟、李一夫、赵子劼、关中哲、杜松寿、郑自毅等人对传稿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

## 杨峻德

冯 奇

杨峻德原名克宽、占魁，又名杨实、杨适、杨敏之，一九〇〇年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县吉阳镇一个手工业家庭，历任中共建瓯支部宣传委员、福州市委书记、闽北特委书记、福建省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厦门被捕，同年五月二十三日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三十一岁。

### (一)

杨峻德的父亲，是位朴实的金银手饰打制匠，有两男两女，杨峻德排行第二。大哥自幼从父学艺，父兄终年勤苦，所得甚微，一家生活至为贫苦。

少年时，杨峻德进私塾读书，受塾师陈老师的影响，立志走读书致仕道路，品学兼优，深得陈老先生的赏识。一九一四年，在陈老先生的再三敦促下，一家人节衣缩食，送杨峻德到县城报考梁山高小。当老师问他姓名时，他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写上“杨占魁”三个字。果然不负师望，以后他每次考试都“独占魁首”。

一九一五年，建瓯山城掀起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复辟帝制的浪潮，杨峻德和全校师生

一起，投入了反袁与抵制日货的斗争。在斗争中，杨峻德读书致仕的思想受到了冲击。他觉得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即使自己读书能够致仕，能够改变自己的穷困处境，也无所裨益于国家人民。他认为，一个人立身于社会，首先在于立德，能够“克明峻德”。为使自已不再陷入为个人奋斗的迷途，他决意改名“峻德”，以此自勉。

这时，杨峻德的意趣也发生了变化。他欢喜读传记文学，倾慕文天祥、李纲等古代英雄，并把这些人物的传记抄录下来，装订成册，日夜“口颂心维”，作为学习的楷模，逐渐由一名莘莘学子，转变为关心社会问题的进步学生。

次年，杨峻德小学毕业，回家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姑娘结婚。不久，父亲去世，他的大哥承担了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支持弟弟继续求学。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六月，消息传到建瓯，以省立第五中学（即建瓯中学）为主体的“建瓯县学生联合会”迅即成立。时杨峻德已在五中就学，他平日“伤民众处于水火”；“痛国家之败亡”<sup>①</sup>的谈吐，敢说敢为的作风，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县学联成立时，即被推为县学联领导人，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他率领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进行演讲，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县里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学生爱国运动恨之入骨，收买流氓地痞，进行捣乱破坏，还写信恐吓杨峻德。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杨峻德泰然处之，继续领导学生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建瓯反帝反封建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

---

<sup>①</sup>见杨峻德手抄本《思则得之》眉头批语。

## (二)

一九二一年，杨峻德结束了中学学业，决心到北京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一些亲友和同学，素知他家境贫寒，乃热心鼓励，解囊相助，为他凑集路费。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大学法律系。

在北京，他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为了不再给亲友增添负担，他靠打短工，勉强维持一日两餐的粗茶淡饭。后来在建宁会馆看门老人的帮助下，包揽了一处低级司法机关的缮写工作，生活才较为安定，得以集中精力投入紧张的学习与新文化新思想的研读，并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李大钊等接触，在他们的热心指导与启迪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二月，军阀吴佩孚残酷地镇压铁路工人运动，酿成二七惨案；在杨峻德的家乡，也发生了军阀孙传芳、周荫人向福建进军的事件<sup>①</sup>。杨峻德对此义愤填膺，暑假期间，他四处奔波，往返京、汉、沪之间，串联闽北各地在外求学的同学，组织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并发表宣言。

《宣言》分析了闽北“举凡教育事业政治经济等等”“无一不在破产”之中的状况，指出它们的原因无不与“社会之废顽，文化之闭塞”以及“政局变动”有关，主张“从文化宣传着手”，“打倒一切恶势力”，“改造社会”<sup>②</sup>。为了动员更多

---

<sup>①</sup>1923年4月，北洋军阀孙传芳，周荫人向福建进军，福州国民党人纷纷逃离，福建由此沦为北洋军阀统治。

<sup>②</sup>《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宣言》。

的青年加入“打倒一切恶势力”的行列，杨峻德将《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寄回家乡，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同学们“向认准的目标共同前进奋斗”<sup>①</sup>。杨峻德还团结了一批在京福建籍学生和有识之士，主编了《建声》（意为福建、建州之声）周刊，就改造社会、改造福建问题开展讨论。虽然这一刊物后因经济来源枯竭，不到半年即行停刊，但从《建声》的创刊到出版，可以看出杨峻德对改造社会问题所持的积极态度和认真探索精神。

通过斗争实践，杨峻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臻成熟，党对杨峻德亦有所了解。一九二六年，杨峻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②</sup>，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同年七月，为配合北伐军进军福建，杨峻德等人受党的派遣，回建瓯开辟工作。同月，闽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建瓯支部成立，杨峻德任宣传委员。他在群众中开展反对北洋军阀宣传，并向驻军头目何麓昆开展政治攻心，迫使何麓昆保持中立，从而孤立了反动县长谭国政，为北伐军入瓯扫除了一大障碍。

十二月初，北伐军二军六师由赣入闽，师部进驻建瓯。党支部派杨峻德到师部联系，杨峻德向六师政治部揭露谭国政横征暴敛的罪行，提出免除苛捐杂税、严惩首恶等要求。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肖劲光顺应民心舆情，宣布罢免苛捐杂税、解散反动武装以及逮捕谭国政交由人民审判。人民大众拍手称快，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

几天后，国民党建瓯县党部委员会（后改称县党部筹备

---

①见《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宣言》。

②见《闽北党史文献》第1集。

处)成立,杨峻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委员会委员、筹备处主任等职务,以双重身份参预领导和发动建瓯工农群众运动。他经常深入工农群众,宣讲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同时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大造革命舆论。在指导工农运动过程中,杨峻德还善于利用典型来教育和发动群众。当时,鼓楼前有一位理发业工会会员,因抗议房东提高房租被法院勒令搬迁,县总工会闻讯后,便组织一百多名会员到法院讲理,迫使法院认错赔礼。城关农会一位菜农上街卖菜,无辜被警察殴打,县农会主动出面为菜农撑腰,警察局长只好下令当众责罚打人的警察。杨峻德及时抓住这两件事,发动学生广为宣传,使工农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力量,一时间要求报名参加工会的各行业店员工会剧增到一千多人,城郊的东门、南门、豪棟,大洲农会纷纷成立;东溪、小桥的农民也自行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由城镇发展到农村。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福州国民党右派抢先发动反革命政变,搜捕与屠杀共产党人及爱国群众。杨峻德在建瓯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采取对策,他吸收了一批革命立场坚定、斗争勇敢的青年如杨则仕等人入党,加强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继则又把在斗争中表现较好的二百多人发展为国民党员,扩大左派队伍,以对付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为加强农村工作,杨峻德还深入到吉阳、上屯、水吉等地,发展农会会员,健全与扩大农会组织,培养农会骨干,开展农民运动。

五月一日,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真相,鼓励群众斗志,中共建瓯支部决定以国民党建瓯县党部筹备处的名义,在黄华山太较场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这天,到



会群众数千人，革命情绪十分高昂，当杨峻德宣读了以大会名义向福州发出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快邮代电”后，全场高呼口号，气氛异常激烈。

### (三)

六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下令罢免杨峻德县党部筹备处主任职务，同时派人到建瓯“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以及和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杨峻德心急如焚，愤慨万分，大书“牺牲奋斗”四字，表示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决定外出寻找上级，请示行动方向。出外找党前，杨峻德特意回到吉阳老家和妻子告别。这时，他的妻子已怀孕六个月，苦苦不肯放行。杨说：“你我两家都是穷苦人，祖祖辈辈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现在去为穷人打天下，将来孩子大了，他们就不再受苦了”<sup>①</sup>。临去，他还交待说：“孩子出生以后，若是男的，可取名‘宏农’，做农民也要有宏大的理想和抱负。要是女孩，也应好好养大，告诉她父辈的苦楚。”他连夜赶到丰乐，登上了一条南下的小木船。从此之后，杨峻德再也没有回家。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恢复和发展闽北工农群众运动，组织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杨峻德受党派遣，回到闽北崇安，和徐履峻一起，发动农民群众，重建工农组织，策划武装暴动。年底，崇安党员由四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杨峻德从事革命活动的上梅，也建立了党

<sup>①</sup> 《吉阳县群众座谈记录》。

的支部。

翌年一月，中共福州市委成立，杨峻德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领导福州地区革命斗争。杨峻德到达福州工作的时候，福州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党、团员由“四三”反革命政变前的一百多人剧减至二十人，为了打开福州工作新局面，重新点燃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杨峻德跋涉于市郊之间，逐渐把一些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串联起来。一次，他到洪山桥参加会议，中途饥疲之极，在一家馄饨店坐下休息，店伙以为他是上门的顾客，给他端来一碗馄饨，他一摸口袋钱不够不敢吃。引起店主妇的注意，近前一看，原来是她的远房侄子，于是请他饱餐一顿，还送给他十几元光洋。之后，杨峻德用这些钱，为机关买了一架油印机，还分了一点钱给有困难的同志。杨峻德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和炽热的革命情感，给同志们以很大鼓舞。在他的带动下，全体市委成员团结一致，积极进行党、团组织的恢复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或健全工会组织。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市委还在南台帮洲、苍山泛船浦建立工人运动据点，以练国术为名，培养工人骨干。此外，还利用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吸引和团结了大批学生、青年与进步人士，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市委举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每期杨峻德都亲自去讲课。通过杨峻德与市委成员的一系列努力，福州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党在福州白区的工作，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杨峻德根据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以及闽海道应以福州为中心，向福宁府及闽清、永泰、连江、长乐、古田等地发展的指示，派出干部到古田、长乐等地，组织农民抗租抗捐，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建

立了玉田、桃源、凤岗、高湖、马鞍等党支部；不少在福州入党入团以及加入进步组织的青年学生，此时也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安、连江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不少新的革命据点。

九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杨峻德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不久，崇安农民暴动失利，县委书记徐履峻遇害。为完成在闽北创造红色区域的任务，省委派杨峻德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崇安指导工作。

十一月下旬，杨峻德几经转折到达崇安；首先着手对崇安县委新班子的组建工作，选举产生了以陈耿为书记的新县委，确立了崇安党的领导核心。在研究和制订行动纲领时，杨峻德又进一步引导县委成员，从总结第一次暴动经验教训入手，强调宣传党的土地纲领，把政治目标同农民的要求密切联系起来，以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自觉性。

十二月十五日，崇安县委召开会议，制订和通过了第二次暴动的行动计划。会后，杨峻德自动提出到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小北片发动群众。在杨峻德的宣传鼓动下，小北方面很快拉起一百多人的队伍（暴动时发展到三百多人），开展打土豪等斗争，同时加紧军事训练，制造土枪土炮，在山冲要道埋设地雷“挨丝炮”。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总暴动的时机成熟了。杨峻德、陈耿、徐福元、左诗赞等，分别在崇安的东、西、北部、浦城县的西部，建阳县的北部以及江西铅山南部同时发动暴动，纵横一百多里地的近万名农民和纸槽工人，攻村占镇，捕杀恶霸土豪，推翻各村镇的反动政权。以“民众会”为代表的各级政权机构，还发布各种训令，号召农民群众开展平田废债运动。

革命风暴席卷武夷山区，有力地震撼着闽北的反动统治基

础。土著军阀卢兴邦急忙向崇安增兵一个团。在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企图扑灭崇安革命烈火。农民军为保卫一村一地，和敌军展开了血战。鉴于各地斗争经验和第一次暴动失败教训，杨峻德和陈耿研究决定：避开敌军锋芒，开展游击战争。各路民众队在杨峻德的指挥下，背靠群众，依托山林，积极寻找战机，打击入侵之敌。民众队越战越强，暴动区域日趋巩固。

在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过程中，杨峻德注意把扩大革命武装，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与加强党的建设结合起来。一九二九年六月，崇安革命形势开始好转，杨峻德在上梅瓦厂主持召开了一次千人大会，向到会干部群众作形势报告。他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指出，当前形势虽然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必须看到，革命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他教育广大干群要有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去认真对付敌人。之后，杨峻德又根据斗争需要，和陈耿共同制定了改民众队为红军，改民众队建制为红军连、排、班建制，每连设党支部以及设“红军局”为军事指挥机构等整编方案，亲自拟订了《红军之意义》、《红军之组织》等文件和宣传大纲，开始对十六支民众队进行整编。

杨峻德还结合崇安具体情况，把党中央、福建省委对崇安问题的指示，归结为崇安党的五大任务：即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继续发动“五抗”斗争；保卫地方基础，保守党和军队秘密；防特与镇压反动分子；加紧制造武器，使崇安党的工作更加系统化条理化。

在杨峻德等的正确领导下，崇安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上梅、吴三地、黄龙岩为中心的三块游击区以及铅山游击区。这就为创建闽北革命根据地、闽北工农红军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 (四)

一九二九年九月，杨峻德调任福建省委秘书长，参预省委领导。

杨峻德到省委机关后，往往兼领导和工作人员于一身，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各地汇集到省委来的情况，草拟指示文稿，为省委制定斗争策略和指导各地斗争提供依据。

一九三〇年二月，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中共中央代表恽代英的指导下召开。会议制定了福建党的政治路线和各种工作方针，通过了政治、组织、农运、苏维埃等十项决定，确定了“建立闽北特委指导延平、建瓯、崇安斗争，造成闽北广大范围的地方暴动”<sup>①</sup>等任务。杨峻德参预了这次大会的筹备与文件起草工作，会上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会后调任闽北特委书记。

此时，闽北形势不断发展，建瓯党的工作已向建阳、政和边区发展；在崇安，由各路民众队整编的红军五十五团已经成立，红色区域日益发展巩固，不少村庄还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杨峻德回到闽北后，看到这一情况十分高兴。在巡视各地之后，杨峻德领导闽北特委决定：抓紧时机，利用刘（和鼎）卢（兴邦）战争，扩大崇安红军，加速崇安苏维埃政权建设步伐，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推进苏区经济建设。闽北特委并把这一决定纳入“五一”行动计划，要求崇安党全力以赴，为闽

---

<sup>①</sup>见1930年2月24日《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北革命树立榜样。为取得经验，杨峻德亲自到白水、上梅、小北等地搞建立区、分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分配试点，提出彻底没收地主土地归苏维埃以及划分成份、计口分田、废债除息等办法，同时建立与调整了区、乡、村三级行政机构与党、团组织，成立了“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群众组织。

白水的成功经验及时在崇安县推开，短期内即先后建立了二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与区苏维埃政府，并在苏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第一次获得土地的苏区农民，个个笑逐颜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持革命斗争，到处涌现参军参战热潮，闽北红军迅速由九个连一千多人扩大到十二个连一千五百多人，有效地保卫了苏区政权建设。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崇安县委根据闽北特委的决定，在崇安上梅召开了“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闽北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至此，以崇安为中心的拥有二十多万人口的闽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闽北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被作为福建的典型在全省推广。在杨峻德的指导下，闽北各地的革命斗争，也在向前推进，整个闽北区域的革命声势日趋强大。

七月，福建省委巡视员邱泮林到崇安传达中央将闽北根据地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调闽北红军前往赣东北同那里的红军组编红十军的命令，引起了党内部分干部的思想混乱。此时，作为闽北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杨峻德的一言一行，都会在执行与否的问题上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杨峻德明白，中央的命令，是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整个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新生的闽北红军能否担负起攻占大城市的重大使命抱有疑虑。但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杨峻德首先明确表态，服从中央的

决定，并教育党员干部从大局出发，认真作好群众工作。他本人以身作则，参预并领导了根据地交接之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交接工作完成后，杨峻德在闽北的任务也随之结束了。

### (五)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杨峻德返抵省委机关。省委听取了杨峻德有关闽北工作的汇报，肯定了闽北党的成绩，决定留杨峻德在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并报中央批准。

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福（州）、（厦门）、漳（州）等城市工作进一步开展，尤其是这年五月，福建省委成功地领导了厦门劫狱，在政治上影响很大，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反过来又引起敌人的注意，加强了对城市的防范。为了尽快地恢复城市党、团、工会系统活动，进一步推动白区工作，杨峻德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单身外出，时而化装成商人，时而化装成公务人员，往返福、厦、漳等城市，领导福建白区的革命斗争。

一九三一年一月，省委书记罗明等一批领导干部调离福建，省委工作由王海萍（代理书记）、杨峻德主持。杨峻德肩负重命，工作更加谨慎细心，凡是和杨峻德有过接触的同志都清楚记得，杨峻德党性观念极强，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但对同志态度谦和，心肠炽热，处理问题冷静沉着，谈吐不俗而极有条理。可是，正当这位新任领导决心“领导贫民作共产奋斗”<sup>①</sup>

---

<sup>①</sup>见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杨寿庄给南京当局的《呈文》。

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

同年三月二十五日，杨峻德在去厦门市郊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常委会的路上，被敌特跟踪逮捕了。同天，设在厦门鼓浪屿公山路的福建省委秘书处和宣传部，也被敌特破坏，并捕去代理宣传部长李国珍等五人。

杨峻德被捕后，被投入敌漳厦海军司令部监狱。

最初，敌人对杨峻德并不摸底，只是一味追查从他身上搜到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不久，敌人就查悉了杨峻德的身份，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乃至南京当局，都对此欢欣若狂，他们认为只要设法撬开这位共党重要人物的嘴巴，便能轻而易举地破获福建省委，甚至破坏全省党的地下组织。于是对杨峻德进行轮番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杨峻德从容镇定，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目的，他说：“近鉴我国政治不良，失业人多，故决加入共产党，领导贫民作共产奋斗”<sup>①</sup>。敌人要他供出福建省委组织与地下党员名单，他报以鄙视目光，说“机关组织秘密，同是党员，非有秘密关系，均不能认识。我既被捕，有（罪）尽我一人承担！”<sup>②</sup>敌人暴跳如雷，对其施以酷刑，杨峻德咬牙忍受，坚不吐实。敌人又以死刑来威胁他，他严厉警告反动派：“（你们）任意屠杀也杀不了！既（继）我而起者尚复大有其人！现我应如何处决，请从速就是”<sup>③</sup>。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并不死心，他们秘密把杨峻德押到南京，继续对杨峻德施展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但是，他们失败了！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们将杨峻德押到雨花台刑场杀害。这位一生为着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终于以自己可贵的

---

①②③见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杨寿庄给南京当局的〈呈文〉。



生命，保护了同志保护了党，实践了他“牺牲奋斗”的崇高诺言。

#### 作者附记：

1. 写作本文主要参考书目有：《闽北党史文献》、《闽北党史资料》、《福建党史资料》、《福建革命史画册》、《福州党史资料》、《厦门党史资料》、《建甌党史资料》、《崇安党史资料》、《北伐纪实》、《战斗在闽北》、《闽浙皖赣苏区回忆》、《五四运动在建甌》、《申报》等。
2. 访查的单位有：教育部、民政部、北京大学、北京档案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省档案馆、建阳地区档案馆、建甌档案馆、崇安县档案馆、福州市委党史办、厦门市委党史办、崇安县委党史办、建阳地委党史办以及政法公安等单位与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
3. 访问肖劲光、陈应中、罗明、王德、潘超人、陈碧笙、柯柏华、黄权、黄葵、朱明生、杨铭锐、烈士亲属与烈士家乡部分干部群众的纪录。

## 林道文

林锦文

林道文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历任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团主席，东江工农革命军总队长，中共潮梅特委书记，东江特委书记，广东省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对广东党的早期工作有一定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夏，壮烈牺牲。

林道文一九〇四年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第一区名园乡。他幼年患天花病，脸有微斑，因得外号“道文斑”。父亲林长春，为人老实、勤劳，早年务农，后来进城做工，当小贩，因善于经营，发展为雇用数名工人的“同记”鱼行老板，林道文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最小。

林道文自小喜爱劳动，进城读书后，逢星期天和假期，还常回农村种地。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海丰参加爱国集会、游行和宣传活动。翌年春，他读初中时，与陈竟扬、郑志云等发起了反对反动分子陈伯华当海丰县教育局长的运动。他串连学生罢课，带领游行队伍到县政府请愿。县长翁桂清不仅拒绝学生的要求，而且把林道文等七位学生代表扣留县府。林道文不怕高压，仍然强烈要求罢陈伯华的官，声明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此事闹到广州军政府内政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炯明那

里，陈炯明伪装进步，训令翁桂清：“林道文这帮学生是不懂事的娃娃，你抓他们干什么？马上释放”<sup>①</sup>。林道文等获释时，许多学生拥到县衙门口迎接，把他们当成英雄抬起来游行，他们回校后继续斗争，终于把陈伯华轰下了台。后来，彭湃接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林道文立即集合学生，欢庆胜利。

一九二一年七月，彭湃串连林道文、郑志云、李劳工、陈魁亚、彭元章、林甦、李国珍等，在海丰县城杂货街的“绵德堂”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团结和组织青年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从此，林道文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成为彭湃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他边读书边跟随彭湃到赤山约等地宣传，鼓动农民组织农会。

一九二三年春，林道文在海丰中学读书时，串连了黄晓元、陈冠中、吴克绵、林鸿扬、吴焕芝、陈舜仪、余汉存等十三位同学，成立“新生社”并出版《新生》周刊。他经常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如《只会吃饭的留学生》讥讽陈伯华等一帮反动分子，对社会的无用和有害；一九二四年，林道文还在《为海丰人一哭》一文中点名抨击海丰县长翁桂清镇压学生运动。

由于林道文等编的《新生》揭露了社会弊病，抨击了县长，同时斥责了地主钟景棠、钟秀南强取拆城的砖头、石板去建造自己的楼房，反动官绅极为嫉恨。县长翁桂清责令海丰中学校长黎樾廷制止该刊出版。林道文等不予理睬，继续编印《新生》。

一九二三年秋，林道文从海丰中学毕业，父亲要他经商，

---

<sup>①</sup>访问余汉存记录（1983年）。

但他却在家乡积极宣传革命。他对待穷人和众乡亲态度亲善，平易近人，且爱学习，善宣传鼓动，因而很快成为群众运动的出色组织者。在他的影响下，父亲的思想逐渐进步，哥哥林海秋<sup>①</sup>等也参加了革命。

一九二四年冬，林道文到广州。翌年一月，他参加了在东皋大道一号举办的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认真聆听阮啸仙（主任）陈延年、彭湃、廖仲恺，鲍罗廷等讲授革命理论，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up>②</sup>。

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广东省革命政府准备出师讨伐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林道文闻讯，向组织请求提前回海丰县做策应工作。农讲所批准了他的请求。他高兴地到东征军政治部报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接见了，指示他先赴海丰通知地下党员配合东征。林道文化装成普通学生，乘船经香港抵海丰，先找到地下党员郑志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郑志云发动群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东征军。然后，他深入到战略要地公平区（即第二区）去发动群众。二月底，东征军经过公平时，经他宣传动员的群众纷纷起来送茶送饭慰劳部队，并组织运输队为部队输送作战物资。随后，他又借助东征军的声威，在公平区大张旗鼓地开展农民运动。公平区在海丰北部，是潮汕人与客家人杂居的地方，各方原先虽有农会组织，但早已被陈炯明摧残殆尽。二月初，林道文以海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第二区特派员的身份在该区恢

---

<sup>①</sup>海秋是道文的三哥，曾任海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秘书，1928年五月被敌人杀害于海丰县。

<sup>②</sup>陈文回忆。

复、组织农会。他走遍全区一百多个乡村，宣传组织农会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出刊的《陆安日刊》说：“该区农民对农会，初时尚有怀疑，现经林君到各乡将其疑点解释，并说明组织农会之用意，是保护农民自己之利益，乡民顿时大悟，由是入会者益众。”至三月下旬已有六、七十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林道文遂设立“海丰县第二区农民协会筹备处”，筹划成立区农会事宜。四月二十六日，他又以“第二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身份，在该区高等小学主持“第二区各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一百〇四乡的代表，还有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同志、农民自卫军等到会参观学习。彭湃在会上发表演说，赞扬林道文指导的第二区农民运动发展迅速，号召各区向第二区学习。区农会成立后，林道文指导农会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禁烟禁赌等斗争，成绩卓著。当时海丰《陆安日刊》对其活动曾多次报道，影响甚大，流誉颇广，林道文成为深受海丰广大农民群众爱戴的领导人。

在国共合作和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林道文在第二区，不仅领导农运，而且负责国民党党务。三月十三日，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第二次会议在彭湃主持和提议下，决定派林道文为第二区国民党组织员。林道文便在公平布街商务局设立“中国国民党海丰县第二区党部筹备处，”并贴出启事，公开宣传，吸收工农分子和开明人士加入国民党，成立了区党部。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海丰县党部执行委员。

六月，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林道文被聘为顾问。

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一九二五年十月，林道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随后他又发动农民配合第二次东征

<sup>①</sup>林务农回忆。

军作战。二十五日，海丰各区乡的农民代表二百多人齐集县城林祖祠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彭湃、林道文等先后在会上作报告和演说，表彰配合第二次东征中英勇战斗的农民。

林道文在开展农运、妇运的同时，又从事工运。早在这年五月一日，海丰县总工会筹备会成立时，林道文就是该筹备会的负责人。他和工人交朋友，发现和培养工会骨干，先后按行业建立了织布工会、渔业工会、店员工会、搬运工会等组织。他指导工人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组织领导工人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支援省港大罢工的政治运动。这一年，海丰县的工会组织发展到三十多个行业，会员一万多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林道文等八十一个代表在县城举行海丰总工会成立大会，决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受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决议案，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林道文被选为县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担任该会党支部书记。县总工会在各区设立办事处，把各行业的职业组织归并为产业组织，设产业工会。在林道文等的领导下，全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一样，成为党在海丰的一大支柱。

一九二六年三月，林道文担任中共中央公平区特支书记（后改为区委书记）。四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丰地方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改组地委，林道文被选为委员，负责青委和妇委工作，他组织成立了青年农工俱乐部，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参加农工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吸收许多优秀分子入团。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追随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张善

铭闻讯在海城鉴湖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把海丰农民自卫军改称“工农救党军”共有武装人员四千多名，编成一个大队，吴振民任大队长，林道文为副大队长。

四月三十日，东江特委向各县、区发布起义动员令。五月一日凌晨二时，海丰起义爆发，吴振民、林道文等指挥起义队伍占领了县城各机关，收缴游击队、警察、盐警队等反动武装的枪支，逮捕了反动官吏和豪绅，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官绅，夺取了海丰政权。接着成立了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林道文被选为政府委员。随后，陆丰县和紫金县亦爆发起义，分别成立了人民政府，林道文调任海丰县农军大队长，统帅王伟群、彭桂、肖河源等几个农军中队。紫金县刘琴西所组织的“炮仔圩队”，也调来海丰，由林道文统一指挥，配合吴振民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分驻卡仔岭，伯公埕各隘口。海陆丰等县的起义震惊了敌人，他们立即从惠州、汕头调遣反动军队夹攻海陆丰，以优势兵力疯狂反扑，起义军防守失利，于五月九日撤出海城。接着，林道文和吴振民又组织数千名农民，三次反攻海城，未克，他们退往山区，待机再起。

海陆丰反动派卷土重来，逃匿香港的国民党党棍、官僚、政客、军阀、土豪劣绅、流氓、打手纷纷回来，成立“保安队”、“清党委员会”、“地方善后委员会”，疯狂捕杀革命者及其家属。这时，吴振民带领的农军主力北上，向武汉长征。林道文率领剩余的农军在海丰北路罗畲、黄羌、麻竹、朝面山、苦竹园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他们经常向城镇打冷枪，惊扰敌人。有时深夜突袭，攻进市镇去镇压罪恶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并贴标语，撒传单。保安队向游击队驻地进犯，林道文就

组织农军据险阻击，或埋伏于山林中伺机突袭，迫使敌军龟缩在城镇里，不敢随便下乡骚扰。

林道文在麻竹乡建立了一所可容数十人的整枪制弹厂，修理枪枝，制造简单的武器和弹药。同时组织训练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农军，为攻克城镇创造条件。八月中旬，他带领第二区农军五、六百人，从麻竹出发，一举攻下公平镇，震撼了全县。后因敌人万炳臣营伙同保安队全力反扑，林道文便率队撤出公平镇。此后，他们又数次袭击该镇。九月初，林道文和刘琴西在海丰成立工农讨逆军，更加频繁地袭击敌人，把敌军弄的惶惶不安。九月七日深夜，驻公平镇的万炳臣营三连一排五十九个士兵在排长郭其宽带领下闹饷哗变，击毙一个司书，绑了连长罗毅先。由几个被他们从连部救出来的农民带路，于八日早晨，在麻竹乡找到林道文率领的农军。林道文热情地接待他们，赞赏他们弃暗投明的义举。并将他们编为工农讨逆军第四中队，由郭其宽任中队长。

白军反戈的消息传开，敌人惊慌失措，农民欢欣鼓舞。林道文乘胜在中秋之夜召开军民联欢、动员大会，并率部于翌日再次攻战公平镇。第二区各乡农民听到公平解放的喜讯，纷纷赶来庆贺。林道文随即召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恢复人民政权。

第二区的胜利给海陆丰人民以很大鼓舞。在东江特委领导下，林道文命令各区农军攻占市镇，消灭反动派，准备总攻海城。各区农军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敌人十分惊慌，马上召回分驻各地的正规军和地主武装约一千二百人集中海城。这时，陆丰县城空虚，刘琴西乘机率部占领，然后与林道文部汇合。

九月十五日午夜，以刘琴西、林道文为正副总指挥的海、



陆、惠、紫农军数千人分四路进攻海城。敌人关门固守，未克。但敌军士气低落，不得不弃城逃走。十七日，林道文在公平镇得到报告，立即率队开进海城，第二次夺取了海丰政权，组成了临时革命政府，林道文任政府主席团主席。他在桥东社林祖祠设立了农军总部，宣布镇压反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和反动派的财产，交县农会分配给穷苦农民。林道文估计到，敌人虽撤出了海丰县城，但必然会集结兵力反扑。因此，他布置部队做好了撤出的准备。当反动派陈学顺一个团和戴可雄的六百名保安队打进海丰来时，林道文已按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指挥队伍撤出海城，转入农村继续斗争。

九月下旬，传来了八一起义军从南昌转战到潮汕的喜讯。十月二日下午，周恩来派出的招兵专员刘立道到达海丰黄莞，与东江特委研究为起义军招兵问题。林道文积极动员民众参军，很快就招到一千多名农民，经过挑选，将七百多名编入部队，于十月四日开赴潮汕。这时南昌起义军已在潮汕战败，在向海陆丰转移途中，连遭挫折。林道文十分关注起义军的命运。派出侦察员分头打听起义军的消息，以便接应。

十月六日，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部和第四军的一小部共一千二百余人，在二十四师七十团团团长董朗率领下到达陆丰东南部，与东江特委领导成员取得联系，由郑志云作向导，经陆丰附城、大安、新田，绕过敌人几处防地，于九日进入农军防地朝面山。林道文迎接到起义军后，把他们带进惠阳县的中洞，筹集了一百头猪、一万担大米慰劳起义军。

十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作了组织上的调整，林道文被选为委员。二十五日，东江特委发布了第三次东江大暴动的命

令。东江革命委员会委任林道文为东江工农革命军总队长<sup>①</sup>，林道文指挥的农军在南昌起义军的配合下，在黄羌诱敌深入，大败敌军，又一鼓作气占领公平、梅陇、汕尾等城镇，敌正规军陈学顺部闻风逃遁，剩下的地主武装保安队亦自行溃散。三十日，林道文和董朗等率队解放海城，第三次夺取了海丰政权。

十一月一日，“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重新成立，林道文、杨其珊、郑志云、林铁史、杨望、陈子岐等组成主席团。六日，革命政府发出布告，重申土地政策：“本政府解放农民痛苦，执行土地政策，一切土地皆归农民。”并公布废除租债、镇压反革命的七条法令<sup>②</sup>，群众把它称为“七条令”。

十一月初，彭湃从香港回到海丰，改组了东江特委，并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兼任东江特委书记，林道文、郑志云、刘翠西、杨望、林铁史、张威等十多人为委员。

在解放海城前后，海丰各地数百名地主武装保安队和土匪逃进南部海边市镇——捷胜城，使该城成为海丰境内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十一月初，林道文率领一千多农军，分三路攻城，先用土制大炮向西门轰击，配合步兵进攻。由于敌军武器较农军精良，农军久攻未克。时由南昌起义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的一个加强连前往捷胜助战，并与地方农军领导人林道文组成统一的攻城指挥部。

十九日上午八时，总攻开始，林道文指挥三路人马同时攻

<sup>①</sup>钟贻谋称：“十月三十日，东江特委办公室扩编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为海陆紫玉农集团军，提升林道文为集团军长，统帅三个大队。”待考。

<sup>②</sup>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布告第九号。

打东、西、北门，农军敢死队抬着长梯在我火力掩护下快速冲至城墙边，竖起长梯，援军冲锋队随即跃登城上，打开城门，我军蜂拥进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解放了捷胜全城，是役共击毙敌军三百多人，俘虏数百名，缴枪百余枝，子弹多箱。林道文下令镇压了大劣绅何舜廷，然后带着部队凯旋而归。二十日上午，各界群众约万人，在龙舌埔举行欢迎和祝捷大会。林道文和第四团一位士兵在会上报告了攻克捷胜城的情形，博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二十一日，海丰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林道文被选为政府委员。政府宣布停租，废债，烧田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时，紫金南岭钟姓地主组织民团对抗革命，林道文即率农军一个中队，配合第二师再次攻打南岭圩。民团据守石楼，林道文指挥农军挖掘隧道，用棺材装满炸药炸毁石楼。打下南岭圩后，林道文率部没收了钟姓地主一千多担谷物，为革命筹集了巨款。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香港举行的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林道文任东江特委常委委员。为使惠阳与海陆丰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林道文被调到惠阳去加强县委领导，准备惠阳暴动。他与惠阳县委书记黄居仁先在镇隆一带发动农民斗争大恶霸、大地主，为暴动做准备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下午，广州起义军一部——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到达海丰县城。林道文从惠阳赶到红场参加欢迎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与省委巡视员黄钊“往白芒花、惠州、横沥、四大半围乡等地巡视工作，并决定二十六号召开

县代表大会。”<sup>①</sup>二月二日，林道文和黄居仁依照省委指示，在四大半围乡召集县委会议，研究并决定四月份暴动计划。二月二十一日，县委在四大半围乡组成“广东省惠阳县苏维埃政府”，林道文为委员。二十六日，召开全县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

三月间，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从香港到惠阳，与蓝璇坤、杨石魂、黄居仁、林道文等组织平山第三次起义。平山是惠州的外围屏障，又是惠州通往海丰的要道。林道文按照统一部署的计划行动最迅速，他率赤卫队及各路武装从四大半围向平山挺进。这时进攻高潭、海丰等地的敌人第七军黄旭初部突然折回惠阳，敌我力量悬殊，上级指示各路农军撤回原地自卫。林道文连夜把赤卫武装带回四大半围，上山打游击。不久，林道文被调往香港，在省委工作。

四月二十四日，林道文奉命潜回惠阳，巡视县委工作。找到九区区委委员和县委书记。了解情况后，在三十日给省委写了关于惠阳暴动失败后敌人到处围捕和党、群受损失情况的报告。

五月下旬，潮梅特委书记沈青早牺牲，林道文被派赴汕头恢复党组织。几经周折，找到潮梅特委临时负责人。三十日晚，林道文召集汕头各有关同志会议，改组特委。会议选出特委委员九人，“推定道文、克家、聂根、耀潮、易标为常委，并以道文为书记……，军事委员会以溥泉、道文、简朴为常委”<sup>②</sup>。从此，林道文领导着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惠来、澄海、南沃、饶平、梅县、平远、蕉岭、五华、兴宁、丰

---

<sup>①</sup>黄钊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28日）。

<sup>②</sup>中共潮梅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2日）。

顺、大埔等十五县和汕头市的革命斗争。六月八日，省委决定将潮梅特委合并于东江特委，指定彭湃、林道文等八人为委员。东江特委成立后，彭湃任书记，林道文任常务委员，仍在潮梅地区活动。

六月中旬，林道文从汕头市来到潮安县余村，秘密召开潮梅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到会的有各县负责人方思琼（方方）、洪木合、龚文河、颜汉章、陈崇如等三十多人。会议在林道文主持下，讨论潮梅夏收总暴动计划并各县个别的暴动计划，研究如何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等问题，会后，他往返所属各县之间，指导各地开展斗争。

十二月，东江特委因新书记未到任，林道文以特委常委身份主持特委工作。次年一月，东江特委机关从潮安田东圩搬到丰顺砾下（现茶背区）西山蓝寮的打拳寮，林道文在这里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并在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日主持了东江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接受党的六大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指示，结合东江地区的斗争实际，认真讨论了政治、组织、军事、苏维埃工作等十二个问题，提出要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红军组织，以便从西北、西南两条干线发展暴动，占领潮汕和惠州，完成东江地方的暴动任务，并向广州发展。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东江地方暴动的总动员”<sup>①</sup>。当时由于工作需要，省委要林道文回省委工作。东江特委考虑即将召开的党代会需要林道文主持，拟开完党代会以后再让林道文去省委。省委于五月二十六日向特委发出指示信：“林道文同志，省委坚决的要他立即来港，再无讨论犹豫之必要。省委

<sup>①</sup> 《东江代表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5月18日）。

完全站在工作的利益上，认为道文必须立即来省委，至要！不得再为延缓！”<sup>①</sup>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初，林道文在丰顺县隍隍区黄标村主持了东江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依照省委的指示，讨论了政治、党务、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农村工作、军事、经济、青年团和济滩会等问题，并通过了有关决议，强调“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会后，林道文到香港向省委汇报了东江特委和党代会情况。省委感到满意，指出东江党代会“给予东江一个极大的前途的开展，有伟大的意义与作用。”按原来决定，林道文留在省委工作。“他在香港时，曾接头得很多海丰同志，并由他请准省委，陆续派来东江工作”<sup>②</sup>。

三月二十八日，林道文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到东江指导工作。林道文向东江特委传达了省委关于东江革命斗争问题的指示信。特委就关于革命根据地发展方向问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以八乡山（五华、丰顺、揭阳交界处）为中心，建立西北根据地，向外发展与江西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会后，林道文组织部队行动，革命力量在八乡山区得到了发展，为后来接应朱德陈毅等率部入粤，开辟了道路。

十月十五日，林道文主持的东江特委就苏维埃的财政问题指示下属各级党组织，筹款时不要侵犯小商人及小资产者的利益，要引导他们加入革命阵线；要没收乡村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穷苦农民及当地贫民。

<sup>①</sup>广东省委给东委指字第十号信。

<sup>②</sup>东委李荣给省委的报告（1929年9月10日）。

十月下旬，朱德、陈毅、朱云卿等率领红四军入粤，林道文等热情地做好配合工作。他亲自动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政治、军事工作人员全力以赴，迎接红四军。古大存、林道文等把分散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准备粮秣，加强各地通讯联络，配合红四军行动。

十月二十日，红四军到达松口。林道文命令东江红军四十六团立即开赴梅县城东，切断敌人联络，打击敌人后方，以利红四军的进军。

红四军三个纵队一万多人，分两路向东江进军，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攻占梅城。二十七日，因敌人反扑，朱德率部退入梅南根据地，隐蔽在丰顺县的马图村、南坑村一带。古大存、林道文、陈魁亚等带领当地工农革命军、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几百人在马图会见朱军长，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接着，朱德与林道文在马图召集军部参谋长、各纵队司令员、及东江各负责同志，举行紧急会议，分析敌人的动向和梅县的形势，决定集中红军到梅南前沿，准备反攻梅城。林道文亲临前线参与指挥。后因敌情变化，这次反攻没有达到目的。红四军返闽，林道文仍在东江，领导潮梅十六县市的革命斗争。

这期间，林道文住在用竹木泥草搭成的低矮小屋里，为避免敌人袭击，还常常转移。“东委本身非常不健全……常委只有三人，即道文和尊道。而工作既繁杂，道文每天应付一切技术问题忙个不了，早上六点开工，晚上二、三点还不能睡觉。”<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春，东江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出现高潮。林道文

---

<sup>①</sup>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聂荣臻给省委的报告（1929年11月6日）。

以省委代表身份出席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传达了中央军委和省委关于建立东江苏维埃政府和成立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的决定。接着，在林道文指导下，大会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确定今后游击战争和革命行动纲领，选举产生了东江苏维埃政府，陈魁亚为主席；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古大存任军长，颜汉章为政委。

这年八月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临时常委会，讨论建全省委组织问题，林道文递补为常务委员，分工担任宣传部长，农委副书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省委秘书处内部交通员莫叔波<sup>①</sup>被捕叛变，十四日带着国民党特务——“广东省会公安局特别侦缉队”和香港警探，包围省委、市委等机关，抓走二十多人，搜去大量文件。当时宣传部机关设在香港坚尼地道宝龙台三十四号楼的四楼上，林道文和他的爱人杨梅芳住在里面。敌人在夜间封锁街道，破门而入。林道文听到破门声，快速爬上天台，敌人吹哨追捕。他翻过十多座楼顶，从天台沿水槽而下，逃入一户人家的厨房里，但仍被敌人搜捕。他爱人也被抓走。

林道文在狱中坚持斗争。敌人用枪托、枪头打他，他横眉冷对。初时，林道文被关在域多利亞监牢，后转移至荔枝角监牢。同狱的陈汉英<sup>②</sup>取水时被狱卒打了一巴掌，林道文立即站起来大喊“不准打人”并举手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其他“犯人”也跟着呼喊，狱卒吓的停住了手。林道文还设法与

---

①即莫叔葆。

②现名陈士民。



组织联系，他提议凡外面有家属的“犯人”，都吃家属送来的饭，不吃监牢内的饭，利用送饭的家属带信。大家立即响应，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使一些同志得到营救。但林道文是“要犯”，国民党和港英当局合谋引渡，秘密把他解到广州。伪省会公安局用电刑残酷审讯，他坚贞不屈。五月底敌人又把他押回海丰“游街示众”。林道文利用这个机会，慷慨陈词，痛斥敌人的罪行，鼓励海丰人民要坚持斗争。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诙谐地说：“有这么多人来为我送葬，我感到光荣。”<sup>①</sup>数天后，林道文被解至省城。一九三一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红花岗，时年二十七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出版。
2. 团海陆丰地委四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5月20日）。
3. 《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3月1日出版。
4. 林道文给省委信（1928年4月30日）。
5. 中共广东省委与东江特委、潮梅特委的来往信件（1928—1929年）。
6. 粤委致中央信（1930年8月8日）。
7. 大盛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16日）。
8. 两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3月29日）。
9. 古大存：《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片断》（1960年6月14日）。
10. 钟贻谋：《海陆丰农民运动》，1957年10月出版。
11. 海丰县民政局编《林道文烈士史略》（未刊稿）。
12. 访问林务农、李沛群、陈士民、张云飞、余汉存、陈文、张爱琴、林忠佳、林群山等人谈话记录。

<sup>①</sup>陈士民的回忆。

## 段 玉 林

裴年松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段玉林在洪湖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始人之一，是湘鄂西人民爱戴的卓越领导人。

段玉林，又名书甲，一九〇〇年生于湖北省石首县北工区叶家垸（港子村）。祖居监利县段家长岭，因饥寒所迫，祖父、父亲出外谋生，开始在公安县裕公垸落脚。不久，又逃荒到芦苇丛生的叶家垸，垦荒造田，辛勤耕耘；农闲季节外出舞狮、卖武，以维持生计。就这样凭着全家的汗水，直至段玉林出生时，已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户。

段玉林有一兄五妹，他排行第二，因他从小聪明伶俐，祖父、父母非常喜爱，决定让他弃农习文，以求取功名，光耀门庭。

段玉林七岁时，入叶家垸私塾就学，后转横沟市读书。同时，在父亲段声达的悉心指点下，从小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刀枪棍棒样样精通。成为文武兼备，闻名叶家垸的人物。

一九二三年，段玉林到武汉中学就读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武昌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段玉林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毅然投笔从戎，考

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在政治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的领导下，革命空气非常浓厚。段玉林在校内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在校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一九二七年五月，夏斗寅叛变，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随叶挺部讨伐夏斗寅。段玉林随军出征，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战，他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月，武汉形势逆转，段玉林随军校开赴九江，按党的指示参加南昌起义未能实现，在九江被编入张发奎部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由仍留在二方面军工作的叶挺担任团长，在叶剑英率领下到达广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作出以教导团为主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十二月四日，段玉林参加了广东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召集的教导团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秘密会议。会后，他根据张太雷团结全体革命官兵，严密控制部队，做好起义准备工作的指示，开展积极的工作，他对士兵们说：“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在北伐军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千百万工农群众支持的结果。现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成为勾结帝国主义的新军阀，我们要实现孙总理之愿望，只有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十二月十一日凌晨，段玉林参加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事败，段玉林和战友们，在观音山战斗中被敌人冲散，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决定返回故乡石首，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组织当地贫苦农民投入斗争。

十二月下旬，段玉林日夜兼程，经武汉回到故乡叶家

境，他奔走于亲友和贫苦农民之中，秘密的向他们介绍广州起义的经过，揭露国民党新军阀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使他们懂得只有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穷苦人才有出路。经过艰苦的工作，他恢复了叶家垅、三户街一带的秘密农协，并秘密发展段凤甲、杨彩章、杨焕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旧历大年三十）的夜晚，段玉林乘黄水套团防年夜戒备松懈，纵酒聚赌之机，率十余名武装农协骨干，迅猛地冲进团防驻地，缴获步枪二十余支。首战告捷。他在叶家垅正式组建了一支二十余人枪的石首游击队，并任队长。

段玉林率领石首游击队，活跃于三户街、冯家潭，新厂一带，他根据群众的要求，捕杀无恶不作的刘学林、易文松、汤魁甲等八个土豪劣绅，将其粮食、衣物分发给穷苦农民，恢复了新厂一带的秘密农协，有力的配合了周逸群、贺龙和石首中心县委领导的荆江沿岸的年关暴动。

二月中旬，段玉林率游击队夜袭新厂镇失利。他一面同战士一起认真总结这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一面利用江北芦苇丛中的开阔地，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与此同时，他还派出杨彩章等人积极寻找石首地下党组织，以加强党对这支年轻的农民武装的领导。这月下旬，段玉林和李兆龙为书记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在石首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他率游击队灵活机动地转战于石首的江北和江南的河口一带。寻机打击敌人。

三月初，段玉林率领游击队员，他装扮成赶集的农夫，混入河口镇，在两名内线的配合下，摸掉了敌岗哨，然后冲入室内，击毙常练队潘队长，活捉了还来不及起床的三十个常练队

员，缴枪二十二支。接着，他率部夜袭横沟市，攻打新码头，周家剏口等地团防。三月下旬，他又率游击队于小河口全歼敌一个正规排的兵力，并巧袭新厂，拔掉了敌人设于江北的顽固堡垒。

随着石首游击战争的节节胜利，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七十余枪。石首北一、北二、东二三个区的区乡农协相继建立，并于小河口建立了县农协，枪毙了东二区罪大恶极的土豪刘代夫，没收其“三千亩田分给原来佃农”<sup>①</sup>耕种，群众的情绪极大高涨，纷纷起来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二八年四月，桂系军阀派驻石首的敌十八军严俊部第三团分驻县城、调弦口、新码头、藕池等地，纠集各地常练队日夜“清乡”，推行“十家连保”法，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形势日趋险恶。段玉林为避敌锋芒，果断地率部辗转至江陵白鹭湖后，积极的支持周逸群提出的集中各地武装，避实就虚，向洪湖区活动的主张。他率部继续向监沔转进，会合邓赤中、王尚武的鄂中特委武装，于五月二十日消灭“峰口镇之敌，缴手枪十八支、现洋三千元”<sup>②</sup>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一批土劣，没收和分配了一部分土劣财物。后来，监、沔之敌合围洪湖，周逸群率石（首）、松（安）、华（容）武装回到石首，统一编为一个大队和特务队。大队下分三个中队，段玉林任三中队中队长。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段玉林率三中队隐蔽于芦苇丛中，将游击队活动方式改为平时分散各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并组织童子队以探亲之名深入江北敌据点，侦察敌情；组织农协会员暗

<sup>①</sup> 《鄂西工作报告》1929年5月16日，存湖北省档案馆。

<sup>②</sup> 《逸群给伍豪信》1928年5月6日，存湖北省档案馆。

备戈矛，以随时配合游击队的行动。当敌军大举“清乡”时，则以“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江北、小河口一带的秘密农协恢复，进一步发动了群众，群众常为游击队“做报信、侦探、掩护等工作”<sup>①</sup>。这时，北一区区长李厚斋在新厂组织了百余人的常练队，轮番下乡残害百姓。为拔掉这个钉子，段玉林于八月中旬，派出四十多名童子队员分别混入新厂镇，深夜以打群架为由搅乱全镇，转移哨兵视线，他乘机率三中队和二百余名秘密农协会员夜袭新厂，缴获步枪十余支和一批银元、粮食等物。敌见江北重镇新厂失守，异常震惊，随即派出大批部队进行“围剿”。段玉林英勇地率部迎击来敌，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被敌击溃。为保存革命火种，他根据石首县委指示，将游击队的长枪埋藏起来，另组一特务队，随县委行动。同年十一月，段玉林召集原游击队骨干王开福、朱祖光、谭大银、王三义、袁寿林、郭忠贵组建夺枪小组，自任组长。他们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先后于小河口、调弦口、焦山河、五谷庙、高基庙等地夺得敌团防步枪二十二支，子弹八百余发。夺枪小组有智有勇，吓的敌人惶惶不安。

一九二九年初，段玉林正式重组石首游击队，并按石首县委的部署，率领游击队活跃于小河口、杨波坦、桃花山，调弦口一带，乘虚打击团防，肃清匪患。二月，他率一侦察小组扮成樵夫，翻山越岭，在当地农协会员的配合下，打垮了陈楚莹百余人的土匪武装，缴获步枪五十余支，其余小股土匪闻风逃窜，安定了民心。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到三百余人，一百四十

①曹壮夫：《鄂西报告》，1928年，8月17日，存湖北省档案馆。

余枪，军威大震，小河口、袁家铺、桃花山一带的根据地开始由点联成片。游击队由秘密进入公开活动。白天，段玉林和游击队员分散在群众之中，和群众一块参加生产劳动，发动并组织群众抗交苛捐杂税，建立乡工农政权；夜晚则集合出击，捕杀劣绅地主，打击下乡的官府人员及小股团防武装。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武装斗争形势，一九二九年初，段玉林组织了十多名铁、木修理工人，创办了石首游击队修械所，专事修理机械，制造火药和土枪土炮。他还发动游击队员，利用战斗空隙，人人动手，用火药、钉子、碎铁、引线等自造了大批酒瓶手榴弹和三门土炮，为创办湘鄂西“红军兵工厂”奠定了基础。

三月下旬，鄂西特委根据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将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游击队合编为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石首、江陵两县合编为第一中队，段玉林任中队长。

游击大队成立后，段玉林按照特委作战部署，率领部队开赴石首，活跃于石首的大江两岸。四月中旬，他亲率三十余名机智勇敢的战士，化装成清明祭扫的群众深入河口镇，全歼其团防后，又于桃口击溃了陈家典赴路家铺“清乡”的常练队。

为开辟石首江南的根据地，段玉林将游击队分布于河口一带，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农协组织，召开贫苦农民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消灭团防。四月二十三日，他率一中队及千余名赤卫队员，夜渡江南，包围了屯子山敌团防局，团防局长袁福阶利用群众的迷信观念，命令他控制的所谓“神兵”，口念咒语，手持大刀，气势汹汹地向游击队和农协会员反扑。部分

---

①《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8日于石首调弦，存湖北省档案馆。

群众见状，心情非常紧张。段玉林一面鼓励大家英勇杀敌，一面端起步枪，接连击毙冲在最前面的两个“神兵”。当“神兵”后撤时，他抽出大刀，高呼着冲杀的口号，带头冲入敌阵，一连杀死三个“神兵”，打破了“神兵”刀枪不入的鬼话。顿时，游击队员和群众斗志大增，将“神兵”全部歼灭，攻占了江南要地屯子山、沙岭子等地。此时，石首城敌人慑于游击队的声威，仓惶向公安方向逃窜，游击队连夜进占县城。次日，段玉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没收土豪粮食、财物分给穷苦农民；镇压反动官吏，“又在狱中放出了七十余人，士气和之一振”<sup>①</sup>。

四月底，一中队主动撤出县城，向藕池进击。由于侦察不及时，在管家铺与敌遭遇，“敌以两团之众”将游击队“层层包围”<sup>②</sup>。段玉林指挥部队突围出来，损失很大，仅剩枪二十余支。此后，段玉林根据特委指示，将一中队分为一、二两个中队，分别在沔阳、石首两县农村，边游击边整顿，以谋发展。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段玉林率部避免与敌正面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摸清敌人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后方，捕杀土匪，镇压土豪劣绅，围歼小股敌人常练队，缴获长短枪四十二支；继而进逼石华堰和华容的墨山铺等地。均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他积极筹款购回枪四十五支。仅一个月的奋战，一中队很快从挫伤中崛起，又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游击武装。

段玉林率一中队在石首游击期间，在袁家铺筹办了石首红色医院。他写信从武汉请来了原在武汉的同学，著名内、外科

<sup>①②</sup>《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其现状》（1939年5月），存湖北省档案馆藏。



医生汪佰扬，张本芝、梅齐芳等人，由汪佰扬任院长，张、梅等人协助主持院务工作；他还从当地招收聘请了十余名医务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使红色医院初具规模。不久，鄂西特委迁至石首后，便将石首红色医院扩编为湘鄂西苏区“红军医院”<sup>①</sup>。

石首游击队枪械所和红色医院的创办，以小河口、袁家铺为中心的石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就大大震惊了敌人。五月下旬，敌两个正规连在陈家典团防队的配合下，分乘一艘轮船和两艘民船开进小河口，妄图扑灭革命火焰。为保卫根据地，段玉林率部在数千赤卫队员的配合下，乘敌疲惫不堪，立足未稳之机，将敌包围于张家台。他沉着果断，首先指挥枪手击毙其指挥官。敌人失去了指挥中心，阵容顿时大乱。小河口一战，敌人全部消灭，没有漏网一个”<sup>②</sup>。此后，敌军“非常害怕，不敢深入内地”<sup>③</sup>。使东一、东二、北一、北平四个红色区域，发展成为湘鄂西地区一块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鄂西特委迁至袁家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月，鄂西特委在宜昌遭到破坏，周逸群将特委机关迁至石首袁家铺，将洪湖游击队和石首、江陵的游击队分别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段玉林任第二大队队长。第二十四团第四连第三大队建立后，段玉林积极开展了部队的各项建设。他在各中队设立了党代表并建立了党团支部，积极发展党员，使“游击队中党员占大多数，非党群众只有小部分”<sup>④</sup>。他反复强

① 《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8日于石首调弦。

②③ 《鄂西巡视员万涛的报告》（1929年9月4日）。在湖北省档案馆藏。

④ 《鄂西工作报告》（1929年5月16日）。

调部队必须听从党的指挥，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大队和中队均设立士兵委员会，通过士兵群众组织对士兵的阶级教育等工作，使士兵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自觉地执行党的纪律和政策，主动积极的参加工作、娱乐和生活的管理。中队和大队还设立巡查队，每队三人，由士兵轮流担任，负责纠正违犯纪律的官兵。段玉林在大小会议中反复强调了官兵平等的意义，宣布严禁肉刑，规定官兵均以指挥员、炊事员和同志相称的制度。他还建立了战后总结制度，并普遍推广批评会的方法，每次战斗后充分发扬民主，让士兵公开批评，指挥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增强了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七月初，段玉林率二大队集中于石首，利用季家嘴和踏家埔一带的芦苇、棉田、高粱地为掩护，粉碎了国民党石首县县长龚振鹏和陈家典率领的常练队对小河根据地的“清剿”。随后，又以诱敌深入的战术，于根据地内的沙口子“消灭五十师一连的兵力”<sup>①</sup>，缴获新枪七十余支。同月下旬，鄂西特委为进一步扩大湘鄂西苏区，决定加强各县地方武装力量。段玉林以大局为重，从二大队抽调一部分骨干分赴南（县）、华（容）、安（乡）、公（安）等县组建和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从而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开辟了一批新的苏区。

八月初，敌一艘运送武器的轮船从宜昌沿江而下，开往敌据点新堤镇，段玉林得到情报后，迅速和赤卫队负责人制定了伏击计划。他指挥二大队和赤卫队员埋伏于季家嘴一线，江堤下数门土炮封锁江面；江堤上刀枪林立，杀声震天。敌惊惶失

① 《鄂西巡视员万涛的报告》（1929年9月4日）。

措，轮船搁浅，运往新堤装备白极会地主武装的九十支九响步枪，十一箱子弹和一个押送排的武器，全被我缴获。不久，二大队整编为鄂西游击总队第二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四百余人枪，段玉林任大队长。

鄂西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使敌惊惶失措。敌湘鄂西绥靖区派彭启彪独立十四旅，纠合各县地主武装，在这年秋后，向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华容根据地疯狂“清剿”。段玉林派王中队开赴江陵坚持游击战争，他亲率主力于石首一带与敌周旋。十月初，他和九月到达石首的孙一中、许广达指挥二大队，于一弓堤伏击了敌章汉卿部一个营，歼敌一百七十余人，缴步枪一百四十余支，轻机枪三挺。接着夜袭新厂，击溃徐代桢的常练队，营救出七名被捕的红军家属。后因环境险恶，段玉林率部转战华容，出奇制胜，全歼砖桥、板桥常练队，二大队“日益发展，并且扩大了红色区域”<sup>①</sup>。

十一月二十四日，遭受二大队沉重打击的石首、公安、华容三县团防联合纠集五百余人，乘船抵小河口大肆烧杀，妄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此时，二大队仅一中队百余人枪留在根据地，敌我兵力十分悬殊。段玉林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人数虽多，但都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缺乏统一指挥；而根据地军民斗志旺盛，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击溃敌军。他在芦苇丛中召开了简短的群众大会，他说：要生存，要保卫红色区域，只有战斗，把敌人赶出根据地。他布置群众准备好武器，打出所有的红旗；乘敌人分散放火抢窃之机，毅然指挥一中队

<sup>①</sup> 《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5月）。

和千余赤卫队员兵分三路，冲出芦林，英勇反击，全歼来敌。缴获敌轮船一艘，步枪四百余支，花机关五十余挺。战斗结束后，段玉林将“俘虏的团丁百余人放回去一部分”<sup>①</sup>发给路费并宣布了投降受奖，来去自由的宽大政策。进犯的敌军中不愿与红军作战和拖枪投诚的日益增多。小河口一仗，大伤了敌人的元气。“自此以后，石首的常练队没有单独向我进攻的能力了”<sup>②</sup>。

为了扩大战果，十一月底，段玉林率二大队一部趁江陵团防戒备松懈之机，渡江北上，夜袭熊家河、马家寨、观音寺，均获胜利，使江陵豪绅地主惶惶不安，群众运动重新得到了发展。

十二月，鄂西党的二大后，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一师，辖两个纵队。“石首红军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由段玉林担任。其下辖四个中队”<sup>③</sup>，枪五百支。独立师组建后，为打通江陵、石首、监利交通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段玉林率二纵队奉命自石首进军江陵，收编了熊家河常练队一个分队，攻取江陵重镇普济观和沙岗，获枪七十余支。

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独立师一、二纵队会师监利汪家桥，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段玉林任二纵队司令、红六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红六军组建后，段玉林率二纵队和一纵队一道，连克江陵的龙湾、熊口、老新口和张金河等重要集镇。在龙湾组织群众选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宣布对当铺实行“二十元以下无本取当，二十元以上无利取

---

①③《鄂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12月31日）。

②《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5月）。

当”<sup>①</sup>的政策。接着他指挥部队连克监利之新沟嘴、沔西鱼洋镇和潜江县城。三月中旬，他率部和一纵队分两路跨江南下，连克藕池、调弦口、石首县城等城镇，缴枪六百余支，提高了党和红军的声威，极大地推动了石首、公安、华容、江陵等县群众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为鄂西五县联县政府在调弦口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月份，段玉林奉命率部和一纵队一道挥师北上，相继攻克沔阳的仙桃、天门的岳口等地。后又奉湖北省委关于向汉阳发展，以配合鄂豫皖红军进攻武汉的命令，折向东进，先后攻克汉川的系马店和汉阳的蔡甸。不久，一、二纵队分别改编为十六师和十七师，段玉林奉命调鄂西联县政府工作，负责组织、整顿、训练苏区各县地方武装，以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一九三〇年九月，段玉林根据鄂西特委指示，于石首组建了石华联县指挥部，并任指挥长。指挥部辖三、八两个大队，共六百余人枪。负责保卫设于石首的特委和联县政府的安全，相机扩大苏区，实行特委“完成地方暴动”<sup>②</sup>的计划。红二军团南征时，他指挥三、八两个大队和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牵制和打击敌人，乘胜发展至荷花嘴、三仙湖一带，解放了华容、南县全境。

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趁红二军团南征远离苏区之机，指挥五个师、七个旅，共三万余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分数路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①《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5月）。

②鄂西特委《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6月），存湖北省档案馆。

为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指挥，粉碎其围攻。段玉林奉命于十一月初在石首桃花山，将石首、华容、公安、南县等县的地方武装整编为江右军，并任指挥。江右军辖三、八、九、十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共千余人，八百余枪，成为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艰难的反“围剿”斗争中，段玉林发动、组织群众严惩了鲇鱼须反动地主马忠春、刘旅凡，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他率部采取夜袭、伏击、围困等战术，主动打击敌人，先后两次全歼进占茅草街之敌，击毙敌团防局长王云芳；四次收复华容县城，击溃万庾守敌。翌年二月下旬，为牵制敌兵力，保卫鄂西苏区首脑机关的安全，他率部重创话岭岗、板桥等地之敌后，转战石首之江北，并一度攻克新厂，歼敌一团，使敌军非常恐慌，不敢随意下乡烧杀。由于江右军在运动战中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江南之敌，有力地配合了洪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粉碎了敌军第一步重点围攻江北苏区的计划。

徐源泉对洪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我军粉碎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重新纠集重兵，发动了对石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敌四十八师张振汉一四二旅黄、芮两团和一四三旅一部，自公安斗湖堤经高河厂、横堤市分两路向石首重镇藕池进逼，形势十分紧张。为了保卫苏区领导机关驻地，段玉林奉命率江右军和石首地方武装共两千余人，顽强地阻击敌近三个正规团的进攻，歼敌数百人，拉开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藕池失守后，他率江右军趁着大雾，击退了敌新十一师一部的进攻，俘敌百余，迫敌退守梅田湖。

此役之后，为牵制敌兵力，段玉林根据特委决定，率江右军在华容、南县一带，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术，各个击破敌人，并发动广大群众将敌人驻地紧紧地拖着，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sup>①</sup>。进占了万庾、十三溪、注滋口、明山头、乌嘴等地，迫使重占高基庙、鲇鱼须之敌向藕池和梅田湖一带收缩；向调弦口推进之敌，也后退了十余里。进而推迟了敌军合围特委机关和联县政府所在地调弦口的计划，为湘鄂西特委重新布置反“围剿”斗争赢得了时间。

段玉林为了分化瓦解敌军，组织部队作了大量的宣传品，通过各种形式散发到敌军中。敌军士兵看了“穷兄弟不打穷兄弟”；“反转枪口打死长官者，赏洋百元”；“拖机枪一挺参加红军的，赏洋二百元”；“拖步枪一支参加红军者，赏洋二十元”<sup>②</sup>等宣传品，军心涣散，整连、排、班拖枪投诚者，屡见不鲜。

三月二十二日，湘鄂西苏区首府调弦口失守后，段玉林率部于桃花山一线负责保卫撤至九佛岗一带的特委和群众的安全。这月底，段玉林指挥江右军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采取口袋战术，将进攻九佛岗之敌一四二旅一个营四面包围，予以全歼，胜利地完成掩护湘鄂西党、政、军、后机关渡江北撤的任务。接着他率江右军继续留在桃花山，坚持反“围剿”斗争。

四月十五日，敌军分数路对桃花山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二十二日晚，段玉林和周逸群一道指挥部队，掩护万余群众和洞庭湖区委机关，从敌防守薄弱的墨山铺向洞庭湖突围。经过通

<sup>①</sup> 《湘鄂西特委来信》，1931年3月7日于石首调弦。

<sup>②</sup> 《团湘鄂西特委（给团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1年3月，存湖北省档案馆。

宵拼杀，沿途激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经贾家凉亭、旗杆嘴到洞庭湖区，取得了突围的胜利。

在洞庭特区，段玉林利用洞庭湖湖面宽广、湖中浅水处芦林茂密、水路纵横交错等特点，发动渔民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四月底他伏奇兵于湖面的芦林中，缴获敌从岳阳运往华容等地三船军粮；又出奇不意地全歼注滋口、杆旗，杨林所等地团防，缴枪百余支。五月，在当地渔民的配合下，他率部乘胜进击杨鬲洲等地，歼敌百余，活俘敌团长，缴获大批布匹和光洋。至此，洞庭湖区的局面基本开创，渔民、农民、樵民协会先后成立，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江右军由突围后的三百余人迅速恢复到千余人枪，每个大队还配备了几挺机枪。他还协助洞庭湖区委组建了三百余人枪的地方武装，基本实现了湘鄂西特委在调弦口制定的开辟洞庭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构成南有洞庭、北有洪湖根据地，以便与敌长期周旋的战略意图。

洞庭湖区的革命火焰，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敌马昆山旅、川军张英师和南县、沅江、华容、湘阴四县团防，分乘汽艇、帆船数十只，于五月中旬向洞庭湖特区合力“围剿”。为避实就虚，段玉林率江右军和洞庭区委部分领导骨干，从野猫岗向桃花山突围。突围中，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周逸群不幸中弹牺牲。段玉林含着极大的悲痛，高呼为周逸群报仇的口号，抱着一挺机关枪，带领战士们向九佛岗之敌发动了猛烈进攻。敌李觉团猝不及防，四处逃窜。段玉林率江右军收复了九佛岗、石华堰等地，又配合石首县委恢复了桃花山、来家铺一带的根据地，重建了区、乡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迫敌龟缩于县城和调弦口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内。

五月底，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段玉林从江右军中



抽调了八十六名骨干，组建了桃花山游击队，留在石首坚持游击战争。其主力奉命改编为湘鄂西警卫二团，段玉林任团长。随后，他率部冒雨攻打调弦口，给敌以重创之后，由刘家铺挥师渡江，出奇制胜，歼敌两个排，缴枪五十余支。不久，警卫二团改编为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段玉林继任团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乘洪湖苏区发生严重水灾和红军主力尚在均房苏区之机，调集三十四个团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负留守后方重责的段玉林，率二十五团主动出击，相继攻克直洛河、莲花城等地，于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八月十五日占领潜江县城后，敌四十三师肖之楚部两个团与新五旅一部向潜江反扑。面对强敌，段玉林镇定自若，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率部主动退出潜江城，利用有利地形，埋伏在城下。待敌入城时，二十五团左右出击，大败敌军，歼其一部，迫使敌军停止了进攻，恢复了潜江政权，保卫了中心苏区，有力地策应了红九师二十六团挺进天（门）、潜（江）接应红三军的行动。

一九三二年七月，为恢复江南苏区，段玉林率二十五团秘密渡过长江，会同石首游击队，于二十一日拂晓突袭九儼岗，将追至华容城东之状元街，歼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和大批粮食及军用物资。并于大旺厂、三郎堰等地，歼灭正在抢粮及屠杀群众的敌十九师、新十一师一部。段玉林率部撤返江北时，连克袁家铺、小河口、横沟市、新厂等要地，恢复了石首江北苏区，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不久，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为排斥贺龙对部队的领导，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理由，错误地取消了红三军军、师指

挥机构，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省军委领导，段玉林任二十四团团长。十二月，根据中央不能取消军部和师部的指示，红三军整编为七、八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段玉林任独立团团长，在贺龙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敌川军二十一军四个团、独立三十七旅一部、三十四师等乘红三军主力进击襄北之机，经沙市、潜江、沔阳分三路向中心苏区发动围攻。留守后方的红三军独立团，在段玉林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具有灵活性、机动性和主动的优势，在潜江一带与敌周旋，后又集中优势兵力斩首网头歼敌一部，并于沔阳一带击退了敌三十四师的进攻。随后他率部配合急援后方的红九师驱散于中心苏区之外。此时，滞留均房苏区的红九军二十五师主力教导团回到洪湖苏区，与独立团合编为八师，段玉林任师长。红八师组建后，旋即歼灭了包围从潜江等地退守策口的新五旅之残部。敌为解策口之围，从岳口、沙洋两方出动援兵，二月二十日，段玉林率红八师和红九师一道，采取围城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待沙洋援敌尚未到达时，于竹沟歼击溃了岳口援敌独立三十七旅的两个营，策口之敌被迫投降。

三月底，国民党集中七个旅的部队在地主团防的配合下，向湖洪苏区发动了新的进攻。此时，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在湘鄂西苏区全面泛滥，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夏曦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sup>①</sup>，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命令段玉林率红八师与红七、九两师一道，用阵地

<sup>①</sup>《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的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年3月21日），存湖北省档案馆。

战，攻坚战迎击敌人。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六日，段玉林率红八师参加了瓦庙集阻击战，此后，敌先后投入了十一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我军虽前仆后继、顽强拚杀，但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阵地。不久，夏曦又强令在瓦庙集战斗中弹药几乎全消耗殆尽的红八师，强攻驻丫角庙一旅之敌。段玉林率部浴血苦战，终因众寡悬殊，久攻未克。于是，他主动率部撤出战斗。夏曦认为瓦庙集战斗没有能够消灭敌人的主要原因是红三军中存在着“游击主义”<sup>①</sup>，指责段玉林攻打丫角庙指挥不力，擅自撤退。对此，段玉林均作了严肃的抵制。一九三二年五月，由于他坚决反对夏曦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于潜江八角庙被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罪名而被捕。红军撤退洪湖根据地前夕，风华正茂的段玉林，在翟家湾被杀害，终年三十二岁。

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为段玉林等烈士在洪湖建立了革命纪念碑，以昭示后人。

#### 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

1. 《湘鄂西省委军事报告》（1932年5月28日）。
2. 《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4. 许光达：《洪湖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载197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5. 访问郭忠贵、宋一平、陈士南、李逸三、廖述云、谭凯丰、徐国祯、曾凡柏、李抚民、樊明耀、刘远柏以及段玉林妹夫杨彩章、张玉孝等人的回忆记录。

<sup>①</sup> 《关于改造红军的训令》（1932年4月），存湖北省档案馆。

## 彭之玉

荆 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之玉曾任湘鄂西省委常委、省政府主席、红五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 (一)

彭之玉，别名玉林，生于一九〇七年三月，世居湖北省江陵县沙岗三户街，父亲彭成银，本是乡村裁缝，后经营鸦片，改设酿酒作坊。彭之玉出生时，家里已较为富裕，彭之玉刚满六岁，就进了本地一家私塾。

彭之玉学习勤奋，善于思考，成绩列一班前茅，深得先生契爱，邻里称道，被新观（紧邻三户街）名绅王子清看中，收为义子。一九二三年，彭之玉东下武汉。考入私立武昌共进中学<sup>①</sup>。

当时共进中学已有革命的秘密组织活动，《新青年》、《觉悟》、《向导》等各种进步书刊在这里广泛流传。新的革命理论启迪了彭之玉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他茅塞顿开，

---

<sup>①</sup>段继李、彭之发等人的回忆（1981年8月），存湖北省江陵县民政局。

决心摆脱传统仕途观念的束缚，起而参加了学校的革命秘密组织，并特意向家里要了一百多块银元交给组织作活动经费。彭之玉衣着朴素，诚实谦和，好论理，不易动怒，很得同学诚服，尤为一些世家寒微的同学所钦敬。当时武汉有不少江陵籍学生，彭之玉利用旅鄂同乡会的关系，联络和发动了一批同学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利用假日，一面登临蛇山，或漫步江畔，一面痛陈国耻，畅谈革命，激发爱国热情。面对外族侵袭、山河破碎的祖国，他常常陷入深沈的思索之中。怎样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呢？他认为，中国受人欺凌的主要原因是民众没有觉醒，国民不齐心。因此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一致觉悟起来，坚决抵制仇货，使帝国主义失去压迫和剥削的对象，我们且不说打他，他自会不战而垮。”<sup>①</sup>国富民强也就指日可待。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纷纷罢工、罢课，热烈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武汉也不例外。彭之玉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他深入工农群众中访贫问苦，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们的斗争觉悟。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翻开了他人人生史上新的一页。

彭之玉在武汉期间，曾担任过《武汉日报》编辑、《武汉日报》副经理等职。一九二六年七月，彭之玉投笔从戎，参加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随驻湖南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贺龙部（第一师）北伐。不久，他在战斗中负伤，奉湖北省委之命，

<sup>①</sup>段继李回忆记录（1981年8月），存湖北省江陵县民政档案。

回江陵开展革命活动<sup>①</sup>。为了安全起见，他寄住在一族叔家。他的住所成了一个革命的秘密联络点，陈香波、刘赤生、王子香、戴绍鼎等地下共产党员时常聚首于此，共同磋商革命事宜。

新观地处江（陵）、监（利）、潜（江）三县交界的江陵东部农村，湖港星罗棋布，交通闭塞，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反动势力猖狂。早在一九二五年寒暑假乡居期间，彭之玉曾与当地一些塾师有过交往，了解到这些塾师大多曾出外求过学，多少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濡染，而且在乡村中深孚众望，乃决定先从发动塾师入手。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彭之玉首先发展了彭之森等一些塾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新观地下党支部，彭之玉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彭之仁、彭之森、马子厚、马西文、黄希香等人。为了取得革命的合法地位，彭之玉进一步在新观成立了国民党分党部，以此为掩护，致力于新观周围的农民运动。他们深入农民中间与农民同劳动，从中进行思想发动。一九二六年底，新观农民协会诞生了。农民协会将新观周围的祠堂、土地庙拆毁，将一些老坟上的石碑搬到新观铺街道，大户人家考妣的墓碑变成了穷人的脚石。与此同时，彭之玉还领导农协会组织了“密查队”（亦被称为“暗杀党”“扒壁队”）儿童团、商民协会和妇女协会。一时严惩劣绅，禁止烟赌，取消苛税杂捐，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放足，反对封建迷信的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

彭之玉的父母对儿子这些活动坐卧不安，要儿子安分守己，不要惹事生非，村中乡绅也纷纷向他的父母投诉，要他们约

彭之玉回江陵，彭之玉回江陵后，即向中共江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sup>①</sup>《贺彪回忆录》（未刊稿），存中共江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束彭之玉。彭之玉向父母讲陈道理说：人生在世哪能只图个人安乐？应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才有意义。但父母亲听不下去。彭之玉只好向父母亲提出：不要对他抱“养子防老，传宗接代”的指望，应早择养一子以为终身之靠。父母终知无法管住儿子的心，也就只好收养了他家一子，对之玉不再做任何指望。

### (三)

新观农民运动发动起来后，彭之玉认识到要革命就得拉枪杆子，而拉枪杆子必须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因而再度东下武汉就学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彭之玉回乡准备秋收暴动，未成。年底，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井冈山斗争的鼓舞和启发下，进入了创建红色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阶段。湖北省委决定举行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要求各地成立革命军和游击队，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和陈香波等连续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按上级要求成立了暴动委员会，其成员为彭之玉，陈香波、马子厚、黄希香等人，拟定了周密的暴动计划，正式组织了武装农民赤卫军，编为一个中队，下辖三个分队。当时的武器十分缺乏，他决定运用各种方式夺取敌械，武装自己。

一天，彭之玉带领马子厚等六人去拜访胡家场团总陈茂明，席间乘机缴了他们的九支枪械武装了自己。

一九三七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晚，暴动队员右臂上各系一条白色布巾，兵分两路，一路由彭之玉、陈香波指挥，目标是敌驻沙岗水警队；一路由陈兴发、邓诗福率领，目标是沙岗镇上的劣绅朱敬亭的鸦片馆和位于该镇的敌盐卡。经过四个多小时

的激战，共缴获长枪二十八支、土炮一门、子弹十箱，俘虏炮船守敌二十八名，沙岗年关暴动一举告捷<sup>①</sup>。

是夜，各乡党团员和农运骨干，奉暴动委员会之命，组织起来张贴布告、散传单、贴标语、送情报、站岗放哨。次日，农民赤卫军在沙岗境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时，彭之玉组织了部分人员沿途向群众宣传武装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他还在沙岗街上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当众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劣绅李负久和横行乡里的五帮会首孙昌富。随之成立了江陵县农民协会，陈香波任委员长，彭之玉、马子厚等为委员。农民赤卫军更名为白鹭湖游击队，从此拉开了以沙岗白鹭湖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序幕，为创建湘鄂西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沙岗白鹭湖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中共江陵县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彭之玉当选为县委委员。为了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彭之玉与陈香波等县委成员经过商量，特派沙岗地下党员徐开芝将正在监利的贺龙接到沙岗。彭之玉和陈香波向贺龙详细汇报了沙岗年关暴动的情况，介绍了沙岗白鹭湖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地理条件、风土民情，以及今后工作的打算。贺龙对沙岗年关暴动表示满意，对沙岗白鹭湖险要的地势和淳朴的民风很感兴趣，要求白鹭湖游击队与监利河口游击队及贺锦斋部取得联系，造成犄角之势，发展翘首可待。此后，周逸

<sup>①</sup> 《沙岗革命斗争简史》（未刊稿），存中共江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sup>②</sup> 《沙岗革命斗争简史》，访问陈桂芳记录（1984年7月），存中共江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群亦几次到沙岗指导工作，使彭之玉受益非浅<sup>①</sup>。四月，由屈阳春、段玉林、朱祖光等领导的石首华容一带的游击武装，因形势恶化，辗转到达沔阳白鹭湖畔，与彭之玉、陈香波领导的白鹭湖游击队会合。五月，两支游击队在彭之玉和段玉林等统一指挥下，遵原逸群之命，东下湖洪会合鄂中特委武装，于十月攻克沔阳（阳）中敌人据点峰口镇，缴获连枪十八支，现洋三千元<sup>②</sup>。时值隆冬，白雪皑皑，段德昌率领一支数十人的武装来到新观与彭之玉取得联系。经过筹划，于次日首歼沙岗一排敌兵，继而连克普济观、麻布拐等敌据点，威震遐迩。

随着彭之玉等人领导的游击战的不断胜利，敌人对彭之玉恨之入骨，张榜捉拿他，甚至连一个姓彭的都不肯放过。同志们不免有些替他担心，他却说：“我们不要把脑袋看的太贵重，搞革命就得随时准备掉脑袋。”<sup>③</sup>一九二八年春，白马区地下党员顿祖刚不幸在沙市被捕，英勇就义。彭之玉闻信后，亲去顿家安慰顿母道：“伯母不要太难过，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并表示一定要替战友报仇。七月五的一个早晨，彭之玉带领两个人到胡家场团防局驻地，他命随来的两个人在外应变，自己只身步入团防局内，乘团总陈茂明不备，机智地将他处决了。等到团匪闻声赶到时，彭之玉已带着两个随来的同志消失在蒿草湖里。

（四）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江陵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彭之玉

<sup>①</sup>周逸群：《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5月），存湖北省档案馆。

当选为常委。翌年春，蒋桂军阀准备混战，鄂西地区敌主力部队大量他调，剩下的主要是地方团防武装。三月六日，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根据目前敌鄂西防务空虚的有利形势，特委决定发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会后，彭之玉和陈香波等江陵县委领导人积极响应特委号召，率先在江陵县成立工农兵政府，将白鹭湖游击队改编为江陵县工农兵大队。革命烈火很快蔓延到沙岗白鹭湖为中心方圆五六十里的地区。不久鄂西特委根据沙岗扩大会议决定，将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零星武装编为一支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将邹资生指挥的特务大队编为第一中队，由彭之玉、段玉林二人负责指挥。他和段玉林一道带领一中队以沙岗白鹭湖为大本营，在特委和周逸群的领导下，与第二中队紧密配合，纵横驰骋于荆江西岸。短短十七天时间内，两个中队作战二十余次，锋芒所向，势如破竹，大大震慑了敌人。

三月中旬，彭之玉和段玉林挥师夜渡江南，出其不意地击溃石首团防匪酋袁福阶控制的“神兵”，攻占江南要地阵子山、沙林子等处。石首城驻敌闻风胆丧，弃城而逃。游击队一鼓作气，连夜进占县城，杀了贪官龚县长的老婆，和反动的国民党指导委员，获枪八十余支和大批弹药，打开监狱救出了七十余名党员和无辜群众，进一步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三月三十一日，游击队攻克监利下车湾，旋又激战石首小河口，重创敌军。继而进袭公安藕池，但因侦察有误，在袁家铺与敌正规军谭道源部两个团遭遇，被层层包围，在这危急关头，彭之玉身先士卒，指挥战士与敌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损失惨重。因游击队元气大损，敌军又疯狂逼剿，彭之玉遂与段玉林商议，决定将一中队分为一、三两个中队，各领一支

分别在江（陵）石（首）两县隐迹群众之中，边游击边整顿，以图发展。

这时，江、监两县的敌人阴谋策划血洗我红色根据地中心沙岗。四月八日龙湾、徐李寺老新口、张金河，土地口五个地区的团防兵丁共四百余众，在国民党江陵铲共团团总龚伯钧率领下猛扑过来，我游击队和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及根据地部分群众，在彭之玉、陈香波等人的部署下，作好了迎敌的准备，将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两旁麦地里，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彭之玉一声令下，群起奋勇杀敌，打得敌兵措手不及，首尾不能相顾，追毙匪首龚伯钧，缴获武器弹药甚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成绩。次日又大败由监利县知事田立勋率领来犯的敌军，田立勋杂于溃兵间落荒而逃。

两战告捷，群情振奋，游击队兵员得到了补充。这时敌虽对沙岗虎视眈眈，但不敢贸然进犯。其间，彭之玉曾率队东下洪湖，取得了第二中队在武器方面的资助。因敌乘隙偷袭沙岗，大肆抢劫，火烧彭之玉、陈香波的住地，一百余户民房顿成焦土。彭之玉乃策马西返，横扫根据地内的白点，一气取得了对易家口、新观、徐李场、资福寺、小河口和沙口子等地地主团防武装作战的胜利，给根据地军民以巨大的鼓舞。

农历端午节，江陵、监利的团防武装乘我根据地暂时武装空虚之机，火烧沙岗民房。游击队闻讯赶到，在江陵县工农兵大队有力配合和根据地群众积极参战下，同敌军在沙岗镇附近的青阳宫展开激战，取得了歼敌八十余人的胜利，我一些游击队军事干部亦壮烈牺牲。

青阳宫之役后，为了补充游击队军事干部，提高游击队的作战素质，鄂西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在洪湖设立教导

队，培训军事骨干，一面将特委所属游击队调驻洪湖，集中训练和整顿，为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特委将鄂西各地的游击队武装编做两个大队，彭之玉、段玉林领导的江、石游击队分别组成四、五两个中队，隶属第二大队。通过一时期的整训之后，各游击队又开始分散活动。

七月初，彭之玉率四中队南下石首，与段玉林领导的五中队汇合作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根据地边沿的沙口子，取得了歼敌谭道源部一个正规连，缴枪七十余支的胜利。

不久，上级派李化龙任四中队队长，特委决定彭之玉在主持江陵县委工作的同时，指导四中队的工作，随军行动。七月上旬，四中队攻下被敌兵盘踞着的徐李寺，得枪二十支。次日敌军四百余人进犯沙岗，彭之玉、陈香波、李化龙等组织游击队和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在新观附近阻击，打的敌人溃不成军，抱头鼠窜。但因反动分子通风报信，敌普济驻兵驰援，新观败敌乘势反攻，我腹背受敌，孤立无援，战斗失利，中队长李化龙阵亡。敌兽性大发，火烧彭之玉的家族新盖的住房，乱杀无辜多人。

挫折，使部分游击队战士产生了悲观情绪，有的人埋了枪。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彭之玉没有气馁，他给战士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舞和开导战士们说：长江水也有倒流的时候，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失败毕竟是暂时的，只要大家不打退堂鼓，胜利早晚属于我们！战士们在他的启发教育下，鼓舞斗志，继续战斗。为了避敌锋芒，保存自己，以利再战，彭之玉率领游击队跨越长江天堑，与在石首活动的第五中队汇合。后因石首环境险恶，乃开往湖南华容化、宣两区。因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游击队如鱼得水，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并扩大了华、石边界的红色区域。

鄂西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逐步形成，大大地震惊了敌人。早在一九二九年四月间，驻湘鄂的敌军就剧增数倍，妄图致革命军民于死地，由于我军民奋力抵抗，敌阴谋破产。秋后，又划分了“绥靖区”，以十余倍于我的兵力，向江、石、监、沔、华根据地猛扑过来，对我红色区域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根据敌我形势变化，八月间，彭之玉、段玉林所在的第二大队奉命与段德昌等人领导的第一大队在监利严李家场会师，正式编为鄂西游击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时因江陵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急需得力领导，特委遂决定彭之玉回江陵主持工作，任县委书记。

在这为时半年的游击战争中，彭之玉表现了自己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胜利和失败，丰富了他对敌斗争的知识，进一步磨砺了他的革命意志，为他日后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和段玉林配合默契，共同切磋，在遵循特委“敌来我飞，敌去我追，敌多则跑，敌少则搞”<sup>①</sup>的游击战术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新的战斗规律，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为了不使游击战争流于单纯的军事行动，游击队每到一处，他都要组织干部战士运用开会讲演，张贴标语，出示布告，编唱歌谣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主张，帮助地方建立建全红色政权，并以身作则地带领战士们利用战余时间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密切了军民关系，有效地消除了敌人反动宣传造成的恶劣影响，取得了新区农民对党的游击队的信任，使游击队险有避所，战有后盾，宿膳无

---

<sup>①</sup> 《解放军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集第432页。

愁，屡战屡胜。

### (五)

彭之玉回江陵工作期间，团结县委一班人，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和二、建立建全区乡苏维埃政权；三、创办了列宁学校和开办各种不同形式的短期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江陵的革命活动就开展的有声有色，局面焕然一新，于次年一月正式成立江陵县苏维埃政府。

四月，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弦口召开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五县（江陵、监利、石首、潜江、沔阳）联县政府。彭之玉当选为联县政府党团书记。他坚持“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形式在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而“不能直接命令苏维埃或代替苏维埃”等原则<sup>①</sup>，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在领导苏区人民分配土地，支援革命战争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九月二十三日，红二军团攻克了监利县城。次日，就地召开了红二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联席会议，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彭之玉当选为特委常委。会后，红二军团政委、特委书记邓中夏随军活动；特委实际上由周逸群、万涛、彭之玉和崔琪四人负责。十月，鄂西第二次工农贫民代表大会召开，改鄂西五县联县政府为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彭之玉当选为湘

---

<sup>①</sup> 《鄂西特委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录》（1929年12月），存湖北档案馆。

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副主席并兼任党团书记。自一九三〇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春，彭之玉按特委分工主要负责土地分配工作，他知道，土地革命最基本的问题是解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关系至大。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鄂西党的二大就做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并首先在苏区部分农村试行分配土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彭之玉和其他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一道，借鉴全国其它苏区的好经验，联系本地实际进行工作，使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日臻完善，为一九三〇年九月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上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和稍后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制订的《土地革命法令》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从而促进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也为苏区的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代表夏曦到达洪湖苏区，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产生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彭之玉当选为省委常委。同时，湘鄂西联县政府相应改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彭之玉当选为苏维埃主席。这时红三军九师成立前敌委员会，万涛任书记，彭之玉、段德昌等为委员。不久，省委宣传部长庄东晓病离，由彭之玉兼任该职，并负责土地农民部工作。十月中旬红三军前敌委员会改组，由彭之玉（代表省委省苏）、唐赤英和贺龙组成前敌委员会，彭任书记，亦是省军委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

彭之玉肩负湘鄂西苏区党政军要职之时，正是苏区危急存亡之秋。是年夏，阴雨连绵，江河泛滥，湖北省遇到了几十年来没发生过的大洪灾。国民党反动派草菅人命，一面以十四个

正规团的重兵压境，一面在监利上车湾掘开长江大堤，妄图凭借滔滔洪水和强大的兵势，一举扑灭我湘鄂西苏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值此严峻时刻，彭之玉同其他领导同志战斗在抗洪救灾前线，共同领导苏区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给红军反“围剿”创造了条件。秋后，洪水退去，局势日渐好转，他又一头扑到苏区生产自救工作上，帮助群众解决耕牛、农具、种子，以及粮食等生产资料，掀起了“赶秋运动”并领导群众兴修堤垸，成绩显著。

彭之玉一贯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他主持编写了一系列宣传小册子，如《俄国国内战争缩影》、《湘鄂西土地农民问题汇刊》等，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革命的现实形势和美好未来，以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他还在百忙中深入到苏区各报社，指导同志办好报纸。他自己就是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日报》通讯员，经常为报纸撰写文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监利磨老嘴召开。会上，彭之玉和万涛、段德昌等代表一起，批评了夏曦在洪湖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夏曦处境孤立。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彭之玉当选为新的省委委员。后为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省委分工他兼任红三军七师政委，随军行动，和师长王一鸣并肩战斗，参加并指挥过著名的瓦庙集之战。

一九三二年二月，皂市之役后，敌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四十四师共计十四团兵力大举进攻襄北苏区，湘鄂西省军委即令留一团兵力在张截港保证襄河两岸交通，其余主力则向在京山、天门境内之宜汉公路两翼运动的八、九师靠拢，以在灰埠头、梵进寺一带迫击敌人。当彭之玉等指挥员率部进至瓦庙集



附近时，即与敌遭遇，这次战斗从三月三十日起到四月六日结束，持续了七个昼夜。敌先后投入兵力两万余众，并济以飞机轰炸，我军将士在襄北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勇猛冲击，以一当十，终于击退了强大的敌军。

彭之玉在兼任七师政委的同时，因为这一时期七师主要活动在襄北一带，彭之玉又兼任襄北特委委员和荆南县委书记<sup>①</sup>。五月一日，彭之玉等在脉旺嘴主持召开数千人的大会，宣告荆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自此，荆南所属浩口、脉旺嘴、蚌滩、长湖、董场、高桥、后港、毛李八个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展开，为红军的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二年初秋，湘鄂西苏区由夏曦主持的错误肃反全面展开，一大批革命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惨遭杀害。奉命“回后方学习”的彭之玉来到了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竟被诬为“改组派书记”监禁于省政保局，数日后殉难，年仅二十五岁。

彭之玉为湘鄂西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一九五七年党和人民政府，在洪湖新堤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以纪念无数湘鄂西苏区死难烈士，彭之玉的英名被镌在纪念碑上。

---

<sup>①</sup> 《潜江县革命斗争史简况》（未刊），存中共潜江县委党史办公室。

# 杨幼麟

谢秉志

杨幼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的农民、工人运动。马日事变后，党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一九三〇年红军攻打长沙后，担任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sup>①</sup>，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二年调中央苏区工作，一九三四年牺牲于江西瑞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一生。

## (一)

杨幼麟，名瑶，别名石夫，祖籍湖南省湘乡县湘西乡（今龙洞乡）。父亲杨祥麟，读过几年私塾，十七岁投入湘军当兵。后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屡有战功，不断晋升，被任命为镇

---

<sup>①</sup>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主席李立三未到职，由王一芬（王首道）代理。不久，王一芬离开，由副主席杨幼麟代理。见195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的信，原件存中共湘乡县委党史办公室；参见《为前湘鄂赣省苏维埃主席人名正误》，载《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守使，率军出屯哈密，并授封为建威将军。其妻马福慧，亦被封为一品夫人<sup>①</sup>。一八九九年，杨幼麟在新疆哈密出生。

一九一二年，杨幼麟十三岁时，父亲在新疆病逝。临终时，他嘱咐妻子：“望善抚儿女，勿使流落异乡，并应督其各自奋志，俾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sup>②</sup>不久，母亲便带着儿女，启程回湘，于一九一三年底，抵达原籍湘乡县湘西乡良储湾定居。

马福慧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她牢记丈夫临终的嘱咐，尽心抚育子女，鼓励他们求学上进。为送子女上学，她自己节衣缩食，将几十亩田地逐渐典卖，使子女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杨幼麟从新疆回到湘乡以后，在本地塾师贺兰阶先生处就读。贺兰阶是湘乡宿儒，对学生施行封建管教。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骂一个学生是牛马，杨幼麟愤愤不平，起而责问：“学生既是牛马，何以老师与牛马为群？我们是来求学的，非为做牛马而来！”<sup>③</sup>贺兰阶无话可答，只好拂袖而去。杨幼麟随即领着同学罢课，并要求退还学俸。塾师自知理屈，只得请人出面调停，此后即改变了管教方法<sup>④</sup>。

一九二〇年，杨幼麟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他在同乡陈子博、易礼容的影响下，常到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参加活动，读到了一些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因为湖南人民坚持对日经济绝交，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伏见”号水兵在日清码头登陆，开枪向示威群众射击，造成

<sup>①</sup>据《杨祥麟墓志》。

<sup>②</sup>马福慧忆述，杨应鹏记录。

<sup>③④</sup>1977年1月20日访问胡桂生、胡中钦的谈话记录。

“长沙惨案”。杨幼麟十分气愤，参加了反日斗争。他和一些青年学生一起，守在码头上，阻止为日本人搬运货物。嗣后，他在给二哥次麟的信中写道：“父亲赶走了俄国侵略者，又来了日本侵略者，此任将责无旁贷地落在我辈身上”<sup>①</sup>。一九二四年，杨幼麟从岳云中学毕业，返回家乡一面任教，一面宣传革命。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养病，在农民中组织雪耻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道理。杨幼麟便邀集本地一些进步青年，经常去韶山听毛泽东讲课，并加入了雪耻会。和毛泽东的接触，使杨幼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年九月，他在韶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韶山党支部领导下，杨幼麟担任了湘乡湘西乡城前区学务委员会学务主任，其他几个党员担任了这个学区的小学教师，一边教学，一边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学校成了党的秘密据点，他们深入农民中进行革命串连，宣传反帝和反封建的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培养先进分子入党。是年十二月，党员已发展到四十多人，成立了党的城前支部和凤音支部，杨幼麟任城前党支部书记。这时，农民运动广泛发展。韶山党支部根据毛泽东从广州农讲所来信的意见，成立了湘潭西二区农民协会。杨幼麟积极参加了农协的组建工作，被选为区农协青工委员，他还和广州农讲所派到湘乡来的学员一道，秘密筹建湘乡县工会、农会，在筹备委员会工作<sup>②</sup>。

北伐军入湘后，农会可以公开树旗活动了。湘西乡首先成立了第一区农民协会，杨幼麟任区农协委员长。

<sup>①</sup>湘乡县民政局：《杨幼麟烈士材料》（1961年）。

<sup>②</sup>《湘乡县农民运动记略》（1980年）未刊稿。

一九二六年九月，经过杨幼麟等的积极筹备，湘乡县总工会在县城南门罗忠节祠正式成立，杨幼麟担任总工会主席，下设二十四个基层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sup>①</sup>。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湖南区委派周以粟来湘乡主持成立党和团的地方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一月初，在湘乡县城镇湘楼同善社召开了中共湘乡地方委员会成立大会，杨幼麟被选为地委委员<sup>②</sup>，负责分管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于一月八日晚专程到城前铺考察农运工作，召开了城前支部的地下党员会议，对杨幼麟领导该地农民运动工作予以赞扬<sup>③</sup>。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工农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杨幼麟被迫离开湖南，到武汉找党组织，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去上海，转入地下活动。八月间，杨幼麟到达上海，党中央决定他去苏联学习。九月，杨幼麟一行搭意大利轮船，经日本、朝鲜、海参崴，十一月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次年三月，又合并到劳动大学。学校分政治、军事两科，杨幼麟学习军事。学校党的支部局隶属莫斯科市委。王明当时是支部局的委员，深得校长米夫的赏识与支持。他利用权力和这种特殊关系，搞宗派活动，封锁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打击瞿秋白<sup>④</sup>。杨幼麟和多

---

①《湘乡县农民运动记略》（1980年）未刊稿。

②《湘乡县地下党组织发展概况》（1980年），未刊稿。

③《毛泽东考察湘乡农民运动纪实》，载《湘乡党史资料》第7期（1983年）。

④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载《党史资料》1980年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见1976年8月26日《陈一诚在湘乡谈话纪要》。

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做法，受到王明的打击排斥。

## (二)

一九二九年夏，杨幼麟从苏联回国，党派他到湘鄂赣苏区工作。自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坚持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赤卫队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也不断巩固发展，一九二八年九月，就正式恢复了湘鄂赣边特委。杨幼麟来到这里时，特委已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将原湘鄂赣边特委改为湘鄂赣边境特委。杨幼麟向特委传达了“六大”制定的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基本策略和方针。但不久，边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湘鄂赣三省反动派又一次向革命势力发动了猖狂进攻，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又趋险恶。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杨幼麟出席了边境特委在平江东乡四区召开的扩大会议，即芦头会议。他在会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敌人的疯狂进攻，固然不能消灭革命，但却能打击革命，延长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因此，他提出：我们在斗争中不仅要学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进攻，而且要学会退却，不仅要学会打击敌人，而且要学会躲避敌人的打击。那种盲动主义的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的乱杀乱烧，企图与实力强大、气焰高涨的敌人作武装对峙，不仅不能打击敌人而且必然招致自己的巨大损失。他主张恢复苏维埃组织，把恢复、健全和发展党组织三者结合起来。到会同志同意了杨幼麟的这些看法<sup>①</sup>。会议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新的形势改变策略；

<sup>①</sup>1983年11月18日访问王首道的谈话记录，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1929年12月2日）。

二是选举边境第二届特委执行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出执委十一人，候补执委三人。随后，召开了第二届特委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推选王首道、杨幼麟、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五人为常委<sup>①</sup>。这次会议，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成为湘鄂赣边区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以后，在红五军的配合下，游击战争战果累累；边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和恢复，党员达到九千九百余人；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湘鄂赣整个边境地区，开始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了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十二月十日，王首道、杨幼麟在万载陈坑召开了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提出了运用民主办法改选各级苏维埃组织，扩大边境赤卫武装，发展年关斗争，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加强思想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会后，特委机关迁至平江长寿街。这时，特委收到了省委十二月三十日来信，信中批评特委“九二”扩大会议在苏维埃、农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正确决议和决策。王首道、杨幼麟立即召集常委会认真进行了讨论，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写了答复报告，对省委的意见和指责，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开诚布公的反驳<sup>②</sup>。但是杨幼麟和其他特委常委在某些问题上，又赞成省委的“左”的观点。从这时起，边境党组织遇到“左”倾情绪的干扰越来越大，并开始，在苏区蔓延。一九三〇年六月八日至十七日，在平江东乡四区召开边境党的代表大会，本来应该总结“九二”扩大会议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制订进一步前进的工作计划，利用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然而，会议在“左”倾

① 《湘鄂赣苏区史稿》第67页。

② 《湘鄂赣边特委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决议》。

思想的指导下，不适当地提出所谓纠正“九二”会议以来形成的不正确工作路线的口号，以种种借口改选了任期不到十个月的第二届特委。杨幼麟仍被选为第三届特委常委<sup>①</sup>，没有抗拒当时“左”的干扰。

七月中旬，杨幼麟出席了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境特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遵照中央命令，同时估量了长沙地区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进攻长沙。为了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湘鄂赣边境特委成立了一个随军工作团，由王首道、杨幼麟负责<sup>②</sup>。

红军在苏区人民的支持下，七月二十八日占领了长沙城。二十九日，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发布告群众书，阐明目前革命形势，提出了革命主张和任务。三十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任主席，因李立三不在长沙，由王一芬（即王首道）代理。不久，王一芬离开，便由副主席杨幼麟代理。委员有彭德怀、李宗白等十三人。省苏政府宣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以保证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和农民获得土地。为制订这些法令，杨幼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sup>③</sup>。

八月三日下午一时，在市教育会坪举行十万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三周年。大会推选彭德怀、袁国平、杨幼麟、钟次农、刘丙寅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杨幼麟首先致词，他说：

---

① 《湘鄂赣边特委报告》（1929年12月21日）。

② 《平江县革命历史文件集》，湖南省档案馆、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1983年编印。

③ 1959年6月15日张启龙给杨应鹏的信，原件存中共湘乡县党史办公室；《为前湘鄂赣省苏维埃主席人名正误》，载《湖南师范学院报》1982年第4期。



今天补行八一示威大会，及庆祝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其要义有三：第一，为纪念八一示威大会，群众应一致团结打倒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帝国主义等反动派。第二，为纪念八一示威大会，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应大家武装联合起来，毫无疑义地扩大红军，拥护苏联。第三，为庆祝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无产阶级广大劳苦工农群众，应自动武装团结起来，肃清一切反动派，巩固我们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sup>①</sup>。

杨幼麟激昂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彭德怀、袁国平都发表了讲话。

红军攻克长沙，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何键即调集其所有部队进行反攻。为了保卫革命实力，杨幼麟率省苏机关，随军于八月五日离开长沙，向平江、浏阳撤退。

### （三）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杨幼麟领导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随三军团撤到长寿街。八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永合会师后，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受挫后，国民党反动派向湘鄂赣苏区的平、浏地区疯狂反扑。这时，苏区军事斗争极为艰苦，党内因“左”倾错误影响，斗争也十分复杂。十二月，敌进攻长寿街。杨幼麟和省苏维埃政府迁至江西修水上衫，决定改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了筹备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筹备委员会，杨幼麟是负责

---

<sup>①</sup>1930年8月3日《红军日报》。

人之一。他和边区党组织非常注意和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在每一个县、区的苏维埃区域内，都建立了党的县委、区委，有效地领导苏区人民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杨幼麟和共青团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李华英，结成革命伴侣<sup>①</sup>。

七月初，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李宗白、赖汝樵、胡梓、杨幼麟、张启龙等十一人为省委委员，正式成立了湘鄂省委，属苏区中央局领导<sup>②</sup>。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了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有二十多个县一百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会前开了三天预备会，推选李宗白、刘建中、杨幼麟等十一人为主席团。会议期间，遵照中央训令，撤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选举赖汝樵、李宗白、杨幼麟等二十三人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大会于十月四日结束。五日，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推定赖汝樵、杨幼麟等九人为常务委员，赖汝樵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幼麟为军事部长<sup>③</sup>。在这期间，杨幼麟在军事上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争取白军士兵拖枪投诚，大力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加强对白军士兵的阶级教育，打入白军组织，破坏敌后交通，发动白区群众斗争等一系列正确措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底，苏区发展到二十几个县，全省红军主力由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一万五千人。

---

①杨应麟：《杨门七烈》存湘乡县民政局。参见凌辉：《李华英传》，未刊稿。

②《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③《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通令（执字第一号）》。

一九三二年初，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认为“湘鄂赣省委贯彻四中全会不力，转变不彻底，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彻底改造，决定派中央代表来改造省委。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省委在驻地修水上衫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央代表林瑞笙的政治报告。他认为原省委在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虽然开始接受了国际路线，但实际中仍然是违背了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的，指出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是李宗白、杨幼麟。会议从“左”倾错误观点出发，对李宗白、杨幼麟为首的原省委进行了批判，指责李宗白、杨幼麟是“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六届四中全会所规定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指挥红军“完全停留在游击时代的游击主义”，等等<sup>①</sup>。这次扩大会议根据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撤销了以李宗白、杨幼麟为首的原省委。接着，四月一日，省苏维埃政府召开苏维埃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临时省委的提议，认为在执委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赖汝樵、杨幼麟、李宗白等十三人，因成份不好，犯了错误，不宜留在省苏维埃政府中负责，须公开召回，分配其它工作。至此，杨幼麟在湘鄂赣苏区的党政职务被全部无理解除<sup>②</sup>。

杨幼麟忍辱负重，不因遭到错误的打击而灰心。他坚信

---

① 《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赣省委信》（1932年3月4日），及《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对省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的提议》（3月29日）。

② 《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对省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提议》（1932年3月29日）；《湘鄂赣苏区史稿》第199页。

党，坚信真理一定战胜谬误。他同爱人李华英一道由湘鄂赣边来到中央苏区，向中央汇报了湘鄂赣省委的情况。不久，苏区中央局指示，改组省委，撤销林瑞笙等的职务。

杨幼麟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里进行斗争，历尽艰险，不辞辛苦，以致积劳成疾，患了严重肺病。中央局留他在中央苏区一边养病，一边工作，住在福建汀州福音医院治疗。一九三四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突围长征时，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中央决定，让他和李华英仍留中央苏区。在白色恐怖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杨幼麟仍然扶病在苏区人民中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后来由于敌人疯狂“围剿”和严密搜查，他和李华英不幸同时被捕，光荣牺牲于江西瑞金，时年三十五岁<sup>①</sup>。

杨幼麟兄弟姐妹六人，除大哥少麟早年病逝外，其余均先后为革命献身。他的二哥次麟毕业于长沙复初中学，一九二五年在韶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湘乡县农民协会负责人之一，马日事变后，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军团某团副团长，一九三二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幸牺牲。弟弟再麟，毕业于长沙湘雅中学，一九二六年入党，后考入武汉大学，大革命时期回乡从事革命活动，兼任中共湘乡县委宣传委员，马日事变后因歹徒告密被捕，一九三〇年一月被反动派枪杀于湘乡县城。妹妹淑梅、淑英，都是湘乡县城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淑梅担任县妇女联合会主任，淑英担任文教宣传委员，马日事变后，淑梅在县城遭到反动派枪杀，淑英出

---

<sup>①</sup>陈赓1950年给杨应聘的信及1959年张启龙给杨应聘的信，原件均存中共湘乡县委党史办公室。

走幸免，不久因悲愤含恨而死。连同杨幼麟夫妇，一家七人为革命光荣捐躯，被人们誉为“杨门七雄”。杨幼麟的母亲马福慧，大革命失败后，也同时遭到反动派的残酷迫害，逃至离家数十里的深山密林里，在一座古庵中安身，隐藏了十余年，直至建国后，才由人民政府接回老家居住。

## 彭 干 臣

张锡岭 彭醒华

彭干臣，是我党我军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一九二一年四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统战工作和武装斗争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

彭干臣，曾用名彭干成，彭耐寒、矿涛、黄春山。一八九九年生于湖北省英山县落令河。家庭出身佃中农，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彭干臣七岁开始读私塾，聪明好学，功课很好。虽家境困难，但在父母的支持和堂叔的资助下，得以在学攻读，后又到罗田县一位有名望的留日回乡杨老师办的学馆学习二年，一九一九年夏考取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设在省会安庆，故简称安庆一师）。

一九一九年秋，彭干臣进入安庆一师读书，经过了“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安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安庆一师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贫民和农民家庭，他们最容易接受爱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安庆一师，就成了安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彭干臣进校不久，就参加了安庆学

生联合会组织的宣传队，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和斗争。他同班同学濮德治是陈独秀的表弟，经常接到陈独秀寄来的《新青年》等革命刊物。彭干臣视为珍宝，每本必读。一九二〇年，有位北京高师毕业生刘著良，来安庆一师任教，“他把带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创造》等进步刊物，陈放在自己的客厅里，让学生自由阅读。”<sup>①</sup>彭干臣对刘老师的这一作法非常高兴，抓紧时间，认真研读。同年，“恽代英应邀来安庆讲演”<sup>②</sup>，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彭干臣等青年学生影响很大。这年五月，安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sup>③</sup>，《唯物史观浅说》、《共产党宣言》等书也在安庆流传。彭干臣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迅速成长为安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

一九二一年四月，蔡晓舟主持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大会<sup>④</sup>，彭干臣、舒传贤、许继慎等四十多名青年，首批加入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建立后，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彭干臣等团员在安庆一师学生宿舍内，“秘密办了一个图书馆”，传阅马列书籍和进步刊物，并举办了《春社》《评论报》等地下刊物，宣传革命真理，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斗争”<sup>⑤</sup>。不久，在安庆就爆发了

---

①濮清泉：《一九二五年前后安徽学生革命活动以及建团建党的回忆》（1983年），载安庆市《编史修志通讯》增刊（第2期）

②③④《安庆文史资料》第6辑（1983年10月），蔡晓舟，合肥人，曾在安庆一师任教，后任安徽大学筹备会主任，“五四”运动后，在安庆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1923年秋被反动派政府通缉，离开安庆。

⑤杨森：《共青团组织在安庆建立的经过》，载《安庆文史资料》第2辑（1981年9月）。

以学生为主体的“六二”运动。彭干臣等在“六二”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

“六二”运动的起因，是安庆各校学生要求省议会增加教育经费，为省议会所拒绝而激起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各校推举代表，于下午六时左右到省议会请愿，遭省议会副议长赵继椿，军阀马联甲（安庆镇守使）、倪道烺等人的拒绝及其鹰犬的殴打，代表戴文秀被打倒在地，满身是血，代表们遂联络安庆一师、法专等校学生千余人于当晚包围了省议会大楼。学生代表方洛舟、彭干臣向守卫省议会的警察交涉，要求会见议长和议员<sup>①</sup>。警察蛮横阻止，军阀马联甲开来大批军警，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顿时，省议会大楼周围血流遍地。学生“受轻伤二百零五人，重伤三十九人”。一师学生姜高琦身上被戳七刀，血流如注<sup>②</sup>。

六月三日，省学联决定，即日起安庆市学生总罢课。彭干臣等团员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揭露官僚、军阀的罪行。安庆各界人民奋起支持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安徽的芜湖、蚌埠、六安等地学生纷纷响应，一些地区的学生团体和其它革命团体也陆续通电声援。

受伤学生姜高琦因医治无效，于七月一日死亡。八月二日，安庆各界在黄家操场召开了大规模的追悼姜高琦烈士大会。同时向北京政府司法部控诉倪、马罪行，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经过各界人民的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安徽当局不得不“将教育经费由二十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同意教育经费独

<sup>①</sup>马铁尘：《五四运动在安庆（附六二惨案）》，载安庆市《编史修志通讯》增刊第1期（1983年7月）。

<sup>②</sup>《安庆文史资料》第6辑（1983年10月）。



立，设立安徽教育经费管理处，由教育界推派人选负责，并抚恤了姜高琦家属”<sup>①</sup>。

“六二”运动，使彭干臣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他曾在姜高琦烈士墓地的血衣亭内题词：“干，革命的精神是干！是要彻底的干！”<sup>②</sup>表现了他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同年秋，安庆各界人民又进行了反对贿选安徽三届省议会的斗争。反对老官僚李兆珍长皖（任安徽省长）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彭干臣在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表现积极得到同学们的信任，于一九二二年秋被选为省“学联委员”<sup>③</sup>。

一九二三年当“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安庆后，以安徽省学生总会为主，联合教职员联合会、商会等组成安徽各界“二七惨案后援会”，在黄家操场召开有数千名学生参加的大会，发表了宣言。会后示威游行，组织募捐<sup>④</sup>，派蔡晓舟、彭干臣和濮清泉，带了二千元大洋到武汉去慰问，还印发了《二七惨案特刊》。

一九二三年春，陈独秀派柯庆施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安庆，具体负责安庆的建团（一九二一年四月建立的安庆团组织，曾报中央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和建党工作。同年六月十三日，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新召开成立大会<sup>⑤</sup>，参加者柯庆

---

①黄华康：《五四时期安庆学运概况》，载《安庆文史资料》第2辑（1981年9月）。

②张格：《一位被历史湮没的英杰》，载《英山革命史资料》第2辑（1985年1月）。

③④《安庆文史资料》第6辑（1983年10月）。

⑤《濮清泉回忆彭干臣等人的革命活动》，载《英山革命史资料》第2辑（1985年1月）。

施、濮德治、彭干臣、许继慎等二十人左右”，将安庆团组织正式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领导。会上，大家推举柯庆施为书记。”<sup>①</sup>

安庆重新建团不久，发生了曹锟贿选总统的丑闻，安庆团组织决定发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在彭干臣等省学生总会骨干的带领下，安庆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示威游行，并捣毁了贿选议员张伯衍、何雯的住宅。不久，曹锟反动政府下了通缉令，被通缉的有蔡晓舟、彭干臣、濮德治、许继慎等三十六人，彭干臣被迫流亡上海，通过同乡傅慧初的关系，在律师李次山家暂住，不久，又密返安庆<sup>②</sup>。

一九二三年冬，安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展到五十人左右。陈独秀认为在安庆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写信给柯庆施，指出可以在安庆建党。当年十二月，“中共安庆党组织在安庆市北门孝子坊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党员有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治、濮德毅、许继慎、杨溥泉、舒传贤、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鼎等十人。选举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任组织，濮德治任宣传。同时还成立了一师党支部，支书彭干臣；甲工党支部，支书濮德毅；一中、一农等校综合党支部，支书舒传贤。安庆党组织成立后，直属上海党的中央领导”<sup>③</sup>。

一九二四年四月，安庆党组织选送彭干臣等六位党员，报考黄埔军官学校，结果彭干臣、许继慎、杨溥泉、姚光鼎四人

---

①濮清泉：《一九二五年前后安徽学生革命活动以及建团建党的回忆》。

②《濮清泉回忆彭干臣等人的革命活动》。

③《安庆文史资料》第6辑（1983年10月）。

被录取<sup>①</sup>。

## (二)

一九二四年五月，彭干臣进黄埔军官学校学习，编在第一期三队。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重要成员，是当时黄埔军校中主要的革命活动分子。”<sup>②</sup>在黄埔军校，他学习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进化论”和军事课等十几门课程。学习成绩优秀。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经常给一些同学、同乡同志和朋友写信，介绍黄埔军校的学习、战斗生活，热情动员他们报考。在彭干臣和其他几位黄埔学生的影响下，安庆、英山等地的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革命青年，踊跃报考黄埔军校。仅英山县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就有三十一人<sup>③</sup>。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旬，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毕业，当时正值第三期学生入学和教导团成立之际，军校留下彭干臣担任教导一团连的党代表。这时，黄埔军校内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彭干臣是蒋先云同志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之一。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黄埔军校教导团（二个团）出发参

<sup>①</sup>濮清泉：《一九二五年前后安徽学生革命活动以及建团建党的回忆续》。

<sup>②</sup>黄铁民：《黄埔军校追忆点滴》，载广东文史资料第三七辑《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

<sup>③</sup>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中的“第三期同志姓名籍贯表”。

加第一次东征。彭干臣等各级党代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对入伍不久的新兵，积极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他们以师示表，先身士卒，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和总预备队，在周恩来同志率领下，夜晚秘密迫近五华县城，驻城之敌仍未察觉，其连哨刚出城即被缴械，并利用俘虏假称回城运弹叫开城门，我军遂一拥而入<sup>①</sup>。彭干臣和连长陈赓率领全连士兵勇猛冲杀，在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中，彭干臣等以墙为垒向敌攻击，敌人负隅顽抗，彭干臣的一个小手指被敌弹击断<sup>②</sup>。他全然不顾，率领战士向敌猛攻，追杀残敌，直至战斗胜利。彭干臣在东征中屡立战功连连晋级。后来彭干臣的一位同学，为他断了手指而惋惜，他爽朗地说：“革命诚非易，断指何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sup>③</sup>

一九二五年五月，东征军回师广州以后，党中央决定派彭干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六月上旬，他来到上海，等候出发。在滞留上海期间，党派他参加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当时上海的“五卅”运动正迅猛发展，党派彭干臣和王警东（共产党员，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等人，到吴淞机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的前身）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当时吴淞机厂还没有工会组织。彭、王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他们住食在工人家中，以上海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在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不久他们就创办了工人义务夜校。彭干

---

<sup>①</sup>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本部东征日记摘要”。

<sup>②</sup>彭积鑫、彭积玉等的回忆（1983年12月）。

<sup>③</sup>濮清泉给彭伟光的信（1984年1月）。

臣任校长，王警东、顾瑞伯任教员<sup>①</sup>，他们通过创办夜校，为组织工会、发展党员创造了条件，八月，彭、王介绍吴淞机厂工人孙津川入党<sup>②</sup>，同年九月五日，吴淞机厂成立了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宣言。中共党员孙津川被推为工人协进会的委员。不久，孙津川根据党的指示，以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的名义，领导吴淞机厂工人连续举行了两次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成了主力军。

一九二五年十月彭干臣从上海出发赴苏，十一月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与彭干臣同班学习的有朱德、曾涌泉、刘鼎、涂作潮等七十多人。彭干臣虚心好学，没有架子，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常与同班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同学交谈，讨论问题时观点鲜明，生动深刻，很有说服力。上军事课时由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朱德和由黄埔军校出身的彭干臣对其他学员进行辅导，往往是苏联教员讲一分钟，翻译的人讲半分钟，解释的人则要讲十几分钟。朱德、彭干臣就是起解释辅导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助教。在军事训练和演习时，他们也常给学员们做示范动作，具体指导<sup>③</sup>。

彭干臣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还和同学们一起共同翻译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作了一些争取苏联华侨的工作<sup>④</sup>，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迅猛发展，党提前调彭干臣回国参加

---

①蔡景海的回忆（1969年4月）。

②王凯回忆材料（1959年5月）。王凯即王警东，（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之胞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局长等职，1970年含冤逝世；孙津川，吴淞机厂第一任党支部支书，1928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牺牲。

③④刘鼎的回忆（1985年1月）。

北伐战争。在铁军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的著名战役中，彭向叶挺建议组织共产党员“敢死队”冲锋陷阵。在战斗中彭腰部负伤，不下火线荣立战功。同年十月，国民军攻占武昌城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十四师，镇守武昌，叶挺为卫戍司令，彭干臣为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对打击反动势力，维护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特别是平定夏斗寅的反革命叛乱，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六月，夏斗寅叛乱，叶挺西征讨夏时期，彭干臣曾代理武昌卫戍司令。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彭干臣受中央军委之命化名率一批军事干部密赴上海，参加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发动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保证起义的胜利，还通过律师李次山等为起义筹集了一笔钱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周恩来已不能到拉斐德路辣斐坊的军委办事处办公，曾一度潜住吴淞张家浜赵家宅孙津川的小木楼上。彭干臣同志慎密地保护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五月下旬，周恩来在彭干臣等的保护下安抵武汉。

###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党指示彭干臣率一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由武昌的东湖转移出城，分散隐蔽。彭干臣回到他的故乡英山。他秘密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在英山县城蒋经开家的“蒋源丰”商店的后屋。彭干臣同当时在英山的共产党员姜镜堂、金仁宣、肖伯堂、蒋经开、段焱华、熊受暄等举行秘密会议，商定尽快地把英山县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革命同志联络起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英山党的组织，组

织农民运动，与反动派展开斗争。某日，段焱华带革命青年张格到“蒋源丰”商店后屋见彭干臣。彭向他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同时强调联合国民党左派的重要性，他列举了英山县李次山的例子，说：李次山大律师不仅是上海律师界的领袖，而且是一位真诚的民主革命者，热忱的爱国者，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sup>①</sup>。历史证明，李次山先生在上海的家成了共产党地下联络站。并告诉他们既要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又要注意严守机密<sup>②</sup>。

彭干臣回英山不久，中央又密令他潜赴南昌，协助周恩来同志筹划武装起义。起义的当天，彭干臣接任南昌公安局长，兼任卫戍司令<sup>③</sup>。接管南昌市公安局后，立即集合原公安局的警官和消防队队员，进行整编。并在当天发出布告要各商店照常做生意<sup>④</sup>。八月四日下午，彭干臣召集保安一、二队和消防队讲话，接着就编队，收二、三百青壮年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编后发给枪和子弹<sup>⑤</sup>，第二天清早，随贺龙将军的警卫团出发南征<sup>⑥</sup>。八月五日，卫戍司令彭干臣要特务连副连长唐天际留下，了解敌人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人的武装部队联系，并交给唐“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自己率部撤出南昌<sup>⑦</sup>。没等唐天际完成任务，敌军就攻占

---

①②张格：《一位被历史湮没的英杰》，载《英山革命史资料》第2辑（1985年1月）。

③④⑤张秉泉、汪宪章：《起义时的公安局》，载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编《“八一”起义资料》。

⑥胥光和：《努力工作，不要找人写八行》，载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南昌起义资料》。

⑦唐天际：《难忘的行程》，载《星火燎原》第1辑（1964年版）。

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唐在群众的掩护下，脱离险境。

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到达潮州、汕头，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曾决定，将海陆丰农民赤卫队“改编成十五军，刘伯承当军长，彭干臣任第一师师长”，但因十月初起义军主力失败，“十五军没能正式成立”<sup>①</sup>。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干臣几经周折，约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达上海，藏身在李次山家。一九二八年，中央委派中央军委委员彭干臣协助军委书记周恩来工作，同年，李次山将其义女江鲜云介绍与彭干臣成婚。一九二九年夏天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举办军委系统的军政干部训练班，选定彭干臣主持该训练班的具体事务，并同其妻江鲜云一起掩护训练班。“训练班，由当时担任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由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任教员，讲授党的建设和军事斗争等课程，共办了三期。每期三十多人，时间三个月左右”<sup>②</sup>。训练班的地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景路）交叉后侧的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我党租用犹太人哈同的房子），花园外的大铁栏杆门旁，挂着一块“蜜蜂经理处”的铜牌。彭干臣对外的名义是该经理处的经理，他当时化名黄春山“皆称谓他‘黄大老板’”<sup>③</sup>，声称蜜蜂公司设在武汉，这里是该公司在上海洽谈生意的地方，彭干臣负责各期训练班学员的接送、住食、安全等具体事务。彭干臣接学员时，“一般都是晚上接进后，任何学员在整个学习期间都不得离开那幢

<sup>①</sup>郭化若的回忆（1983年10月），魏文伯、刘鼎《革命先烈彭干臣》，载1985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sup>②</sup>江鲜云的回忆（1983年9月）。

<sup>③</sup>陶秉哲的回忆（1985年4月）。



房子。“每期训练班结束，彭干臣都是夜里把一个个学员送走，拉人力车的人都是我们的保卫人员，人力车把学员直送事先安排好的旅馆，进旅馆后，静候我党‘交通’人员来接。”<sup>①</sup>学员训练结束后，大部分派往苏区，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如红军的高级将领“蔡申熙和他的爱人，就是在这里学习后，又派往苏区工作的”<sup>②</sup>。

彭干臣在主持中央军委军政干部训练班一年期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而未出任何事故。周恩来因此称赞他是位“出色的将才经理”。一九三〇年五月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半个多月后，党中央指派彭干臣担任满洲军委书记，去东北组织武装斗争。

一九三〇年六月，彭干臣偕同江鲜云携带刚满周岁的幼女到达奉天（沈阳）。党中央还派了一位原上海工会的负责人配合彭干臣开展工作。到奉天后，彭干臣的家安在小边门外（距火车站较近），江鲜云负责党的联络站工作（他们的家就是联络站），彭干臣忙于组织武装斗争，很少住在家里。

一九三〇年九月，东北党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敌特竭力追捕彭干臣等同志。十月上旬的一天，彭干臣和配合他工作的那位同志，从大连乘火车北上哈尔滨，两个侦探一直跟踪到哈尔滨的一个高级旅馆。彭干臣发现了一个家伙向敌特机关报告去了。留下的一个监视他们二人。彭向助手使了眼色，然后从容地走出房间，“热情”地同侦探打招呼，邀其进房间坐坐，等那家伙走进房间，他们就把那家伙掐死了，然后他们直奔火车

---

<sup>①②</sup>江鲜云的回忆（1983年9月）。

站，乘车取道大连，连返上海。鉴于彭等二人在东北已经暴露，中央决定他们二人暂留上海<sup>①</sup>。

彭干臣回上海后约一个月，中央军委又派彭干臣任中共顺直军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彭到达天津，同天津某公司的一位经理合住一幢洋房，对外称在某洋行当经理，彭在天津千方百计恢复、发展顺直省的地下武装，但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工作很难开展。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和许多党员被捕<sup>②</sup>。是年四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的行动科长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在这种情况下，彭干臣在天津工作就更加困难，中央军委决定彭干臣离开天津密返上海。

一九三一年五月，彭干臣回到上海，仍协助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央军委工作，并亲自到工厂、商店、学校活动，发展革命武装，组织武装暴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统治党中央，由于一系列的冒险行动，使上海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军委的活动异常困难。中央被迫决定周恩来、彭干臣等同志离沪赴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二月，彭干臣离沪赴赣东北苏区。离沪前夕，正值“一二八”抗战之时，彭干臣积极帮助安徽旅沪中学校长李次山（国民党左派）、教务主任蒋经开（中共闸北区委书记）组织了安徽旅沪中学爱国师生义勇军（编成一个营），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寇。此营壮士大多为国捐躯。

---

<sup>①</sup>江鲜云的回忆（1983年9月）。

<sup>②</sup>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7月版。

#### (四)

彭干臣，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先任红十军“参谋处长”，后又改任彭（湃）、杨（殷）军校教育长、校长等职<sup>①</sup>。彭、杨军校的学员由红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选派，一九三二年以前每期三个月，一九三三年以后每期六个月，学员一百八十名左右，毕业后到部队任连长或连指导员。文武全才的彭干臣，为赣东北红军培养了几百名军事干部，在横峰县曾有“小小葛原镇，大大军干校”的民谣<sup>②</sup>。

彭干臣在彭杨军校任职时，把自己名字最后一字“臣”改为“成”（彭干成）含意是干什么要立志干成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经常找战士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他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学员深受启迪和鼓舞。

正当彭干臣为培养红军干部大展才智之时，不幸党内肃反扩大化的寒流向他袭来，赣东北苏区的中央代表曾洪易，竭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搞肃反扩大化，对曾在“白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处处怀疑，迫害尤为严重，彭干臣成了所谓“理所当然的肃反对象”。约在一九三三年九月，曾洪易以召集彭杨军校校长彭干臣和政委舒冀开会为名，把彭、舒二人囚禁起来横加诬陷、迫害。舒冀同志含冤致死，彭干臣被长期囚禁直到一九三四年秋，刘鼎在路过某村庄

---

<sup>①</sup>陈赓给彭伟光的信（1953年4月），存中央档案馆。

<sup>②</sup>《宣金堂同志的回忆》，载《英山革命史资料》第2辑（1985年1月）。

时还亲眼目睹彭干臣被“单独囚禁”<sup>①</sup>。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方志敏受中央指示组织抗日先遣队出师北上，这时曾洪易见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即认为中国革命失败难免，在部队和干部中到处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动摇军心。方志敏等对此十分气愤，即将曾洪易的错误电告中央，并在大部队出征前夕，对曾洪易的悲观失望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为了加强抗日先遣队的力量，方志敏重新启用了彭干臣等在肃反扩大化中受迫害的干部。彭干臣受命后，立即奔赴前线，协同方志敏等率抗日先遣队北上。半月之内，部队沿皖赣边出击，一路胜利挺进，威震一时。后敌人调动大量兵力，蜂拥而至，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赣东北怀至山，我军陷敌重围。我军指战员英勇抗敌，牺牲惨重。方志敏因叛徒出卖被俘（同年八月慷慨就义），彭干臣在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六岁。

彭干臣在他短暂的戎马生涯中，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经历了黄埔军校东征讨伐军阀，北伐战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党训班，北上抗日先遣队等重大革命进程，并都留下他的光辉业绩，周恩来同志得知彭干臣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并一直惦记着彭干臣烈士子女，抗日战争初期，曾打听其下落，但无结果<sup>②</sup>。一九五〇年周恩来总理致书英山县一位革命烈士的父亲郭若夫先生，内称“德昭弟

---

①刘鼎的回忆（1985年1月）。

②1935年彭干臣的妻子和子女，在李次山临终前托人，从上海送往英山县隐蔽，抗战爆发后，魏文伯任英山县委书记时，将他们送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党安排了江鲜云的工作，安置了子女的生活和读书。

为国捐躯，还有彭干臣先后同学，亦为国牺牲”<sup>①</sup>。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第一次见到彭干臣的儿子彭伟光时，把他从头到脚审视一遍后说：“是的，他是彭干臣的儿子。”邓颖超同志兴奋地说：“今天见到你，我和你周伯伯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对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待了”<sup>②</sup>。

---

<sup>①</sup>周恩来致郭若夫的信（1950年）。德昭即郭德昭烈士，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周恩来的秘书，1927年牺牲。

<sup>②</sup>彭伟光，《回忆与思考》（1980年3月），

# 孙 仲 德

蒋 晓 钟

孙仲德，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皖西北游击师师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政委、第七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司令员等职，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一九六一年因病逝世。

## (一)

孙仲德原名孙家骥，曾用名余凯章，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人，一九〇二年一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有薄田十多亩，草房三间。父亲孙传斋靠种田织布维持生活。母亲是个勤劳的家庭妇女。哥哥孙铸之是个小职员，曾在直隶第二补充旅当过文书。家境虽然艰难，但他父母还是想方设法让孙仲德上学读书。他幼时读私塾，十三岁时转入高小学习，毕业后考入安徽省乙种工业学校，只读了两年，就因家贫而辍学。

一九二〇年经哥哥孙铸之托人介绍，他考入直系军阀开办的保定随营军校。次年，正值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军校当局决定将安徽籍学员全部逐出军校。孙仲德离开军校后，即到山东投入段祺瑞的边防军第二师，任下级军官。其间，他饱尝了军阀的淫威，对旧军队的腐败黑暗深恶痛绝。一九二七年他回到家

乡，在舒城任小学教师一年。这时，正是北伐战争时期，孙仲德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对北伐军极为向往。一九二七年秋，孙仲德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桂系）军械处处长吴绍杰介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第四集团军特务团当了迫击炮连连长。不久，孙仲德便认识到这支部队与旧军阀原是一丘之貉，大失所望。这使他非常苦闷，但回家又难以谋得职业，只得勉强在军队里呆下去。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当部队打到长沙时，他因病落伍，即回家住闲。后来当上了国民党的合肥县三河镇警备队长<sup>①</sup>。

在此期间，孙仲德目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民党内部腐败不堪，他深深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这时，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皖西爆发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到一九三〇年，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使皖西北人民看到了曙光，也使孙仲德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他怀着追求正义、寻找真理的愿望，设法接近当地的党组织。他的表弟颜文斗，由上海党组织派到合肥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颜文斗经常指导他阅读进步书刊，向他灌输革命思想。从此，孙仲德的觉悟日益提高<sup>②</sup>。

一九三一年春，孙仲德参加了革命工作，并由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跟他单线联系，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三河镇警备队长的合法身分，在舒（城）、庐（江）、合（肥）地区组织了一个党的外围秘密组织——“舒庐合地区赤色互济会”，自任互济会的主任。通过互济会的活动扩大党的影响；

---

<sup>①</sup>孙仲德自传，存安徽省委组织部。

<sup>②</sup>张如屏：《我所知道的孙仲德同志》，载1985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配合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sup>①</sup>。

是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集中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围剿”。一时反动势力十分猖獗。那时合肥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同志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颜文斗等十六位共产党员被捕后坚贞不屈，全部英勇献身。共产党人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孙仲德以深刻的教育。

正在这个时候，孙仲德的父母不堪国民党的敲榨勒索，贫病交加，相继去世。孙仲德的哥哥由于过度悲伤，也暴病身亡。孙仲德胸怀国难家仇，变卖了家产，草草安葬了父母和兄长，决心同国民党斗争到底。

一九三三年，孙仲德从敌人内部了解到党的合肥中心县委委员马自忠被捕，马上要解送去县城，时间紧迫，他只得亲自跑去红军游击队送信，游击队立即在解送的必经之地设下埋伏，把马自忠从敌人手中抢回来。孙仲德却因此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回警备队，便毅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sup>②</sup>。

那时，合肥地区红军游击队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战斗，经常是风餐露宿，生活十分艰苦。孙仲德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困难面前经受了考验。党组织看到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十分坚定，便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正式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他入党后不久，委派他为肥南区委书记<sup>③</sup>。

---

①叶平：《怀念仲德同志》，载1981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②顾鸿回忆材料，存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③孙仲德自传。



## (二)

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于形势险恶，原来在安徽省寿县一带活动的红军皖北游击大队一百余人南下合肥，和合肥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皖西北游击大队，由曹广海（原皖北游击大队副队长）任大队长，孙仲德任副大队长，张如屏（原皖北游击大队政委）任政委。

红军皖西北大队成立后，敌人加紧了对我“围剿”。十月的一天（农历重阳节前），游击大队在进军舒城南山的途中，于春秋山一带突然同大批敌人遭遇。由于敌人抢占了制高点，在激战中游击大队伤亡很重，大队长曹广海等壮烈牺牲。孙仲德指挥部队顶住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敌人始终未能把我们的队伍冲垮。入晚，孙仲德带着游击大队转移到舒城北乡沙河边的毛竹园子村。为了摆脱困境，孙仲德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找到了村里的一位绅士（孙同他曾是同学），将部队隐藏在他家深院内。这位绅士派人站岗放哨，送饭送水，避开了敌人的搜索。部队临走前，这位绅士又找到了几个竹筏子，帮助游击队渡过了沙河，使游击队化险为夷。

春秋山战斗后，孙仲德任皖西北游击大队大队长，各中队撤到合肥西乡曹家岗、小郢岗、邢家岗一带暂时隐蔽休整。一九三五年春节刚过，党中央派李德保来传达指示，同意把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建立皖西北特委，由刘敏任书记。同时，要求游击大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短时间内重新壮大起来。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大队经过重新研究，决定把党的骨干派往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游击大队

的队伍。孙仲德留在合肥西乡，带领部队积极宣传群众，发展农民协会组织，支持劳苦农民抗捐抗税和掩护他们进行扒粮斗争，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许多青年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游击大队。到一九三五年夏，游击大队就发展到五百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春，红军游击大队在肥西缺牙山附近的小园墙村改编为皖西北游击师。皖西北特委任命孙仲德为游击师师长，张如屏为政委，曹云露为参谋长。此后，皖西北游击师转战在皖西北地区和大江两岸。

那时，不少地方都成立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民团。肥南五十里铺国民党联保主任、民团团长宣冠伯勾结地主武装头目汪大祥和汪大祥的儿子“汪家五虎”，带了三十多个团丁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曾杀害了我肥南区委交通员。为了消灭这股凶恶的敌人，孙仲德争取了民团的两个班长作为内应，趁五十里铺逢集之机，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化装进入闹市，利用团丁假传消息，骗出了宣冠伯，把他抓了起来，又通过这两名班长吓跑了团防队，把“汪家五虎”孤立了起来，这才集中部队围歼“汪家五虎”，“汪家五虎”全被消灭。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短枪八支、长枪四支、子弹数十发。

豪绅卫守殿所在的卫西洼是山南地区反动武装的堡垒，孙仲德等经过侦察研究，决定智取卫家圩子。一天凌晨，红军游击师徐连长带领十几名战士，穿上国民党第十一路军的服装，神气十足地到了卫家圩子。卫守殿急忙出来迎接，他一边通知厨房做饭，一边带领徐连长走向客厅。在客厅里，互相介绍了“清乡”情况，徐连长还要他把他的儿子联保主任卫小山请回来共商“清乡”大计。卫小山回家后觉察到自己上了当，父子

俩正想反抗，徐连长当场把卫守殿击毙，卫小山被擒获。被集合起来的团防队，也糊里糊涂地被缴了枪。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子弹百余发。在此同时，孙仲德带领游击师在卫西洼附近伏击国民党军郭延甫的增援部队，毙敌四十余名，十多人缴枪投降。这次战斗使红军游击师声威大震，从此，敌人听到“孙大胖子”都胆战心惊。

在成立皖西北特委时，党中央就指示：部队要继续发展扩大，打通与老苏区的联系，在可能条件下建立新苏区。遵照这一指示，孙仲德率皖西北游击师于岳西县的孟薄原、黄表园一带找到了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八十二师手枪团。孙仲德同该团协同作战，打了几个民团，使该团武器和粮食都得到很好的补充，与此同时还将招募来的一百多名战士拨给了红八十二师。在这方面，孙仲德表现出他顾全大局、互助团结的宽阔胸怀。

### (三)

一九三五年秋，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增兵皖西北，对红军游击师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敌人对我游击区实行堡垒政策，三里一城，五里一堡，到处修碉堡、设据点，严密封锁交通要道，使我军活动越来越困难。这年冬天，战斗在大别山区的红军游击师的一连一排排长任继周打死了从红八十二师派来的一位副师长，策动叛变，使游击师力量受到损失，加之，坚持在肥南的红军游击师一部，在焦婆店、秋碑寺等地先后遭到敌人围攻，部队损失惨重。这时，红军皖西北游击师仅剩下一百二十余人，环境对我十分不利。孙仲德决定带领部

队撤离大别山区，靠拢设在舒城的皖西北特委，然后再徐图发展。

为了应付严重困难局面，制定对策，皖西北特委在庐江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圩子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孙仲德和其他同志一致要求清除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坚决克服不注意根据地建设，不注意隐蔽力量硬打硬拚及互不信任等错误做法，提出必须发扬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鉴于当时的险恶处境，会议研究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积极发展群众组织，以待时机。特委决定张如屏到巢县城以商人的合法身份建立特委机关，杨银声、奚业胜到巢县忠庙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坚持秘密革命斗争。孙仲德主动要求去长江沿岸开辟新局面，并为党筹集活动经费<sup>①</sup>。

特委扩大会议后，孙仲德化名余凯章，带领五、六个同志去无为县黑沙州一带活动。他们买了一条船，以贩米卖布作掩护，在江上拦截汉奸、豪绅的货船，没收他们的财物，为党筹措资金，购买枪枝弹药、医药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为了跟敌人周旋，孙仲德在木船上做了个夹层，既可以隐蔽武器等违禁物资，又可以藏人。有一次，敌人封锁江面，逐船进行搜查，孙仲德钻进船舱的夹层，躲过了敌人的搜捕。那年夏天，船停在无为的一条叉江里，大批敌人突然逼近。孙仲德来不及躲进夹层，就跳入水中，用荷叶遮住头面，一直坚持到深夜，等敌人撤走后他才钻出水面，周身都被水泡肿了，但仍谈笑自若<sup>②</sup>。孙仲德就是这样冒着风险进行革命活动，先后恢复了芜湖、无

---

<sup>①②</sup>张如屏、顾鸿回忆材料。

为、繁昌等县的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六年冬，皖西北特委在庐江北乡戴家桥南宋家小圩子召开特委会议，重新充实了特委领导班子，选举刘敏、曹云露、孙仲德、张如屏、杨银声、冯兆鲁等为特委委员，刘敏任书记，曹云露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孙仲德任军事部长，张如屏任组织部长<sup>①</sup>。

正当皖西北特委的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的时候，他们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们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又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报导，刘敏、张如屏还在上海找到了曾经担任江苏省团省委书记的老朱同志，从他那里也证实了上述消息。一九三七年春，皖西北特委召开会议，决定派人到陕北寻找党中央。孙仲德主动请求担负这一重任。特委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九三七年三月，孙仲德从庐江麻石桥出发，闯过了重重封锁，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上了关系<sup>②</sup>。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把孙仲德送到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分同志驻在云阳）。他向党中央汇报了皖西北特委和大别山苏区的军事、政治及民运工作情况。柯庆施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交待了我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还转达了中央组织部的决定，要皖西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到延安学习，党中央派宋天觉接任皖西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孙仲德迅速赶回庐江麻石桥，给皖西北特委的同志们作了传达。

---

<sup>①</sup>顾鸿、杨银声、奚业胜回忆材料。

<sup>②</sup>孙仲德自传。

五月，孙仲德和特委负责人刘敏、曹云露、杨银声、奚业胜、顾鸿一起，化装北上，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孙仲德进入抗大第三期一大队学习。在抗大，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和战略战术。第二年党组织调他去抗大教员队，他仍然是勤勤恳恳，边教边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sup>①</sup>。

#### (四)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孙仲德等从抗大和中央党校毕业，毕业前夕，毛泽东接见了他们，询问了学习情况，鼓励他们到前线勇敢杀敌，保卫祖国，大家都感到心里暖烘烘的，受到很大鼓舞。不久，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孙仲德（队长）率领五十三位同志，从平汉路到武汉、九江，再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浙江金华转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军部任命孙仲德为第三支队第五团团<sup>②</sup>。

五团位于繁昌县梅冲附近，日伪军在繁昌县城及长江重要口岸驻有部队，并经常外出“扫荡”，在这些频繁的战斗中，五团一直打得很好。有一次日寇一千五百多人进犯五团驻地，孙仲德命令二营坚守山头，部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击退了日寇多次冲锋，并大量杀伤了敌人，一直战斗到天快黑的时候，敌人怕遭我夜间袭击，赶紧撤走。这次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当时颇有影响。

孙仲德在五团期间不仅积极训练部队，打了一些胜仗，也十分重视深入发动群众工作。一九三五年五月，叶挺军长和张

<sup>①</sup>孙仲德自传；顾鸿、杨银声回忆材料。

<sup>②</sup>孙仲德自传；顾鸿回忆材料。

云逸、罗炳辉等到江北检查工作，孙仲德护送军首长渡江。可是到达江边后，江面上一条船也没有，叶军长的随行人员十分焦急。这时，孙仲德不慌不忙地打了一声口哨，几条小船便从芦苇丛中飞驰而来，首长们连声叫好，叶军长高兴地对孙仲德说：你们组织群众的工作可算做到家了，并送给孙仲德一支驳壳枪，作为对他的奖励<sup>①</sup>。

一九三九年八月，孙仲德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黄岩兼任政委，当时江北游击纵队只有三个营，约一千多人，驻在巢南地区。孙仲德亲自到舒城、合肥、寿县、云安一带扩充军队，先后组建了新八团、新九团，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完成扩军后，他回到无为县汪家大屯子组建纵队教导队，培训干部，教导队有学员一百多人，孙仲德调来了抗大的同学顾鸿等任教员，自己也常到教导队授课。与此同时，孙仲德还精简机构，改编了纵队直属机关，充实战斗部队。这些措施提高了纵队的战斗力，对纵队后来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sup>②</sup>。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间，巢（县）无（为）地区是一个日伪顽多种势力频繁“拉锯”的地区。我江北游击纵队一部也在巢无建立了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四月，顽军保安司令吴绍礼趁孙仲德扩军未归，集中了两个团向我发动突然袭击，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纵队参谋长桂蓬舟英勇牺牲，教导大队大队长丁亚负伤。为了避开敌人的实力，部队由纵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带领，撤至巢湖以北的小庙岗、柘皋、青龙尖一带休整。巢湖根据地落入日伪之手。

一九四〇年六月，江北游击纵队改编，孙仲德任纵队政治

---

<sup>①</sup>顾鸿，陈郁法回忆材料。

<sup>②</sup>顾鸿回忆材料。

委员，谭希林任司令员。部队改编后，孙仲德率领二团二营打回了巢无地区。

一天，伪军“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突然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发动袭击。孙仲德指挥部队掩护党政军机关人员撤退到沈家山中，凭险据守，阻击伪军。从清晨激战到下午，我军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入夜，孙仲德率部利用黑夜跳出包围圈，渡过苍头河，脱离了险境，部队进入了无为东乡之官店一带。第二天伪军在沈家山扑了空，只得败兴而去。就在这时，我游击队在巢县东关、临头等到处袭击敌人，使敌不得安宁，不得不撤出巢湖地区。这样，孙仲德便又指挥我主力部队返回巢无地区，恢复了各级政权。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旬，孙仲德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率江北游击纵队一个大队从淮南根据地南下无为，其主要任务是为了增强我军在江北沿江一带的实力，同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九月初从皖南挺进到无为）配合，以掩护皖南军部渡江，然后护送军部去淮南。

同年十一月中旬，孙仲德接到军部的电报，说军部和皖南的部队将要北渡，指示江北游击纵队和无为地方党组织，筹集渡船、粮草，作好接应的准备。这月下旬，军部又派原总兵站站站长张元寿带着电台和侦察分队，具体检查和落实渡江的准备工作，并在无为东乡临江坝设立渡江指挥部，由曾希圣任指挥长，孙仲德、张正坤任副指挥长，具体负责接应北渡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孙仲德移驻无为白茆洲坐镇指挥。经过积极艰苦的工作，共筹集了大小船只二、三百条，同时还筹集了大量款项和门板、稻草、粮食，并把挑伕都组织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随时接应军部北渡。



这年十二月三十日，军部突然给渡江指挥部发来电报，说皖南部队决定东进苏南，不由铜陵、繁昌北渡了。于是孙仲德和胡荣德等研究，决定遣散大部分船只，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应不测。

在这段时间内，江北国民党顽军以桂系第五二八团为主，纠合省保安第四、八团，从庐江南下，逼近无为县城，经常骚扰我巢湖一带，企图向我无为北乡根据地进攻。日本鬼子也经常从无为县城出来“扫荡”。日寇的汽艇在长江来回游弋，形势非常紧张。当时纵队干部中有人曾主张撤出巢无地区。孙仲德考虑到军部虽东去苏南，总会有一些零星掉队人员从铜、繁过江，需要接应。因此，他极力主张坚持原地斗争，他曾对那位负责干部说：“部队在这个地区不会出问题；我老孙绝对保证部队的安全。”在他的主持下，大江两岸设立了三个联络站：一个设在江南，一个设在无为东乡开明士绅胡士坦家里，另一个设在巢南山区。孙仲德决定留下胡德荣和地方上的一些同志在沿江主持工作，自己则急忙赶回巢南纵队司令部，组织反击敌伪、顽的侵犯。

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时，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七万余人的突然袭击，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牺牲，叶挺军长被扣捕。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江北，孙仲德和他的战友们无不义愤填膺，一方面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击退敌、伪、顽的进攻；另一方面加强沿江的接应工作，保证皖南突围的同志能够安全北渡。从一月中旬开始，便不断有突围人员从铜、繁地区渡江至无为，先后总计约七百余，其中有原第一团、三团、新三团、五团、军特务团、军部等各部干部、战士，分别由黄火星、刘别生、钟得

胜、熊梦辉、李志高、谢忠良等率领过江，最多的一批是新二支队，有二百多人，在巫希权等率领下到达无为。当时正值春节前后，寒气袭人。而突围出来的同志都没有棉衣棉被，孙仲德等指示接应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他们的衣被问题<sup>①</sup>。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从军部发来电报，指名要把一切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军部干部送到苏北军部去。孙仲德等派得力人员，护送这批干部安全到达新军部，从而圆满地完成了接应江南突围部队的任务。

皖南事变发生后，进入巢无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气焰嚣张，他们一面遣兵调将，伺机对我发动军事围攻；一面又散布谣言，妄图蛊惑人心，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这时摆在我军面前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继续宣传我党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在军事上粉碎敌、伪、顽的夹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改变巢无地区我军孤立的局面。孙仲德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同时利用江南突围部队的声势，在心理上压倒敌人，他们常组织白天行军，扛着许多用布套子套着的假机枪，并派出小部队到无为城边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迫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政治上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还在无为东乡茅草垄召开了群众大会。孙仲德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枪毙了五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从而稳定了民心。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江北游击纵队和突围过江的部队、林维先的挺进团、无为游击队、江北地方武装合并，在无为东乡白茆洲正式宣布组建新四军第七师。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任

---

<sup>①</sup>曾希圣：《皖江的抗日斗争》，载《新四军在安徽》，顾鸿回忆材料。

命张鼎丞为师长（未到职，由傅秋涛代理师长），曾勉（曾希圣）为政治委员。第七师成立了第十九旅，由孙仲德任旅长，曾勉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一九四二年三月，孙仲德任第七师参谋长）<sup>①</sup>。七师组建后，师部派顾鸿的一个营去和（县）含（山）地区活动，积极准备开辟新根据地，打通与军部及兄弟师的联系。

### （五）

一九四三年春，成立了皖江区党委，下辖和含、皖南、沿江等三个地委，孙仲德任第七师参谋长兼和含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和含地委书记，负责全地区的领导工作。和含支队下辖江全大队、含巢大队、和含独立大队和湖西大队<sup>②</sup>。

当时和含地区西边淮南线上的巢县、东关、铜闸等地日寇驻有重兵；南面的陶家厂、关门镇、螺丝滩等地也都有伪军驻守；北面是国民党安徽省府第五专署驻地，全区日、伪、顽碉堡林立，多种势力穿插其间，犬牙交错。此外，这个地区村村有刀会，家家有人参加刀会。敌、伪、顽为加强其统治，提出“防匪保家”的口号，甚至发给刀会枪枝，增加了这一地区斗争的复杂性。

为了顺利开辟这一地区，和含地委决定：首先在干部、战士中进行政策教育，进一步明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势力，要求人人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在处理大刀会的问题上，

<sup>①</sup>曾希圣：《皖江的抗日斗争》。

<sup>②</sup>孙仲德自传，顾鸿回忆材料。

地委要求部队打一场“不打枪的战斗”。江全大队初次进军新区，刚住进村庄，便有数千名大刀会众冲杀过来。我军一面后退，一面宣传，一直退到日寇据点的前面，才被迫开枪，专打混在刀会中的二支队（国民党支持的土匪武装）。事后、部队、县委又送钱、送物到被误伤的群众家进行安抚，把善后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一起进行。经过这样反复教育，刀会群众终于认清了敌友，表示今后一切行动听从新四军指挥。以后我军打绰庙集时，刀会群众主动跟去助战，绰庙集敌人（日军五、六十人，伪军两个连），一枪没敢还击就被吓跑了，部队又相继拔掉了陶家厂、娘娘庙等敌伪据点，接连打退了桂顽的多次进攻。后来，全区成立了四个县级办事处，下有区、乡、保、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此外，在敌占区还发展了一些两面政权。第七师不仅打通了他们与第二师、军部的交通线，而且形成了三条路线都可以通达的交通网。

在根据地的建设上，孙仲德非常重视发展党的组织和军队的建设，每次布置战斗任务时，他都要同时布置建党的工作。他规定部队在一个地方暂时不走，就要发展地方党员；无论战斗如何频繁，条件怎样艰苦，总要利用战斗间隙办教导大队或开展练兵活动。同时，注意通过根据地内的伪顽军的家属，去做对伪顽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和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如他曾争取了和县国民党一部分军队向我军投诚。我军跨越淮南铁路，横渡巢湖、张家大河时，都由伪军或伪乡、保长为我们提供情报，来往接应，甚至为我站岗放哨。部队还通过统战关系购买枪枝弹药。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日寇抽调第十五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六千多人，分别从东、西、南三面向我巢无中心区两次奔

袭“扫荡”，企图将我第七师主力压缩在银屏山区加以围歼，根据内线送来的可靠情报，我巢无地区主力部队在孙仲德和其他师首长的指挥下，在大王家、银屏山、石洞埠等地与日寇展开激战，给敌人重大杀伤后分路突围，冲出了敌人包围圈，使敌人围歼我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

自四月十八日起，日寇在银屏山区进行搜山，对我根据地疯狂破坏。我主力部队即在敌人侧背不断进行袭击，地方武装民兵也广泛开展“麻雀战”。同时，我和含支队在孙仲德等的指挥下，和沿江、皖南各支队一起，趁敌人后方空虚，纷纷向东关、开城桥等敌伪据点进行猛烈袭击，有力的配合了巢无中心区的反“扫荡”战斗，终于粉碎了日寇第一次历时两周、第二次历时六天的“扫荡”。

在反“扫荡”战斗最艰苦的时候，我军为了轻装大踏步地运动，还将伤病员转移到伪军的碉堡旁边打埋伏。伤病员和医务人员都穿上便衣，由伪保长和碉堡中的关系人负责他们的安全。事实证明，在当时这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措施。

一九四三年七月，向我进攻的日寇突然从黄姑闸、盛家桥两个据点撤退，有意放开一个缺口，使我巢无中心区暴露在大别山国民党反共军面前，让桂顽向我进攻。十一月，国民党顽军第八挺进纵队分三路向我磨盘山、丁字山、黄泥山一线进犯。敌军出动前，驻在盛家桥的一个顽军连长就把情报送了出来，我军事先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孙仲德亲自指挥下，这次战斗共歼敌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一门，长短枪七百余支。

反“扫荡”和反顽战斗的胜利，使我第七师所在地——皖江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七师由原组

建时的一个旅，发展成三个旅（第十九旅旅长林维先、二十旅旅长梁金华、二十一旅旅长马长炎），全师指战员由组建时一千九百多人，发展到三万多人，其中和含支队也由八百多人发展到五千多人<sup>①</sup>。

## （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抢夺胜利果实，内战危机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为了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我党表示愿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逐步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这样，既可以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也便于保卫和巩固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十月，孙仲德和第七师的部队一起奉命从皖江根据地 toward 山东撤退，他告别了多年来生死与共的根据地人民，作为师参谋长他极其慎重地安排了部队的行军路线。为了保证随军伤病员的安全，他还通过统战关系搞到几只日军汽艇，利用日军初降，国民党立足未稳之际，带领伤病员及部分妇女、机关干部乘船北上，从无为到六合，闯过了国民党的岗哨，直到登陆后国民党才有所闻。

部队到达山东后，孙仲德调往华东局党校任校委委员和一队队长。在党校工作期间，他除了授课外，还和学员同吃、同住、同生活，并找学员谈心，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四七年底，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孙仲德主动要

---

<sup>①</sup>曾希圣：《皖江的抗日斗争》，顾鸿回忆材料。

求华东局派他南下，深入敌后斗争。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接受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江淮军区副政委兼中共淮南工委书记，派他和梁从学率领华野先遣支队（由原华野第三十三团及干部支队组成，支队长顾鸿，政委方志明），迅速到达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和第二师的根据地侦察敌情，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辟和扩大根据地，为支援大军渡江作准备。一九四八年一月，孙仲德率领先遣支队从河南羊陂城林出发，穿过黄泛区，进入安徽涡阳、阜阳，再越过渡河，沿凤阳、嘉山、定远一线南下。因为部队是在蒋管区活动，孙仲德严格要求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部队宿营，他都要检查群众纪律，不管情况怎样紧急，从未间断。三月，国民党以九个团的兵力在定远县藕塘截击先遣支队，部队被迫转向舒城、潜山、太湖。六月初，先遣支队到达目的地，先后行军六个月，行程数千里<sup>①</sup>。

当时伪保安第六团盘踞在含、和、巢一带，这股敌人趁我军立足未稳之际，于六月八日纠集全部人马向我进犯。我先遣部队利用敌人兵力分散，指挥混乱等弱点，仅用了两个连加一个排的兵力，分别歼灭了这股顽匪，活捉了保六团从团长到炊事员共一千多人。这一仗打开了和、含、巢、无地区的局面，从此皖江老根据地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一地区的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又迅速发展起来，地方各级政权也都相继恢复。以后，孙仲德又指挥先遣支队在巢南山区重创了敌杨创奇的一个旅（广西军），伏击了保一团的两个连，生擒了巢湖地区的大土匪头子夏静然，全歼了夏匪的“招安队”。与此同时，孙仲德

---

<sup>①</sup>据孙仲德自传；顾鸿回忆材料。

又派出小分队秘密到和县沿江侦察情况，积极准备渡江南下，以便在皖南与游击队会合，创造条件迎接大军进军江南。这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淮海地区消灭敌人的精锐部队，撤销了先遣支队渡江南下的计划，改华东野战军先遣支队为华野先遣纵队。

一九四八年九月，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成立，下辖三个支队，孙仲德任纵队司令员。先遣纵队的任务为破坏津浦铁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阻止国民党江南部队向淮海战场增援。孙仲德率领先遣纵队在张八岭到明光一线活动，半个月内破坏铁路六、七次之多，一度切断了南北交通，搞得敌人狼狈不堪，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sup>①</sup>。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孙仲德、谭启龙率领先遣纵队进军合肥、桐城。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业已南逃，敌军刘汝明部盘踞合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先遣纵队两个连出敌不意直指合肥，占领了城外的飞机场，刘汝明部打了一阵枪炮便仓皇而逃。当时国民党合肥县长是由我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组织安排的民盟盟员龚兆庆担任的。他见我解放大军到来，立即下令开城欢迎。我军遂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合肥城。不久，桐城也为先遣纵队第七支队解放。至此，皖中大片地区全为我军控制，为我大军在巢湖练兵，横渡长江，提供了有利条件。

合肥解放后，孙仲德任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岩、宋日昌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四九年二月，党中央决定将安徽划分为皖北、皖南两个军区，孙仲德任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为了胜利完成

---

<sup>①</sup>孙仲德自传；陈郁法回忆材料。



支援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他亲自带领几十位同志到沿江一带敌占区，秘密动员和组织民工支援前线，同时搜集运载大军渡江的船只。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在沿江地区的一些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进行严密封锁，并且抓伕、抢船，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年船工、渔民，几乎全部躲藏了起来。面对这种困难和复杂的情况，孙仲德化装成船工、渔民，白天隐藏在渔村、港口，晚上找群众谈心。经过两个月深入细致的动员，组织起几万名船工，动员出无数的大小船只，为支援大军渡江作出了贡献。

## （七）

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皖北军区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开展剿匪反霸斗争，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革命秩序，领导军队参加建设工作，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军政干部。孙仲德参加了皖西剿匪的指挥工作。在剿匪作战中，他在总结多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长途奔袭，包围搜剿，设点伏击，跟踪缉捕，便衣小分队配合等多种战术。他还采取布置内线，利用矛盾，利用匪属劝匪投降等多种瓦解敌人的方法，为迅速剿灭大别山股匪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九月，全国除华南、西南一些地区和西藏尚未解放外，其余大部地区已经解放。这时，皖北地区急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新的形势下，孙仲德兼任了皖北地区军政干校的校长、党委书记。他经常到校过问工作，并亲自上课。当他发现一部分干部调到干校后不安心工作时，就给他们讲形势、讲任务、讲革命事业的发展，进行耐心细致的

思想工作，稳定了干部队伍。

一九五二年二月，孙仲德当选为中共安徽省委委员，五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当时党外的统战对象中有人对党有一定顾虑，孙仲德总是热情地跟他们交往，耐心地找他们谈心。他平易近人，说话直爽，所以团结了许多党外朋友。

一九五三年九月，孙仲德调至上海第二医学院工作，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他认真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工作。如对该院教师中分德日派、英美派的问题，下了很大功夫，亲自深入下去摸清情况，做好教育和团结工作。在审干和反右斗争中，他处理问题比较慎重，因此后遗症较少。一次，孙仲德同几位教授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沪时买不到足够的软席车票，他把软席让给教授们坐，自己坐硬席。这使教授们非常感动，他们说：“孙院长还是老八路作风。”他和该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在安徽患了重病，上海第二医学院派了专家组来为他诊治，有的还自愿留下来给他进行悉心治疗。

一九五八年，孙仲德调回安徽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他在长期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患有胃溃疡、高血压等多种病症，但他一直坚持工作，不肯稍事休息。这年夏天，他带病到华阳湖农场检查工作，中途接电话通知，立即赶回省委参加常委会议。因时急路远，长途颠簸，致使脑血管破裂，从此，他便一直卧床不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孙仲德因脑干动脉出血，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 冀朝鼎

曹云鼎 李吉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外贸经济学家冀朝鼎同志在清华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是他毕生奋斗、振兴中华的真实写照。

###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

冀朝鼎，号筱泉，一九〇三年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建昌村。父冀贡泉，系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获法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后任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山西省司法厅厅长、教育厅厅长等职。冀朝鼎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十三岁那年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当时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军阀连年混战，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冀朝鼎怀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进入清华后，很快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于一九一八年和一批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组织了一个叫暑假修业团的社团，其宗旨是：“振作我们的精神，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来肩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以为社会改造

之导火线”<sup>①</sup>。冀朝鼎被推选为社长，主要成员有施滉、徐永燮、张友江等。他们出版《修业杂志》，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宣传新文化运动。

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六月三日的大宣传中，冀朝鼎怀着满腔的爱国义愤，率领同学上街宣传，不料被军警拘捕，关押了三天。斗争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本质，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更促进了他的觉醒。这年夏天，冀朝鼎和施滉等人把暑假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行动口号，积极投入了“改良社会”、“改良清华”的热潮之中。他们仿照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的形式，成立了清华学生自治会。冀朝鼎以其真挚的爱国热忱，言行一致的品格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先后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部及校务改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学生法庭审判官及《清华周刊》的集稿人，负责《言论》专栏。他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积极撰写文章，提出了不少改良清华的建议。

在此期间，冀朝鼎和唯真学会的同学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在清华园里率先组织了“工读团”，自己动手印制信封、信笺和学习用品，并集股筹资准备制作和销售冰淇淋。冀朝鼎还用生活费节余的五块大洋从一个逃兵手中买了匹受伤的军马，精心养好后，无偿地送给了一家农户。一九二一年，清华校庆十周年之际，他又和徐永燮等编辑出版了《清华通俗周刊》，散发给附近的工人、农民和市民，“做为清华送给平民的礼物”<sup>①</sup>。在这本小册子里，冀朝鼎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编

---

<sup>①</sup>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写了《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怎样生活》和《去做》等文章，阐述人生的意义和志趣。他说：“如今世界不好，是人的过错，不是天命，亦不是神意”。“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不是单为吃喝的。”<sup>①</sup>他主张，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尽他的力量去做事，尽他活在世上的责任。他说：“若有一个永久去作，那世界便多了一个真正的人，少了一个假的人。若人人都永久去作，那人人便不愧虚生一世，作了真正的人。国家还怕不富强？世界岂能不平安？”<sup>②</sup>

冀朝鼎等人身为清华学子，又大多出身于书香门弟和官宦之家，却倡言“劳工神圣”，亲操养马、作工“贱役”，这不仅被守旧派认为“震世骇俗、不成体统”；就是一些高唱“社会改良”，坐而论道的社会人士也视为“言行过激”。然而，矢志改革的冀朝鼎却不顾时议所非，决心按照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去作。他常对志同道合的罗静宜（后与冀朝鼎结婚）说：我平生最敬慕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不移，奋斗终生，堪为千秋师表，望你以秋瑾、向警予为楷模，认真地向她们学习<sup>③</sup>。

也正是基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志趣，冀朝鼎和施滉、徐永燠、胡敦源、张友江、罗宗震、梅汝璈、罗静宜等八人，在“唯真学会”内结成了一个核心组织——“超桃”，意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生死之交，共同负起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重任。

为寻求改革政治，振兴中华的方略大计，冀朝鼎和“超

---

<sup>①②</sup>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sup>③</sup>访问罗静宜记录（1963年9月9日），存清华校史编写组。

桃”成员，一边认真阅读倡导改革的各种论著，一边又分头求教于国内名流学者。冀朝鼎曾于一九二四年亲往北京大学向李大钊求教，“畅谈一次、印象很深”<sup>①</sup>，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九二四年秋，冀朝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他潜心学业，留心时事，从古今中外的兴废变革中探求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历史真谛。

从北平到芝城，远涉重洋，漂零异域，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系中华。在他写给清华校友的一封信中，无限感慨地说道：“没有出洋的，一心一意想出洋，但是不居异乡，不知异乡的苦。我现在才知道，就生活快乐方面讲，出洋留学是牺牲，实在是牺牲！自从到美后，我对于一切谈‘别情’的诗词，比以前大能赏识，……现在回想起当日离别祖国时的感想，不禁沧然！”<sup>②</sup>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美国后，冀朝鼎义愤填膺，和芝加哥华侨立即组成沪案后援会，并被推选为该会对外宣传演讲员及《芝城侨声报》编辑。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废寝忘食地四处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介绍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在这段时间里，他虽然四处奔波，忙得要命，但他却因为自己能对祖国尽一点棉薄之力而感到欣慰。他在给清华校友的信中写道：“弟曾被举为芝校国际学生会会计及数（委员会）委员长，交结得印、日、韩、欧、美、黑白友人很多，忙虽

<sup>①</sup>访问罗静宜记录（1963年9月9日）。

<sup>②</sup>《冀朝鼎君来函》，载《清华周刊》356号。

忙，有时与异地人畅谈天下事，也还痛快，……我们有救国责任的人，忙些不算什么！”

这时“超桃”组织的几个成员都到了美国，他们在旧金山召开了全体会议，就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一致决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年冬天，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会，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推选冀朝鼎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会后，冀朝鼎等人又认真地讨论了“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的问题，最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还是共产党好！”<sup>①</sup>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冀朝鼎一经认定了“还是共产党好”这一真理，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会议期间，他从中国代表那里获悉了国民党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国共分裂的血的教训，使冀朝鼎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的丑恶本质，也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政党。于是，经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介绍，冀朝鼎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up>②</sup>。

这时，“超桃”组织中的其他七个成员也先后入党。于是，他们组织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由施滉任书记，冀朝

---

<sup>①</sup>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sup>②</sup>方杨春、廖训振：《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同志》，载1964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鼎任委员并兼任美共中央中国局机关报——《先锋报》编辑，和同志们一起用各种方法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美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罪行。

不久，他们又在旧金山召开支部大会，决定选派冀朝鼎、张友江两人回国参加斗争。他们路经莫斯科时，见到了正在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sup>①</sup>。根据当时国内斗争情况，组织上决定冀朝鼎暂不回国，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冀朝鼎奉调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其后，又派往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工作，担任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sup>②</sup>。

一九二九年，冀朝鼎奉命回到美国，参加美共中央中国局和《工人日报》的工作，同时兼办《今日中国》和《亚美杂志》两个党内刊物，他用“动平”的笔名，为这些报刊撰写文稿。

### “我的事业是在中国”

冀朝鼎留美之初，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历史，继而攻读法律。后来在革命实践中，由于关心和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研究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因而改学经济。当时，在出国留学生中有一种时髦的风气，就是愿意研究外国的问题，以外国的素材撰写论文。而冀朝鼎则独树一帜，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这时，他的生活十分窘迫，完全依靠美籍妻子海丽·利文（美共党员）做工维持。但冀朝鼎甘苦如饴，潜心研究。他从

---

<sup>①②</sup>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中国古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分析探讨，以此来解释中国历代兴废变革的经验教训，以为振兴中华、改良社会之借鉴。论文写成后，定名为《中国经济枢纽区域》（又译为《中国枢纽经济地带史》）。这是一本很有见解的学术专著，因而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英、美等国的一些大学把它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

冀朝鼎获博士学位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并一度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时，他跻身于名流学者之中，物质生活十分优厚，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念中华。为寄托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把出生于美国的两个男孩分别起名为冀中田、冀中民，教导孩子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冀朝鼎报国之志，忧国之心与日俱增。经美共中央中国局批准，他于一九三八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回国视察。视察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邓颖超，沟通了美共中央中国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为了向美共中央中国局汇报中国抗战的情况，视察期满后，冀朝鼎怀着无限眷恋之情启程返美。但祖国同胞们前仆后继，艰苦抗战的情景却时刻萦绕在心间。他深为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而没有能够亲身投入抗日前线而感到内疚和痛心。

一九四一年，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朝鼎再也按捺不住报效祖国的满腔热忱，经党组织批准毅然归国，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战争。

冀朝鼎归国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长期旅居国外，党员身份从未公开，同时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因而决定让他在国民党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冀朝鼎即通过其父冀贡泉和陈光甫的介绍，到孔祥熙手下任职。由于他渊博的学

识，丰富的斗争艺术和有利的社会关系，很快就得到了孔的赏识和信赖，委派他担任了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党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及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sup>①</sup>。冀朝鼎利用这些公开身份，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经常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官场之中，通过各种途径为我党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并掩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王寅生等。同时，他还为延安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奇缺物品，通过邓颖超转交后方<sup>②</sup>。

抗战胜利后，冀朝鼎被国民党政府聘为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日暮途穷的蒋介石欲以召开“国大”、攻打延安两项办法挽救危局，继续扩大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返回延安。临行前周恩来通过邓颖超化名写信给冀朝鼎。信中说：“吉兄（指周恩来）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sup>③</sup>冀朝鼎遵照党的指示，以合法身份继续在国民党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海丽带着冀中田、冀中民两个孩子来上海和冀朝鼎团聚。由于她们母子不懂中文，生活诸多不便，又鉴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海丽便请求冀朝鼎重返美国。冀朝鼎委婉而果断地答道：抗战虽然胜利，但革命尚未成功。振兴中华是我的夙愿，我的事业是在中国，我不能为一己的安逸、全家的

---

<sup>①</sup>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sup>②③</sup>访问罗静宜同志的记录（1963年9月9日）。

团聚而重返美国<sup>①</sup>。在此情况下，海丽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美国。身怀报国之志的冀朝鼎，就这样忍痛地和娇妻爱子做了最后的诀别。中美建交后，冀中田和冀中民兄弟多次来华讲学和探亲，他们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解放战争后期，冀朝鼎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天深夜两点多钟，孔祥熙突然打电话把冀朝鼎叫去。见面后，孔祥熙咄咄逼人地劈头问道：“朝鼎，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原来孔祥熙接到中统特务的告密，想乘午夜时分冀朝鼎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来个突然袭击。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冀朝鼎，临危不乱，坦然答道：“老伯，我追随你这些年，我的一切你都了解，你看我象不象共产党？”这一“军”将得孔祥熙无言答对，沉吟半晌，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道：“是啊！我看不象！都是些谣言。”<sup>②</sup>接着又讲了些“勤勉供职、效忠党国”的套话，让冀朝鼎回去好好工作。

国民党特务的这次告密，虽然没有得逞，但他们对冀朝鼎并不完全放心。在一次宴会上阴险狡诈的蒋廷黻借酒作态，举杯向冀朝鼎“祝酒”，“为你的共产主义干杯！”冀朝鼎也机智地举杯回敬：“为你的法西斯主义干杯！”<sup>③</sup>就这样半真半假，机敏地又一次挫败了敌特的阴谋。

鉴于冀朝鼎已为中统特务所怀疑，而全国的解放已胜利在望，极需象冀朝鼎这样的外贸、经济人才共筹建国大计，因而党组织指示他伺机撤往北方。一九四六年底，冀朝鼎出席在澳

---

①方杨春、廖训振：《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同志》，载1984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②访问罗静宜同志记录（1963年9月9日）。

③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大利亚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经济会议之后，回到香港，得到了“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邀他北上的电报。原来此时北平已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傅作义为直接取得美援，苟延时日，向南京政府请准，要冀朝鼎就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然而此时南京与北平之间的陆空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只有一架运送钞票的飞机近日内要飞往北平。于是冀朝鼎决定将计就计，搭乘这架飞机前往北平。南京当局答应了冀朝鼎的请求，但又居心叵测地只许冀朝鼎一人前往，不得携带家眷同行，冀朝鼎洞悉了敌人的阴谋，在拿到南京政府的关防命令之后，借亲友送行之机把夫人罗静宜带进机场。随机押运的负责人见到冀朝鼎和罗静宜时，即讨好地问道：“太太去不去？”冀朝鼎机敏地随口答道：“当然去啰！只是上边有限制，才去不了啊！”那人听了忙说：“哎，这不要紧，只要你签个字就行了！”于是，冀朝鼎和罗静宜安然跳出了虎穴龙潭，顺利地到达了北平<sup>①</sup>。

冀朝鼎到北平后，在其父冀贡泉的住所——北池子七十二号，曾与傅作义数次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之事。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冀朝鼎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自己一份力量，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 远见卓识的外贸经济学家

建国之后，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以其卓越的经济才能和杰出的外事活动，

---

<sup>①</sup>访问罗静宜同志的记录（1963年9月9日）。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冀朝鼎从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深切地懂得，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而开展对外贸易，增强友好往来，则是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方略。因而，早在建国之初，冀朝鼎就提出并拟定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措施。贸促会初建时，冀朝鼎就积极倡导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当时我国外贸工作尚未开展，这件工作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随着外贸工作的开展，仲裁处在处理外贸事务争端，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健全外贸经济立法等方面，日益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期间，冀朝鼎还亲自创办并主持了贸促会研究室的工作，最早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动。在当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从事此项研究，也确是深谋远虑，慧眼独到。

一九五七年四月，冀朝鼎率领我国代表团赴西德参加东亚贸易会并参观了汉诺威博览会回国之后，即刻组织代表团同志们起草了综合性的考察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资金不足、干部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经济发展；建立技术资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加强技术情报研究和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和主张。并提出应立即开始对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研究，培养干部队伍，以便一旦同这些国家建交后，尽快开展外事工作<sup>①</sup>。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些建议未能实现，但历史的进程再一次表

---

<sup>①</sup>方杨春、廖训振，〈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同志〉。

明，冀朝鼎是有远见卓识的！

在外事活动中，冀朝鼎机敏果敢、坚持原则。一九五九年，冀朝鼎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赴中欧的一个国家首都举办展览。展览馆开幕之后，每天都有大批友好人士前来参观、洽谈，但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起所谓“侵犯打火机专利权”的事件。

一天，这个国家的首都警察局派出四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展览馆驻地，出示出庭通知书后，要展览馆负责人签字，保证于翌日十时到庭受审，否则，立即拘捕。冀朝鼎得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预谋挑衅活动。如签字受审，就会损害祖国的尊严，如不签字，四名警察就守在办公室的外面不走。这时他正好有一个宴会必须马上动身出席。事出意外，情况紧迫，在场的我国工作人员暗暗着急。但冀朝鼎却沉着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能在出庭通知书上签字，更不能出庭受审，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话音未落，警察已走了进来。冀朝鼎立即站了起来，严正地对警察说道：“我是代表团团长，现在要去出席联邦银行的宴会，有什么具体事情请你们去找馆长。”说着，伸手拉着展览馆馆长李兆离出门上了汽车。当警方回过头来找馆长时，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告诉他们，馆长因公外出，不在馆里，四名警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在联邦银行的盛大宴会上，应邀而来的各方面人士盛情款待中国客人。当宴会主人致祝酒词之后，冀朝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而神情肃穆地说道：朋友们、女士们，当诸位在此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我们的友好合作举杯祝酒之时，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在贵国首都刚刚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人民很不友好的事件……，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投下了阴影……。

顿时，惊诧和愤懑代替了宴会上欢快的气氛。这些国家政权的操纵者——金融界巨头和实业家们担心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发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纷纷向警察当局提出质问，但事态并未停息。展览馆的同志从冀朝鼎的安全着想，劝他立即离开险地。我国使馆也指示展览馆的有关人员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再办交涉。冀朝鼎坚定地答道：我们是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来发展贸易关系、促进友好往来的代表使团。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损害，无理的起诉没有撤销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离开！他宽慰同志们说：我持有外交护照，警察当局不敢违反国际公法，动我半根毫毛。

在冀朝鼎的领导下，展览馆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迫使阴谋制造者们撤销了无理起诉；这个国家的内政部长还亲自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代表该国政府表示歉意。这件事的处理，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保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示了冀朝鼎高超的斗争艺术。

冀朝鼎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出国访问，他是我国与西方世界接触最早、交往最多、了解最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也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应邀赴英国讲学的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的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财政和贸易方面的杰出人物”<sup>①</sup>。

---

<sup>①</sup>1963年8月10日《泰晤士报》，转载于《参考资料》第5931期。

## 廉洁奉公的模范党员

冀朝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外事活动，经常周旋于灯红酒绿的官场酬酢和外交场合，但他“立污泥而不染”，“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不愧为无产阶级的一名英勇战士。”<sup>①</sup>

冀朝鼎严以律己，公私分明，从不以权谋私。建国初期，朝鼎同志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不少熟人、亲友找上门来，请他帮助安排工作，都被他婉言拒绝。有一位同他在清华和美国数载同窗，相识达四十年的老友，经组织介绍由上海来贸促会工作，一连做了三年临时工，冀朝鼎都未干预，最后还是按正常手续才转正。在外事活动中，他总是谆谆告诫工作人员，决不能私自收受和留用外宾赠送的礼品。一九五八年，他担任赴瑞士洛桑展览团团长，瑞士朋友赠给展览团几十只手表。归国后，他坚持全部交公。一九六二年，香港一位老朋友赠送他一台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他仍坚持交公。同志们都说，这是私人交往，应自己留用。但他仍让秘书去总务科登记后，才领回来放在办公室使用。他去世后，工作人员尊重他的愿望，仍把这台收音机作为公物上交。

冀朝鼎的经济一直是宽裕的，但他不尚浮华，自奉节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时悬念着贫穷落后的祖国和不敷温饱的数万万同胞。因此，无论是出国求学之时或洽谈外事之际，他孜孜以求的是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富民强国之

---

<sup>①</sup>《首都各界人士公祭冀朝鼎同志》，载196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策，绝不盲目追求和沉湎于豪华的物质享受。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旅居国外多年，一生从事外事活动的冀朝鼎不爱吃西餐，只爱吃家乡饭。每餐只要有陈醋、腐乳，就觉得香美可口，从不要求大鱼大肉；西装领带只是在外交场合才穿用一下，回到家中就改穿民族服装，他唯一会跳的“四步舞”也是一九五〇年为出席联合国会议才临时请人教的；他一生以穿用“国货”为荣。临终前，他带的是“上海”牌手表，穿的是已破了几个小洞的国产背心；为纪念抗战胜利而购置的一条毛巾一直使用到他与世长辞……他在个人生活上是如此俭朴，但却不惜重金大量购买字画、碑帖、古董、砚台。他酷爱祖国的一草一木，珍惜民族文化的传统艺术。他逝世后，夫人罗静宜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满满四卡车的重要文物献给了国家。其余一般文物卖给了文物商店，所得几千元都捐赠机关资助福利事业。这种不断地追求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又酷爱祖国的传统文化；自奉甚俭而又慷慨为公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品格，奇特而又和谐地在“改良世界，振兴中华”的宗旨下融为一体，构成了冀朝鼎纯洁无瑕的本质。

忠于职守，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冀朝鼎思想品格中的又一特色。建国之初，为打破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禁运政策（即经济封锁）”和“不承认主义”，尽快开创外贸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呕心沥血，奋发图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而又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措施，加强了贸促会各方面的建设。同时，又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的对外政策，利用外出讲学和参观访问等各种机会和场合，大力开展对外宣传联络工作，他还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直接用英语向国外听众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及对外贸易的前景，在国

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经常告诫大家：外事活动是祖国和人民的重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就会损害祖国的尊严。因此，凡是送他审定的重要决策和涉外文稿，虽经有关人员多次审核，他总要严肃、认真地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就是一些文法、词语上的欠妥之处，也要亲自改定。他的日常工作相当紧张，外事活动十分频繁，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在国外，时间紧迫，情况复杂，他就通宵达旦、日以继夜地进行工作。他每次出国归来，虽经长途跋涉，疲累不堪，但总是第二天就去上班。有时还带病工作，实在迫不得已才去住院，但工作需要时，常常提前出院。

长期的紧张工作和过重的负担，使冀朝鼎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虽经医生和亲友的多次忠告，他都一笑置之。一九六三年八月冀朝鼎再次受任，准备率领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他按照多年的习惯，和党小组长商定，临行前再参加一次党小组的生活会。不料，在会前四小时，即八月八日中午十二时，突患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内，经抢救无效，于次日中午一时二十五分与世长辞。

冀朝鼎逝世后的三天之内，治丧委员会就收到了来自二十二个国家团体和个人的吊唁函电一百五十多件。正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所说的那样：冀朝鼎“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sup>①</sup>“不愧为无产阶级的一名英勇战士<sup>②</sup>。”

---

①②《首都各界人士公祭冀朝鼎同志》。

附 本文资料来源:

1.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有关冀朝鼎同志的档案文献资料。
2. 南汉宸遗墨:《冀朝鼎同志生平》,载《汾阳党史资料》第2辑。
3. 贾文林:《缅怀冀朝鼎博士》,载《汾阳党史资料》第2辑。
4. 田际康:《冀贡泉 附冀朝鼎》,载《山西人物志资料》第1辑。
5. 《吊唁冀朝鼎同志逝世》,载196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6. 周培源:《毕业六十年——怀念母校三位最早的共产党员》,载《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
7. 树书:《读论文、忆战友》,载《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
8. 史集:《清华留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施滉烈士》,载清华校史丛书《人物志》第1辑。
9. 方杨春:《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朝鼎同志》(未刊)。
10. 廖训振:《冀老的精神永存》(未刊)。
11. 程海峰:《一些回忆和感想》(未刊)。
12. 李效民:《朝鼎同志二三事》(未刊)。
13. 苏德萍:《冀老和党小组》(未刊)。
14. 《党给朝鼎同志的一封指示信》(未刊)。
15. 访问冀朝鼎的爱人罗静宜、弟弟冀志枫及冀朝鼎的秘书方杨春,汾阳县志办公室李中才,杨耀科等的谈话记录。

## 郭晓棠

张仁荣

郭晓棠是河南省马列主义理论和教育战线上的老战士，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历任中共豫晋边工委宣传部长，中共豫西工委书记，中共豫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全国解放以后，他先后任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开封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郑州大学副校长，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务。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遭受残酷迫害。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含冤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郭晓棠出生在沁阳县紫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由于他的父辈勤俭苦做，兼营副业，经济比较富裕，全力支持他读书，因此，他得以从私塾一直读到大学。他的青少年时代，受其远房伯父郭振邦的影响最大。这位清末秀才对新学旧学都有相当根基，富有民主自由思想，在陵紫一带颇有名望。郭晓棠随伯父学习，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学业成绩连续名列第一，乡人称为“紫陵三才”之一。一九二四年，他来到当时河南的文化中心开封，以优异成绩被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和中州大学附中三所学校同时录取。高等学府宏大的读书馆、阅览室及其丰富的藏书，吸引

了年轻的郭晓棠，他决定进入中州大学附中。

在他的中学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起，中国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在读书馆和阅览室阅读中外杂志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兼收并蓄。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的著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对他都有影响。在文学方面，他曾发起了关于《诗经·邶风静女篇》问题的论争，他的文章发表在鲁迅主编的《语丝》上，后来被刘太白收进《白屋师说》一书，顾颉刚又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他还和沁阳旅汴、旅京同乡同学成立微光社，出版《微光周刊》。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开始接触到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他积极参加开封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及会后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示威游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群众性的政治活动，精神极为振奋。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又参加开封各校的罢课活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暴行。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以浩大声势由广东革命根据地向北发展，给河南人民极大鼓舞。这年底，学校提前放假。郭晓棠回家自修，在家乡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谩声社和三五学社，对本乡的土豪劣绅展开尖锐的斗争，揭露其罪恶行径，土豪们被迫低头。三个月后，他离开沁阳，重返开封，到中州大学（一九三〇年改为河南大学）攻读历史。在此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国民党背弃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面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轻易占领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潮。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张默君（女）在南京一次群众大会上愤激地说：“中国不亡于清政府，不亡于北伐军，而将亡于国民党之手！”

这使郭晓棠极为震动。与此同时，报载江西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主张对日宣战，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恰成鲜明对照，他由此产生了新的希望，认定共产党、红军是救中国的真正力量，从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河南大学全体师生代表组成反日救国委员会时，他被推选为主席。开封全市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他奋笔疾书《为反日救国告全国劳苦大众书》，呼吁抗日救国，斥责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一九三二年二月，济源县党组织介绍他与地下党负责人杨斯萍会晤。同年四月，经杨斯萍介绍，郭晓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晓棠入党后，积极从事地下斗争。他除散发宣传品、为红军募捐之外，还团结各校进步青年成立开封新兴教育社，并为该社起草简章，发表宣言。一九三二年六月，地下省委负责人杨斯萍，派他回沁阳组织革命武装，准备创立新苏区，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红军的进攻。他到沁阳城后，领导城郊农民到县政府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县政府将贪官田某撤职，并为农民争得城壕地的“永佃权”。接着，他又到紫陵镇找郭大佛、郭舜人、任建章等，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准备武装暴动。他们以紫陵小学暑假读书会为掩护，集合几十名学生秘密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八月二十日，他依照约定时间地点到郑州向上级党汇报工作，得知省委机关已破坏，杨斯萍等人被捕。接着，开封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郭晓棠的原住处被查抄。于是，他削发易服，逃出开封，隐藏于住许昌的一个表叔家，九月又流亡到北平，与组织失去联系。

流亡北京期间，郭晓棠生活艰难，给别人当家庭教师。但不忘找寻党的组织，不忘学习，利用住在沙滩公寓的条件，就

近跑到北大听课，潜心研究革命理论，认真读完了《国家与革命》、《二月至十月》、《列宁主义概论》等著作，政治思想得到更大提高。

一九三三年六月，郭晓棠应王拱璧邀请，到南阳嵩山公学任副校长兼教员。从此后，他以教员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到处撒播革命的种子，先后在南阳嵩山公学、新蔡今是中学、杞县大同中学、临汝汝阳中学、开封中山中学、许昌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处任教。在国文教学中，他精心挑选五四以来的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章，联系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进行讲解，向学生灌输社会科学知识，帮助学生了解革命理论，启发革命思想，深受学生欢迎。在他的帮助下，不少学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学生们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他。穆青说：“郭晓棠是我走向革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郭淑贞说：“郭晓棠同志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是我敬爱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

郭晓棠虽然生活漂泊无定，同上级党未能接上关系，但他始终坚持战斗，努力冲破黑暗，摸索前进。他在努力寻找组织关系的同时，竭力帮助沁阳、济源地方党的工作。他利用暑假到沁阳、济源、博爱一带工作，不但保存和恢复了豫晋边一带革命组织，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工作领域，成立了临时性的豫晋边党委。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他到许昌女子师范教书。在此期间，他把苏联海参崴出的《拥护新文字报》上用拉丁化新文字刊登的《八一宣言》翻译成汉文印制成册，散发到群众中去，对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这在河南来说是第一次见到的《八一宣言》。十二月下旬，他和灞陵中学教师郭洁民等一起组织发动了许昌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游

行示威。

“一二·九”运动后，通过灞陵中学教员王定南去北京同党的北方局联系。北方局派沈东平随王定南到许昌领导党的工作。直到这时，郭晓棠才与上级组织正式恢复联系。沈到许昌先与郭晓棠见面，由郭汇报工作情况，介绍了当时几个同情分子的政治表现等，后立即成立党支部，沈东平、王定南、郭晓棠、郭洁民、陈秀琴、路延岭、粟元恒七人组成，沈为支部书记。

一九三六年一月，郭晓棠同沈东平一起到沁济一带巡视工作，与豫晋边工委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但因郭在许昌受到反动分子的注意，不能久留，遂于同年春转移到北平。到北平后，他努力学习，以金秋笔名，撰写时事论文，利用自由主义派杂志《自由评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同年夏，北方局特科负责人刘子厚派他返回河南工作。于是他由北京返回许昌，参加省工委领导工作。按照省委指示，他先到郑州建立起党的郑属工作委员会（包括郑州、信阳、密县等地），又到开封建立党的组织，由杨伯笙、朱华、赵玉亭、李仲英等组成支部，杨为支部书记。郭离开后，这些组织即由沈东平、刘子久负责领导。

一九三六年秋，郭晓棠应洛阳复旦中学之邀，到该校任史地教员。他到洛阳后，在豫西这块没有建立过党组织的荒园之地，开拓党的工作。

在洛阳，郭晓棠通过洛阳中学校长周筱沛的一次宴会，认识了包括吴芝圃（纯甫）、郝得青和曲乃生在内的许多进步教师。他们一见如故，常聚在一起，谈抗日救亡问题。郭晓棠建议，建立由复旦、洛阳两校进步教师参加的国防教育社，宣



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家一致同意，并推郭晓棠、吴芝圃、郝德青负责领导。经过多次集合和倾心交谈，郭晓棠得知吴芝圃、曲乃生都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便很快给他们恢复了党籍。国防教育社的其他成员后来绝大部分都加入了共产党。为了迅速的打开豫西党的工作局面，同年十月成立了豫西工委，由郭晓棠任书记、吴芝圃任组织委员。一九三七年一月，郭晓棠又到偃师中学任教，开展偃师的建党工作；曲乃生也以洛宁中学校长职业为掩护，到洛宁开辟工作。经过努力，半年时间开辟了三个县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干部，成立了洛阳、偃师、洛宁三个县委。郭晓棠担任偃师县委书记，又相继在全县建立了三四个区委，在偃师中学教师、学生中分别成立了党的支部。到年底，偃师全县已有二百多名党员，一九三八年底达八九百名，一九三九年春近千名，成为河南省党员最多的一个县。

一九三七年八月，省委决定将豫西工委改为豫西特委，吴芝圃任书记，郭晓棠任组织部部长，领导创办党刊《战旗》旬刊。每一期《战旗》上，他都以祥庭、祥天笔名撰文，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党的工作。次年，他改任宣传部部长，主持特委机关报《前锋报》，在各阶层群众中广泛宣传我党主张。他又积极筹办《行都日报》，这家报纸的主要社论和重要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成亲笔修改的。

一九三八年底，刘少奇化名“胡服”来河南，利用渑池八路军兵站做掩护，召开豫西地区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郭晓棠参加了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刘子久任书记，郭晓棠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并负责举办省委党训班，训练党员干

部。此时，豫西党的工作由抗战初期的大发展，转入巩固组织的阶段。党训班第一期开学时，他亲自讲课，还请刘少奇为学员作了两个报告：《中共党史报告》和《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共产党员修养》由郭晓棠笔录整理，在省委党刊《前锋报》首次发表。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和对内加紧反共活动，豫西的政治形势急剧逆转，党的活动十分困难。省委决定除省委书记刘子久仍留在洛阳以外，省委机关以郭晓棠为核心，迁到洛阳乡下大屯村，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郭晓棠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七十队义务队员的身份为掩护，到各地、县委视察工作。一九三五年冬，豫西、豫南两省委合并为河南省委，刘子久任省委书记，郭晓棠任宣传部长。一九四〇年四月，刘子久去延安，郭晓棠代理省委书记，主持豫西党的工作。后来，张维桢任省委书记，他仍任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

在开辟豫西党的工作期间，郭晓棠不畏艰险，谨慎大胆，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战斗在第一线。有一天夜里，他正在伏案写作，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肺病发作。尽管如此，他照样坚持工作。由于他和省委其他领导成员的努力，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中，豫西党组织虽遭破坏，但党内的各级主要领导骨干，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向豫东、华北、鄂中等敌后输送了大批党员骨干，还向延安输送了不少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

由于斗争形势日益紧张，一九四一年三月，党中央指示河南干部向陕甘宁边区撤退。郭晓棠于六月二十日动身，随省委机关于七月初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此后，他担任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分别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汇报

了河南的工作情况。为了总结和研究白区工作，经陈云提议，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了白区与统战工作小组委员会，郭晓棠是小组委员会三名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大后方反顽固派斗争的经验》，对白区斗争进行了总结。

一九四三年春天，郭晓棠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期间，郭晓棠因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党的方针、路线问题发表了看法，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在“抢救运动”中，又遭到了康生的迫害，被诬为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河南“红旗党”成员。一次会议上，康生竟狠狠地打了郭晓棠一耳光，把他的眼镜打落老远，接着又停止了他的组织生活。郭晓棠一方面坚持原则，驳斥诬陷，不断向上申诉，从没屈服；另一方面，继续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抗战胜利后，中央派郭晓棠去东北工作，中途滞留晋察冀边区张家口数月。一九四六年六月，党改派他到华北联合大学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工作。在华北联大，他先后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并写了《中国社会发展史论纲》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简论》两本小册子。

一九四九年秋，郭晓棠奉调回河南工作。

一九五〇年，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刘少奇、任弼时批准，恢复了郭晓棠的组织生活，决定他的党龄从一九三二年入党时算起。接着，他被调到河南大学任文教学院副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后任河南大学教务长，开封师院副院长等职。此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学校的任务由培训革命干部转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材，干部、教师对新的任务一时难以适应。郭晓棠不畏困难，带领教职员工认真学习

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研究实际问题，很快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一系列规章制度。

一九五六年，在中共河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委员，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接着又担任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副主编，还被选为河南省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六一年，郭晓棠调任郑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一九六四年当选为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郭晓棠专门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前后近十年之久，从事大学工作约十五年，发表了大量的著述。现在找到的他的主要著作约有十余种，如《社会发展史纲要》、《资本主义社会史论》、《社会主义社会史论》、《中国社会发展史论纲》、《近代中国社会史简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关于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共产主义同盟与共产党宣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注》等等。

郭晓棠生活俭朴，唯一的嗜好就是好看书、买书、藏书。他一生虽然屡遭诬陷，迭逢逆境，职务忽升忽降，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地位的高低和个人荣辱得失，始终坚持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一九六四年，他还积极支持爱人齐欣把日常生活中节约下来的一千二百元钱，支援林县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为郭晓棠郑重地举行追悼大会。一九八三年在中央为“红旗党”假案

平反后，省委专门发出一六六号文件。至此，郭晓棠多年冤案终得彻底平反昭雪。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是郭晓棠的《自传》、《自述》、《回忆录》，齐欣整理的《郭晓棠同志传略》，以及中共河南省委档案局、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编纂委员会、中共沁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保存的有关郭晓棠的资料。

# 张克侠

杨明训 谢公义 张光天

## (一)

张克侠，原名张树棠，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村乡侯陵屯村。从他刚刚懂事的时候开始，国家的不幸，民族的灾难，便朦胧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中，并开始了辗转动荡的生活。

张克侠祖籍海河一带。连年兵乱天灾，他的先辈为了逃生，从外乡流落到侯陵屯村落了户。他的父亲张起豹为了寻找生路，在未及成年的时候，就离家出外当兵，由兵士逐步升为现役兵排长、续备军队长等职。他同母亲远离家乡，随同父亲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河北获鹿县时，张克侠开始读私塾，有时帮母亲上街卖菜。民国成立后，其父在湖北宜昌王占元部下任营长时，由于和团长发生矛盾，于一九二〇年遭到诬陷，投入狱中，不久，便被解职。此后，张起豹开始信奉基督教，成为一个忠笃的教徒，携全家迁住河北通州（今通县）定居。

张克侠在北京汇文小学毕业后升入汇文中学。他一面用功学习，一面读了不少历代中外名人传记，在思想上受到很大激励，渴望学到本领，以便为国家出力报效。

一九一五年，当张克侠将于中学毕业前夕，北京及全国各

地集会，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及开展各种反日活动。张克侠积极投身于这一反日爱国浪潮中，热情宣传抵制日货。同时，他开始思考人们都在议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堂堂中华大国，为什么竟受一个小小的日本任意宰割？最后的结论是：我国的政府，特别是我国的军队太腐败，太无能。于是，他决心离开学校，弃文习武，投笔从戎，拯救祖国，遂毅然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就在张克侠上军校的时候，其母李贵馨双目失明，无人照料。在亲友的主持下，母亲给他定了亲。妻子叫李德璞<sup>①</sup>，两人在一九一八年结了婚。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因前妻去世，经人介绍续取了张克侠妻子的姐姐李德全，张克侠成了冯玉祥的连襟。这一关系为他以后长期在西北军从事党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二年，张克侠升入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军校毕业的同学，大都要求分配到粮饷充足的军队去。冯玉祥的军队，粮饷均很困难。张克侠纵观全局，感到冯的部队纪律比较严明，便和二十几名同学，如董振堂、边障武、张寿龄、张子春、王治和何基沣等，要求分到冯玉祥的部队。到冯部后，他先在宋哲元的二十五旅见习，半年后，由于染上了肺结核病，不得不离开军队回家疗养。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大本营。张克侠的同学李明灏在军政部程潜的属下任职，来信邀他前往广东工作。此时，冯玉祥再三劝他养好病之后仍回

---

<sup>①</sup>婚后，张克侠为她取名张英侠，解放后，组织上取名李英。

他的部队去，并许以要职。但张克侠对广州十分向往，决心到大革命发源地广州去。为了防止沿途敌人的缉查和对亲属的迫害，他把原来的名字张树棠改为张克侠。张克侠抵广州后，经李明灏介绍，被任命为军政部少校科员，后来又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

北伐前广州的革命气氛，大大开阔了张克侠的眼界，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革命熏陶。特别重要的是，使他知道中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他在广州参加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群情热烈的场景，他从未见过，心情异常激动。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和讲演的各界人士中，有农民和工人。工农代表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大会及所受到的欢迎，尤其令他感动。

讲武堂学校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多次来校讲话，张克侠每次必听。他还在广东大学聆听过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问题，使他深受教育。在此同时，他认识了在军官队学习的左权，二人成为好友。

对于广州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张克侠都曾详尽地写信给他的内弟李连山<sup>①</sup>，嘱托他读给冯玉祥听，劝告冯不要再同军阀们混在一起，应不失时机地加入革命行列。李连山十分支持他的看法，并且回信说，冯玉祥表示赞同他的见解。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克侠得知冯玉祥已同国民党和北伐军取得联系，便立即返回北京，到冯玉祥身边参与戎机，被任命为学兵团团副，团长是张自忠，二人结识从此开始。

---

<sup>①</sup>李连山，中共党员，曾多次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者，抗战后期为日寇迫害致死。



## (二)

一九二六年底，李德全正在苏联，来信邀张克侠前往苏联学习。一九二七年春，张克侠在王以哲帮助下，到达了久已向往的莫斯科。暑假后，他进入中山大学。此时，左权亦在中山大学学习，两人关系密切，互相勉励。张克侠通过政治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成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工农大众推翻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使人民获得彻底解放。因此，他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二八年暑假期间，学校决定张克侠返回中国。临回国之前，党组织找他谈话，说明他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已经考虑过，但目前暂不宜解决；并郑重告诉他：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威胁，国内反动势力猖獗，在这样的生死关头申请入党，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希望他继续经受考验<sup>①</sup>。

和张克侠同时回国的还有张振亚（后改名张存实），也是从西北军来的。张振亚已在东方劳动大学入党。张克侠曾多次向他谈及入党的愿望，张振亚答应回国后替他联系。张克侠回国后，继续在冯玉祥部工作。

一九二九年五月，张克侠接到张存实来信，叫他到上海与董健吾接头。七月间，张克侠到达上海，见到了董健吾。在董安排下，后来，又会见了张存实和组织派来的一位同志。这位

---

<sup>①</sup>张克侠：《我的经历与回忆》（1979年10月5日）。

同志与他谈话后，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由张存实负责转交给组织。在递交申请书的同时，他向组织提出了到苏区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过了一段时间，党组织正式通知他说：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介绍人为张存实、李翔梧二人（都是在苏联的同学）。党组织还通知他，今后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由党直接派人与他联系。关于他今后的工作和个人心愿，组织认为他在西北军中有较好的条件，在那里工作对党更为有利，勉励他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sup>①</sup>。张克侠得知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十分激动，当即表示：党的需要即是自己的需要，将不惜生命去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使命<sup>②</sup>。

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及军事部部长。张克侠在周恩来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政治生命的征途。

不久，根据党的指示，张克侠由上海重返西北军，被任命为张自忠师的师参谋长。他积极参与了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随时将有关情报送给党组织。

一九三〇年十月，冯、阎反蒋战争失利，冯部退到山西境内。为了掌握战后形势变化情况，张自忠让张克侠到各地调查。张克侠借这个机会，从南京转到上海，又通过董健吾找到了党组织。组织派人听取了他关于此次反蒋战争经过及西北军情况的汇报。他请示今后工作，组织上要他仍回西北军，由张存实担任单线联系<sup>③</sup>。在上海期间，党派陈赓等来旅社探望他，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

<sup>①②③</sup>张克侠：《我的经历与回忆》（1979年10月5日）。

返回山西后，入晋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已改编为二十九军，张自忠部改为三十八师，张克侠担任该师的参谋长。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杨献珍曾通过胡鄂公与张克侠联系，搜集有关军事情报<sup>①</sup>。

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瓦解西北军，除收买和重用韩复榘、石友三外，还策划冯玉祥的高级将领反冯，任命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为四个路军的总指挥。孙、梁、吉因此离开了冯；张自忠被任命为第二十三路总指挥。张克侠趁张自忠不在师内，便把队伍带进了山西，以避免参加反共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陆军大学招考，张克侠被二十九军保送考入陆军大学。陆大的学制为三年。在学习期间，他一直和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张存实经常找他搜集军事情报和索取军事书籍。有一次，张存实介绍一位在第三国际工作的马同志来找他。马需要一个助手，张克侠便介绍自己的弟弟张树棣前往<sup>②</sup>。

一九三三年五月，张克侠接内弟李连山来信说，冯玉祥正与共产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张克侠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前往参加。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暑假在庐山开办一个包括陆大在内的各军事学校学员参加的训练班，张克侠未予理睬，不经请假就到了张家口，表示支持冯玉祥爱国抗日。

---

<sup>①</sup>张克侠：《我的经历与回忆》（1979年10月5日）。

<sup>②</sup>张树棣，后改名张克义，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克侠与张克义从小亲密无间，但是双方谁都没有向自己的骨肉兄弟暴露过自己的政治面目。张克义被送到苏联学习情报业务，后被派到东北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被日军逮捕杀害。

张克侠抵张家口后，初任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后来，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地前来张家口参加抗日的学生很多，为接纳他们及为军队培养干部，冯玉祥决定开办一个干部学校，由张克侠任校长，冯玉祥为名誉校长。

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十分仇视，一面封锁张家口，造成种种困难，一面百般破坏同盟军组织，收买反冯的部队（如庞炳勋），拉拢中间部队（如孙殿英）。但是，抗日同盟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士气很高，作战英勇，曾一度收复多伦、沽源，获得全国的赞扬。到八月间，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下，抗日同盟军面临困境，财源已近枯竭，武器弹药极端缺乏，轰动一时的抗日同盟军终于失败。张克侠借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关系，以因病离校为由，重返陆大。

###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驻守宛平县芦沟桥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发动进攻，扩大了侵华战争。我国全面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在此之前，张克侠已担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他向宋哲元提出一个集结兵力于京、津、保地区，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计划在日军增援之前，以二十九军约十万之众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他将此计划通过肖明<sup>①</sup>报请中共北方局领导同志审核，得到了党的同意，

---

<sup>①</sup>见《肖明白传》，胡华，《肖明》，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0卷。

并给了书面批示。在党的指导和支持下，他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并采取了适当措施。此时，除与肖明联系外，他与王世英和徐冰也有过来往。

七七事变发生后，具有爱国传统的二十九军官兵，在党的影响下奋起反击，坚守在芦沟桥的金振中营奋死抵抗，予敌重创，保卫了阵地。次日，我党发出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动员二十九军全部开赴前线应战，根据党的指示，张克侠动员宋哲元抗战。宋态度犹豫。张克侠对宋指明：作战固然有困难，但也有克敌致胜的条件，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会成为民族罪人，战而不胜仍可以向人民交待。他又告诉宋：按现在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sup>①</sup>。宋认为他讲得有道理，便叫他提出作战方案。张克侠连夜拟好作战计划，内容与上次给党的计划相同。

第二天凌晨，张克侠将计划送去时，宋哲元的态度突然变了。在军事会议上，宋只主张“以守为守”。不久，在汉奸及投降派的包围中，宋受到恫吓和利诱，对形势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后，决定与日寇妥协。张克侠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队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位置，但宋却未采纳。

七月二十七日傍晚，日寇逼近南苑，宋哲元此时才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命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晚六时许，赵到南苑，张克侠向他介绍了情况，召集师、旅、团长开会，发布了口头作战命令。然后，张克侠就随军部进城。夜间，日寇突然袭击南苑，南苑失陷，城中兵力不足，人心惶

---

<sup>①</sup>张克侠：《我的经历与回忆》（1979年10月5日）。

惶。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等三人奉党的指示来找张克侠，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庆祝大会，借此激发抗战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让张克侠去说。张克侠认为这是党的指示，便答应照办。二十八日张克侠找宋哲元、冯治安（城防司令）等。此时宋、冯等已决定当夜撤退，但冯不告诉张，表面却答应张可以开庆祝会。直至当晚，张克侠才获悉撤退消息。他立即把这一突变通知刘清扬、张友渔、杨秀峰等，让他们立即组织转移。

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张克侠心中燃起怒火，忍不住痛哭一场。

后来，张克侠到了南京，得知冯玉祥在无锡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随即前往。不久，冯玉祥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又随冯到了山东。在这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张克侠日夜都在苦心钻研和寻求坚持抗日的方案。并多次与宣侠父晤谈。

一九三七年九月，第六战区长官部奉命转移到新乡。同时，第一战区也因作战不利，南撤到安阳一带，两个战区混合到一起，蒋介石便撤销了第六战区，平汉线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第六战区人员办完交待，随同冯玉祥回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南京政府西迁武汉，张克侠又随冯玉祥到武汉。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到冯玉祥处晤谈。张克侠通过王梓木、宣侠父向驻汉口的中共中央办事处转交了一封信，请求党对今后工作给予指示。党决定让叶剑英领导他的工作，并与其直接联系<sup>①</sup>。此时，党又介绍了许多当时在汉口

---

<sup>①</sup>张克侠：《我的经历与回忆》（1979年10月5日）。

工作的领导同志与他交往，如罗炳辉、张经武等。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使他在精神上得到很大慰藉，也了解到新四军、八路军英勇作战和坚韧不拔的英雄业绩，并且比较深切地理解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和以后如何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更好地工作。

一九三八年初，张自忠奉命回五十九军任军长。张自忠亲自打电话给冯玉祥，邀张克侠前去相助，冯表示同意。张克侠将这件事报告给党，请求给以指示。党鼓励他前去。叶剑英还于二月二十五日在董必武住处附近的普海春饭店为其送行。饭厅在楼上，叶剑英特意让张克侠在餐室中坐在背向门口的地方，防止特务窥视。张克侠对此十分感动，深深体会到这是党对于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张克侠于三月初抵达山东滕县，仍任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参谋长。不久，临沂吃紧，该军奉第五战区命令前往增援。当时，有人主张守城，而张克侠力主野战，主动出击敌人。在张自忠的同意下，张克侠布置三十八师为左纵队。一八〇师为右纵队，强渡沂河，向日军王牌之一的板垣师团展开猛烈攻击。

三月二十一日，张克侠襄助张自忠军长，以黄维纲的三十八师进攻刘家湖之敌，以一八〇师进击苗庄之敌。敌我双方展开了拚死搏斗。由于我军官兵同仇敌忾，视死如归，一向骄横的日军损失惨重，主力被歼五千余人，最后狼狈溃逃。

临沂战役的胜利，是台儿庄大捷的序幕。它粉碎了日军王牌板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企图，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它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它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创造了武器低劣的国民党杂牌部队战胜武器优良的日本“皇军”的生动范例。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204

---

定 价： 3.40 元